极左思潮与中国

1958—1981

ZUOSICH

YUZHONGGUO

(美)威廉·A·约瑟夫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CRITIQUE OF ULTRA-LEFTISM IN CHINA

极左思潮与中国

1958-1981

【美】威廉·A·约瑟夫 著

[illegible]平 顾昱 刘小兵 刘长江 译

1958—1981

极左思潮与中国

(1958—1981)

〔美〕威廉·A·约瑟夫　著

夏　军　　顾　星

刘小兵　　刘长江　译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四牌楼2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高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46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81023—180—4

D·3　　定价：4.60元

译序

极左思潮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进程，并在1958年以后一段时间内左右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今天，在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深切瞩目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深刻反思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今天，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对极左思潮进行深入研究和全盘否定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能使我们了解历史。对历史无知的最大惩罚就是历史的回复。因此，只有了解极左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史，我们才能找到它之所以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殖、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其次，它能使我们了解极左思潮的内容及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增加识别、抵抗能力。最后，它能使我们理解现今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解中国共产党现行开放与改革政策的正确性，并有助于我们甩掉历史包袱，轻装迈进21世纪。

基于这一原因，我们翻译了本书。我们认为，该书所论述的下列思路是得当的：(1) 在过去两个十年中，批判极左思潮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采取了何种形式？在不同阶段又是如何展开的？(2) 批判极

左思潮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其主要争端是什么？不同时期的争论点之间有无连续性？为什么说极左思潮给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危害？(3)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演化过程中，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极左派各自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批判极左思潮对回顾和评价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产生了什么后果？(4) 批判极左思潮对中国政治产生了什么作用？并且是怎样和1958年以来中国政治的总格局相适应的？这类批判和调整的事件对形成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起了什么作用？同时又给中国政治的未来带来了何种预示？

全书的分析大体上是客观的，其所引用的绝大部分是国内外的公开资料。当然，由于作者的研究角度、思维方法及其所持的政治立场，书中亦有不妥之处。因此，读者参阅本书时，有必要进行鉴别和分析。

翻译分工为：

夏　军：鸣谢、第1章；

刘小兵：第2章(第1节)、第3、5、7章；

顾　星：第2章(第2、3节)、第4、6章；

刘长江：第8章；

顾星、刘长江：主要参考书目。

顾星担任全书统稿、译校工作，并核查了全书的中文引文出处(个别一时确难查找者，照原著直译)。

吕书琼、马迅也参加了本书的校订。

本译著是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的科研项目，项目负责人刘小兵组织了翻译工作。东南大学出版社施恩为本译著进行了大量工作；张爱宁、邢光虹、徐正超等誊写了全书，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本译著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指正；同时，请读者在引用时参阅原著。

1988年8月7日于南京

鸣　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西格丽德·伯杰斯坦。多年来，我从她对中国的了解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她确实是我在把论文扩充成书这一“长征”中的伙伴，没有她的支持，完成本书是无法想象的。

我也十分感激斯坦福大学的约翰·威尔逊·刘易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我还是康乃尔大学的一名学生时，是他——约翰·刘易斯第一个鼓励我踏入研究中国天地的；此后他便成了我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时的顾问，并指导了我的博士论文的写作，本书即以这篇论文为蓝本。我特别要向原在斯坦福大学，现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哈里·哈定表示由衷的谢意，他也是我的论文的指导老师，以后又是他激励着我将该论文修改后出版。在我被训练成为一名汉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那些年月里，约翰·刘易斯和哈里·哈定两人给了我很大启发和鼓舞，本文所写的文字远不足以补偿他们在知识和个人情份上惠及于我的东西。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亚历山大·达林、维克托·李以及莱曼·冯·斯赖克——他们提出的深思熟虑的评论和各种疑问，对我修订这篇研究性的论文帮助很大。莫里斯·梅斯纳

详尽而又透彻地审读了原稿，对如何阐明观点、精心发挥和组织文章等方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罗德里克·麦克法卡对“大跃进”这一章谈了自己的见解，他提请我注意书中几个有待改进之处。

肖-蒂·法尔考坦还在威斯力大学任计算机咨询顾问时，就向我介绍了字码处理技术，并为我与出版人、排字工打交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巴巴拉·辛吉格利斯、凯瑟琳·安特娜、凯罗·玛扎雷拉、凯利·沃克以及洛丽·马丁，她们都在原稿打印的不同阶段付出了自己的劳动。

我感谢约克大学和威斯力大学在我完成论文和酝酿本书写作期间，不仅给了我以知识上的激励，而且给了我一份工作。威斯力大学“大学奖”委员会为我撰写这本书稿提供了慷慨的资助。

最后，我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尤其是杰西·贝尔对本书的信任以及在出版过程中自始至终给予的指点。约翰·费朗纳是位极有才干且又和蔼可亲的文字编辑，雪莉·泰勒对本书的文字做了出色的校订和润色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有多种理由可以说明本书是许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只有我才能对涉及本书材料的描述和解释工作承担全部责任。

威廉·A·约瑟夫

目　录

1　一场是非颠倒的革命……………………（1）
价值观、权力、政治和革命……………………（4）
极左思潮的含义……………………………………（6）
方法和设想……………………………………（11）
目的……………………………………………（17）
极左思潮对修正主义，一切是非颠倒的混战…（20）
2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批判…（27）
历史上的关联…………………………………（28）
批“左”的主题………………………………（39）
结论……………………………………………（66）
3　未能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根源…………（77）
稳步革新，高潮，第一次退下来………………（78）
第一次退下来…………………………………（82）
从“共产风”到“右倾机会主义”……………（87）
没有批判而退下来……………………………（91）
为什么是一场不彻底的批判……………………（93）
结论……………………………………………（96）
4　批判“大跃进”……………………（101）
思想意识形态……………………………（102）
领导人物和工作作风……………………（110）
政策尺度…………………………………（123）
结论………………………………………（137）

5　从极左到极右：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143）
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147）
围绕着批判的斗争……（152）
失败的批判……（155）
对批判失败的解释……（163）
6　从极右到极左：批判“四人帮”运动……（177）
第一阶段：作为极右分子的“四人帮”……（179）
第二阶段：剥去“左”的伪装……（188）
第三阶段：对极左思潮的正面进攻……（194）
怎样理解批判“四人帮”矛头的先后转变……（205）
7　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213）
两次批判之间的主要联系……（215）
极左路线的核心内容……（227）
结论……（247）
8　批判极左思潮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255）
对批判的回顾……（256）
批判极左思潮和毛泽东以后的政治环境……（266）

1

一场是非颠倒的革命

好吧，基蒂，如果你光听我讲，不要那么多话，我就把我对是非颠倒时期的各种想法告诉你。比如说，透过那面镜子你可以看见一个房间——正象看见我们的客厅一样，只不过看出的刚好是另一种位置相反的景象。

《透过镜子》

1981年1月25日，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的特别法庭对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和另外九名被告进行了终审判决，他们被指控在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下了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罪行。〔1〕起草好的判决书对这起案件进行总结，作出了宣判。指出被告是一伙“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这些活动，包括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所施行的政治上和肉体上的迫害，以及企图煽动武装叛乱，发动政变等，被认为构成了“刑事犯罪”。判决书进一

步指出，法庭的职责只在于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不审理各被告人的不属于刑事犯罪的其他问题”。〔3〕

法庭判决中附带提及的“其他问题”，是指江青和她的亲密的同谋，即所谓“四人帮”，以及一度担任中国国防部长的林彪及其追随者在政治上所犯的罪过。林彪本人据称已于1971年在策划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以后，因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对所谓“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审判长达两个月之久，而围绕这一审判所进行的宣传反复强调，被告在“文革”期间所推行的基本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极左的政治路线，不论其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多大的错误和危害，都不属于刑事惩罚的范围，因而法庭的起诉没有列入这些内容。正如中国的特别检察庭庭长在一份宣布结束庭前调查的报告中所说：“准备提起公诉的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所犯下的罪行。不涉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4〕

把政治错误和那些需要惩处的刑事犯罪区别开来，这与其说是用以掩饰这次“公开”审判的一种巧妙手段，以及事后为监禁党的领导层内部一场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还不如说，作出这一区分是自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异常趋势而呈现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必然结果。在毛泽东以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邓小平体制竭力把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后近三十年来所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归咎于意识形态、政策和领导方法上的极“左”偏差。对极左路线提出的一项最严厉的指责是：党内的激进分子将同志间的意见分歧夸大为极端的意识形态对抗。极左分子常常把政策上的意见不一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从而竟导致把清洗和迫害作为处理党内争议的主要方式。激进分子认为政治上的错误和犯罪行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政治上犯错误就等于犯罪，因为这类错误被视为构成了“人民”和蓄意破坏革命的敌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邓小平势力的巩固，中国领导人迅速

采取措施，削弱在激进分子统治时期党内斗争中老是出现的那股火药味，因为政治上的稳定对加快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是必要条件。当时试图重新确定党内斗争的性质和范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复强调反革命罪行和政治上的错误应该有分析地区别开来，绝不能象“文革”期间那样不加区别地任意处置。

这种划分在审理“四人帮”以及林彪的追随者们的案件中得到了体现，很明显，他们并非因政治上的过失或思想上的错误，而只是因为他们事实上犯下的反革命罪行而听候审判。审判的公开记录表明，对被告的指控，实际上只限于他们对政敌的迫害、政变计划、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等。(5) 审理过程中丝毫没有提到极左思潮，因为按照应将反革命罪和政治错误加以区别的逻辑，极左思潮本身并不构成罪行。

但是，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自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以后，极左思潮在中国确已受到了批判。从“大跃进”到“文革”结束为止一直支配着人民共和国政治舞台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灾难的激进思想和各种政策都已遭到了摒弃。毛泽东的继承者在动用大量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制定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案的同时，也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来驱除过去遗留下来的“左”的幽灵。然而，由这一意识形态上的清扫运动体现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不单纯是毛泽东以后的一种现象，其最初做法可回溯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初期，当时展开的几次对极左思潮的批判，都为其后批判“四人帮”树立了很有影响的先例。本书要考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分析并纠正他们在建国后历次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左”的偏差。同时还要探讨，这种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怎样、又为何会成为党的领导层内严酷的政治冲突和论战的焦点。

价值观、权力、政治和革命

人们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投身到斗争中去。有些人企图借助政治运动和政府工具来进一步达到个人目的，如自我满足，或捞取财富等。另一些人则为了追求更为崇高的事业而介入政治。公开的誓词并非可靠的向导，单凭它并不能验明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外表上相似的价值模式或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其动机也许是极不相同的狭隘的个人利益和广泛的社会义务的混合体。令人激奋的词藻和乌托邦式的空想常常模糊了赤裸裸的权力之争的起因，不承认政坛上充斥着权力冲突和价值观冲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对政治的解释就是不完全的。把政治仅仅看作追求无私的社会目的未免天真；但把政治贬低为一种仅由兽性的本能和自私的目的激发起的霍布斯式(英国哲学家，1588—1679年，认为人的本性使人象狼与狼一样处于可怕的斗争之中——译注)的斗争，那就剥夺了政治生活的其它意义，而只剩下污浊不堪的含义了。只表现为一种权力之争的政治是罕见的，它常常是对应当如何管理社会，如何分配资源，如何行使权力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之间的斗争。换言之，政治的核心和许多热点是由价值观上的冲突引起的；政治是一种解决或控制价值观冲突的过程。〔6〕

革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冲突。如查尔斯·蒂利所言，它是“正常政治进程中的一种极端状况”，在这种状况中，围绕权力和影响展开的角逐成为生活中一种不断得到发展的事实。在各种竞争集团对社会不同部分取得控制，并提出关于谁应全面统治国家这类“有效的、好斗的、互相排斥的主张时”，〔7〕“多极政权”的相应出现，正是辨别革命形势的重要标志。革命党人的目的是要把“多极政权”变为一个政权，并用这个政权来取代现有政府，以此作为国家组织中占优势的权力；政府的目的则是抵制这种对其权力和合法

性的攻击。双方为控制地盘和赢得国民的忠诚而厮杀得难解难分。

此外，革命毕竟首先是一种试图用贬斥旧价值、灌输新价值的方法来触发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行为。[8]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狂暴的、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支持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的实现以及彻底重建等级化的统治体制等，都是革命变革中的重要方面。[9] 但隐含在这些特点背后的基本事实是：革命是两种对抗性矛盾的世界观和两种互相抵触的价值模式之间的一场冲突。诚然，由革命和反革命的对抗造成的希望和恐惧，证明了历次运动斗争中确实存在着迫切需待考虑的权力、财富以及地位等具体因素，但是，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革命形势中的物质现实并没有削弱这种冲突的意义，但只有正确评价这种斗争的价值观，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那些罕见的政治事件——革命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典型性、不妥协性以及难预见性。

其次，政治还具有另一种标志，即指革命运动也包含着价值冲突所形成的一种内部动力。革命者会承认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必要性；但他们可能会在采取何种手段推翻旧秩序、以及取代旧秩序的新社会应具有何种确切的性质等问题上，持有极不相同的看法。革命运动内部这类政治争辩所固有的价值观上的冲突，从许多方面看，其严酷和不可调和的程度——就它对社会、历史所蕴含的重要意义而言——或许堪与向旧政体发起最初挑战的情感力量相比。请看英国革命中的平均派与克伦威尔派之争，法国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争，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争，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农村起义者和偏爱城市暴动者之间的冲突——这里只举出了几个决定了"伟大革命"之命运的内部政治斗争的例子，已能足够说明问题。[10]

本书既研究革命运动内部的价值观的冲突，同时也探讨革命党内的价值观的冲突和权力斗争的关系。它对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展开的持久论战这一方面进行了描述

和分析。本书着重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新中国历史上的几次运动的反应，那几次运动不仅导致中国的经济混乱、政治动荡和社会不满，而且还几乎导致革命的失败。那几次运动又必然被看作是由意识形态上范围广泛的严重的"极左思潮"（极左主义）引起的病症。这是极左思潮的批评者依据某种假设作出的评价——自然，这种假设并不为那些被批评者所接受，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极左，而却深信不移地认为这些政策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具体体现。在极左分子看来，他们的批评者犯了右倾错误，任其发展下去，将导致抛弃建设一个真正革命的社会的责任。持截然相反观点的政治人物之间就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展开的斗争，已成为近二十年来左右中国政治的主要力量。[11]本章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党派论战中的一方——极左派的批评者——的行动和观点所作的详细考察，来阐明这种力量的作用和影响。

极左思潮的含义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名称所具有的政治含义源于法国大革命。[12]当时（1789—1791），为治理新的共和政体而成立的国民代表会议在讨论王室是否能拥有否决权、以及立法机构的组成和公民权利的性质这些议题时出现了分歧。一派要求给予王室以绝对否决权，以维护其至尊权利；设立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上院，以保留贵族的某些权力；通过课税和规定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来约束人民的主权范围。反对者则要求对封建主义残余发动一场更为深刻的进攻，他们呼吁取消王室否决权；建立了一个一院制的议会，议会的一切权力则属于经选举产生的议员；废除公民权利中所有的约束性的资格限制（除性别外）。而第三派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则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13]

当议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时，那些鼓吹给予王室以否决权及

相应地位的议员，都坐在立法院的右边(以会议主持人位置为准)，而他们的反对者则坐在左边，折衷办法的拥护者们恰如其分地坐在中间。这样，政治争论和形式安排之间的这种吻合，用大卫·古特的话来说，就反映了“近代社会中最根本的分裂，原则、立场和政治上的冲突。”[14]左派逐渐与要求根本的变革、追求人民的主权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平等联系了起来。而右派则不可避免地与保持现状和维护特权的要求联系在一起。

基于这种政治上的划线，很自然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壮大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就为自己采用了左派这个称谓。左派纲领被视为实现无阶级社会这一目标的象征，而右派纲领则被看作是对这一历史必然趋势的反动；此外，左派和右派这些标记还成了鉴别革命运动内部思想意识偏向的衡量标准。[15]

口头革命派的思想倾向通常被认为反映了右倾错误，他们热衷于搞妥协和“改良主义”，把所负有的革命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右派的这种倾向以“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形式出现，前者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篡改，后者的政治罪过在于为了暂时的个人利益而牺牲长远的革命目标。另一方面，那些看来为过火的革命热情所驱使，作出不负责任的行动的人，或奉行不切实际的政策的人，则被认为犯了“左”倾错误。无论何种右倾观点，照字面上讲，理应遭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谴责；但是，“左派”这个名称却体现了迈向无阶级社会的运动中的正确方向，为保持神圣性，对那些因对时代持过激态度而造成偏差的左派，可以称作加注了引号的“左派”，以示其偏离了真正左派的立场。“极左派”这个名词被援引来指这些偏向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16]本书为简化起见，在大部分篇幅中，将省略引号，并且不时交替使用左派和极左派这两个名称。[17]

这样，作为反映截然不同的政治价值的行为指示器，左派和右派其原始的客观含义渐行消失，它们成了较为主观的范畴，人们用它

们来诋毁政治对手，将对手们随心所欲地归入“左派”或归入“右派”。这种左派和右派标记在功能上的主观性质导源于这一事实，即检验革命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由个人或政党以贴标签式的评价来决定的。一方视为偏离或有损于革命事业的战术、策略或政策，在他们的反对者看来，则是保证社会主义取得不断成功和进步的正确的战术、策略和政策。左派和右派这两个名称逐渐带有很大的相对性，它们依照历史形势和革命运动内部变化着的权力联盟而变换其意义，通过其客观和主观意义上的混淆，它们成了二十世纪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进行深刻的价值观论战和浅薄的派别斗争时使用的重要的文字武器。

由近来苏联和中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所持的观点，可以集中说明这种变化着的历史环境中的左派和右派这两个名词的相对性。自斯大林时代以来，苏维埃党就一直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视为异端，因为它依靠农民这个基础，并运用非正统的革命策略。“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苏联坚定了这一信念，即毛主义是极左思潮的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18]当然，中国共产党人断然拒绝这种观点，他们把这种观点看作右倾观点，认为是苏联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本质的暴露。

自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和中国为极左思潮所下的定义之间存在的距离明显缩短。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态度也把“大跃进”和“文革”看作是1958—1976年间在中国政治中占支配地位的极左思潮的典型表现。而且，中国不再用修正主义这个字眼来形容苏联国内的情况，并称两国间矛盾的实质是苏联的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这一态度上的变化并不意味中国会重新回到苏联的发展模式中去，它毋宁表明中国现领导是要清除他们自己营垒内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在国内的政治词汇中废弃修正主义这个字眼的愿望。结果，中国对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决策中具体表现出来的极左思潮的看法，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不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尽管在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中，加贴极左思潮标签的手续并不严格，但这个名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使用中，还是保留了某种确定的内涵。事实上，本文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极左思潮这个名称的基本含义，在反复无常的政治斗争中竟出乎意料地始终没变，而不断变幻的政治斗争则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特征之一。下一章将较详尽地阐述与极左思潮有关的偏差和谬误的内容。而现在，我仅就本书所使用的这一术语作些一般性的说明。

1937年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实践论》中，为革命运动内部"左"的和右的偏差下了最为精确的定义。他首先肯定，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使政治行动与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具体现实保持一致，而不能让它主观愿望或偏见遮掩了当时形势的要求，他接着写道：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19]

于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共同特性就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20]除了这些相似的认识论根源外，这两种错误还被认为导致了相似的后果，因为两者都严重损害了革命。如毛泽东二十年后指出的："就其对革命事业

造成的危害来说，'左'并不比右好到哪里去，因此必须坚决予以纠正。"[21]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识到"左"的和右的偏差有其共同的起源和影响，但还是把它们认作两类不同性质的现象。右倾观点因受倒退的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反映出对革命变革并不全力以赴的态度。极左观点从理论上看，它意味着一种与革命的最终目标并行不悖的价值观；可是极左的行为被判定严重脱离了时代的物质和思想现实，因而不是推进而是损害了革命事业。如米歇尔·瓦勒所称，极左分子是些坚持"在显然不利的形势下追求向往之物"的人。[22]简言之，他们是急躁的革命者。

在共产党的政治中，"左"的和右的错误都意味着对"正确"路线的背离，这条路线经由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运用得以确定，并经由革命政党内部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得到批准。[23]"党的路线"涉及到为完成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而对一种特定形势和派生的实际措施（战术、战略、政策）所做的"全面估价"。[24]"基本路线"是指"为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制定的基本准则。"[25]因此，党的领导层的主要任务就是搞清当前的主要矛盾，以基本路线来促成其解决，针对各种特殊问题宣传党的有关路线。同时它（基本路线或党的路线）还包含特有的意识形态成份（各种价值评估）和具体政策的确切陈述，

从理论上讲，路线必定总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科学地"制定出来的。[26]但这并不排除会发生"左"倾或右倾的异常情况，这得归咎于负责贯彻这条路线的个人。在革命实践过程中，这种犯错误的趋势和适当的补救措施都在预料之中。事实上，如约翰·刘易斯指出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总是紧盯着错误和缺陷"，因此它的学说"对错误和令人紧张的问题特别认真"。[27]这种专注的态度，反过来表明了领导层不允许个别出现的偏差干扰正确路线的决心。

然而，路线本身也能成为引起革命运动内部重大冲突的根源。

在某种时候，革命形势中的政治形态也会面临类似“多极政权”的窘境，各种有争议的路线的支持者声称唯我独革，而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是右倾或“左”倾分子，这时革命运动就陷入了一种“党的路线的多元化”。[28]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巴枯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分裂开始，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南斯拉夫对苏联的霸权提出挑战，直至五、六十年代中苏破裂的出现，无不说明了这一情况。[29]这种“党的路线的多元化”也同样成为经历“文革”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把这种状况形容为卷入了“路线斗争”，这是一场围绕着“不同的政策纲领”“展开的斗争”，“这些不同的政策、纲领将会把革命引导到完全不同类型的制度上去。”[30]换言之，路线斗争是党的领导层内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冲突的表现。

在这篇研究中，我首先关注的问题是作为路线斗争过程一部分的极左思潮，而不是全面的“正确”路线陪衬下较为一般的“左”倾问题。我在以下事例中将要描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起因于不相容的价值观念的差别和由此决定的各领导集团对政策的选择偏好。本文的任务，是要详细阐述极左派的批评者是怎样发动一场政治攻势，以反对据信会给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造成危害的路线。采用极左思潮这一术语，只是基于他们的批判性眼光，当然他们与他们的对手所奉行的那条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确定这一术语的偏差属性是评论家的事，就作者而言，他毫无传达一种政治批判之意。

方法和设想

这样，本书的着眼点，就是自1958年以来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我所说的极左思潮批判，意指一种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才日益认识到“左”的路线错误是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失调的根源，这个过程体现着宣传工具的批判和政策调整的某种结合。在实例研究中这种情况变得更明显，每一问题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上述的批判和调整总是具体结合在一起的。了解到这一点，对了解二十多年来批判的演进过程关系极大；眼下只要这么说就够了：宣传工具的批判和政策的调整，正是中国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两个互相联系的显著特点。

假如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阐述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支配中国政治的两条路线斗争，那么，只注重一方的观点（极左派的批评者的观点），而不给斗争的另一方参与者以发言权，这么做有什么理由呢？采纳这种方法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右派的批评家们的观点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分析的题目，[31]总的说来，党的领导层内在"文革"中成为打倒对象的那批人，在文献中被认为持以"消极观点"；他们被认作是一条特定路线的捍卫者，这条路线确定了某种加快经济增长，而不是促进平等和革命变革的发展模式，同时，这条路线还体现出他们自己对维护和扩大官僚政治权威和技术治国权威的权力的兴趣。[32]他们同样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动力的牺牲品，在"文革"的群众运动中受到清算，直到1976年10月的一次政变后才重新掌权。[33]但这部分人不仅是那条特定路线的捍卫者，而且还有理有据地反对他们在党内的反动派所代表的那条路线，并试图从好几方面向那条路线发动政治攻势，换句话说，在疯狂的"文革"中靠边站的那批人（和那些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执掌大权的人），对极左倾向展开过有条不紊的批判，他们断言，极左是一股对新中国的发展极为有害的倾向。这种批判源于根本的价值冲突，同时也出于对权力政治的过于精心的考虑。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构成了195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中最具活力的要素，然而它的历史和影响却多少被忽视了，如果注意到由'文革'事件造成的中国宣传运动和西方学术研究一叶障目的情况，那么这种现象自然就容易理解了。本文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叙述迄今为止多少被忽视

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方面的内情，以期对这一分析上的短见提供一条矫正措施。

毛泽东逝世后兴起的对中国政治中极左思潮的批判，其重大意义为作者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某一方面入手进行论述，提供了第二个理论依据。自从"四人帮"垮台后，党的领导层为拨乱反正，为使"文革"的意识形态名誉扫地，作出了巨大努力。这对于任何当代中国事件的观察家们来说，是很清楚的事。这种努力的一个方面就是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在这场批判中，林彪、"四人帮"推行的路线受到了持久的政治抨击。目前，批判已进展到这一地步：极左思潮被认为是在这两个十年(1957—1976)的大部分时间内，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它把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引向了灾难的边缘。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几乎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有出现的问题，都被归结为受到极左倾向的影响。毛泽东以后的第一年里发起的批判极左派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较早的批判所提供的先例。而目前对这些先例进行的描述和分析，是想把当前的这场批判放到历史的角度去看，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体制的动机、行为和选择意图。因为要想完全地把握近几年中国前进方向的意义，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理解现领导对中国解放后近三十年来大量遗留问题所持的"否定"评价，正如我们为此必须详细了解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所采纳的各种政策和思想体系的"积极"内容一样。换句话说，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作为毛泽东以后在中国发生的一起事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发展中国经济，即所谓四个现代化的运动。[34]

这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包含着几个相互联系的设想，以便对中国的政治进行研究。第一个设想蕴含在上述评论中，它涉及到对政治生活加以理解的价值上的确切性。这样的价值观对分析一个负有促进革命变革和社会的迅速现代化使命的自觉的思想体系来说，显得格外重要。[35]我们应设定，一种意识形态是由其内部一整套合乎逻辑的价值观所组成，它规定着人与其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

系，指示着人们能够被接受和被期待的行为界线，确定着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这些价值观念为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行为方向带来一种凝聚性，如前所述，它们也是政治冲突的一大根源。

第二个设想是，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中心人物十分严肃地对待意识形态和教义学说，他们作出的政策选择，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教义上的倾向性。这里所作出的分析指明，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内，将中国领导层整个儿卷入的这场决定性斗争，远不只是如某位分析家所认为的，是将十足的权力政治这一事实遮盖起来的“一种或左或右的舞台艺术”。下面的实例研究有力地提醒人们，自1958年以来的那些年里发生的政策变化和政治路线的变更，很难说只是在一个公认的价值模式中出现的“瞬间变动”。[36]

相反，本书试图阐明，两条路线斗争是党的领导层内就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展开深刻的价值观斗争的产物。[37]这一价值观上的分歧，由对诸如教育、物质刺激和福利这些专门问题采取的具体政策所发生的争论反映出来，[38]最终还导致了两条路线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原有的共同思想基础都已被置于不顾（这并不是靠对某些词句和符号的操纵达到的）。这一分歧如此深刻，以致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罗列出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对毛泽东思想的含义和效力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借用弗兰兹·舒曼的话来说，我们所描绘的为“纯粹的思想意识”（它以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和“实践的思想意识”（它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是“指导行动的理性手段”）所影响的价值观斗争，曾一度被自诩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凝聚力量。[39]

第三个设想是这种价值观斗争不仅给中国的精英政治，而且给中国的全面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舒曼还指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去替换已被推翻的那个体系的价值结构，并为新秩序的合法性提供一套根据。[40]从“大跃进”到“四人帮”被捕，这期间支配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反映着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合法

根据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冲突。毛泽东把这场冲突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矛盾的体现，是对立面斗争的具体化，这场斗争将使革命免于停滞和僵化。但路线斗争也使党内滋长了派性，导致了人们的普遍疏远和玩世不恭，并转移了人们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紧迫任务的注意力。确实，这一价值观论战的深刻性和持久性给中国革命注入了一股力量，但它也极大地削弱了这一制度的认同感、一致性、正统性、组织结构、效率(和)稳定性；换言之，这场论战“继续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政治上的腐败”。[41]这是中国现领导必然处置的的一笔遗产。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丰富了这笔遗产，本文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描述围绕着这场批判发生着怎样的政治斗争。

最后的一个设想，左派和右派这两个名称，作为对中国政治进行分析的工具，尽管在政治交战中被当作贬抑的标签而加以主观运用，但仍然有其客观意义。[42]我们设想它们具有某种有效性而不是一种“用以解释和证明清洗领导成员的必要性的文饰手段”。[43]左派和右派这两个名称，在经验上与不同的意识形态方向和一整套政策相联系——也就是说，它们分别是尖锐分歧的政治路线的指示器。

这些路线之间的区分，常常被人们形容是中国领导层内的“激进派”对“稳健派”、或“革命派”对“务实派”之争。激进派和革命派通常强调社会经济的平等，或强调对生产关系不断进行变革的重要性，而稳健派和务实派则赞成经济现代化和发展生产力。[44]当然，这些区分从总体上看过于简单化，在某些方面，非但没有澄清反而模糊了互相冲突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差异，但它们至少反映了围绕党的领导层内普遍关心中国发展道路是否正确的问题而展开的具有戏剧性的深刻斗争，仍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参照。

可是，这里仍必须牢记，左派和右派(或激进派和稳健派)作为理解中国政治的描述性术语所具的相对性。自然，毛泽东以后的领

导者们将会拒绝用右倾标签来形容他们的政治路线，而会把自己说成是真正左派的代表（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遵循一条足以确保革命未来的路线）。同样地，"四人帮"则会对加诸他们那条路线的极左标记嗤之以鼻，并严厉谴责现行体制的右的本质。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大胆使用左派和右派这种略称，按照它们的相互关系来描述客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但我们在把它们当作政治标签使用时，决不能忽略这些术语具有的相对性。

关于构成本书体系的三个选例研究的理论依据，在此予以说明。这些实例涵容了以下几个时期：(1) 大跃进（1958—1961）；(2) 林彪死后的整个反省时期，宣传工具以"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名称进行批林（1971—1973）；(3) 在"四人帮"1976年10月被清洗后对他们展开的批判运动。第一、二两个实例处在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声称极左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势的那段日子；第三个实例发生在那些一望即知的嚣张跋扈的极左分子被从党的领导层撤换后的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之处是：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本身成了领导层内引起严重政治争论的焦点，一方试图扩大这种批判，而另一方则试图停止、转移或限制这种批判。这些事例共同构成了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事件的结果反过来都极大影响了随后而来的批判的展开。这一点在"大跃进"情形中尤为明显。当时对"大跃进"进行批判的方式，正为以后二十年里如何处待极左思潮这个问题提供了样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只举出了一个划分为两个相关阶段的单一事例，而不是三种可以进行严格比较的情况。

选择这三个事例，并不意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其他就没再发生过反对极左倾向的事件。任何有关展现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批判极左思潮的真正综合性的研究，都必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的问题分析：为纠正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土改运动中"左"的错误所作的努力；[45]为遏制1955—1956年合作化运动中的过失行为而发动的"反冒进"运动；[46]为制止红卫兵的无政府状态，

中央认为红卫兵在执行"文革"赋予的从"党内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使命时走向了极端(原文如此—译注)〔47〕；还有对1967—1968年所谓"5·16"极左阴谋集团的镇压情况，当时这一集团鼓吹"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企图控制外交部，对周恩来及其在国务院的同事发动全面攻势。〔48〕所有这些事件虽然都与我们探讨的论题有关，但在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演进过程中，只能算是次要现象。因为它们在批判或纠正极左路线这方面，从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而我所精选的要作详细研究的这三个实例，是中国政坛上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三起主要事件，它们各有其充分的分析价值。

目 的

我已提到了本书最重要的意图：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过程进行考察，这一批判展示了自1958年以来奠定了中国的精英政治和社会主义发展格局的根本的价值观冲突的基础。在详述一些必须予以解答的主要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清楚地表明后面的分析中不打算涉及的事情：

首先，本书将不注重对个人进行政治评议。当然，在讨论围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展开的政治斗争时，必然会频繁提到诸如彭德怀、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张春桥这些人物，对他们思想意识上的推断失之偏颇也可能在所难免。然而，这些个人和某条特定政治路线之间的联系，仅在我们这个论题中附带提及，并不打算致力于详述任何个人的政治面目。只是在谈到毛泽东时，才真正涉及了对个人作用的评价；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位主席对于批判的演进过程所施加的重要影响，而并不试图"证明"把他看作一个极左分子恰当还是看成一个极左派的批判者更好，

同样，本书也不对中国政界中的派别活动进行所谓研究。这里

所感兴趣的是：价值观的冲突是如何从个人的联系，思想观念的共鸣，共同的政治目标……，逐步发展到领导层内部出现阵线分明的情形。围绕1971—1973年间“文革”派同老干部之间的斗争，1976—1980年间“凡是派”同“实践派”之间的斗争进行的讨论表明，在这两个时期中，非正式的政治联盟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除此以外，我将不对这些联盟的起源、结构和功能作为单独现象而予以详尽说明。另外，与中国政治中关于派性问题的观点相反，本书认为，“文革”中之所以形成许多对立的集团，更多地是出自鲜明的价值观选择，而不是出于赤裸裸的权力较量。[49]

第三，本书将不对批判极左思潮问题提出一种“事后批判”——就是说，本文不准备象洛厄尔·迪特麦在研究“文革”对刘少奇和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批判时所做的那样，试图去验证他那种针对历史实录的评判的正确性。[50]这里的探讨是了解中国对极左思潮的看法的第一步，以后再试图径直考察毛泽东以后的领导者就极左路线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所作的客观性评价。[51]

第四，应该明确，本书并不研究极左思潮本身，它将不直接涉及革命运动内部的激进倾向的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起源问题，也不涉及占据主导地位时的极左路线的作用问题。它所感兴趣的中心问题，并不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所谓极左时期，而在事后对这些年代进行的批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叠合之处，例如，“大跃进”就特别能说明这种情况，但重点总是放在后一个方面，即“大跃进”的调整，而不是“大跃进”本身的细节，又如在林彪问题上，重点是研究死后对他的批判，而不是他炙手可热的那些年月；再如“四人帮”，重点是放在垮台后的头几年，而不是他们得势时的详情。毋庸置疑，对实践中极左思潮的作用进行分析性的讨论，这将符合综合性的事后评判之意，但这种评判已超出了本书涉及的范围。

本书探讨以下四个中心问题：

1.在过去两个十年中，对极左思潮的批判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采取了何种形式？具体又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批判在不同阶段是怎样展开的？这类批判的不同事例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为了揭示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关注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本身为什么常常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触发起严重的政治斗争。顺着这条探索路线，就将发现价值观冲突和权力政治之间的联系，这在上述讨论中已经强调。第3、5、6章涉及了三个不同实例中开展批判的政治动力，因而直截了当地涉及了这些问题。

2.极左派的批评者们的主要理由有哪些？什么是引起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主要争端？在什么意义上，极左思潮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危害？从哪些方面看，极左思潮被认为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和实践？在所讨论的不同时期中，由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引出的争论点或主题有没有连续性？

通过对这一批判的内容所作的详尽阐发，我们拟解释有关极左思潮的一般性问题。虽然本书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但这些观察和结论也适用于对其它社会主义运动中类似现象的分析。[52]第2、4、7章将讨论和分析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有联系的一些重大争论问题。

3.在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演化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什么作用？毛主席的政治行为和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经由什么途径，而对批判或纠正党内"左"的倾向产生什么作用？批判极左路线对回顾和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产生了什么后果？

4.最后，在中国政治中，这种批判发生了什么作用？这类批判是如何与1958年以来中国政治的总格局相适应的？这类批判和调整的事件，对形成毛泽东以后的政治环境起到了什么作用？同时，又给中国政治的未来带来了何种预示？

极左思潮对修正主义：一场是非颠倒的混战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总以为中国领导层内是团结一致的。当“文革”表明这种看法仅是一种错觉以后，他们又设法证实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初产生，可一直追溯到解放以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年代。这样，在六十年代中期爆发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就被看作是长期紧张的矛盾冲突达到顶点的表现。而这些矛盾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争夺国家权力的领导人之间的迥异经历和担任的不同角色所决定的。[53]还有的人则着重阐述毛泽东对“修正主义路线”展开批判的内容和背景，以及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者和认为是体现了官僚主义路线的制度进行斗争的过程。[54]上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极大丰富了我们关于“文革”的见解，即要使这一翻天覆地的事件变得容易理解，就不能只把它看作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但是，在有关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这种解释工作容易导致一种诱使人们模糊对“文革”冲突的复杂性的片面认识。同时，它虽对毛泽东批判修正主义的起因和本意作了充分说明，但是并未直接涉及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这又是一种片面情况。

早在“文革”以前，一些观察家就已颇具见地地对引入中国政治的原动力问题作了描述，认为这种原动力常常表现为对相互抵触的两类社会主义目标——革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逐渐变革）和现代化（生产力的增长和发展）的追求。[55]随着发展，这两类互相抵触的目标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演变为“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但由于在六十年代后期，那种煽动性的雄辩和单方面的权力分配的做法已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主要特征，因此，尾随“革命”的路线，把“现代化”的路线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相对来说要

容易些。可是那些热衷于现代化，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发展当务之急的人，恰恰一贯坚持把这条“革命”的路线批判为“极左”路线，但这种批判的进展却远非前者那么容易。[56]

换句话说，两条路线斗争的双方，都各自具有支持和否定的一面。我们对“革命”路线的支持方面(支持者所主张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做法)和否定方面(反对者批判其为修正主义路线)有了很好的了解；我们也相当清楚地把握了现代化路线的支持方面，缺少的是对它的否定一面的了解，即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做法的评价。

“文革”所展示的，事实上也是贯穿于中共党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确实是一场是非颠倒的混战。[57]批评家的眼光总是存在着偏差。被一些人痛斥为威胁革命生存的错误路线，在另一些人看来，都恰好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引向胜利的唯一道路。中国政治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这种镜子映象式的外观，看上去似乎很清楚，但实际上并非那么清楚，因为我们对这场斗争所持的观点，大多只是依据我们从镜子的一面所看到的景象。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摆脱这种状况，象爱丽丝所说，“透过镜子”去瞧瞧另一面是些什么。但与爱丽丝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的将不是一个人为装扮的世界，而是锻铸中国共产党政治达三十多年之久的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

注释

〔1〕按照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层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之久(1966—1976)。他们将“文革”正式划分为三个阶段：(1)从1966年5月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从而“铺天盖地”地展开了这场运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这次会议“将‘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正式认可了林彪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选定的接班人所具有的显赫地位；(2)从九大到1973年

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在这段时期中，林彪拟发动反对毛泽东的政变，结果折戟沉沙，身死异邦。“四人帮”巩固了他们在领导层的地位；（3）从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一时期围绕着对周恩来和毛泽东即将迫近的接班问题，在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发生了剧烈冲突。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6—41页。

我将在本书中始终用这个十年期来界定“文革”，尽管西方大多数中国政治分析家都认为，“文革”从1966年开始，到1969年就已走完了全程，中国政治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巩固时期后，就转入了另一轮抢班夺权的斗争。例如，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第18章。

〔2〕〔3〕《北京周报》1981年第5期第14页，第16页。

〔4〕《参考资料》（1980.9.27），载国外广播资料服务中心：每日报导：《中国》（1980.9.28）第52页。

〔5〕有关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材料汇编可参见《历史的审判》一书。

〔6〕马克·R·阿姆斯图兹：《政治科学导论：冲突的控制》（伊利诺斯州，格伦弗；司各特，福斯曼，1982）。

〔7〕蒂利，《革命和集体暴力》第512页。另见蒂利：《从动员到革命》，第7章；托洛茨基：第9章；阿曼：第59—60页。

〔8〕克朗尼克：《关于革命的思考》；参见：霍普第237页；格曼尼：《革命的道德含义》。

〔9〕有关这方面更多的材料可见约翰：《革命变革》；阿伦德特：《论革命》；哈格佩：《革命现象》。

〔10〕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冲突未曾同样推动了“次要”的革命进程。例如，墨西哥的赞巴塔和立宪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或古巴革命中的西拉(山地派)和拉诺(平原派)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都指明了这一点。前者的情况可见小约翰·沃马克：《赞巴塔和墨西哥革命》（纽约，经典文库，1968）；后者的情况可见切·格瓦拉：《古巴革命战争回忆》（纽约，每月评论杂志，1968）。

〔11〕有关这些歧异观点的一项综合性研究可参见格雷：《两条道路》。

〔12〕对这些术语的来源的讨论参见：古特，第26—32页。

〔13〕崇布：第56—85页。

〔14〕古特：第9页。

〔15〕〔16〕瓦勒：第62—67页。

〔17〕在对“四人帮”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思考了较次要的“左”的偏差和极左路线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只在于程度不同而已。他们宣称，把二者之间的差别看得如此泾渭分明，只会使纠正这类错误的工作复杂化。与此同时，党在对是否要用引号将“左”的偏差和真正的左派加以区分的问题显得犹豫不定。在现今的用法上，他们试图在提及极左思潮（并不是极端的“左派观点”）时省略引号，但当只在一种贬斥的意义上使用“左的”这个词时则保留引号。例如，1979年2月4日光明日报认为在提到所有“左”的错误时应去掉引号；另见《北京周报》1982年第27期第3页。

〔18〕例如克里斯托夫：《共产主义视野中的毛主义》。有关苏联对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迄止的中国革命的评价的一项范围广泛的讨论，见佩克：《革命与现代化和修正主义》。

〔19〕〔20〕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271—272页。

〔21〕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

〔22〕〔23〕瓦勒：第64页；第37—39页。

〔24〕〔25〕刘易斯：《红色中国的领导阶层》第87—97页。

〔26〕瓦勒：第42—43页。

〔27〕刘易斯：《红色中国的主要教条》第5页。

〔28〕瓦勒：第41页；也可参见蒂利：《从动员到革命》第218—219页；波特：第55页。

〔29〕见特拉斯科维奇：《革命的国际》；鲍科努：《全球共产主义》；克罗丁：《共产主义运动》。

〔30〕迪特麦：《理论和实践中的路线斗争》第680页。

〔31〕对右倾观点批判作过最为详尽研究的要数迪特麦，例如见他的《刘少奇和中国文化革命》。还可参见其它关于“文革”的由来和影响的著作，例如，多比尔：《中国文化革命史》；贝特尔海姆：《中国的文化革命及工业体制》；欣顿：《中国的转折点》；以及舒朗：《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中的几篇论文。

〔32〕怀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

〔33〕贝特尔海姆：《大倒退》。

〔34〕有关毛泽东以后时代早几年政策发展的综述，可见鲍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35〕斯塔：《意识形态和文化》第8—13页。

〔36〕内森：《政策摇摆》第728—732页。

〔37〕用一种比较观点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冲突进行的讨论，见洛纹索尔：《发展与共产党政策中的乌托邦空想》。

〔38〕见加德纳和艾德玛：《中国的教育革命》；里斯金：《毛主义和动机形成》；兰普顿：《福利、冲突和中国的政治体系》。

〔39〕《红色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第22—24页。

〔40〕同上，《序言》；还可参见斯塔：《意识形态和文化》第10页。

〔41〕“政治上的腐败”概念，和已被引证的它的对立面政治发展的概念均采自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3页。

〔42〕有关中国政治中政治帽子的使用和滥扣，见贝内特：《政治帽子和民众间的紧张关系》。

〔43〕内森：《政策摇摆》第732页。

〔44〕哈定：《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奥森伯格和古尔斯坦：《中国的政治透视》；利贝索尔：《冲突的战略》。

〔45〕毛泽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75—1177页。

〔46〕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场运动存在着“严重不足”，因为它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见《关于反右倾和保守主义的谈话》（1955.12.6），载《毛泽东思想杂录》、《联合出版物查询目录》61269-2，第467—469页。

〔47〕1967—1968年，“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红卫兵曾鼓吹要成立中国人民公社，关于这一事件见梅哈纳：《北京和新左派》。有关上海一次类似的极左派的造反，见沃尔达：《张春桥和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尼：《革命和官僚政治》。有关“文革”前期北京的一些大学的无政府状态的情况，见欣顿：《百日战争》。关于毛泽东对这些情况的看

法，见《和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7.28)，载《毛泽东思想杂录》第469—497页。

〔48〕伯顿：《文化革命的极左阴谋》；古多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

〔49〕内森：《中共政治的一种派性模式》；《中共政治中非正式集团研究绪论》；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

〔50〕迪特麦：《刘少奇》第214—293页。

〔51〕有关极左思潮批判的这种事后批判的初步尝试，见伊万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52〕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和共产国际与俄国革命运动中“左”翼反对派进行过斗争，写下了一系列短评，本书第2章将在广泛(并非中国一家)的背景下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有关七十年代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内对“左”的偏差的一种论战性批判，可参见第2、3章中的《一种新形式的多党制》。

〔53〕刘易斯：《领袖、政委和官僚》。

〔54〕格雷：《两条道路》。

〔55〕见舒瓦兹：第3—19页；刘易斯：《中国都市发展的灵活性的政治方面》。

〔56〕使用“革命”和“现代化”这两个术语来描述互相冲突的路线，只应当看作是对每条路线内相对强调的重点反映。“革命”路线的鼓吹者以为他们在推进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业；“现代化”路线的支持者则以为他们在寻求社会主义革命。

〔57〕这一用语引自约翰·利加勒：《是非颠倒的混战》，纽约，矮人丛书，1975年。

2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恩格斯（1874）

如果认为论述极左思潮是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弗·列宁以及毛泽东著作中的主要内容，这大概是一种夸大。但是，指出他们都曾对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左”倾问题给予过足够的注意，从而表明这一问题是他们各自哲学和政治纲领发展中反复出现和引人注目的主题，则既不是对他们著作的字面意义的曲解，也不是对他们著作的内在精神的曲解。本章的题目即是根据这些“revolutionary teachers”（即“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以勾勒出发生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中的批“左”的理论框架，并阐述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条件（它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变

过程)下，批判“左”倾倾向中一些次要问题的引人注目的持续性。

马、恩、列、毛对极左问题的阐述包含在他们观点最为明确的政治著作中。[1] 导师们对这一论题的阐述一般出现在论文、书信及演讲词中，这些论文、书信及演讲词或者用之于直接反驳，或者用之于事后分析那些在革命运动中对他们的领导权提出挑战的“左”倾反动派的。虽然他们有时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论述对极“左”问题的看法，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从革命策略，党内斗争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等这样一些更为实际的方面提出问题的。无疑，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准则，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了证实：批判极左思潮已发展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组成部分。[2]

历史上的关联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批判鼓吹非暴力论的无政府主义时，就已对本章将要涉及的有关极左思潮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3]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及欧文等人，在十八世纪初叶就已为社会主义者批判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打下了基础，并且描绘了一个更人道的、公有化的未来社会的蓝图。他们这种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政见，巧妙地表现为吁请进行和平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的基础，乃是来自于所有抱有善良愿望的人们，对由于都市化、工业化及集中化而产生的邪恶与非人道的力量的合乎理性的批判。他们相信，人类本性的基本美德能为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提供动力；他们还相信，有远见卓识的人(如他们自己)能成为人类社会中道德改良的主要宣传者和指导者。乌托邦是极为质朴宜人的农民式幻想，它反映了对小国寡民式社会的偏爱。这种社会体现了简朴的乡村生活的道德标准，并且在使社会满足其需求的

各种方法中给农业以优先地位。这种更美好的社会还将是平均主义的。在那里，等级制度和特殊化将被限制在最低程度，人们作为社会的同类，自然地工作和生活在一起，毫无政治权威或经济刺激的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对现存制度的观点及与之相联系的关于未来的幻想，批判为最糟糕的“乌托邦”，认为是不现实的，是想象出来的，并且是行不通的，只能存在于冥冥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肯定了乌托邦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痛苦的极大厌恶，但他们却不能容忍理想主义与缺乏严肃的科学性，而这正是乌托邦在批判社会和采取政治行动的特征。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所评述的：“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谴责资产阶级的工业主义所产生的社会罪恶时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强有力的。但是，与其说他们的批判建立在对这一体制的作用和性质进行一些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毋宁说这一批判更多地建立在对新经济秩序下的不公正所进行的道德判断这一基础上。”〔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些空想家们犯了错误，因为他们贬低了“所有政治的，特别是所有革命行动的”价值，而乐于描绘“未来社会的幻想图画”，乐于建造“空中楼阁”。这种空想的结果，是“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5〕，并因此而延缓了真正的革命的到来。

马克思主义者拒绝了乌托邦关于人类发展的幻想，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可避免性，乃是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必要过程；同时还因为它否认所有历史上的革命对无产阶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将城市和工厂看作是人类自身堕落的象征；相反，他们宣称，这些由资本主义创造出来而又被资本主义败坏了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旦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就会变成解放的工具。当然，无产阶级应在行动上表现出是一个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阶级，抓住资本主义矛盾所提供的完全成熟了的历史时机，夺取政权，并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社会，这才

是无产阶级的任务。

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固执的反权威主义和极端的平均主义，是导致他们后来倾向于更直接地和极左思潮搅和在一起的早期表现。乌托邦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表现出所具有的“左”倾倾向，如相信能很快实现一个更慈善的社会，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进行这种激烈转变的复杂历史过程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乌托邦这一观点的错误，关键在于他们盲目地相信人类的意志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于他们对跳过或避开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抱有天真的幻想，而不是想办法使资本主义的许多长处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初期达到了高峰，但这仅仅代表了“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还基于幻想的时候”[6]的革命早期年代。可是，当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一旦和各种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结合起来时，它就嬗变成了一场有凝聚性的政治运动。[7]蒲鲁东分子与乌托邦主义者一样，不赞成暴力革命，而对渐进地和理性地进行社会经济变革抱有偏爱。然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则更棱角分明，从而也更受人注意。很难将第一国际（1864）内这些“和平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活动看作是极左思潮，确实，他们对一些反资本主义的过于极端的做法（如剥夺生产资料并使之社会化）一贯持反对态度。[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列举工人运动中一些离经叛道的倾向时，将蒲鲁东的哲学排在“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列是非常明确的。[9]但是，我们仍还可发现蒲鲁东主义中与极左思潮有关联系的一些因素。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蒲鲁东理论中的极端无政府主义倾向，并预感到它将会对第一国际中一些激进的反权威主义者产生影响。[10]

其次，他们强烈反对蒲鲁东及其追随者在批判资本主义以及在谈论社会主义时，将分配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11] 蒲鲁东分子认为

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所有的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制度所固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要求“劳动收入的更公平的分配”。[12] 马克思主义将这种论调看作是一种以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能通过较小的经济让步而达成妥协的幻想；并认为，这种有害的论调只会使工人阶级看不到自己负有的全面根除资本主义这一真正任务。

第三，他们还反对蒲鲁东分子的如下观点，即以为社会主义只是在更高程度上取消不平等，而不是采用暴力手段重组社会，进而解放生产力并解放生产者本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虽然社会主义必然消灭剥削，但它并不象蒲鲁东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保持社会平均主义的社会；相反，某些形式的不平等，作为一项刺激生产力的措施以及作为一项分配制度，仍将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马克思关于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应坚持这类“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论述，影响最大的是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这一纲领的制定受到蒲鲁东的知识分子的追随者和政治上的追随者的极大影响)所作的批判。[13] 因此，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的谴责中，可以看到一百多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两个派别之间斗争的先兆，例如其中的一派主张，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分配问题(诸如消灭所有的“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派后来被谴责为极左分子。

被放逐的俄国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以马克思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洲革命的领导权的主要挑战者的面貌出现，反映了无政府主义的兴起，并已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内的一种严重倾向。[14]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权力结构上，以及在他们为之奋斗的未来革命社会的组织机构上，巴枯宁逐渐与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样，巴枯宁分子就与蒲鲁东的反权威主义，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主义等，在一种貌似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新的

恶毒的情调下结成了联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政府主义因要求取消全部的继承权而完全拒绝参与资产阶级的政治进程，甚至不分清红皂白地制造恐怖活动，从而从极“左”方面给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了损害。但国际工人协会对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直到其妄图在协会内部建立一个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时，才以阴谋及宗派主义罪名将其开除出去。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在1872年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极为不满，并建立了一系列斗争组织，以推进他们在欧洲的政治活动。[15] 本章下面所要讨论的从意识形态上批判极左思潮的许多具体原则，正是从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主义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批判中引伸出来的。

列宁对批判极左思潮所作的贡献，可以分为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后两个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列宁花费了很大精力，对反对沙皇专制政府的激进分子中的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给予了密切注意，并进行了批驳。在1917年革命之后，列宁发现面对着党内的“左”翼反对派指责他为修正主义的情势，他还必须继续战斗，以捍卫他所制定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列宁还对欧洲那些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组织提出了许多策略上的建议，其中也涉及到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许多问题。

列宁早期曾对反抗沙皇统治的俄国民粹主义进行过批判。这一批判是他后来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先声。[16] 列宁将民粹主义（或民意派）看作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变种，并且既否定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反现代化式的批判，也否定民粹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农民式平均主义的设想。列宁指出，民粹主义者具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特征，因为他们要求快速而激进地进行变革，认为“无论是历史的客观现实，还是经济落后的条件……都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17]

随着十九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主义革命的抉择而衰落了。列宁也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当1905年革命迫使沙皇承诺了一定的民主要求时，一些社会主义者坚决拒绝参加新近成立的资产阶级议会(杜马)和商业联盟，列宁和他们就此展开了争论。列宁谴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孟什维克的“新星火派”和“召回派”是在照搬教条，一味鼓吹以激进的政策夺取政权，而不懂得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杂过程。[18]

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前，列宁就因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民主”概念的不同，而与很多信奉平均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过论战。[19] 在苏联(事实上，苏联是在1936年成立的。在十月革命后至1936前称作苏俄——译注)成立以后，列宁又进一步受到了党内的“左”翼反对派的挑战(他们反对他的建设新社会的蓝图)，从而使论战更趋激烈。[20]

列宁和“左”翼反对派论战的首要问题，是关于1918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谈判和签订问题，这一条约使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左”翼反对派——包括布哈林——强调要继续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而列宁则反驳说，只有妥协(甚至是割让土地)才能缓解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面临的极端险恶的经济和军事局势。[21] 在和“左”翼反对派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列宁日益发现这种情况有些类似商业上的起诉和反诉。不夸张地说，这种情况几乎一直延续到1924年他逝世的时候。在反对派攻击列宁搞杰出人物论和权威主义时，列宁捍卫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必须在一个起先锋队作用的党的领导下，实行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反革命力量。[22] 列宁还反对党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观点，与这些人鼓吹的实行更多工业化民主及分散经营的观点相比，列宁更倾向于严格控制下的国营经济。[23]

但是，也正是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措施，以图恢

复饱受战争创伤的俄国经济时，在当时遭到了强烈反对。正是来自“左”翼反对派的这种反对，才使列宁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24] 当时，列宁鉴于国家的解放和发展，而与资产阶级进行某种妥协；并支持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支付高薪；在工厂实行行政等级制，并实行强制性的管理纪律和效率措施（“泰罗制”）等。而布哈林等人则认为这些政策无疑在损害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原则。列宁在1918年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对这些反对意见作出了最有力的回答。[25] 列宁在他的“政治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中更为完整地阐述了极“左”的阶级根源及意识形态上的“不成熟性”这一主题。[26] 这一著作重温了布尔什维克运动中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历史；它还包含有列宁的如下观点：在进行激烈的革命时，在无情地谴责教条主义及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时，策略上的灵活性是绝对必要的。

象列宁一样，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看法也可以分成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后两个明显的阶段。但是，与列宁不同的是，毛泽东在解放后对极左倾向则注意不够。毛泽东1927年至1949年大部分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是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等“左”倾错误明显地放在中心位置。可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逐渐将其政治权力和批判焦点，转到注意党内修正主义及保守主义的右倾危险上。

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他在历史上反对“三条‘左’倾路线”具有内在关系，这三条路线曾在1927年至1935年间的不同阶段支配了中国共产党。[27]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对他在“统一战线”中的共产党同伴的政变。在这次政变所引起的灾难性的后果中，陈独秀（党的创始人之一）犯了右倾教条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错误。党内第一次激烈的“左”倾观点，就是作为批判陈独秀的反应而出现的。这种观点在1927年下半年发展成一条完整的政治

路线，它片面地强调城市暴动是革命策略的首要手段，但在对城市地区发起的一系列进攻失败后，1928年春党内围绕这条路线开展的斗争，使得它“实际上已经停止了”。[28]

由于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蒋介石与他的一些军阀联盟之间增长的矛盾，也由于受莫斯科指挥的第三国际的巨大影响（为响应斯大林在国内进行的政治斗争，第三国际自身也经历了一次“向左转”），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中又一次出现了“左”倾思潮。[29] 在中国，这一“左”倾思潮体现在李立三领导下的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路线中。李立三恢复了把夺取大城市处于优先地位的策略，并反对毛泽东日益坚决的主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应是团结农民并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30]

在国民党一再发动军事围剿从而证明城市策略不适用于中国条件后，李立三因领导错误而受到了批判，但却并没有对他的政治路线进行彻底的分析。不久后党内即又一次产生了极左思潮。1931年上半年，刚从莫斯科归来的一群中国留学生取得了领导权。这一新的领导集团以王明和博古为首，他们把对李立三极左思潮的批判转变成对他的右倾错误的批判。同时，王明等人还对早些时候党的会议及其决议没有确认右倾机会主义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危险这一疏忽进行了攻击。这种做法阻碍了对李立三领导下所犯下的“左”倾错误的批判，并且使王明建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霸权。因此，毛泽东认为，第三次“左”倾路线有“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并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31]

王明路线统治中央达四年之久。首先，王明及其追随者坚持这样的政策：即以夺取中心城市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迅猛发展的序幕。甚至在（国民党）连续不断的军事围剿导致最终放弃城市策略，并使党中央在1931年末撤到江西农村根据地后，“左”倾领导人仍然沉溺于这一幻想：中国革命正处在决定性阶段，急需发起大规模

的反攻以反抗国民党日益增强的包围。他们否定了毛泽东的坚持人民战争的(包括游击策略)思想，说它反映了“军事保守主义”的右倾错误。〔32〕但当国民党力量最终迫使共产党撤离江西苏区并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后，“左”倾路线就名誉扫地了。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获得足够的支持，“成功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33〕在遵义，毛泽东不仅巩固了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权力，而且还第一次赢得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34〕

虽然“左”倾路线的统治在1935年被粉碎了，但毛泽东仍然反复强调，要反对所有的极“左”倾向，特别是要反对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时的教条主义的方法。〔35〕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为了使全党团结在当时刚刚提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周围；它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要消除早些时候“左”倾路线遗留下来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残余影响。〔36〕

从四十年代的政策倾向来说，当时发生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执行过程中的“左”倾错误，曾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在这些地区，过分热心的干部以及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有时超出党的稳健的总方针的规定，毛泽东为此不得不经常加以告诫，要求反对土改中分配“果实”时出现的过激和平均主义倾向。当时土改中出现的所谓“贫农路线”将中农也划入应予剥夺所有权的剥削者的行列中，这一路线的出现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警觉。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左”倾倾向，它不仅违背了新民主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精神(因为这一时期的基础乃是相当广泛的反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而且还由于使农村中最有技术的农民处于政治上的偏执狂状态和经济上的消极状态，从而也会损害生产的基础。〔37〕

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其文章和讲话中仍然关注开展全国性土地改革时的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问题，认为当时搞集体

化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后，他最主要的注意力明显开始转向党内保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险。〔38〕虽然他仍告诫说，不要过分急躁地推进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且提醒他的同志说“‘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39〕但同时，他也开始逐渐担心，由于党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它已开始落后于加快（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这一群众化的要求。在谈到1955年集体化运动的群众性高潮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40〕

1956年下半年至1957上半年，党的领导层着手解决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但终于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下一阶段所面临主要矛盾的性质问题上发生了致命的争执。刘少奇主张当前主要矛盾应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现代化）。毛泽东则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阶级斗争）。甚至可以说，当时主要矛盾的性质是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41〕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争论，是因为毛泽东日益相信，“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他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42〕很明显，他仍然坚持“大胆冒进”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指导性原则。〔43〕

1958年至1961年间“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最后一次在实质问题上涉及到对极左思潮的批判问题。在建立人民公社，执行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空想政策上，许多干部的命令主义方法，新的收入与分配体制的过于平均主义做法，以及经济计划上放卫星式的希望和目标，都构成了计划的极端草率与极端混乱的特征。所有这些都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正视极左思潮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但毛泽东对“大跃进”错误所作的评价和自我批评是很有意思的，他不仅就主观主义和冒进主义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尖锐

的批评，而且还坚决地再次肯定了“大跃进”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的正确性。〔44〕“大跃进”所引起的广泛后果使他认识到“左”的倾向的巨大危险，然而自身意识形态的偏好仍使他大力鼓励英雄主义和冒进政策。

六十年代初，“大跃进”策略失败的后果，使毛泽东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黯然失色。但在这一时期，他对他所认为的党内修正主义倾向日益增长的危险的关心，变成了一种偏见，而正是这种偏见最终促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45〕他不仅专心于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发展，而且还专心于日益严重的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此之后，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评述变得少而零散。虽然他批判了“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并且还同意对极端主义的“5·16集团”进行清洗（该组织在国家和军队机关中扩大打倒“走资派”的规定范围），但他从未对“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表示过认真的些许担忧。〔46〕同样，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以及他对“四人帮”的警告，基本只限于论述这些派别的宗派主义和阴谋活动，而几乎没有触及到更为本质的问题，以及包括对极左思潮进行真正的批判；换言之，他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但没有批判他们的极左政治路线。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中的“左”倾问题的态度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从1927年至1954年，他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党内极“左”倾向加以了鲜明的反对，视之为革命能否成功的最大危险根源。在五十年代中期，他仍然从政治上反对这种倾向，但已开始对他以前的思索产生了怀疑，逐渐认为在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极左思潮相比，右的修正主义可能具有更大的危险。在“大跃进”期间，他几乎完全抛弃了早些时候的担忧——冒险主义会破坏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与此相反，他被干部和群众的鲁莽冒进和革命英雄主义有力地吸引住了。在“大跃进”的余波中以及在“文革”前，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态度是非常不正确的。虽然他似乎受

到了“大跃进”策略所造成的灾难的惩罚，但反而却表现了日益增强的意识形态偏见及政治偏见，以为党内保守主义倾向和社会中的不平等倾向已越演越烈。从1965年到1976年逝世为止，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极左思潮问题不加理会，却集中力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进行斗争。上述这些阶段，是理解毛泽东对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识形态根源——我们正在讨论中的问题——所作贡献的关键所在。同时，它也明显地涉及到特殊情形下的政治状况——它构成了本书的中心。

批“左”的主题

教条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者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中，最普遍的主题是教条主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担心社会主义事业可能受到一些革命者的损害。这些人僵硬地解释理论，拒绝接受变化着的形势所要求的策略上的灵活性。马克思曾这样批判无政府主义者，指出他们在照搬教条时即使看到可能要导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的失败，却仍然盲目地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永恒原则”。马克思认为策略上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他讽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认为他们把灵活性看成是“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但是永恒原则必须保持洁白无瑕！”〔47〕

列宁也同样尖锐地批判了主张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按照原则办事的教条主义者。他指出：“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应许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的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骗子。”〔48〕毛泽东也具有同样的精神，他反对一些党的干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

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49〕他多次告诫说，不应将马列主义看作是“死的教条”，而应将它看作是“行动的指南”，从而能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情况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50〕

革命导师常常将教条主义者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方法上的激进性，归因于他们缺乏对客观形势的了解。现实世界是复杂的，但他们却常常用简单化的公式加以硬套。例如在推进欧洲革命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也曾提出了他们的方案，恩格斯认为这一方案存在着不少不切实际的方面，指出，“所有这些娓娓动听的极端激进和极端革命的词句只是掩盖着思想的极其贫乏和对社会日常生活所处条件的根本无知。”〔51〕毛泽东也经常用类似的语言批评教条主义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原则时的这一“左”倾倾向，指出马列主义起源于欧洲当时的现实环境，这种环境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情况。毛泽东还指出，教条主义路线的“理论”常常只是某种思想体系的孤立部分，是不分具体情况、过分简单地“照搬”过来的。这种观点引起了他的继位者们的共鸣。〔52〕恩格斯和列宁也曾对这种“简单化”的情况进行过批判。恩格斯认为，巴枯宁变种社会主义的流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其实际内容“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53〕列宁在谴责“左”翼反对者不用心去分析复杂的情况，而仅仅“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54〕时，也批判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左”倾简化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坚决主张一个革命领导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是能够适应变化着的斗争条件，并能够善于妥协，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列宁在1920年论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著作中，曾告诫说，教条主义和革命中的“不妥协”办法，“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适应性和灵活性是无

产阶级事业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关键任务，就是要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为了革命的胜利，“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55〕

教条主义者由于其不妥协的态度，因此在制定夺取政权的策略以及在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措施时，非常容易犯下严重错误。但是，他们也对马、恩、列、毛所赞赏的某些政策表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蔑视，认为这些政策违反了原则和良心的召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争执不下的一个问题，乃是无产阶级从改善自身的地位和表达观点的角度出发，是否应参与资产阶级的政治进程及其机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参与只会使资产阶级国家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且会玷污无产阶级推翻现存秩序的所有制制度这一最终目标的纯洁性。马克思则认为，这种“政治冷淡主义”将使无产阶级失去“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索取”。他指出，国际工人协会不应拒绝参与资产阶级的政治进程，“因为这个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并不符合被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56〕

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05年参加沙皇钦准的杜马进行辩护时，针对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召回派提出社会民主工党因参加议会而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指责，列宁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道路上利用了……杜马”，以此“作为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教育及组织工人群众的方法”。〔57〕当革命胜利后，列宁对没有执政的德国和英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要他们在参加议会斗争的问题上拒绝“左”翼反对派的立场，列宁认为这种立场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一个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

路。〔58〕

在革命运动内的权力问题上，以及在未来的革命社会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权力运行都视为资产阶级政治，并提出在共产国际中要绝对自由。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政党内部需要权力机构来保证协作和纪律。恩格斯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特别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把革命曲解为一种反权威主义的行为。恩格斯指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象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59〕

恩格斯还同样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如下观点：社会主义社会能在没有任何权力等级结构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考虑到未来的工业化组织问题，恩格斯指出，大规模现代化的工业——无论它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其根本性质都要求有权威、纪律、规章、制度。既使在遥远的将来，当消灭国家这一共产主义目标实现时，作为现代工业绝对必要的条件的经济集权，仍需继续存在下去。恩格斯在一篇论述这一问题的经典著作中，以这种方式提出了他的观点："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60〕对无政府主义者不停地

反对权威的做法，列宁也同样表示反对。他坚决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依靠一个起先锋队作用的党来领导，这同“左”翼反对派所攻击的那种只搞“上面的革命”而不支持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完全是两回事。〔61〕列宁认为，夺取政权必须要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它是起先锋队作用的党用来保卫胜利成果，对付反革命力量的有力武器。〔62〕他还拒绝了布哈林等人的建议即应给予个体产业及组织更大的经济权力，召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工人反对派”，成立经选举产生的“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以管理全国经济。列宁警告说，虽然这种“工团主义”看起来是非常革命的，但它只会损害党的权威，引起工业中的无政府状态，有助于资产阶级恢复在俄国的权力。〔63〕

列宁还力图借鉴“国家资本主义”的某些做法，以恢复和振兴饱受战争创伤的俄国经济，但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却攻击这是“右倾布尔什维克倾向”，列宁对此予以坚决回击，〔64〕斥责他们“最坚决的社会化”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教条式的固执，表明了他们的思想没能跟上形势的变化。〔65〕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不仅必须要利用旧政权下的“第一流的资产阶级专家”（这些专家被慷慨地付出高薪，以鼓励他们为新政权服务），而且还必须要学习德国先进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苏维埃政权的存在，能够保证德国的工艺技术被用来为俄国无产阶级造福。左派共产主义者不同意列宁的看法，认为向资产阶级德国学习不是革命家干的事。但列宁则反驳道：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是因为他不知道具体事实，看不见现存事物，不会辨别真理，或者是因为他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未注意研究我国目前这一过渡的一些具体形式和阶段。”〔66〕

在中国，毛泽东也曾同列宁一样，认为在全国解放以后，有必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反对立即实现全部收归国有的做法。〔67〕但是，毛泽东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之间

更多的富有戏剧性的对抗，主要是集中在土地改革、统一战线以及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农民问题上等。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毛泽东的主张曾被指责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异端邪说，但毛泽东又加以回敬，指责反对派是一伙教条主义者。

毛泽东同“左”倾机会主义者李立三、王明等人的斗争，主要是从1927年以后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的。

在毛泽东看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重心就已从城市转入了农村。但是，李立三和王明却矢口否认这种“重心转移”的必要性，并斥责这种“重心转移”是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核心作用，继续坚持要搞城市起义、工厂罢工那一套做法，因此，他们的策略中更多地具有主观臆测的成分。毛泽东认为，这种策略是“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反映，是工作中教条主义的表现，既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内容，又看不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力量对比上的客观差别。〔68〕

1937年，在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社会革命就是民族革命。毛泽东对此作出了批评，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是否定了为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当前共同敌人而做出的必要妥协。他认为这种“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是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做到集中起来解决主要矛盾，因而对中国革命事业是一个极大威胁和破坏。〔69〕

在解放区的土改工作上，毛泽东也曾反对教条主义倾向。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所谓“贫农路线”，认为这种“纯洁”的阶级政策在土改中侵害了中农的利益。在处理地主富农问题上，特别是在没收和镇压农村少数工商业资本家的财产问题上过于粗暴，而后者还曾被毛泽东称为是整个封建农村中的一股“进步”力量。〔70〕毛泽东认为，这些“左”的偏差来源于解放区在执行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影

响，从而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71]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土改中坚持曾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讥为“富农路线”的相对较为温和的政策，认为只有通过某些非原则性的妥协，才能加速土地革命胜利的到来。[72]

总之，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都一贯认为，共产党人的坚持理想，和策略上的灵活性与政治上的必要妥协，二者是不矛盾的。这些“革命导师们”认为，社会主义事业除受到资本主义的威胁之外，常常还受到来自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侵蚀与“左”倾教条主义的僵硬和死板的危害，有时候后者往往更甚。

主观主义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都认为教条主义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一些激进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景的人)在进行政治活动时，总是喜欢从自己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根据对社会条件的具体分析。由于这种做法导致的往往只是一些虚假认识，因此通常被人们称为是“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这种主观主义造成的后果，导致一些做法虽然在理论上或许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因和具体现实情况大相径庭，而必然要遭到失败。

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他对革命斗争中主客观之间认识方法上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观念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一些激进分子之所以很容易滑进教条主义泥坑，是因为他们“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73] 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回顾了对“左”倾机会主义

分子的激进战略的批判，并针对他们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可以望到”、无产阶级胜利就在“眼前”的观点，指出：“他们……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74〕

毛泽东在《实践论》(1937年)中曾指出：“当思想落后于实际”时，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接着，他又警告要反对另一种让主观愿望模糊了现实条件的倾向，认为左翼空谈主义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75〕

在这一段话中，毛泽东简洁勾画了与“左”倾主观主义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1) 超越发展，不能看到历史发展阶段的合理性；(2) 盲目狂热，以为人的愿望动机可以克服历史变革中的一切客观障碍；(3) 估计过高，错误认为群众会轻易地接受剧烈的社会变化；(4) 冒险主义，热衷于极端的策略和计划以求实现革命目标。下面，让我们对上述四点进行一下详细的分析。

超越发展 如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在有关论著中所描述的那样，“左”倾主观主义通常都有这样的特征，即其思想和行动计划往往是把历史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混为一谈。在狂热追求实现革命目标时，根本没考虑现实条件对人们追求意识形态上近视的满足感的行为和动机的限制。当年恩格斯在驳斥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即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时，曾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这种极端的政治策略的性质的要害：“……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

中，那么‘后天就会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76]

列宁和毛泽东都竭力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那些鼓吹不停顿的社会变革，以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主张。列宁认为，1905年俄国的民主发展水平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决定了“工人阶级立即取得完全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而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参加杜马：“无政府主义者说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77]

毛泽东认为，李立三和王明的路线有许多教条主义的做法。这反映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因而造成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以至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党的生存，这是因为：“他们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78]

“左”倾主观主义者超越发展阶段的另一个重要错误，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错误估计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的性质和时间。本来，马克思曾指出，新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它脱胎而出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并且这种旧的痕迹是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能扫除干净的。当时的“左派”

分子正因没能很好注意到这一论述而遭到了马克思的谴责。[79] 因此，新政权建立以后，在从适当尊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法权思想，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必须要经历一个微妙的发展过程。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认为，省略掉这样一个过渡时期，或完全否认这一过程的任何必要性，是完全可能的。相反，批评他们的人，则挖苦他们是在为一种自以为正在直接从事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崇高计划的观念"所驱动着。[80] 这种偏差情况，就决定了他们无论是在评论别人的做法时，还是自己在执行本来相对现阶段的发展已属早熟的政策时，都仍会一概认为还远远不够"前进"。

列宁曾经遇到过这类超越发展阶段的问题。他对那些企图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追求迅速实现国营化和集体化计划的人进行了批判，指出："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 4 岁的孩子去学高等数学。"[81] 毛泽东在分析大跃进初期的共产风现象时，也曾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认为当时的基本错误，就在于许多同志(包括他本人)赞成的政策，实际上是反映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主观意志的产物，错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82]

在怎样看待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企图对此加以否定的主观主义错误。列宁曾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在议会问题上的做法决不是革命的，而是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了解根本不对"，而这就使得他们"不善于估计各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特点，不善于看到这些特点有时使这一种斗争方式在某个时期具有特殊意义，有时使另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83] 因此，列宁坚决主张在某种情况下，议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策略，是完全合适的，而"那些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认'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的共同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的极左分子的做法，则是不可取的。虽然在社

会主义革命的蓝图规划中，尚未具体提到怎样处置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但是，革命的最终目标则是明确的，那就是在将来，将把议会制度作为“历史的垃圾”，“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量的……，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极为严重的理论错误。”[84]

在二十年代，列宁曾主张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某些做法，来发展处于崩溃的俄国经济，然而这却引起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又导致列宁对“左派”所主张的历史发展是一自然过程的观点进行了深刻分析，列宁认为，这一观点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具体政策正确与否的作用问题。他针对“左派”对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怀疑态度，指出“他们从没有想到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情况，是一个进步。”[85]

盲目狂热 “左”倾主观主义和超越发展阶段紧密相连的另一种错误表现形式，乃是盲目狂热，过分夸大了人们的思想觉悟及行为能够克服革命中物质和观念上的障碍的能力。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根本漠视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时，曾指出仅从思想观念上去解释历史的变化，是很不够的，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为前提。马克思认为：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之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都是可能的……，他的社会变革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86]

列宁和毛泽东也都曾谴责过激进分子的盲目狂热，指责他们企图在一个被马克思称为是社会主义基础必须具备的“经济前提”远远不够的国家里“推进革命”。但是，毛主义却又曾一再强调过人的能力能够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认为只要统一意志和共同努力，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87] 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和列宁一

样，还是经常提到准确认识革命活动中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他们当然知道，人类的行为是存在着一定限度的。

例如，在德国共产党内“左”倾派别拒绝参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问题上，列宁曾经批评说，仅仅是“革命精神”，是不能为采取比客观所允许的情况更激进的策略辩护的。〔88〕毛泽东也批评过党内的主观主义者，指出他们否认在从事具体工作之前进行实际社会调查的必要性，“不注意实事求是”，而是把工作建立在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上面。〔89〕在“大跃进”问题上，毛泽东本人曾作过一些自我批评，认为党的领导人“急于进入共产主义”，从而在“大跃进”中出现了急于求成和共产风等问题，粗暴地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90〕

估计过高 马克思在进行政治分析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革命阶级一方面蕴藏着极大的能量，但另一方面其内部又会经常受到“败坏工人的意识”的东西的影响，〔91〕从而必然导致有的工人由于受到物质利益的引诱，而逐渐满足于现状，趋向保守，甚至反对起革命来了。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来看，这没有什么奇怪，可笑的倒是那些纯粹的“左”倾主观主义者，他们通常看不到普通平民百姓中的这种“败坏工人的意识”的影响的客观存在，相反，还以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他们一样地高，因而一定会热切期望并接受最激进的革命计划。这种错误，就是一种过高估计群众思想觉悟的错误。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巴枯宁号召立即废除继承权，以作为取消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的司法基础的一步实际行动时，马克思立即予以抨击。马克思认为，大多数人，无论其阶级出身如何，都仍然希望能把自己的财产传给下一代。因此，任何要求，包括国际的纲领在内，都远远不能做到巴枯宁所希望做到的。这种要求自己放弃继承权的政策，“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92〕

列宁是一个先进政党的坚定拥护者，但他却更为率直地揭露这种过高估计群众觉悟的危害性，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成为革命者的陷井。针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对革命策略已经"过时"的主张，列宁告诫他的同伴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水平……，但是同时你们也必须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93〕

毛泽东对文化宣传工作的口径和规格是非常重视的，他反对过分夸大群众真实的态度和觉悟，认为在需要做什么的问题上一定要从群众路线出发，这样才能和工人农民想到一起去。他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94〕

对"大跃进"中发生的"左"倾过火现象，毛泽东曾多次作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党的"共产主义"政策常常是一头撞到农民努力保护自己私人利益的南墙上去，认为农民的"本位主义"促使他们对平均主义做法（例如农村食堂、按需而不是按劳进行分配等），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毛泽东在1959年上半年的郑州会议上，曾就此作了一系列讲话，主张要保护农民的"本位主义"，并且批

评自己和其他领导人在这问题上只是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上去考虑问题，而忽视了农民的要求。他警告说："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95]

激进分子常常置实际情况于不顾，一味过高估计群众的思想觉悟，这在政治上通常表现为"命令主义"。当干部们号召群众接受一项他们并不真正支持或理解的政策时，这些干部们就是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但有时候，当革命的动力极大焕发了群众热情，并向他们展示其在革命活动中真正利益之所在时，这时往往就容易产生一种"左倾尾巴主义"的错误。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尾巴主义"一词通常是用来形容右倾错误的，即当领导人落后于形势，甚至阻碍群众对未来或对革命更迅速发展的合理要求时的情况。[96]而"'左'倾尾巴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干部未能完全制止群众的一些极端做法，这些做法也许对眼前有利，但对长远却是有害的。由于党没能及时引导群众的热情，结果无产阶级的长远使命和责任在这里就遭到了漠视。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党不了解群众的情绪，而是因为党自己一下子也陷进群众的情绪中去了。例如在土地改革时，一些地方的干部就以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因此对土地分配和处理地主富农问题上出现的极端倾向，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从而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97]

冒险主义　毛泽东在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中，还曾经讲过"冒进"这个词。其意思是指激进分子往往过于执着意识形态教科书中的词句，从而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容易在策略的选择和政治行为的时间选择上表现轻率和鲁莽。他们往往自以为垄断着"真理"，因此常常不考虑任何客观限制条件，主观主义地想尽快获取革命成果。毛泽东曾把这种过于性急的政治行为，比成是要一个孕妇不足月生孩子："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

的。比如生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98〕

除了冒险主义倾向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遭到批判的，还有一种要求割断和旧社会一切联系的唯我独革的“左”倾情绪。持有这两种思潮的人，都自以为自己的行动最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了，因而对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事物都盲目地加以反对。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反对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暴力政策，但一百多年以后，在中国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走卒——打砸抢分子时，这个词又再次出现了。在无政府主义分子的纲领中，他们认为，“工人为着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应该改变为地下英雄式的全面破坏活动……，说到底，人们应该释放被工人自己镇压下去的街头无赖们。”〔99〕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曾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仅仅只想要破坏资产阶级国家，而没有积极的计划去把它改造得更好一些。这实际上反映了“拼命的策略，而不采取那种以大无畏的精神并根据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革命地完成具体任务的策略。”〔100〕总之，无论是在建设新社会还是在破坏旧社会上面，“革命导师”都对“左”倾分子的冒险主义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宗派主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认为革命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倾向，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最主要的一种政治危害。这种“左”倾宗派主义，有时以坚持真理的“左”得可爱的面目出现，有时则以与所谓反动势力势不两立的姿态出现。如果用这种教条主义的眼光去看待革命实践，所到之处，往往都导致党内出现严重的派别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常常提及第一国际时巴枯宁主义者的宗派活动问

题。他们严厉抨击巴枯宁组织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组织，是第一国际内部的一个"寄生组织"，认为他们挑起的"内部纠纷"，严重削弱了革命队伍的力量。[101]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指出巴枯宁的哲学观点的可疑性，另一方面还指出他们和无政府主义分子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真正原因，不仅是因为原则上的截然不同，而且还由于无政府主义分子"公开了我们队伍内部的冲突"这一不可饶恕的挑衅行为。[102]巴枯宁由于其无政府主义纲领受到了国际的抵制，因而对原则性问题的公开论战方式失去了信心，转而使用所谓"间接方式"，妄图窃取国际的领导权。可以料到，他们和国际的这场斗争，最后是以他们被第一国际开除出去而告终。恩格斯指出："巴枯宁主义者们活动的主要结果在于给我们队伍带来了分裂。谁也没有为他们的特殊信条设置障碍，但是他们还不满足于此，而想发号施令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我们全体会员。"[103]

毛泽东对"左"倾分子有组织有影响的派别活动一向予以特别注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李立三、王明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104]因此他们的行为就给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例如，统一战线是当时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石，但宗派主义活动却在无形中对此产生了很多干扰。他们拒不承认在特定时期内，在全力解决主要矛盾的时候，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团结国民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却反而主张要为"原则"而奋斗，要同时和各个方面而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在对待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表现为鼓吹"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则是坚持毫不妥协的"关门主义"，把阶级队伍和思想原则的所谓纯洁性，置于必要的策略灵活性之上。[105]

"左"倾机会主义者所采取的方针及实行的策略，是片面强调

斗争，并不断予以扩大。因此，对“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必然就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经常斥责“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们在党内实行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06]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就“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对阶级斗争问题产生错误理解的唯心主义根源，作了一番精辟总结：“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于把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107]

这种对人民内部矛盾错误理解的做法，就使得非对抗性的矛盾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实质上破坏和削弱了革命力量。例如，在第一国际时期，围绕着怎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曾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巴枯宁分子却认为，国际内部的领导成员(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只要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一定是反革命。[108]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予以辛辣的讽刺，将其比喻成是在搞“神圣的宗教法庭”。[109]

同样，毛泽东当年也曾尖锐批判过李立三、王明，认为他们对不同意他们的路线的干部，实行的是宗派主义政策，破坏了党的团结。毛泽东在批判中紧紧抓住了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路线中最严重的错误(这些问题后来在批判“四人帮”时竟也了热门话题)，指出：“(他们)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进行这种‘党内斗争’。”[110]

李立三和王明实行的宗派主义，使许多一直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的人，变成了“斗争对象”。“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意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

部……。”〔111〕

毛泽东还严厉指出，他们除了对老党员和老干部进行迫害外，“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112〕毛泽东说过的这些话，对后来的历史来说，象是一种预言。过了三十多年，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这些话居然又构成了对不是依靠功绩、而是靠坚持极左路线、坐“直升飞机”起家的“四人帮”及其同伙的批判。

1956年8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重新提及党的历史上宗派主义的问题，但他对此采取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新的态度。他指出，如果我们因为李立三、王明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不选他们担任八大中央委员（他们仍然是有相当活动能力的党员），那我们就要犯错误。他一方面批判党内宗派主义倾向，一方面又继续指出：“我们不选举犯了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113〕

“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

“革命导师”总是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根源，归结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同小生产造成的社会关系有着原则区别（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这种小生产形式在农民中间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

客观条件时曾说，落后的经济关系，使人们必然转而支持工人运动。认识到这一点，仅仅只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即整个新世界观中的某一部分。实际上进一步讲，这仍然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民主的世界观内容。[114]列宁还指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的世界观，常常很可能会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115]也还很可能会表现为激进的"左"的形式。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为了能迅速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但是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不能有组织、有纪律地坚持到底。"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看起来似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实际上，它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敌人。"因为"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116]

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之所以容易导致产生"左"倾机会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大量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去。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这些知识分子"脱离生产实践"，仅仅有"书本知识"，因此在他们参加革命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从而使得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不能做出全面的理解。[117]但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欢迎知识分子加入革命，并认为他们"在党的马列主义教育和群众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可以逐渐地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但他又再三告诫："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常常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118]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若不对那些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的思想进行积极的改造，小资产阶级分子就会篡夺党的权力，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改造党。

知识分子身上这种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曾给

苏联党和中国党带来过极大的威胁。他们试图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缺乏大量工业无产阶级的不发达国家内，直接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即使是在十九世纪末经济更为发达的西欧各国，这种歪曲无产阶级的作用，妄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的成功性，也是微乎其微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过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巴枯宁曾指责马克思企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把知识分子（有学问的社会主义者）的独裁统治强加在工人阶级头上。马克思恩格斯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无政府主义纲领曾多次使欧洲革命运动濒临绝境，其原因就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已被巴枯宁等某些根本无视无产阶级要求的“自命不凡的天才”的主观主义引入了歧途。[119]

“革命导师”一方面指出可能导致“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还指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特定的政治条件，也会大大助长“左”倾思潮的泛滥。这一精辟的论点指出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的辩证联系。例如，列宁就曾经谈到，当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对资产阶级作出太多的不必要的妥协时，有的工人就会因此不满意而逐渐为过激的革命纲领所吸引，他指出：“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120]

毛泽东也曾多次提及这方面的问题，他指出，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左”倾路线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达到顶点，甚至连温和派都遭到指责时，不仅普通党员会产生矫枉过正的心理，而且在党的领导层内极端主义思想也会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据此分析了1927年在李立三领导下，党内“急躁情绪”迅速滋生的原因。他指出这种情绪在1927年8月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那次会议是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陈的错误部分地导致了国民党在当年4月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大屠杀）。毛泽东认为，会议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上是正确的，是主要方面，“但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

'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命令主义和宗派主义，使之成为1927年以后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条路线。[121]

毛泽东认为，正是由于对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分析和批判不够，所以才导致了党内另一次更为严重的"左"倾思潮的抬头。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122]因此，王明路线便轻易地占据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所以，只有对"左"倾路线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才能够使干部对于错误路线的实质"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123]从而避免重蹈复辙。

"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还同某些具体政策问题有关。毛泽东就曾指出，有时候在按照教条主义者的极端政策去处理问题时，往往就会发生"左"的错误。例如，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候(如在1927年4月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时)，或当红军正在迅速取得胜利的时候，或当群众已被动员起来开始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左"的错误往往就会冒头。相反，在统一战线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在军事上遭到失败的时候，或在农民革命尚未发动起来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往往就会得到滋生和发展。[124]

"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动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都曾一再谈过激进分子的动机问题。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关键问题，是由于过于急躁。他们和犯右倾错误的人有显著不同，后者往往是出于极为险恶的用心。而许多犯"左"倾错误的人，本是具有良好的愿望，基本政策是正确的，但因过于性急而走向了极端。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则被看成是自觉充当资产阶级的走狗，并奉命破坏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和政治纲领进行

了无情的抨击，但是他们也认为巴枯宁的纲领中某些方面的内容（例如无神论、取消继承权、号召“废除国家”等），从本质上讲，还是反映了一些进步倾向的。问题只是在于他们主张要立即实现上述条款，这样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这些条款在革命目标上所具有的合理性质。[125]

列宁也曾多次用宽容语气谈及“左”派的良好动机问题。例如，在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所有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士兵们起来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战争进行全面抵制时，列宁就主张对各种情况应该有区别地进行详细分析。他表示赞同卡尔·考茨基当时说过的一句话：“罢战思想是由‘良好的’动机中产生的，是高尚的和充满英勇精神的思想，但是这是一种英勇的愚蠢。”[126]对于“左派”“不赞成参加议会斗争”的主张，列宁尽管表示强烈的反对，但仍然认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最忠实的拥护者……，是最好的同志和朋友，是优秀的革命者，他们过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由于误会。”[127]认为他们的革命情绪是“极其可喜、可贵的”，并教导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28]列宁认为“左派”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但他对他们的动机却持以宽容态度，认为“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那些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129]

毛泽东在处理党内路线错误问题时提出了一条原则：“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他认为“左”倾机会主义者主要问题，是在“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上面犯了错误，而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130]

到五十年代中期，从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来看，他开始对党内可能会出修正主义的危险问题日益重视起来。但尽管如此，在接踵而来出现农业集体化一刀切和大刮共产风时，他仍然迅速发表讲话，对

政策执行上的冒进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现象加以制止，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表明了他认为对那些犯了“左”的错误的同志(包括他本人)，还是应要进行批评和帮助的。但是，后来他在1957年5月发表的为当时反右运动定下调子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法上却有了很大改变。他一方面认为教条主义者在历史上是有过一些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而那些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则“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131]毛泽东认为，“左”的错误确实曾危害过革命事业，然而在中国的当前发展阶段，批判的主要矛头应该是指向修正主义。不除掉修正主义，它就会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来散播资产阶级思想。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动机和热情，则可以被很好地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他这样写道：“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经验来说，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132]

这一番话清楚表明，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以及与它有联系的“左”倾机会主义，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则被毫不留情地认为是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这种关系的演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和政策，对于怎样认识1957年以后中国的极左思潮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毛泽东事后在分析“大跃进”问题时，进一步认为盲动主义的错误也是可以谅解的。他当时指出，党的领导层在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问题上，确实有些忘乎所以，但还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的干部……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问题只是……走得快了一

些。”[133]在有些人批评“大跃进”的做法时，毛泽东反驳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大跃进”中虽然发生一些“左”的现象，但群众的热情还是宝贵的。毛泽东认为，工作中确实是“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但并非全都如此。他要求党的各级干部正确看待“大跃进”：“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共产主义热情？我们能够把这种热情称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不能这样做。这是想要多做一点……做快一点的问题。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实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134]

1968年7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负责人的讲话，进一步表明了他对“左”的错误所持的宽容态度。[135]他在讲话中虽然对红卫兵运动中越演越烈的派性斗争表示不快，甚至有些失望，但总的来说，他对年青造反派的批判，更象是慈父对自己顽皮的孩子的一种开导，并明确无疑地对他们进行了鼓励(毛泽东在接见结束时宣称：“我们是支持你们的。”[136]) 因为关键问题在于，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还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列宁和毛泽东似乎对“左派”常常持以宽容态度，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对巴枯宁等“左派”予以无情的嘲讽和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的这种态度，说明了他们对巴枯宁的个人野心具有更大的警惕，认为他的政治纲领主要是为他的个人野心服务的。马克思在给他在纽约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13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枯宁的无政府纲领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建立巴枯宁对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个人独裁。而巴枯宁之所以鼓吹完全的自由，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妄图隐藏起他的权欲的阴谋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的路线作出一个嘲讽的概括，认为

这条路线是主张在以巴枯宁为首的、无形的但却是全权的“委员会”的命令下，实行“自下而上的无政府状态和自上而下的纪律。”〔138〕

认真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的批判，对更好地理解中国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展开的对“四人帮”的批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及其同伙的思想动机和令人厌恶的政治行为时，是和对他们错误的政治路线的批判区别开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错误路线的极左性质和这条路线的提出者所从事的反革命活动之间，存在着重要不同。恩格斯曾经指出，导致强制性地把巴枯宁分子从国际中开除出去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特殊信条”，而是由于他们会造成国际分裂的派别活动。〔139〕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比起“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来说，他们所从事的阴谋活动更加为中共党内所不能容忍的原因。〔140〕

“左”倾机会主义带来的实际后果

“革命导师”虽曾肯定过许多“左”倾路线的追随者主观动机中的积极因素，但他们对“左”倾路线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客观危害还是给予了尖锐批判。例如毛泽东就曾指出：“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纠正。”〔141〕

“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总是表现为用一种偏激的态度来对待党的政策。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一旦把正确思想引上了邪路，革命就必然要遭到损失。列宁对这种过头现象提出过严厉警告：“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142〕

恩格斯曾对1873年西班牙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注意

到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一再强调要工人阶级对各自新的小“国家”的自治保持纯洁性的，从而“无限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143〕

而毛泽东在合作化时，也曾深刻指出，如果用极端主义的观点去对待合作化这样基本正确的政策，很可能就会使合作化流于失败。他指出：“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我们回答，完全可能。只要某个地方的领导方面，不管是乡支部、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不去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去注意互助组的发展情况，又没有规划，又没有控制，不是分期分批，而是专喜欢数量，不爱好质量，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144〕

恩格斯当年曾指出，巴枯宁之流大喊大叫要反对宗教和继承权的实际目的，是要使我们“自己脱离我们广大会员，那就等于分裂欧洲工人阶级。”〔145〕从那时起，一百多年来，抨击“左”倾机会主义者妄图使社会主义事业脱离群众、变成孤鸿哀鸣的阴谋，便一直成为批判他们的主要内容。而且，他们的这种做法，以及歪曲社会主义纲领，挑动革命队伍内部不和等行为，还被认为是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资产阶级力量的作用。恩格斯在谈到巴枯宁一伙被国际开除的原因时，就指出他们的行为是在“阻挠国际反对工人阶级敌人的活动，因此它就是在最好地为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146〕后来列宁在批判“左”翼反对派时，几乎是在重复恩格斯的这一番话，认为“左”翼反对派的做法“等于完全解散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147〕毛泽东也曾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搞“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做法〔148〕，指责他们是在间接地为统治阶级服务。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对巴枯宁的批判中，有一处内容同中国后来对“四人帮”的批判颇为相似。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曾抨击巴枯宁鼓吹的废除国民教育一说，认为这一提法只能得到这样的实际效果，即剥夺了无产阶级学习将

来可能会对社会主义革命有益的知识和技艺的权利。他们指出：巴枯宁"借口说现代科学无非是官方科学(能否设想有官方数学、官方物理、或官方化学呢？)，……从而便向青年宣扬对愚昧无知的崇拜。"〔149〕

"革命导师"把"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和政策，讥讽为拉历史进程的后腿，认为把未来社会憧憬得象田园诗一样美好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后来的变种——俄国民粹主义)是不合时宜的。导师们还抨击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他们鼓吹在将来社会主义工业组织中可以取消管理中心的想法，反映了一种向后看的倾向。恩格斯曾幽默地写道："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150〕列宁在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观点时，曾肯定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支持进步的管理工作的，"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只是意味着退到旧技术，退到旧式企业。"〔151〕

"革命导师"还认为，"左"倾机会主义者最令人不可原谅的，是在于其极端主义做法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恩格斯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粗暴行为和恐怖的策略，仅仅只会使人们以为无产阶级运动天然地就是和无数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些暴力，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象工人起义的。"〔152〕列宁也曾严厉抨击过"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随心所欲的行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名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的'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153〕

结　论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只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尽管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不同，但在批判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提出的问题，却具有令人注目的连续性。例如，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上述“革命导师”遇到的许多问题，在几十年后当今中国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中，又多次被重新提及。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的观点，极左思潮通常是产生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而在物质和文化都很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内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又特别容易滋长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只是书生气十足，缺乏与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联系时，由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的极端观念和政治倾向，往往就会混合为一，表现为一股强烈的极左思潮。某些具有极左思潮的人，常常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形式出现，因为他们仅有“干革命”的“好的动机”，而看不到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一定历史活动的必然产物，更缺乏对导致这种政治行为得以出现的特定条件之间互相作用的冷静分析。

还有的极左分子，具有一种“恶的动机”，即喜欢通过颁布激进的政治纲领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表现出一种极端革命的姿态。上述这两种情况都被人们称为是极左路线的表现。然而，在具体人之间，还是存在着区别的，即一种是出于真心但却因路线错误而导致革命失败的人；另一种是阴险地利用这条错误路线为其反革命阴谋服务的人。作出这样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无论其起因或动机如何，极左思潮总是对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时，由于其激进行为和僵硬的政策，还常常使群众把社会主义和极端主义、暴力、贫穷联系起来，从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最后，在此可以对极左思潮作出一个总结性的批判：极左思潮导致的实际后果和作用，实际上和右倾机会主义一样，都是在帮助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二者可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注释

〔1〕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文章，可以查阅《马恩列论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一书（该书无中译本——译者注）。

〔2〕约瑟夫·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生前经历的政治斗争，也曾深刻涉及到极左思潮问题，其论述并经常被中国人在有关问题上奉为经典，因此在这里也应提及。但是斯大林的论述甚少自己的见解，基本上都是在新的情况下对列宁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观点的应用而已（例如在集体化问题上）。斯大林在这方面的一些代表作，可参见《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第8卷；《胜利冲昏头脑》，同上，第12卷；《给集体农庄同志们的答复》，同上，第12卷。

〔3〕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论述，可参见《共产党宣言》一文。马克思早期是否曾参照"原始共产主义"情况，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性质进行预言的问题，曾引起过一场有趣的争论。关于这些情况可参见雷斯尼克：《原始共产主义和革命》；什洛莫·阿维兰尼：《对大卫·雷斯尼克的答复》；以及雷斯尼克对此再作的回答。以上文章可参见《美国政治科学周刊》1976年第4期第1136—1155页。

〔4〕莫里斯·梅斯纳：《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目标》第216页，本书有关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大量论述，都是建立在这篇优秀论文基础上的。

〔5〕〔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1卷第283页、第282页。

〔7〕当代普鲁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从其最初起源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为止的整个发展历史的研究，可参见诺曼德：《传统》；乌拉姆：《未完成的革命》第95—118页；以及托马斯：同上，第2章。

〔8〕诺曼德，同上，第61页。"和平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提法见诸于帕

姆·杜特的文章，第48页。

〔9〕《共产党宣言》，同上，第281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在1851年期间的通信。(原著这里可能有误。因为第一国际成立于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显然不会在1851年就考虑到第一国际内部的事务。——译者注)

〔11〕塔克：《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理想》第2章。

〔12〕引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戏剧性的纲领(即哥达纲领)。

〔13〕马克思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同上，第3卷第1—25页。

〔14〕诺曼德：同上，第62—69页。对巴枯宁的生平和哲学论点的介绍可见马斯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之父》。

〔15〕诺曼德：同上，第62—69页；托马斯：同上，第5章；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著作有：恩格斯：《论权威》(1873)；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1873)；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1874—1875)。

〔16〕莫里斯·梅斯纳：《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目标》第223—228页，以及《列宁主义和毛主义》；马拉姆：《以人民的名义》。

〔17〕莫里斯·梅斯纳：《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目标》第227页。列宁批判民粹主义的文章主要有以下三篇：《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

〔18〕列宁：《论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8卷第430—439页，《论拥护召回主义造神说的派别》，同上，第16卷第433—644页。

〔19〕列宁：《青年国际》，同上，第23卷第165页。

〔20〕关于这场论战的详细情况，可参见贝托海姆：《苏联的阶级斗争》。

〔21〕同上，第372—374页。

〔22〕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同上，第27卷第186—200页。

〔23〕见列宁在俄共(布)第十届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所提《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決议草案。

〔24〕贝托海姆：同上，第374—379页。

〔25〕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同上，第3卷第530—559页

〔26〕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4卷第178—269页。

〔27〕鲁：《1927—1935：处于反对派的毛泽东》；还可参见勃兰特：《1924—1927：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

〔28〕参见《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

〔29〕鲁：同上，第118—136页。

〔30〕奥尼亚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第142页，还可参见吉耶尔马：同上，第195—206页；哈里森：同上，第166—168页。

〔31〕《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上。

〔32〕哈里森：同上，第235页。

〔33〕《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上。

〔34〕关于遵义会议情况，可参见哈里森：同上，第245—250页；吉耶尔马：同上，第253—257页。

〔35〕毛泽东曾说过，《实践论》的写作意图，主要是为了"揭露主观主义者所犯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原著这里出处不详，按英文译出，仅供参考。——译者注)

〔36〕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2.1)，《反对党八股》(1942.2.8)。有关这段时期的研究材料，可参见奥尼亚特：《毛主席》第213—221页；吉耶尔马：同上，第363—368页；哈里森：同上，第323—347页。

〔37〕毛泽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同上。有关"贫农路线"的论述，可参见欣顿：《翻身》。

〔38〕毛泽东：《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1950.3.12)，《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1955.12.6)。

〔39〕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10.11)；《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6.15)，《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3.31)。

〔40〕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7.31)。

〔41〕麦克法卡：《文革的起因》，第99—168页。

〔4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

〔43〕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11.11—12)。

〔4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12.19)，《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2)。

〔4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

〔46〕有关"文革"高潮时期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情况，可参见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和首都红卫兵负责人的谈话。有关批判"5·16兵团"的情况，可参见伯顿：《文革中的极左阴谋》。

〔47〕马克思：《政治冷谈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上，第2卷第556页。

〔48〕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同上，第4卷第194页。

〔49〕〔50〕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同上，第778页、第773页。

〔51〕引自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上，第4卷第397页。

〔52〕《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上。

〔53〕恩格斯致泰·库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上，第4卷第401页。

〔54〕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同上，第3卷第536页。

〔55〕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4卷第225页、第243页、第248—249页。

〔56〕马克思：《政治冷谈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

556—557页。

〔57〕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列宁全集》，同上，第16卷第438—644页。

〔58〕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同上，第4卷第238页。

〔59〕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1872.1.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上，第4卷第399页。

〔60〕恩格斯：《论权威》，同上，第2卷第553页。

〔6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论述，可参见《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同上，第83—93页。

〔62〕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同上。恩格斯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卡尔·马克思的逝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可见诸于“文革”时期就1967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一事提出的批评。毛泽东当时在答复上海造反派成立非政府行政体制的人民公社时指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人民公社不愿叫什么什么长，……实际上总还是要有‘长’。……人民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毛泽东三次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讲话》，转摘自施拉姆：《毛泽东讲话汇编》第277—278页。(这一讲话系由张春桥在1967年2月中旬在上海群众大会上所作的传达，未见诸正式文件，译者根据英文原文译出，并参考张春桥的传达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仅供参考——译者注)。

〔63〕列宁：《党内危机》，《列宁全集》，同上，第32卷第26—27页。

〔64〕～〔66〕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同上，第539页、第538页、第546页。

〔6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同上，第1321—1322页。

〔68〕《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

〔69〕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721页。

〔70〕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1162—1169页；《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同上，第1178—1179页。

〔71〕毛泽东：《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同上，第1175—1178页。

〔72〕～〔74〕《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上。

〔75〕毛泽东：《实践论》，同上，第271—272页。

〔76〕恩格斯：《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计划》，转引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1973年第4卷第222页。

〔77〕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同上，第1卷第522页。

〔78〕《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上。

〔79〕马克思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3卷第10页。

〔80〕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同上，第522页。

〔8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205页。

〔82〕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6.5.5)

〔83〕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16卷第22—23页。

〔84〕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217页、212页、213页。

〔85〕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同上，第3卷第540页。

〔86〕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上，第2卷第235—236页。

〔87〕威克曼：《历史和愿望》；斯达尔：《继续进行的革命》。

〔88〕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214页。

〔89〕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同上，第757页。

〔90〕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7.2.27)

〔91〕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同上，第21卷第56页。

〔92〕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上，第4卷第384页。

〔93〕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214页。

〔94〕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同上，第913—914页。

〔95〕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

〔96〕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1955.7.31)。

〔97〕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同上，第1200—1212页。以及《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同上，第1175—1177页。

〔98〕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10.11)。

〔99〕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第18卷第370页。

〔100〕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同上，第3卷第273页。

〔101〕恩格斯：《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第18卷第133页。

〔102〕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同上，第371页。

〔103〕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7.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第33卷第244页。

〔104〕《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0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同上，第485—501页。

〔10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同上，第792页。

〔10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2.27)。

〔108〕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同上，第372

页。

〔109〕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年7月1—3日），同上，第242页。

〔110〕～〔112〕《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13〕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8.30）。

〔114〕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差异》，1919年，《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同上，第243页。

〔115〕列宁：《取消取消主义》，《列宁全集》，同上，第15卷423页。

〔116〕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188页。

〔117〕〔118〕《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19〕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同上，第638页；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上，第2卷第561页。

〔120〕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189页。

〔121〕〔122〕《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23〕毛泽东：《学习与时局》，同上，第891页。

〔124〕《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25〕恩格斯在1871年7月写给卡·卡菲埃罗的信中，曾写道："按照他们的意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是巴枯宁自己从我们德国人这里剽窃的）应当是必须遵守的义务，废除继承权和国家等等应当成为我们纲领的一部分。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我本来差不多就象巴枯宁一样，是老早的和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会员也都是这样的……。我们和他们不同……，废除继承权……、废除国家……等用语……，只是我们年青的时候曾多次使用过。但是把这一切列入我们自己的纲领，那就等于使自己脱离我们广大的会员，那就等于分裂欧洲无产阶级，而不是团结它。"（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第242—243页。——译者注。）

〔126〕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战略》，《列宁全集》，同上，第15卷170页。

〔127〕列宁：《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列宁全集》，同上，第29卷514—515页。列宁在这里还指出："更正确些说，不是由于误会，而是由于第二国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译者注。）

〔128〕〔129〕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225—226页。（列宁这段话是针对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党人而言的，而列宁认为他们和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着显著不同。——译者注）

〔130〕毛泽东：《学习与时局》，同上，第892—893页。

〔131〕〔132〕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5.25）。

〔133〕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8）

〔134〕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7.23）

〔135〕〔136〕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负责人时的讲话（1967.7.28）

〔137〕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第33卷333页。

〔138〕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同上，第444页。

〔139〕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年7月1—3日），同上，第244页。

〔140〕毛泽东曾经指出：1929年把陈独秀开除出党的原因，是因为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派别，而不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党的意见"。参见《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41〕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5.15）。

〔142〕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257页。

〔143〕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第18卷539页。

〔144〕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10.11）。（但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反对当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译者注）

〔145〕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年7月1—3日），同上，第243页。

〔146〕恩格斯：《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成员书》，同上第133页。

〔147〕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200页。

〔148〕《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49〕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同上，第443页。

〔150〕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第18卷342—343页。

〔151〕列宁：《青年国防》，《列宁全集》，同上，第23卷165页。

〔152〕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同上，第540页。

〔153〕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上，第217页。

3

未能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根源

谷撒地，
禾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我为人民鼓与呼。

彭德怀(1959)

解放以后，中国在“大跃进”期间(1958—1961年)对极“左”思潮的批判，第一次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1) 虽然对“大跃进”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其后的一些事件(我们将要考察这些事件)，然而它却树立了一个先例，这一先例从根本上确定了以后批判和纠正“左”倾错误的范围及其处理方法。(2) 研究“大跃进”问题并不是想要对那一时期的政策制定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也不是对与中国在五十年代后期发展问题相关的“大跃进”策略的合理性进行评价；这一研究也不会对那一时期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内

著名人物之间的政治性组合提出任何新的见解。这些问题将在其他部分进行适当阐述。[3] 确切地说，本章的目的首先是从政治斗争的演变角度来考察“大跃进”，而党内领导层中的这种政治斗争正是为了努力纠正“大跃进”策略的片面性而出现的。

其次，本章通过对1958年至1961年期间各个年份的考察，将对其中的政策歧异的原因进行探究，即在全面纠正“大跃进”政策的同时，却为什么几乎没有对首先导致“大跃进”的那条路线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当“大跃进”终于失败并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被抛弃时，党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导致当时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混乱的原因，不仅仅是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技术援助，更主要的是由于这场运动。但是当时除了将六十年代初期与那一路线相联系的几乎所有的主要政策加以重新制定以外，在“大跃进”中占统治地位的那条政治路线，却从未被批判地分析过。

稳步革新，高潮，第一次退下来

对经济和社会变革采取极端英雄主义即“鼓足干劲，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这往往被说成是整个“大跃进”期间的明显特点)，事实上只持续了几个月。“大跃进”短暂的“高潮”以一个目标相当节制、方法相当稳健的开始阶段为先导，以一个含有深意的、强化的紧缩为特征的衰败阶段紧随其后，并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全面退却中而告结束。

“大跃进”的第一阶段在1958年上半年展开。[4] 195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赞成要大大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要求与1957年相比，钢产量增长19%，电力增长18%，煤增长17%等，实现大幅度增长。这些要求几乎在整个春季里使经济指标达到了不断升级，失去控制的程度。与此同时，为了补充和促进新的经济发展，中国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重要的措施有：进一步实行企业管

理集中化；动员群众努力发展地方工业并努力建设水利工程；加强党对经济计划的监督；恢复和扩大把上级机关的人员下放到基层的计划，以提高当地的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5]

1958年5月，当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正式批准进行“大跃进”运动时，很明显，中国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超速度，已开始着手进行一项急躁的行动。在二中全会上，刘少奇的报告为这场运动定下了基调，指出了“大跃进”的目标：“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他们迫切要求摆脱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障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6]

刘少奇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大跃进”的主要任务，同时他还详尽说明了作为“大跃进”一部分的“文化革命”问题：“当前的任务，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认真地有系统地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清除其中旧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建立起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7] 很明显，从一开始起，“大跃进”就意味着是一场全面的规划，它要从性质上为人民共和国创造一项新的发展战略。

不过，可以公正地将“大跃进”的第一个阶段称之为稳步革新时期，这不但是与随后更激进的政策的比较，也是表明了这一时期“大跃进”的基本目标的性质。刘少奇的报告和“大跃进”开始阶段宣布的所有政策，都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一种“大跃进”式的目标的问题。只是到1958年夏末，其重点才转而宣布“大跃进”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8]“大跃进”的初期确实与以前的做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并且和随后的“高潮”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大跃进”的“初期”和“高潮”这两个阶段的界限并无根本的区分，但是注意到下面的不同还是相当重要的，这就是在其初期的设想中，“大跃进”并不是作为一个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飞跃

的手段。只是到了“高潮”时期，对大跃进的目标、期望及政策上的宣传才日益甚嚣尘上，把“大跃进”吹成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目标的夸大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动员群众的政策提法的改变上面。这种情况给中国新的发展战略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到1958年夏末，向共产主义过渡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化，成了“大跃进”占支配地位的论调，这种宣传重点的转移在1958年8月29日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北戴河决议》中得到了反映。这一《决议》正式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人民公社。虽然《议决》在过渡时间的选择上保持了一个谨慎的基调，但其要旨是明确的：“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遥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9]

“大跃进”的许多最具有革新意义的政策，其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基层，这一点看来基本没有什么疑问。[10]但是，中央对过渡的速度和宣传基调的逐步升级，有着明显的责任。因为正是《北戴河决议》，才标志了这样一场运动的真正开始。在这场运动中，甚至“共产主义的幼苗”也被认为会在整个国家突然涌现。1958年10月份，90%以上的中国农民家庭被重新组织进了公社。这种公社规模很大，功能齐全；集体所有制范围被极大地扩充了，同时引人注目地限制了农村中私人经济的活动场所；建立了按需而不是按劳分配粮食和其他日常需要品的半供给制度。[11]这些变化明显地、戏剧性地表明了农村社会化程度的发展。但是，宣传工具将这一变化看作是进一步推进公社化的一个步骤，而公社是立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先声；宣传工具还严厉批评了那些对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变化速度持以保留态度的人。[12]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争论

在得意洋洋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乐观主义中，一件有趣——虽然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发生了，它暗示了中国新方向的可能性，也暗示了在“大跃进”的“高潮”期间早已是领导层中的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批判极左思潮。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的特点也表明，为七十年代政治摊牌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两条不同路线，早在1958年底就已被划清了。

事情的导火线是张春桥首次发表于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上的一篇文章。那时张春桥还只是一名地方上资浅的理论家，但稍后却成了“文革”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并成为在1976年10月被逮捕后被称为“四人帮”的激进领导人之一。张春桥非常欣赏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他强烈谴责所有按照劳动或按照等级分配收益的工资制度，认为反映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性质。[13]张春桥强调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需要有效地限制所有的“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一种由于收入、地位及权力不同而导致不平等的形式——的表现，以便保护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力量。

围绕发表张春桥这篇文章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因一篇《交代》而暴露出来了。这篇《交代》是1968年红卫兵从吴冷西那里搞到的。吴冷西当时是全国性的党报《人民日报》的主编。[14]在这篇《交代》里，吴冷西指出，根据毛泽东的个人指示，《人民日报》在1958年10月转载了张的文章，毛泽东要求就当时存在的工资分配制度中的矛盾进行公开讨论，毛泽东写的编者按随文章同时发表。编者按指出，张的观点除了“某些方面有片面性”外，“总的来说是正确的。”[15]吴冷西还指出，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赞扬了张春桥文章中的“基本思想”；我们从另一些渠道还知道，主席在随后视察人民公社期间，表示支持迅速扩大供给制。（指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在分配方面对社员群众实行的主要是免费供给口粮或伙食的制度。1958年底施行，1961年年中取消。——

译者注)[16]

张春桥的文章使宣传界就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不平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根除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并代之以更平等的分配形式。[17]1958年年底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总结这场争论的主要观点。据推测，他的目的是要为党关于迅速扩大公社供给制的政策进行思想上的指导。当时，这种供给制引起了劳动积极性下降、资源浪费等类难题。邓小平和胡乔木(五十年代胡是一名党的宣传领导干部，“文革”期间被打倒，毛泽东逝世以后，重新获得了一个有声望的职位)都发表了讲话，反对过早地取消工资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并批判了“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思潮(即分配政策中的极左思潮)。邓小平甚至走得更远。他认为对国家来说，建立工资制度的代价要比供给制低——这是一种对待“共产主义幼苗”的客观的、经济上深思熟虑的观点，但也许是一种无法很好地适合张春桥及另一些“大跃进”的强烈支持者的胃口的观点。[18]

张春桥负责总结这次分配制度会议。可是，因为不同意邓小平和胡乔木所定下的调子，他并没有写出报告。根据胡乔木的讲法，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政治上的僵持，但在晚些时候却表示不满于这一僵持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上的妥协。[19]

这一事件是七十年代两大领导集团之间(包括张春桥和邓小平)互相斗争的先声。因为1958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相互对立的观点，在“文革”斗争中起了关键性作用。1958年的争论，必然影响到这两个集团之间势不两立的意识形态对抗，并对这种对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次退下来

1958年10月下旬左右，经济混乱、农民的不满已充分表现出来，

中共召开了一系列中央会议来分析这种形势，并开始了补救行动。在11月底至12月初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作出了《武昌决议》，标志了“大跃进”第一次退下来的开始。[20]

《武昌决议》再次肯定了公社化运动的主流，并号召在1959年展开“一次更大的跃进”。因此，它在许多方面仍适应了那时的膨胀要求。例如，它仍表示希望给经济现代化发展安排一份极不现实的时间表，它仍一如既往地提及要继续增加“共产主义成分”（如供给制和公社群众食堂），并以此作为“大跃进”的重要目标。但同时，武昌会议也号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要有一段时间的“教育工作，对公社进行总结、巩固的工作。”[21]

《武昌决议》勾勒了某些小规模的管理组织的框架。同时，《武昌决议》还考虑了这样一些问题，如过多地将私人财产入社和平均主义的不利影响，因公社的自我服务（确实是闭关自守的）倾向而引起的全国经济中商品交换制度的瓦解，一些干部的命令主义倾向（他们急于将“大跃进”推向更大的高潮）等等。再者，虽然《武昌决议》仍坚持“大跃进”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和思想基础”。但它也强调，“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贯穿这一全过程的社会在性质上仍是社会主义社会。”[22]《决议》还明确对北戴河会议的论述进行降温，北戴河会议认为，大跃进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农村中所有制形式的基本改变可能只要三、四年时间即可实现。而这次的《决议》虽然对完成这一任务仍作出充满希望的预测，但同时又指出，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要使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切实可行，可能要“花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23]

总而言之，《武昌决议》表明了党的领导人在对“大跃进”的估价上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它明显地保持了“大跃进”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必须要纠正太显眼、太过分的“高

潮"。因为"大跃进"的发动本身，就反映了领导层对中国的发展需要新的目标这一基本一致的主张，所以领导层差不多一致同意进行这一最初的退却，这是确实的。[24]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总结"过程暴露出了人民公社具有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这甚至出乎那些领导人意料之外。当党的高层详尽阐述这两个过渡(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之间的细微差别时(在中央指示中，并附有限制性说明及修辞性语句)，农村经济已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困难之中，群众对"大跃进"政策的不满也在日甚一日。[25]严峻的形势促使中央于1959年2月底至3月初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承认了公社结构中需要作进一步的行政变化，将大部分生产和分配职能转让给大队，从而减少了上级在许多重要方面对农村生活的指导权力，这对恢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毛泽东在郑州发表了几次讲话，详细谈到了日益明显的"大跃进"计划的副作用。[26]主席对中层干部提出了非常率直的看法，认为这些干部在执行公社化政策时搞极端。他辛辣地讽刺了"共产风"，即1958年夏秋时期大刮公社化之风。他指出，这股"风"是由那些具有良好愿望但过于急躁的干部煽动起的。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愿望冲昏了他们的头脑，过火的热情导致了强行拉平穷富差距，并把过高的积累(特别是基本建设)，而不是把分配的不同，看成是集体所有制的主要特征；基层利益和个人所得被公社无偿调用，甚至借共产主义之名来搞这些名堂。这就等同于"抢劫"。如果不纠正这些做法，人民将会抛弃革命事业。[27]主席甚至强烈地为农民的"本位主义"辩护，认为农民们用瞒产的方法来抵制上述做法是情有可谅的。[28]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还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他的其他同事。他就自己过高估计了群众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热情问题上所犯的"冒进主义"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还告诫其他领导人

不要因追求革命目标而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29]甚至在郑州会议之前，毛泽东对那些负责制定"大跃进"目标的领导人(包括他自己)不懂经济建设的具体问题的情况，就已表示了遗憾。毛泽东认识到，蔑视现实对纯粹的意志力和愿望的固有限制，则将会因此而受到现实的惩罚。他对已经发生的这种严厉的报复苦思冥想，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象小孩玩火，没有经验，只是在烧到时才知道痛。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向地球宣战，但是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没有经验，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失败和错误。"[30]

毛泽东尽管作了这些自我批评，但仍多次重申了运动的总的设想和具体政策，他认为基层干部的热情和积极性是非常宝贵的，即使有时显得有点过份。[31]毛提到了"一平二调"的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内容。"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及社员个人的财物等。——译者注)但他认为："我们的干部……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问题只是……走得快了一些。"[32]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对"大跃进"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主要出在负责执行政策的干部的工作作风上，其中部分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至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33]此外，毛泽东还认为，虽然过去几个月中出现了不少困难和混乱，"但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34]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含糊，其中对"大跃进""高潮"问题是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这种模棱两可的政治会议，也许能从毛泽东似乎自相矛盾地给后来主张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这一事件中得到最好的理解。当时一方面，毛泽

东就抵制"共产风"问题帮助农民说话，他指出他本人"不怕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坚持这一观点，即使开除出党，也要坚持下去。"[35]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对那些认为"大跃进"有问题的人发出了警告(这些人认为应撤销所有的"大跃进"项目)，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36]他重申了《北戴河决议》中关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认为人民公社是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并警告说："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37]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意图看来是：纠正"大跃进"的过火现象，主要是在于纠正干部的工作作风，而如果藉此对"大跃进"的根本路线产生怀疑，则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彭德怀几个月后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毛泽东一方面利用"右倾机会主义"一词来表示他自己反对"共产风"，这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肺腑之言；而另一方面，他又利用这个词作为符咒，来警告那些怀疑"大跃进"策略是否明智的人，这才是利用"右倾机会主义"这一词汇的关键所在。不管毛泽东那时的思想是怎样的隐而不露，但实际上由武昌会议开始的，并由郑州会议再次肯定的对党的政策进行重新调整的做法所产生的强烈而迅猛的推动力，招致对产生"大跃进"的原因进行了更彻底的探究。在1959年初至1959年年中这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看到为纠正具体政策错误而重新采取各种措施的现象，而且也能看到对许多意识形态观点进行研讨的势头也正日益高涨。有些人甚至认为，"大跃进""高潮"的产生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失误所致。在1959年前六个月中，可以察觉到全面批判极左思潮的情况正在开始，它包括调整具体政策，也包括对这些政策之所以产生的路线给予批判性的分析。[38]

宣传工具在这段时间内把下面一些问题，如错误理解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复杂性，贬低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刺激的正当作用，错误

地认为平均主义是一种革命思想等等情况，看成是有可能危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并花了大量篇幅加以讨论。与此同时，宣传工具还相应降低了把群众运动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策略奠基石的论调，并表示要更加相信周密的计划及技术专家的作用，甚至还对经济组织中到处都是党的领导这种情况表示了一定的怀疑。[39]总的说来，在对“大跃进”许多政策进行实质性的调整时，“大跃进”的一些重要的指导思想也都受到了怀疑。

虽然毛泽东同意对“大跃进”的政策进行调整和对工作作风加以必要的纠正，但他却不能看到1959年上半年展开更深入地批判“大跃进”策略的重要性。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举行了八届七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对“共产风”的原因及其给经济造成的困难程度看法不一。[40]领导层在“大跃进”及其“退下来”这两个问题上曾是相当一致的。而现在，恰恰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范围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于1959年夏庐山会议上摊牌时达到了顶点。

从“共产风”到“右倾机会主义”

西方观察家和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都将1959年7、8月间在江西庐山举行的党的会议看作是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庐山事件被看作是党内领导层的第一次冲突，围绕政策和意识形态而引起的这起冲突为路线斗争准备了舞台，而这种路线斗争又对“文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1]从这一研究角度来看，对那些日益怀疑“大跃进”、并力图将对“大跃进”的批评扩大成对“大跃进”的路线进行全面批评的人来说，庐山会议标志着他们所有努力的结束。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冲突涉及了如下几个问题[42]：入民解放军是遵循苏联军队的模式，向职业化方向发展，还是应日

益增强其政治化（包括党的领导和军队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军事工作）？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和彭德怀分别持有不同观点，这种不同观点的形成已经酝酿了相当一段时间了。[43] 军队问题并没有提上庐山会议的议事日程，而且也没有作为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一部分内容，但这一问题对扩大主席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争执起到了明显的间接作用。此外，彭德怀对"大跃进"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之所以持批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士气低落的警觉；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认识到经济的紊乱必然会影响到他指挥下的军队。苏联对中国具有创新精神（或者，根据苏联人的观点，这是一种异端邪说）的发展策略日益轻视，这也引起了彭德怀的忧虑，因为这可能危害他的在苏联援助下实现军队现代化的希望。

彭德怀及其支持者还对毛泽东的个人领导方式深感忧虑，认为毛泽东在渐渐向高度的个人专制方向发展。[44] 他们对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计划或试验的情况下就提出"大跃进"策略这种做法，感到特别恼火。当这一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被提出来时，毛泽东知道，必须要对这种指责（即他违反了他自己所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原则）[45] 做出严肃的反应。

不管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包括据传彭德怀因不满"大跃进"而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不正当"联系）在形成庐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是导致冲突的关键问题，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筹备组讨论的发言，以及后来他送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中表达的不同意见，都认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是导致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物质现实对中国发展抉择的限制，从而盲目发动大跃进的主要原因。[46]彭德怀在"意见书"中，认为主观主义导致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政策（如仓促建立人民公社，分配中大搞平均主义等），并导致在制定目标和汇报成绩这两方面出现了极为恶劣的"浮夸风"。他指出，这些错误违反了"党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正因为这些错误，党失去了群众的支持。[47] 意见书最后触及了“大跃进”问题的核心所在：“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性，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48]

彭德怀认为，“大跃进”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好处。在他看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造成了灾难性的向“左”转，严重损害了党的威望。

彭德怀用向毛泽东表示敬意的语言发泄了他的不满。他虽然对前几年的基本政策在表面上也说了一些恭维的话，并且，他批判“大跃进”的观点并非与毛泽东本人对“大跃进”问题的看法相去甚远。[49] 然而，毛泽东的反应是，把他和其他对“大跃进”持批评态度的人谴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正在共同向党进攻。”[50] 毛泽东也承认人民公社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承认领导阶层有时对复杂的经济问题缺乏了解，但是他却把大部分责任推到执行政策的公社一级干部的身上。他强烈表示坚持“大跃进”的思想和基本方针，认为在郑州会议后，大跃进“高潮”时的许多过火的做法都已得到了纠正。毛泽东声称，“刮‘共产风’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没有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反‘左’，而是反右。”[51]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有人批评“大跃进”，是因为那些人不喜欢采用群众运动方式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党内存在严重的路线斗争。毛泽东要求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必须就这一问题进行表态。[52] 主席得到了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的支持。这些领导人出于中国革命的正统观念，因而无视彭德怀的正确批评而支持了毛泽

东。[53] 这样，庐山会议在闭幕时，通过了谴责"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发表公报，再次肯定了"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声称中国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各级领导层"一些干部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54]

庐山会议后，对"大跃进"政策进行了某些事实上的调整，以防止出现早先时候的浮夸风现象，肯定基层的生产职能作用，并通过增加集体收入的比例（指定实行分配制而不搞积累制）来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55] 但是，总的来说，紧接着庐山会议后的那段时间可被称为是"第二次大跃进"。[56] 1959年最后一个季节和1960年上半年，一些较为激进的"大跃进"政策又复活了。例如，虽然农村和城市都经历过1958年至1959年的特别困难时期，但这个时期在农村建立公共食堂、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等倾向却又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毛泽东在1960年3月还赞赏"鞍钢宪法"，认为它强调了群众运动，党的领导和非官僚主义的企业管理结构。这种态度对于发展社会主义采取"政治挂帅"方法来说，无疑是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而这种做法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反对的。[57]

随着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冲突之后的，是一场激烈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直到1959年底才结束。[58] 这场运动宣传批判面很广，主要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在给全面的群众运动抹黑，给"大跃进"所取得的特别成就抹黑。在基层，对那些反对"大跃进"政策或在1959年上半年调整工作中过于急躁的干部则是采取纪律性措施（达到进行清洗和进行人身攻击的程度）。在重新进行"大跃进"时，虽然注意到反对"左"倾倾向如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等，但是官方的批判重点，已明显转到了把右倾机会主义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极大危险上面。

没有批判而退下来

当"第二次大跃进"造成更加严重的经济困难，农民的反抗超过了对"高潮"的反抗时，中央最初所谴责的，只是基层干部在执行政策中的错误，"在好心好意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少数思想觉悟不高的人。"[59] 从1960年中到1961年，所谓的"五种作风"即"五风"成了一场调整运动的目标，而这场运动具有批"左"的色彩，它的目的是要纠正"共产风"（平均主义），命令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正确考虑具体情况的生产瞎指挥风以及在目标和成绩上的浮夸风。[60] 可是，批判仅仅直接针对执行中的问题，官方的宣传一致维护大跃进最初的政策和思想的正确性。[61] 但是，当经济中的问题越来越多（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在1960年突然撤走技术人员这两者同时发生）时，大跃进的全面退却终于开始了。

1960年11月关于农村形势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治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12条》）和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60条》）决定对公社再作进一步的调整。[62] 这些文件在生产和分配方面保证了生产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农村中的社会化水平；这些文件还规定可以保留私人自留地和农村的自由市场，而在"大跃进"期间，这些东西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遭到彻底禁止。在工业和教育战线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整。这样到了1961年中左右，不仅完全纠正了"大跃进"的政策规定中许多实质性内容，甚至宣传工具也停止了对"大跃进"最初思想的鼓吹。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这至少持续到1962年初）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外交政策，以拯救经济、缓和普遍的不满，并建立了一个较少激进色彩的未来发展框架。[63]

在六十年代初，常常认为中共的这种"新经济政策"是借鉴于列宁二十年代初为解脱"军事共产主义"激进措施而实行的政策；

而稍后，毛泽东则开始将这种新的战略视为在党内蔓延的修正主义温床和在整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先兆。但是，对这一时期中共的“新经济政策”无论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实际上它都已意义深远地结束了“大跃进”的纲领和目标，并诱发了党内对抗的进一步骚动。

这种对抗终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达到顶峰。

这种对抗的焦点，正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党的实践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64)换言之，毛泽东开始警觉到想要努力使国家摆脱五十年代末的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许多其他高层领导也日益强硬起来，深信“大跃进”表明了主席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的极左观点已彻底破产。可是，批判“大跃进”——他们受到当时政治现实的限制——不能(或不愿)采取一场公开的运动，来批判首先引起“大跃进”的那条路线。因此，从“大跃进”最初退下来主要是进行充分的政策调整，而没有对路线本身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对极左思潮“批判不彻底”一词来描述的过程。对政策本身的调整，以纠正所宣称的“左”倾错误，这并没有形成一场全面的批判；在我们看来，要真正对极左思潮进行全面批判，就必须涉及政策调整和对产生这些错误政策的路线进行批判性分析这两个方面。

这并不意味着在庐山会议后不存在对“左”倾错误的公开批判。事实上，在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至1961年间，都有一些这样的批判。特别明显的是批判了公社再调整时期各个阶段所存在的平均主义。可是，至少可以这样说，与1959年上半年对极左倾向所进行的那场相当广泛的批判运动相比较，这种批判被大大减弱了。最意味深长的是，对“大跃进”从来没有从整体上进行过任何公开的谴责或分析。在某些方面，“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

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五十年代后期被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次适当战略，而“三面红旗”的神话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后才被触动。

对“大跃进”没有进行彻底批判当然加剧了高层人物内部对抗的形成；也许，随之还引起了公众的玩世不恭，因为群众对调整政策和官方神话之间的不协调，进行了深刻的思索。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对“大跃进”的批判从未能将公众的这种思索转变成一种对极左思潮的全面批判。

为什么是一场不彻底的批判

很明显，在1959年上半年“大跃进”第一次退下来的最初阶段中，曾有过对极左思潮较深刻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做法而转变了方向。但是，为什么在1960年至1961年“第二次大跃进”失败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仍不能深入下去呢？

首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表达了非常透彻的看法：他绝对不能忍受对“大跃进”的基本思想的批判。虽然“大跃进”的失败损害了主席在最高决策集团中的权威，但决不可以忽视他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影响。除了有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在高层决策中有时有被架空的情况外，[65] 他仍然拥有从前的政治力量，并反对将“大跃进”路线看作是极左倾向，反对在党内进行任何公开或正式批判的意图。

其次，毛泽东在普通党员和全体人民当中拥有巨大的威望。对1958年至1960年间问题的任何批判性分析，都不可避免要引起对毛主席领导的不满，并将使整个党的合法性黯然失色。因此，如果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这时想发动一场批“左”（批判导致“大跃进”“高潮”的过火行为的政治环境）运动，那么即使他们能够表明自己在“大跃进”政策的制定上没有什么责任，但也不可能获得舆论和组织上的巨大支持。

最后，"大跃进"的批评者们已对六十年代初期退下来的政策调整措施感到满意了。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可能感到不必再冒任何风险去对意识形态进行良心上的自我反省了，而彻底批判"大跃进"就必须付出这种风险。他们还希望毛泽东吸取教训，也希望他遵守他自己早在1958年2月就已作出的一个决定，将精力集中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路线问题"，〔66〕将细枝末节计划问题留给那些精通经济事务的人去做。

总之，"大跃进"的批判者们必须认识到：进行一场全面而公开的对极左路线（它引起了如此多的困难和倾轧）的批判，其所要冒的政治风险远远超过可能得到的好处。因此，在开始意识到"三面红旗"的提法有问题时，他们仍然继续而慎重地进行工作。彭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彭真是北京市市长，高层次的政治局委员，他在1961年10月曾要求对"大跃进"所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秘密的调查，这表明他生怕招致毛泽东的惩罚及挑起公众对党的领导是否明智的疑虑。〔67〕

庐山会议是批判"大跃进"演变过程中的主要转折点。毛泽东对彭德怀批判"大跃进"所作的尖刻回答，有效地窒息了对导致"三面红旗"的那条路线进行任何更深入批判的可能性。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做呢？

主席在这些会议上的行为，既是他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冲突的一种结果，也与在庐山会议前6个月或8个月中党内出现的对"大跃进"的批判意见不无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毛泽东的行为。这种批判并无太多的具体内容，对毛泽东所反对的多方面调整"大跃进"政策也没有什么建议——事实上，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本人在党的会议上和其他一些场合，也发出了相同的批评和建议。看来使毛泽东激怒的是"大跃进"批评者的"调子和总的估计"，毛泽东将这一点理解为是对他本人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进行总批驳的先兆。〔68〕毛泽东赞成要纠正冒进主义倾向和"刮共产风"的工作

作风，但他却震怒于彭德怀的批评是含沙射影，彭德怀认为“大跃进”的整个政治路线是党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产物。要理解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还必须要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对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革命中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问题，一直抱有偏激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所以主席一直对苏联国内外政策持以批判的态度。而到五十年代末，这个问题显得格外迫切。1959年春夏之际对“大跃进”日益强烈的批判和此后的庐山事件，都更加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仅在最近，1956年进行的“反冒进”运动(以控制过度的集体化)刚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也就是说，纠正“左”倾倾向就意味着要向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批“左”不过是从右的方面进行攻击的伪装而已。

因此，不象10年以后在林彪死时“四人帮”所作出的反应那样，毛泽东的反应只是采取行动扼杀了对极左思潮日益强烈的批判。因为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得出其自身的逻辑结论就是，一场对“大跃进”的批判，将对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提出难以接受的挑战。还将对他极力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应偏重于意识形态的做法提出挑战。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的关键所在，是认为无论政策中“左”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怎样严重，它都不会象右倾机会主义那样，对社会主义构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对“左”倾错误不应象对右倾错误那样加以同样广泛的公开批判。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还表明了他这样一种态度，即如果力主批“左”，就是一种近乎于反革命的行为。毛泽东的这些做法的实际结果，不仅在于想要突然扼杀任何可能对“大跃进”进行全面批判的做法，而且还想缓和中国领导层内和群众政治文化中蕴含的对极左思潮的忧虑。然而很清楚，对“大跃进”政策有所保留的高层领导人，对此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与此同时，在中国人的政治文化问题上，官方认为当前所应批判的，应是修正主义的危险，而“左”倾机会主义则没有

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可能导致出现严重差错的主要问题。这样，就为极端的“文革”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就象我们在随后的事件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也为以后进一步批判中国政治中的极左思潮创造了基本条件。

结　论

中国人曾经对“大跃进”中的极左思潮进行过批判，这一批判过程可分成五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58年春天至夏初)时，“大跃进”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子，来补救因照搬苏联模式而造成的困难。虽然在第一阶段中制定了一些口气过大的高经济指标，但新计划的所有目标仍被规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稳步革新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大跃进”的“高潮”阶段，时间是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公社化运动后到1958年年底。在这一阶段，不仅明确宣传要动员全体人民起来支持“大跃进”，而且把“百花齐放”运动后的反右运动(开始于1957年)，扩大成对地方干部和所有群众中的所谓保守倾向进行的斗争。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强调“大跃进”是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努力，并得意洋洋地以为实现这一乌托邦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1958年12月《武昌决议》为解决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严重困难，开始了最初的巩固和再调整时期。这第三阶段涉及了两个方面：即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对“高潮”中“左”倾倾向的批判。到1959年春夏时期，这场整顿和批判的运动，已逐渐表明有可能发展成对极左思潮的全面批判，即从对具体政策的调整，逐步向对政治路线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方面发展。但这一发展过程却因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事件而告夭折，那时毛泽东“战胜”了彭德

怀，从而导致了第四个阶段的开始，即号召开展“第二次大跃进”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

此后便是这一过程的第五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某次中央会议还是几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现在还不很清楚。然而，这一阶段在1960年年底和1961年年初便已渐见端倪。当时，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自然灾害，苏联又撤走了技术援助，“第二次大跃进”挣扎前进，然而终归失败。在这一时期，六十年代初的“新经济政策”羽毛已丰，“大跃进”计划被全部撤消，但却没有对“大跃进”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进行任何严肃的再评价。因此，它具有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不彻底的特性。与播响预示着这场运动开始的宣传之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二次大跃进”以怨声载道而消声匿迹。深刻认识这种全面而不彻底的批判方式的形成原因，不仅有助于理解“大跃进”的政治原动力及其直接后果，而且还有助于分析后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纠正为什么呈现出迂回曲折的特点的实质所在，而正是这种极左思潮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注释

〔1〕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政策执行上面曾有过多次批判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情况。但是“大跃进”却是第一次由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引起了党内领导层的严重分歧。

〔2〕例如，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疏远，使得党内最高层在整个“大跃进”时期都未置一词，其后又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在“文革”时期，党内领导层出现了深刻的难以弥合的分歧。因此，“文革”之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比“大跃进”期间的批判要深刻得多。

〔3〕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些有益的研究资料有：阿恩：《中国政治和文化革命》第2—4章；钱：《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3—5章；戴维：《中国的政治和解药》第8—10章；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第18章；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第12—14章；利珀特：《重新思考大跃进》；卡塔卡：《大跃

进的政治理论》。

〔4〕《红色中国：政策文件分析》第17—18页

〔5〕哈定：《组织起来的中国》第169—177页。

〔6〕〔7〕引自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其主要内容为：目前形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今后的各项任务。引自人民日报(1958.5.27)。

〔8〕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以后，社会发展通常将分为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者是通向后者的一个过渡时期，并只有在后一个阶段，才能真正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纲领。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被打上了"从旧社会脱胎而出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些"痕迹"(例如不平等，劳动力的差别，按劳分配，国家政治权力等)只有通过相当长时期的真正平等的经济生活、社会制度、以及人类关系等的磨砥，才能逐渐消除。参见奥曼：《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看法》。

〔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后来称之为北戴河决议)

〔10〕例如，人民公社最初是于1958年春季在河南、河北以及东北等地获得大丰收以后当地的合作社自发合并的产物，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对此进行一系列的视察以后，才就成立人民公社问题发出了正式通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就曾讲过，农村食堂"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群众的创造。"

〔11〕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根据钱的著作：《权利和政策》第96—110页。

〔12〕《人民日报》(1958.9.3)

〔13〕《解放》1958年第6期；也可参见哈定：《组织起来的中国》第190—193页。有关张春桥的政治简历可参见瓦尔德：第5—8页。

〔14〕参见吴冷西的《交代》，《红色新华》1968年5月第43期。(这是"文革"期间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译者注)

〔15〕《人民日报》(1958.10.13)

〔16〕吴冷西的《交代》，同上。

〔17〕有关争论文章可参见《当代背景》第537—539页。

〔18〕邓小平认为，工资制度"并没有使资产阶级不平等权利制度化"，邓小平对供给制的批评，《人民日报》(1958.10.17)。

〔19〕有关这方面材料可参见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思想论集》第233页。

〔20〕～〔23〕《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12.10）

〔24〕戴维：《政治》第335—336页；钱：《权力和政策》第101—105页；还可参见麦克法卡：《红色中国的党内分歧》。

〔25〕这一节中的情况可以用彭德怀的那首失题的诗加以表明。本章开头就引用了这首诗。

〔26〕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两次讲话（1959.2—3）

〔27〕〔28〕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

〔29〕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5.5）

〔30〕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2.2）

〔31〕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

〔32〕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8）

〔33〕〔34〕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

〔35〕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5.5）

〔36〕〔37〕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

〔38〕即使在这一时期批判"大跃进"的失误时，也很少使用"极左"这个词。显然，这同反右运动不无联系。反右运动已使批"左"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件危险事情。

〔39〕戴维：《政治》第398—406页。

〔40〕阿恩：同上，第37页；钱：《权力与政策》第108页。

〔41〕戴维：《政治》第9章。

〔42〕有关庐山会议情况可参见上述著作，以及查尔斯：《彭德怀元帅的失误》。

〔43〕钱：《权力与政策》第110—114页；吉廷斯：同上，第11章。

〔44〕戴维：同上，第406—407页；阿恩，同上，第40页。

〔45〕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8.15，1959.8.16）

〔46〕上述问题可参见《彭德怀问题》

〔47〕〔48〕彭德怀：《意见书》，《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第285页、第286页。

〔49〕戴维：同上，第405页。

〔50〕〔51〕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8.2)

〔52〕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8.7.23)

〔53〕戴维：同上，第405页。

〔54〕有关材料可参见《彭德怀问题》第39—44页

〔55〕阿恩：同上，第43页。

〔56〕沃格尔把这段时期称为是“大跃进的复兴”，参见《共产主义实现的地方》第262页。戴维将其称为是“大跃进中的又一个新高潮……”，同上，第435页。

〔57〕阿恩：同上，第43页。

〔58〕戴维：同上，第428—436页；还可参见约瑟夫，《两届之间》。

〔59〕《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公报》(1961.1.21)

〔60〕阿恩：同上，第44—45页；戴维：同上，第435—436页，第448—451页。

〔61〕戴维：同上，第458—459页。

〔62〕戴维：同上，第444—445页；阿恩：同上，第46—47页，第54—58页。

〔63〕戴维：同上，第471—476页。

〔64〕阿恩：同上，第86页。

〔65〕例如，邓小平和彭真在1961年初就曾未向毛泽东请示，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起草了6篇文章。毛泽东为此作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哪个皇帝决定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而且，毛泽东在1966年还曾抱怨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对他“敬而远之”，并且6年来从不就重要政策问题向他请示汇报。施拉姆：《毛泽东讲话集》第266—267页。

〔66〕促成毛泽东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决定不当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原因，可参见《红色中国：政策文件分析》第487—488页。这一决定的产生，还可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2.19)。

〔67〕〔68〕戴维：同上，第491—492页，第405—406页。

4

批判“大跃进”

……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毛泽东(1944)

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使得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没能坚持下去，进而导致对当时大跃进路线作出彻底分析的努力也就中途夭折。但尽管如此，人们在随后处理由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的困难时，还是提出了很多直接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生、表现和影响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进一步证实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方法、干部的工作作风以及具体的政策问题上，确实存在着极左思潮，这一点将在本章中得到详尽的论述。(1)有关这些问题的内容，有的是在对大跃进极左错误进行广泛批判时期内，因受到彭德怀等人强烈语言的启发而提出，还有的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由大跃进退为全面调整的时期内，因毛泽东在肯定

大跃进的战略意义的前提下也承认了对其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后而提出的。

思想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以及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大跃进”的理论和实践，至少是从1958年8月北戴河决议之后，以中国能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阶段的设想为依据的。这种信念又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认为中国在1958年到1959年期间已经能够大体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任务，从而就具备了（或因爆发新的干劲和热情从而能很快达到）过渡成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引导毛泽东和其他人得出这一乐观分析的是基于对以下若干问题的考虑，即：中国自解放以来，总体上说在经济上的发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和农业迅速地并相对平稳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化；认为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表明已消灭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残余势力；认为以1957年底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2]表明国际力量平衡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明显转变。这些乐观估计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毛泽东开始日益感到担忧：如果没有对群众的进一步动员和社会与经济平等的持续发展，中国革命将有可能面临官僚主义和退化的危险。因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便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上，为了加快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一种大跃进的做法，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对于履行党的革命使命，也是完全必要的。[3]

1958年夏天，在中央的支持下，各地纷纷建立了人民公社，把迅速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大跃进的一个明确目标。刘少奇在1958年5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号召，

指出前面的任务是“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要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4]然而，他虽在讲话中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国将能够在工业上“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并指出“我们将肯定能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世界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甩到后面”，但在这时他还没有提到这种大跃进即将就要导致向共产主义的过渡。[5]

陈伯达在1958年7月《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总结公社早期经验的文章，[6]第一次正式提出大跃进是一场“开辟了我们国家能够顺利地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运动。1958年8月29日通过的北戴河决议，不仅正式肯定了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而且还将其与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直接地联系起来。虽然决议中也提出：“在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决议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积极做好准备。”在决议的总结部分，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7]

实际上，北戴河决议仅仅只是乐观派的情绪的体现。自从1958年春天出现了第一个公社以后，这些乐观派就一直在不断增多。他们对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普遍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这里以当时人民日报一篇充满信心的预言式的文章尤为典型。该文写道：“中国正在以宇宙飞行的速度奔腾前进。不久以前，农村五十来岁的人们还在担心自己可能看不到共产主义的美好时光，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却都喜笑颜开地坚信自己能够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有的老汉甚至还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过上了共产主义的幸福。”[8]北戴河决议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狂热的宣传号召，戏剧性地促使当时的情绪更加激进。原先政策的重点，是要鼓励开

展社会主义的大跃进，这时也一改而为开展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大跃进。然而，“社会主义建设”与作为这场大跃进的奋斗目标的“向共产主义过渡”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抽象，而且还对干部的素质、工作作风以及政策的内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新闻媒介不停地鼓吹中国已正处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口处。但到1958年年底，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出现和对公社的普遍不满，领导阶层迅速意识到了把大跃进看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狂热设想，正是导致在实际工作中造成许多具体困难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原因。虽然最初的这种设想，反映的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愿望，并在实际工作中仅仅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但这场乌托邦仍然使很多人在1958年年底挨了批，〔9〕认为他们过于乐观，对共产主义提出了“过于急躁的要求”，并因而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相反的结果”。〔10〕

这时的报纸即使在支持大跃进的时候，也开始重申分清社会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阶段的重要性，以期避免不切实际地追求扩大平等、减少等级的所谓共产主义目标，从而与现阶段的争取更高生产水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相抵触。在批判大跃进的极左思潮时的一个基本要点，是提醒干部要注意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内的工作内容。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和未来无阶级的、财富极大涌现的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但是，搞不清楚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一发展阶段上，并因此不能很好分清“远大的目标和现实的工作之间”、“今天的工作和明天的工作之间”的界限，则是要受到批评的。〔11〕虽然在社会主义时期要继续培养“共产主义因素”的号召，可能会搅昏某些干部的头脑，使之分不清“急躁”与“保守”的界限，但中央在党内通信中提出的不要对高速过渡到共产主义抱不切实际的期望的劝告，则应是说得很清楚了。〔12〕

之后，新闻报刊为了反驳极左思潮在过渡问题上的观点，着重

分析对比了中国在五十年代后期的客观情况和进入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例如，假设共产主义“是一个以绝大多数人从事工业和其他经济服务部门的现代化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而中国的现实则恰恰相反，基本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又如，设想共产主义是“社会财富极大涌现”，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的社会，而中国的现实则是“社会财富”非常贫乏；无论是从刺激生产发展，还是从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说，按劳分配都仍然是必需的。在思想意识战线上，任何人只要对中国在1958年和1959年左右的情况进行一下客观的分析，都不难发现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仍然是“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在政治上，反革命分子还有可能存在，这就使得“取消国内的专政职能”几乎成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这恰恰又正是国家的消亡这一共产主义目标实现的一个先决条件。〔13〕

换言之，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需要一种很高的经济水平和思想意识上的进步。而极左思潮对“大跃进”的看法违背了这一事实，这一点已受到批判。过渡阶段并不是仍在争取实现上述要求的过程，而更应是促使一种共产主义的价值和制度趋向成熟的发展过程，这种价值和制度正是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得到巩固发展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社会思想意识的日益进步。普遍的贫穷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更不用说封建主义残余了)，决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就是要逐渐消灭这些东西，并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打下基础。〔14〕

不断革命论对阶段革命论

极左思潮在把“大跃进”看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的思想背后，在意识形态上暗含着涉及到历史变化的一般规律的某种设想。这表现在：首先，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性质在于是一个不

断革命的过程。这种观点后来被批判是片面的。[15] 按照这种观点看，通过在社会组织和价值观念上的连续的、渐进的变化，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然后，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内部矛盾有意识的激发和斗争，又会重新推动这些变化的产生。此外，这种观点还认为，由于各种势力总是顽固地抵制革命的深入发展，因此，一切革命如果不能不停顿地发展到更高阶段，则将会停滞和退化下去。[16] 毛泽东本人最初在1958年1月一次关于"大跃进"的意义的谈话中，对这种"不断革命论"是持支持态度的，他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在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的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17] 这种"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问题上运用的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在农村所出现的接二连三的变化。在大约六年的时间内，农村的社会主义化程度，就从简单的互助组上升到了高级形式的人民公社。

在企图迅速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跃进"中，极左思潮的错误还在于忽视了对"不断革命论"的辩证运用，即"革命阶段论"。后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的每个阶级都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巩固、调整和缓和的间歇。这如同人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需要一定时间来吸收营养，并使之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没有这样一种相应的间歇，人们将会头昏脑胀，精疲力尽。在革命过程中分清各个阶段是必要的，否定这一点，就可能造成决策失误。否则，变化不停地接踵而来，各级领导则穷于应付，根本没有时间通过群众反映或干部调查研究的途径，去真正了解这些变化的效果。这样计划将可能泡汤，错误不是被纠正，而是可能被谅解或进一步得到加重。发展到极端时，这种不断革命将成为对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一种粗暴的践踏。

总而言之，极左思潮的错误，就在于过分强调了"不断革命"的过程，过分鼓吹了继续革命，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实行的政策与

中国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从而歪曲了决策过程的跳跃式的推论。

唯意志论对唯物论

其次，极左思潮在"大跃进"中涉及到社会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另一个错误，是关于在历史发展中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谁更为根本动力的关系问题上胡搅一气。极左思潮的观点，后来被指责是犯了"唯意志论"的错误，即是夸大了人的意志，以为这种意志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这种错误观点正是造成产生"大跃进"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唯意志论者富于想象地宣称："人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者而言，"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继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就能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18]

对此观点有的文章给予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东西，即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19] 该文章并没有全盘否定革命信心和革命热情的作用，但明确肯定人类行为作为物质世界发展到一个特殊阶段的产物所具有的局限性。文章指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不为人们意识所决定的客观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我们认识并掌握了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后，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以加速这一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凭借主观幻想去改变这些规律，也不可以越过这一历史发展阶段而进入共产主义。"[20]

这样，各级干部都被告之不能简单地把自己的"革命热情"作为决定社会变化的阶段和范围的指示器，他们的工作还必须根据客观条件来决定，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共产主义热情有多高，但由于中国现阶段的物质紧缺，仍然严重限制了在不损害生产的情况下提高平均分配程度的做法。无论他们的亩产万吨粮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但由于现阶段的人力和土地都

受到了物质条件的限制而根本做不到。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谁为根本？

在批判唯意志论的错误时，另一场重要的争论是有关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到生产的物质因素（包括劳动力、机器、工具、原材料以及自然资源）。生产力的增长，就意味着产量和生产率的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关系则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组织、产品的分配形式，以及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阶级结构。生产关系的改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词典中，表现的是在解决各种形式的特权和等级阶层问题的同时，追求一种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更高层次的平等。〔21〕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生产关系方面的改变，是绝对地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毛泽东主义修正了这种"物质决定论"，提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改变，不仅可以先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能积极地推动它的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理论创新在解放以后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毛泽东认为，在农村提高产量和生产率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把社会主义的程度推向更高水平。大跃进正是这一逻辑应用的一段插曲，并成为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共产主义做好准备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破口。这一突破口能够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热情的迸发与艰苦的努力，通过包括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而取得。因此"大跃进"的高潮注重强调了在农村要提高社会主义的程度，要求从集体所有制发展到全民所有制，同时采用了很多平均分配的做法。这个时期的大量宣传，正是强调生产关系上的变化已导致了各条经济战线上生产率的全面提高，经济基础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和发展，从而能得以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22〕

早在几年以前，即约在1955年至1956年期间，就曾发生过一场关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关系的争论。〔23〕当时的

焦点是关于在没有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及提高工业化程度）之前，是否要实行向初级社过渡的问题。在1958年，由“大跃进”引起经济失调的现象最初开始出现时，这一问题又再次被提了出来；有人对上述所谓的理论创新表示怀疑，并指责是研究中国问题时的一种极左方法。这种指责的依据是：社会变化的程度不能脱离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否则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给它造成损害。在当时大谈继续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性时，有一家报纸在1959年5月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中的物质因素的根本性：“生产关系的改变，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要起阻碍作用。反之，生产关系的改变过份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例如，过早地把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不符合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其结果不仅是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行不通，而且会引起违反客观规律的混乱现象。”〔24〕

在批评者看来，“大跃进”的问题正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关系是不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重的。人民公社制度在以后进行了调整，“大跃进”的政策受到了重新修改，都可以看成是努力恢复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两大要素之间的平衡的一种表现。〔25〕

总结

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引出了与“大跃进”有关的四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1）大跃进是否是导致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实现过渡阶段的开始？（2）中国在1958年至1959年间是否已为这样的过渡准备好了物质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条件？（3）群众的热情和决心等主观因素，是否能够足以克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切障碍？（4）生产关系的改变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上去，但生产关系的这种改变是否可以脱离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巩固和提高？

显然，这时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对极左观点的批评基本上还是模糊的。因为毕竟在决定历史变化的主客观要素之间某种恰当的平衡，以及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上，并没有一种绝对的标准。而且，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相当模糊的，很难用来作为衡量思想意识形态的方位的尺码。要求是采取某种行为时能做到客观冷静地决定主要应从传统习惯方面作出适当的考虑，还是从当前的需要，依或是从将来潜在的可能方面去考虑，是很难做到的。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当中，意识形态上有问题的讲话(无论是极左路线还是右倾路线都是如此)，能够很容易地被摆设成对一个政敌的陷井。这样的事情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发生过多次。对“大跃进”中极左思潮的批判，如果要和严重的领导失误和政策上偏差的原因联系起来，那么这个问题就被提到了思想意识形态的高度，而不是仅仅拘泥于对一些更为具体的错误的批判。党内有的领导人物正是这样去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造成“大跃进”问题的根源，正是在于是一种长期的、错误的发展战略(或错误的路线)，而不仅仅只是个人的责任或偶然的失误。

领导人物和工作作风

领导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程序中是一个关键的变量。[26] 好的领导，往往是确保政治体制顺利进行而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样，差的领导，则往往被认为是政策失误的原因。没有一个得力的领导，就既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方针，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贯彻执行。中国政治的有效领导的一个法宝，就是“群众路线”。约翰·刘易斯曾将之评价为“共产党干部所使用的一种基本的工作方法，希冀以此产生和推进他们与中国老百姓之间的一体化关系，并在决策过程中争取老百姓的支持和积极参与。”[27] 因此，领导人物为了能更敏感地知道被领导者们的要

求和意见，就可以通过群众路线这一机制，来保持与他们的联系。从具体作用上来看，群众路线具有一种渐进循环的特征，即从认识阶段(对各种信息的集中概括)，再到决定阶段(由更高阶层作出总的指导政策的决定)和执行阶段(地方各级部门对政策的执行)。[28]“工作作风”涉及到的是有关党和国家干部执行自己工作职责时的方式问题，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在处理与群众关系时的方式问题。[29]在干部的工作作风出现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人就会运用其独有的整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组织工作中的方法去加以纠正，以确保党的政策不受到自身队伍中不正常行为的破坏。[30]

批评“大跃进”的和拥护“大跃进”的人，都一致认为工作作风上的“左”的偏差，是应对“大跃进”中许多政策的失误负有责任。然而，批评“大跃进”的人认为，工作作风上的错误，是表明了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中央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犯了错误。而拥护“大跃进”的人则认为，“大跃进”中领导阶层中出现的差错，仅仅只是个人的失误，不会影响有关“大跃进”的整个战略的正确。此外，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拥护者，都一致对许多干部企图实行全面“大跃进”时粗暴践踏了群众路线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大跃进”的政治环境

在中国，把“大跃进”时期领导阶层中的极左错误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客观因素，在任何时侯都是较为稳妥的。例如，归结为希望某种目标尽快实现而显得自负的干部们的骄傲自满；或归结为任务和责任的艰难；或归结为执行任务或完成计划时因困难而受到的挫折；或归结为有的干部利用党的威信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群众。[31]基层干部批评了1958年至1959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环境，认为这种政治环境特别适合于工作作风中“左”的错误的滋生。然而，我们在研究中更感兴趣的，是那些种种有助于这种政治环境得

以出现的因素。

这首先表现为：时代的意识潮流发展得很快，“大跃进”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并且以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的具体行动，来判别人们的政治本色，这样就给干部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中国青年报》要求它的读者们（绝大多数为共青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要做正在到处诞生的“共产主义幼苗”的热情支持者，“如果你是真诚地欢迎共产主义，你就必须在共产主义幼苗开始出现之时，要表明自己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目前，共产主义的幼苗正象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这是考验我们每个青年人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最好时机。”〔32〕这篇文章热情歌颂了1958年秋天的“大跃进”，认为“大跃进”虽在有的人看来“发展得太快了，但是它却激励了中国的青年人。如果我们能充满激情地支持共产主义，决心听党的话，跟党走，忘掉我们个人狭隘的利益，摒弃个人主义和机会主义，坚决与陈腐观点一刀两断，我们就能够紧紧跟上时代。”〔33〕类似这样的号召，在大跃进“高潮”期间在新闻报道上多次出现，明显地在鼓励一种能够很容易被引向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和野心家的能动主义哲学。

对拥护“大跃进”目标的人给予积极鼓励的做法，导致了一种过分崇尚主观能动性的倾向。但这里也混杂了许多干部害怕被贴上保守派标签而不得不如此的情况。1957年中“百花齐放”之后到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尚未掀起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开展的反右斗争，1959年至1960年的“第二次大跃进”期间，因庐山会议余波而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都进一步强化了对工作作风中的右倾错误的批判，从而在工作中常常形成为一种令人感到惶恐紧张的根源。〔34〕因而，人们认为如要避免被指责是沾染上资产阶级影响的最好方法，就是要保证自己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人们说成是对“大跃进”的阻碍。

其次，大跃进的政治环境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因素，是从中央

发出的许多指示中，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内容。例如，1958年8月标志了全国公社化运动正式开始的《北戴河决议》，重申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坚持按劳分配的普遍收入原则和集体所有制。但在“条件允许”的地区，[35]都可以实行按需分配这一更为先进的分配政策和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1959年2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36]多次指出了中央文件中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也许，缺乏具体指示，是为了给按照当地条件或正在变化的情况来更好地执行中央政策留有余地吧。但是在公社一级干部中，更可能的是凭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而不是根据所要求的整个条件来做出决定的。自己所在的地方，因符合条件而被明确批准执行更为先进的政策，从而能走在整个运动的前列，这种显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这样，出于能动主义的正面和反面的不同动机，与中央文件模棱两可的语气结合起来，就在干部当中造成了一种普遍持“左比右好”的态度的情况，这种情况将无法使干部去确定怎样更好地执行政策。

在这一时期作为“大跃进”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而提出的三项基本措施，也间接地助长了地方干部的“左”的倾向。[37]即：(1)在1957年至1958年间开始实行的政治和经济的放权过程，[38]虽然扩大了地方的主动性，但都大大削弱了决策和执行之间的联系。因而造成了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常常超出中央决定政策时的意图。(2)在“大跃进”的发动阶段，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了基层。[39]干部下放的目的，除了为改造官僚主义习气而要求密切联系群众之外，则就是为了精减行政机构，加强基层领导水平，以迎接“大跃进”的到来。但是下放运动也助长了干部工作作风上的极左倾向。这因为一部分好的下放干部可能是“单纯的”积极分子，他们会充满热情地去执行“大跃进”的政策。另一些下放干部，则认为下放基层是一种降级，因而一心希望再爬到高位上去。而他们升迁的机会最终决定于行政阶梯和工作成绩。因此，他们也会为此而竭尽全力地去贯彻执

行上面下达的指标。(3)"大跃进"使各个单位中党员干部的权力得到了相对扩大。这些党员干部受到信任，被委以掌握为"大跃进"提供动力的意识形态方向盘。[40] 被认为是"先锋力量"（红）的党员干部的影响的增加，与谨小慎微的管理技术人员（专）在内在权威上的相应下降，就为冒险主义者们的盲目领导提供了一个肥沃的土壤。

总之，在"大跃进"岁月里，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相互交织，推波助澜，极大增加了诱惑基层领导在工作上犯"左"的错误的可能性。此后，对"大跃进"采取了各种调整和退却的措施，其中也包括采用批评和整风等重要做法，以使"左"的错误的危害有所减轻。

反击"五风"

在"大跃进"期间，对领导上的错误的最普遍的批评，就是所谓"五风"，即"共产风"、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浮夸风，以及干部特殊风。[41] 前四风很明确地被批判为是"左"的偏差的产物，而干部特权，则被认为是属于利用职权谋取物质利益、不参加生产劳动等一类右的错误，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货色。在"大跃进"之后实行退却的时期里，对"左"的前四"风"的批判，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共产风" 毛泽东在1959年初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接受了对这一错误的批评。这种"共产风"的情况，表明了有的干部只是单凭意识形态上的热情，执行政策时过于急进，以至脱离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他们尤其是在"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过渡之间的关系上搞的一套乌托邦似的设想的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共产风"的标签，最初是用来表示在"平均主义"问题上领导干部推行极左的经济政策的错误（这一类的错误，下面将要在政策部分予以详细讨论）。但在"大跃进"期间，"共产风"的其他一些形

式，严重地影响了干部作风。

例如，当时在意识形态工作上也刮起了一股“共产风”。1959年夏季，曾呼吁青年人用自己的具体行动来表明对共产主义的热诚，从而对“大跃进”时激进的政治环境负有部分责任的《中国青年报》，此时却批评了青年团员中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如要求在所有的青年人中“三个月内消灭个人主义”，“在六个月内青年团员要百分之百地成为共产党员”。他们的错误被概括是“要求学生们进步更快。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但他们的愿望是主观的、不切实际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以为思想工作可以通过作出一道‘死规定’和‘强制的调整’而得到进步的想法，实际上是否定了思想教育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性。”〔42〕

干部们以为是资产阶级因素阻碍了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因此应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借以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在这股普遍的倾向中，“共产风”也是其中的一种。有篇文章告诫干部们不要把“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不要到处不分清红皂白地扣大帽子。”〔43〕还有一篇文章批评了某些干部，要求他们在把个人主义批判是一种思想缺点时，不要到处“拔白旗”（即资产阶级因素）；红白之分，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不能马虎从事。把并非两条道路的矛盾和两条道路的矛盾混在一起，就会使人在思想上发生混乱，这对于团结和改造一些有缺点但仍然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不利的。当然，人们的落后，有的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如果他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不太深，个人主义的臭气还不太大，是不应该把这种人说成“白旗”的。〔44〕

该文虽然在决定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缺点”的标准上较“左”，但上述内容明显地是要求积极分子们不要教条主义地援用判断标准，而要求他们在各方面工作中，对其他的人要多团结、少斗争。

“共产风”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并没有对群众路线得出正确的

认识和概括。这种认识和概括，一方面需要依据基层干部对当地条件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作出的（认识），另一方面需要依据对事实和观点的综合，从而形成报告，送交上级，以有助于决策而作出的（概括）。被指责在“大跃进”期间沉溺于“共产风”的干部们，其主观愿望是想加快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但结果是歪曲了上述的认识和概括的阶段程序，混淆了对当地情况的客观认识，并继而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未能如实地反映情况，从而使得决策依据的是一种受到歪曲的信息。这种极左偏差在工作作风上的典型表现，就是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认为群众觉悟低”，而习惯以一种主观的、教条的方式去从事革命工作，凌驾于群众之上，突出自己“高水平的”政治意识，把这种突出的思想觉悟来代替具体的调查研究，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新的政策内容和运用时间。

毛泽东曾表示过，干部如要搞“共产风”，农民就可以藏起自己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他对这种“共产风”的做法进行过批评。〔45〕毛泽东指出，积极分子们应当记住，农民只能够逐步相信某种先进的公社政策的优越性。党——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却严重地错误估算了群众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迅速发展的自觉性：“在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之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46〕

作为先锋队的党，在制定政策时犯了错误，它不是依据当时的思想觉悟和物质现实条件作出准确的认识，而是依据自己的一种预想，即一个“革命的”阶级应当怎样行动等等。在总结公社化运动中的极端平均主义的原因时，有一篇文章认为，许多干部实际上是很欣赏这种“以木代林”的倾向的。他们以为群众会迅速接受新倡导的最进步的因素，会欢迎激进的分配计划。这篇文章指出：“对

待劳动和对待公共财产的共产主义态度，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屡见不鲜。但是少数先进人物的觉悟水平，并不能等于全体人民的觉悟水平。”〔47〕

命令风 和“共产风”的偏差有着密切联系的命令风，表现为群众有所勉强的时候，干部们不是说明政策将会对他们怎样有利，而是“强迫群众跟着大跃进的政策走。”干部们真诚相信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就在眼前，他们容易对顽固不化的农民失去耐心，转而恢复简单命令的方法，而不是细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争取他们的支持。因此，不是依靠说服的方法，而是依靠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强迫方法，就构成了所谓“命令风”的错误。〔48〕

命令风是执行群众路线出现偏差的一种表现。干部们往往是超前执行计划，而不是耐心地争取让一项新政策能得到公众普遍的接受。“大跃进”中执行政策时的命令风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粗暴践踏自愿服从的基本原则，强迫农民加入共产主义食堂。这种命令风的后果，概括说来，就是：“我们可能似乎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取得某种成果，但这样取得的成果并不是那么真实的。这常常可能会导致损害干群关系，破坏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至本应能够实现的任务，也没能实现。”〔49〕甚至一项本是正确的政策，如果一旦采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从而否定了群众路线的民主内容，则也注定只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尾巴主义则是领导问题上的一个相反的错误。尾巴主义放弃了党指导群众运动的先锋作用，并“盲目同意群众的不合理的要求。”它同样是在执行群众路线时出现的一种偏差。〔50〕毛泽东曾赞同过群众对更高的生活标准的追求，但在1958年12月，他对此作了自我批评，认为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这种想法使得他没能察觉当前经济目标的客观现实性。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没有考虑可能性的问题。……1962年一亿二千万

吨，这种可能是虚假的可能性。”〔51〕虽然在“大跃进”时期，中央在制定政策时对“左”的尾巴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在基层，领导作风上的主要矛盾，在性质上很明显地是一种命令主义。

对生产瞎指挥风　命令风在农业工作中的一种错误形式，就是“生产瞎指挥”，即指干部们虽有“大跃进”的冲天干劲，但对实际农业事务却一窍不通。例如，有一位党委书记，在接到要求大面积生产的上级通知以后，坚持立刻移植稻苗，而把农民提出根据当地条件只适宜分期播种的劝告，视为“保守观点”而置之不理。当粮食歉收的时候，这位干部因其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和拒不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而遭到了批评。〔52〕

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干部过于急躁，尚未很好理解“大跃进”的政策，就匆忙地去贯彻执行了。这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倾向。地方领导人忽视了一切需要先加以试验的要求，对一些并不成熟的做法贸然实行，甚至到处加以推广起来。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53〕这些错误严重地影响了有关公社化问题的政策的正确制定，尤其在指望能迅速提高生产的农业技术的推广上，更是因其所导致的不慎重态度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在“大跃进”激进的政治环境里，明显地相当普遍地把细致的实验看成是一种保守的做法。然而到后来，这种看法遭到了明确的驳斥，被认为是在盲目地领导生产。1959年6月，有一篇文章指出：“有人认为，一切经过试验的方法，是同大规模群众运动不相适应的，群众运动要求轰轰烈烈地前进，因而也就无法精雕细刻地进行试验……。但是，要轰轰烈烈地推广的，应当是那些经过群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54〕

党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作风，是指一种新的行动方针必须是在经过“典型试验”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应加以推广。上述文章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并证明了这一传统作风的正确，正是在于坚持一切从实

际情况出发，从而才能够为群众所接受。

另一个缺乏实践、盲目指挥的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没有相应的客观条件或可能性的情况下，为完成“大跃进”运动的粗糙的不现实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土高炉，在农村遍地开花。在这一计划有欠考虑、行动过于急躁的运动中，地方资源使用枯竭，劳力滥用，金属器具毫无必要地被收集用于冶炼。钢是生产出来了，但却极易断裂，几近废物。〔55〕

瞎指挥和缺少经验的做法，实际上使群众路线成了一句空话。并被认为对“大跃进”中出现的经济严重失调的现象，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浮夸风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有两种表现形式：好大喜功和谎报产量。浮夸风在当时的各级干部中，因种种原因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最虔诚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可能确实已被“大跃进”的思想发展搅昏了头脑，从而真诚相信了无论生产目标定得怎样高，只要激发出群众的干劲和热情，就总能顺利完成。还有的人则任意瞎吹，把这种浮夸看成是一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较高水平的“大跃进”方式。有时候，例如在令人诅咒的反右斗争时，他们这样做确实不会被指责是保守。这种理想主义的观点，在工作作风上比起有的干部出于追求荣誉或躲避批评而采取观潮态度或自私自利的动机来说，更明显地表现为一种“十足的”“左”倾错误。然而，这两种情况的客观效果，都激起了一股歪风，一股综合了当时全部极左倾向内容的“浮夸风”。

提出高指标的某些干部们，真诚相信只要自己带头大干，就一定能够刺激生产的发展。因此，他们强调“高指标能够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并批评有的人在制定本单位的产量指标时，“宁愿骑驴也不肯骑马”。〔56〕当这些实际上“很难实现”的指标颁布时遭到一些谨慎的异议的时候，这些乐观主义者却自信这些野心勃勃的指标能够通过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体力干劲的激发而得到

实现。

对这种“理论”持批评态度的观点认为，如果指标定得太高，工人们就会因无法完成预定目标而气馁。或即使有时能够完成任务，他们也最终将为此必须连续高强度地劳动和被迫放弃必要的休息而精疲力尽。〔57〕高指标不仅损伤了人们的热情和干劲，还造成人们在追求数量的同时忽视了质量，在追求速度的同时忽视了对设备的保养。〔58〕

《红旗》杂志在1959年6月刊登了一篇文章，批评那些坚持高指标的干部过份强调了人的作用，以为人的作用可以突破物质世界的限制。该文指出：“指标高低的制定，主要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依据于客观可能性。”〔59〕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人，实际上并不具有完成高指标所必需的条件，如足够的人力和机器等。他们漠视物质刺激，以为工人农民仅凭对共产主义的热爱，就能够竭尽全力地努力工作，因此而犯下了“左”的错误。《中国青年》杂志载文提醒党的干部们：“制定计划指标和制定政治鼓动口号有所不同。因为政治鼓动口号往往只是提出在一定时间内的奋斗目标，而没有十分严格的时间要求。而计划指标则不然，它对于数量、质量、成本、完成时间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60〕

基层普遍浮夸实际生产数字的倾向(或反过来说，是为了隐瞒贫穷结果)，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大跃进的激进的政治条件造成的。上层的决策需要以下面的情况汇报为依据，但浮夸风则破坏了这种情况汇报的可靠性，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群众路线的联系作用的有效性。然后，这些不准确的数字，在所谓走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又歪曲成对事物的概括和决策。由于这种决策是在下面不真实的材料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就进一步增加了中央对在基层再掀起一次生产大跃进的期望，从而反过来又导致对基层压力的增强。这样，“浮夸风”在1958年至1960年期间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领导问题，并在生产上一再歪曲群众路线的作用，形成了一个一错再错的循环过程。

本位主义

在领导问题上的另一个错误，即是所谓“本位主义”。很明显，这指的是那些只关心本地区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的干部们。从性质上看，这种错误并不算极左思潮。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有的地区内，就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上搞一套统一的新的规则制度，否则不利于照顾到各地区之间的特殊性。这种情况表明了本位主义并非是个别例外。〔61〕然而有时候，这种情况则被简单地认为是对中央指示的一种反抗，或是一种“把自己部门搞成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官僚主义分子的倾向。〔62〕在大跃进中，中央为了加快发展生产，采取了广泛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放权措施，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上的主动性。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本位主义，正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这种本位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公社的作用，助长了大炼钢铁中的极左倾向的做法，因此在后来遭到了批判。

在1959年2月，中央为了反对在大跃进高潮期间出现的放权过度的倾向，提出了“全国一盘棋”的政策。〔63〕认为中央的领导和地方各级部门应该是协调一致的，否则，结果将会出现计划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性是可贵的，是不应被漠视的，然而当时《红旗》杂志上有一篇权威文章却指出：“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一盘棋原则的积极性……，一种是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违背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所谓‘积极性’，实即盲动性。”〔64〕

这一批评既是针对中央某些“不切实际地”相信地方主动精神的制定计划的人，也是针对那些把总的放权政策理解得过于极端的基层干部。

用心良苦的绝对主义者

许多干部之所以在工作作风上犯了“左”的偏差，究其原因，仍是对复杂事物知之甚少，因而很容易走向“绝对主义”（即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许多事物，就其本质来说是矛盾的。然而这些干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被批评是缺乏辩证法的观点，以为只要敢干，革命的豪言壮语就能够实现。〔65〕相反，好的领导则总是把革命干劲和冷静的分析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一篇评论员文章在1959年6月份指出：“没有经历过实践检验的敢说敢做，是在说蠢话、做蠢事，其危险性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66〕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给工作作风带来了很大损害。作为对这种情况的一种纠正，中央不时地引用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语录来告诫干部们，并要求他们记住正确行动只能来源于具体的社会调查，而不能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以为对革命来说什么是对的或什么是错的都已一目了然。〔67〕

然而，被认为大跃进期间在工作作风上犯有“左”的错误的干部们，几乎总能因为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之故而得以减轻责任。毛泽东曾就初期的公社热讲过一番话：“我们的干部们……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问题只是……走得快了一些。”〔68〕这样，对那些对“五风”负有责任的少数人的追究问题，就逐渐地不再经常提了。〔69〕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疯狂进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污蔑其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牺牲品”。庐山会议之后，新闻报刊转变了注意的焦点，认为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这种“疯狂进攻”，才是导致“大跃进”出现一些差错的主要原因。新闻报刊还进一步强调了“左”的错误和好的动机之间的联系，认为在“第二次大跃进时期”，在“狂热性”和“革命热情”之间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区别。由于“革命热情”有时

候会和“科学分析”相脱节，因此，“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可以允许的。然而这种热情反映了“千百万人民在建设一个新社会时所具有的重要力量”，这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不可饶恕的极大犯罪，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70]

总而言之，极左思潮在工作作风上的各种错误表现，在“大跃进”中虽遭到批判，但远未批透，有的甚至和群众路线混同起来。由于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一旦有误，则将自然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规划产生严重的影响。当群众路线在“大跃进”一类的敢说敢做的群众运动高潮中遭到破坏时，其政策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政策尺度

政策错误的起因：认识的分歧

在党内领导层意见相对统一的时候，中央的决策就能够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但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问题，发生严重失误的时候，党内在探究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时，就会发生尖锐的分歧。

有的领导人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错就错在为完成总路线的目标时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做法。基层干部不用对政策的错误负责，因为他们仅仅只是忠实地努力执行了从上面下达的计划而已。问题的解决，将主要集中在对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上。至于路线或具体的干部，都不应遭到整顿或批判。

还有的领导认为，不仅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与之有联系的具体政策，也基本上是正确的。造成失误的原因，主要只是在于基层个别干部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整顿和批评主要是针对他们而来的。如果他们痛改前非，则政策就能得到纠正，并得到正确的执行，从而就能实现总路线提出的目标。

但是有的领导人则认为政策失误的原因，是在于中央自己在最

初制定总路线时出了问题。就是说，基层虽然在工作作风上和政策执行上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还在于中央领导层内根据不真实的理论推断，制定出一条错误的总路线所致。政策的错误，不过是这一总路线的错误的结果。换言之，即认为政策的失误集中反映了路线的错误。而对此最有效的弥补，就是放弃这条错误的路线，或进行全面的修正。

例如，正是在1958年夏季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过程中，由于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因而才导致了一条偏差更大(即极左)的路线的出现，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庐山会议是在公社已“过早”建立之后召开的，彭德怀在会议上的发言，似乎暗含了对大跃进基本路线的上述看法。[71] 他认为这不仅与公社形成的具体政策(如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办食堂、土高炉等)有关，而且与作为整体的公社化运动也有关，公社化问题并非仅仅只是基层领导失误的结果。但是毛泽东和其他大跃进的坚定支持者们，在全面评价大跃进的战略作用时，则对上述这两个问题倾向于作出否定的回答。因此，关于政策失误原因的认识上的分歧，就成为大跃进期间党内政治斗争的关键所在。大跃进的支持者们，为了捍卫最初赖以发动大跃进的基本价值观念，反对把对政策或工作作风上的调整和对路线的批判(即对极左思潮的全面批判)直接联系起来。

这里关键问题是：在革命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明显的价值冲突。这不仅表现在发展计划或安排侧重点上的意见相左，而且表现在政策失误的原因以致认识到需要调整和批判的范围程度上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并且作为大跃进的后遗症所表现出来的政策调整——无论它调整到哪一地步——都仅仅只能是对这种价值冲突的一种暂时性的缓和，因为它根本没有解决这两种冲突的观点之间的矛盾。

然而，对1958年至1961年期间大跃进计划具体内容的调整在程度上的不同，容易使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极左思潮得出

一个重要认识，即在精心的调整工作中，有的政策只是调整而不是受到批判，而有的政策的调整则是和批判分析的方式连在一起的。下面将研究这样的问题，即首先，大跃进中哪些具体方面是和一种我们称为是对极左思潮的局部批判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其次，还有哪些政策问题，是置于较为全面的批判之下的。

特殊的政策问题：不彻底的批判

有一些政策问题在大跃进期间非常引人注目，如农村食堂、城市公社、土高炉等，但到调整过程中很快就“黯然失色”了，在还没有试图对其失败原因作出任何分析和批判时就已全都消失了。[72] 这代表的是一种努力想尽快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企图超越面临的客观的时代限制的想法。因此，对大跃进持批判态度的观点，就必然认为这些情况都是极左路线的一种反映。同样，在1961年至1962年期间对农村人民公社的规模和职能所进行的调整，虽然没有明确对其发生原因进行过批判，但也被默认是由于极左思潮而造成政策严重失误的结果而进行的调整，以使其规模适当，可算是从局部批“左”来调整政策的有趣事例。

众所周知，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个最大错误，是在中国农村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经济统一体。[73] 1958年的北戴河决议，在最初具体规划公社的适当规模时，提出的是一个颇为含糊的指导思想。虽然决议指出：“在现阶段，一个乡建立一个大约拥有两千左右农户的公社比较好。”但决议又因各地情况不同而留下了充分发挥的余地，认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可能一个乡能建几个公社，而在有的地区，“按照其地理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则可能由几个乡合并成一个大约拥有六、七千农户的公社。至于有的地方建立了超过一万甚至二万农户的公社，我们不必反对他们，但目前也不能提倡和鼓励。”[74]

实践中，绝大多数地方的计划制定者们都倾向于中等规模的公

社形式。但到全国农村都已实现公社化以及在1959年早期的第一次调整之后，从全国来讲，公社通常结构已达到包括五千多农户的横跨多乡的规模。[75]在这一新的统一体中担负领导职务的农村干部，就其管理水平而言，公社这种巨大规模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这么大的规模还很容易使公社陷入农村的地方主义的争斗之中。这对于企图使公社结构内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升级到更高、“更先进”的决策水平的打算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削弱。[76]

1961—1962年期间对大跃进进行调整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极大地缩小了人民公社的规模。原先的24000个公社，被分为74000个公社(平均1600户农户)。调整之后，一个公社通常相当于原来乡的规模。[77]此外，原先绝大多数归公社所有的生产和分配的职能，也被下放给了生产队(其规模相当于以前的农业初级合作社)。换言之，1962年对农村人民公社的规模，比起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因素的1958年的公社模式，要小得多了。[78]

原先的公社规模违反了生产规律。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严重失误，“左”的错误的结果才能得以产生。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基层领导人在其负责的地域内规划公社规模时领导失误的产物。毕竟，北戴河决议对各个公社的发展规模是一个刺激，地方干部为此而简单地冲昏了头脑，在没有细心进行规划或进行试点时就把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推向了极端。然而这种工作作风上的“左”的偏差为什么没有能很快地得到纠正？其事实只能是：中央内部的主导意见并不认为这种大公社是一种偏差，恰恰相反，还把这种大公社看成是一种进步的标志。认为这种把农村一切生活全部包括进去的统一体，是一种群众的热情和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反映。

其次，它是大跃进激进的政治环境的产物。地方干部由于必须须通过狂热执行中央指示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并要避免蒙受可能因谨慎或慎重而遭到贬斥为保守主义的耻辱，从而承受了加倍的压力，因此，公社规模越大，就越成为了革命成功的标志；反

之，就等于是犯了拖群众运动后腿的右倾错误。〔79〕对此作正确观察，就可以知道，执行政策中的偏差，是由于中央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性质问题上的“左”倾思想错误，以及对基层领导施加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

最后，这个问题的出现，还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决策者们为试图打破作为农民的本位主义思想根源的乡土观念而作出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以求能加快农村的革命改造。〔80〕新的统一体将确立和扩大农民世代以来为农村生活所局限的世界观，并向他们提供与现代化和共产主义目标更相一致的价值观念。如果这种意图是为了让公社能越过传统的市场和社会政治结构的话，那么，“左”的错误，就可以被归结是由于部分领导人认识上的偏差，以为生产关系上的变革，能够打破甚至比农民生活中深刻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变化还要重要的农村乡土观念之故。

以上论述基本概括了在公社规模问题上极左政策的错误。但是这种极左政策的制定过程，亦即公社在被允许发展到违反生产规律的规模过程，却从未遭受到严厉的批判。有关文件在谈到对农村的大跃进的调整时，重点主要放在改变“高潮”模式的公社结构的调整上。1962年在执行这一调整政策时，无论是当时的文件还是宣传，都没有对当初导致产生这么多问题的路线，作出丝毫的分析。〔81〕

特殊的政策问题：彻底的批判

尽管总的来说，当时对大跃进基本问题的探讨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但在有的政策问题上，还是多少直接涉及到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即为一种彻底的批判）。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性质的争论。虽然在1959年上半年（庐山会议之前）对分配政策上的“左”的错误批得很厉害，但无论是在大跃进时期还是在调整时期，平均主义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粉碎“四人帮”之

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又一次被作为重点提了出来，并成为毛泽东之后对林彪和“四人帮”路线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说明了在中国政治中也还存在着对极左思潮某些方面的内容进行批判的连续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及其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理论，对革命队伍里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一贯是持批判态度的。[82] 他们认为这种倾向是企图抹杀造成物质上不平等的各种原因(例如按照劳力、技术、地位所得到的不同收入)，并企图按照需要，在简单的人均基础上瓜分社会财富。此外，这种绝对平均主义还期望彻底消灭一切私人财产和私人的经济活动。但是，这些做法只不过被认为是简单反映了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想法。他们为了消灭原本是产生于剥削的不平等，提出了实际是损害群众物质生活的回归自然的做法，实际上正是混淆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然而尽管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对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反对由来已久，但在大跃进“高潮”中这一倾向仍然又得以出现，并在领导层中很快成为一个主要的争论问题。

当大跃进被强调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时，干部们就在意识形态上又承受了一层压力，即要求他们更好地执行推进新时代早日到来的政策。因此，培育“共产主义幼苗”就成了公社的领导工作中的重点任务。[83] 其中各种平均分配计划则是被培育得最好的“幼苗”，而正是这些平均分配计划，则最有可能毁掉所有经济翻番的设想，和对“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信条的促进执行。[84]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做法有三种形式，即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上，是按照(公社/大队/生产队)三个层次进行的；在收入上，允许在同一水平上的各个单位(绝大多数为生产队)之间略有差别；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以各个农户为单位进行。下面我们将逐个对这些平均主义做法及其批判进行论述。

无偿调拨 上级部门可以在一个公社范围以内从下面无偿地调

拨物资。这种做法后来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如一些新的大项目由于自身缺乏物资基础，而必须要抽调其它地方的力量。又如在全国范围内，大队取代了生产队(即对传统的村的单位的代替)成为诸如土地、家畜、果树等资产的所有制单位和核算单位，而生产队则被看成是一个不适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失去生机的农村生活单位。这些情况很自然地导致了对更高的集体单位的兴趣。同时，向基层生产队抽调物资，当然也就不必付给他们补偿，因为毕竟社员们并没有真正"失去"他们的物资，而仅是在更符合时尚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形式"中，和更多的社员一起分享着他们的平等。此外，他们还得继续获得收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参加新明确的分配实体的活动，也能从被调拨走的那些物资的使用上得到收益。

在劳力使用上也同样如此。上级部门常常从生产队抽调劳力去从事各种主要的建设工程(如修建灌溉渠道、土地开荒、公路建设等)，而对由此给各个农户造成的收入上的损失则根本不予考虑。对这种物资和劳力无偿调拨的问题进行批判和调整，涉及到的是改变对人民公社所有制性质的错误认识的问题。[85] 这两个相互有关的问题之所以错误，首先是由于在农业经济中，相对全民所有制而言，集体所有制是一种从事生产的更好的主要形式。而且，在分配从生产中获取的物资以及在负责制定生产计划时，也应主要由直接与生产打交道的基层单位作出决定。而"全民"所有制(国家控制的一种委婉说法)则表明所有的生产成果，应作为国家计划的一个部分，而更多地由中央作出分配的决定。[86]

"大跃进""高潮"中的一种"左"的倾向，就是把上述后一种更为"先进"的所有制，从工业部门(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全民所有制就已在工业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推广到了农业部门。但从武昌会议以来(1958年12月)，就开始注意对在中国农村为什么还不能采用"全民"所有制的问题作出了解释。因为从现实来说，生

产队的发展，还不足以达到这样一种水平，即让中央在不损害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标准的条件下做到更多的积累，也不可能做到在不降低情况较好的单位的收入水平基础上让各个生产队和大队足以公平地参加公社一级的分配。在农村搞"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对农村的客观条件的一种忽视，[87] 而绝大多数农民则并不相信这种绝对的做法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农民对于彼此之间从来没有什么来往的村庄，或甚至是传统的冤家搞合作，是明显不愿意的。武昌会议正是对上述种种情况的一种让步。[88] 有一篇文章指出："有的干部一心希望在农村搞"全民"所有制，想看到诸如共产主义大协作一类的新生事物的显著成绩。然而，他们忽视了或完全没有看到人民公社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过渡性质。"[89]

其次，对无偿调拨的批判，还涉及到决定物资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分配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经过了一系列过程。起先，把大队作为所有制和分配的单位（在大跃进"高潮"时这些职能作用都被集中在公社一级）。后来到1962年，这些权力都下放给了生产队，甚至大队也只成为集体经济中一个较虚的层次，仅负责规划农村的经济生活。[90]

平调 在农村经济单位之间关系上的平均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为了在全公社范围内实现一种更平等的生活标准（在极端情况下，实现一种完全的平等），而在生产队或大队之间实行物资的再分配。这种"平调"不考虑自然因素的不同（如土地的好坏），发展水平的不同，努力程度和有效劳动的不同，而只是通过上级部门的计算去加以贯彻，以便让所有的单位在分配过程中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91] 虽然在起初，这种做法被看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跃进的一个方面，认为共产主义在物资分配上是按需而不是按劳进行的。但最终，这种做法被批判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于人的能力和物质刺激之间关系上的一种乌托邦设想。这种乌托邦主义的结果，是在穷队内鼓励了懒汉而不是自力更生，在富队内则戏剧性

地破坏了生产的积极性。[92]

平均主义和向平均主义发展的问题，是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评论大跃进时谈到的重要话题之一。他把那种仅在理论上似乎有助于把农民早日带进共产主义时代的政策，比喻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93] 主席还把"共产风"称为是"劫财"，好象农民是地主和资本家似的，毫无补偿地收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指出："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不许可的。"[94] 主席还对农民藏起部分财产以防被公社平调的做法予以支持。他指出，"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95] 他还告诫公社干部，任何抽调物质或劳力的做法，都必须按照"等价交换规律"。这个规律是充分保护基层和每个农户的物质利益的。主席喜欢使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方法，来反复推敲他所认为的"价值规律"的客观现实性，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不涉及到交换，甚至人和自然界的斗争也是如此。例如人要吃饭和呼吸，但又要大小便，进行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粪矢，这也是一种平等的价值交换。[96] 显然，在公社的分配政策上，任何企图否定这种自然的基本规律的做法，都是一种严重的"左"的主观主义思想的反映。

基层在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表现及其所引起的争论 新诞生的公社在立刻着手制定能按人或至少部分在按需而不是按劳的基础上，分配粮食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油料、燃料、棉布）的分配计划时，就造成了基层单位的平均主义现象的出现。并还导致一种完全在人均基础上的"分配制度"形式的出现。

地方干部们在这一时期沉溺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狂热的激情和为中央含糊不清的指示所激起的信心之中。对这种分配制度的理解，似乎正是由他们据此而产生的主动性所致。[97] 北戴河决议并没有

倡导任何形式的分配制度，也没有对现存的按日或按时付酬的分配制度加以反对。但决议中却指出："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尝试改变工资制度。"〔98〕在农村搞工资制，可以用来向农民保证不必再依赖于个人或集体的生产数量就可获得收入。这种做法被认为比老的工作日制度更为先进，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减少对劳力的粗劣的物质刺激，并预计将有助于减少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此外在工厂，自从工资制正在逐渐取代计件制之后，这种做法还被认为是在填补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而迈出的重要一步。〔99〕

在农村，从工作日制度改为工资制度，将会导致其自身发生一连串的变化。因为中国农村的物质基础过于虚弱，因此事实上这种农村工资制度很难行得通。在六十年代初期，这种做法已成为一个负担。但是分配制度上的这种变革一旦成为大跃进的目标后，当时激进的政治环境就会自动地把变革行为升级为一种甚至比农村工资制度还要高的分配模式。人民公社匆匆建立起这种分配制度，更多的仅仅只是要"证明"群众是能够接受按照需要、自愿劳动的分配上的共产主义价值观的。1959年底，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时评论说："既然一个公社能够实现吃饭不要钱的原则，那么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当一家刊物把这番话登出来以后，上述所谓"按照需要，自愿劳动"的做法又大大推进了一步。〔99〕

到1958年底，在农村公社已被分配制度普遍认为是"大跃进"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大多数公社在分配上，采取人均平等分配的数额占每份数量的55%（按照某种工资和工作日的综合计算）的做法。〔100〕虽然百分之百的按需分配制度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逐步向一种纯粹的共产主义制度发展，还是成为"高潮"时期的总的趋势。当时有一篇文章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思想觉悟的提高，按需分配的数量将逐步增多，相应地，按劳分配的数量将逐步减少。"〔101〕

和广泛的按需分配制度支持者们所鼓吹的情况恰恰相反，这

种"共产主义幼苗"在生产上以及取消等级的问题上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做法在日常生活中还经常遇到另一种现象，即是许多农民急于要"利用"公社的优越性，不是囤积物品，就是邀请穷乡僻壤的亲朋好友前来共享当地的物质财富。〔102〕

1958年的武昌会议虽然在某些方面助长了这种按需分配制度，但是它确实在努力改变基层单位的平均主义倾向："……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将占有主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的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得更快。"〔103〕

武昌会议把试图在按需基础上实行一种分配制度的做法称为是"过早的"做法。并警告说："在条件还不成熟时，任何过高估计自己情况而企图进入共产主义的做法，都毫无疑问地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104〕

1959年初，报刊上开展了一场特殊的讨论，认为在平均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有人曾鼓吹的那种必然联系。并再次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刺激的正式地位。〔105〕在这场讨论之后，武昌会议的决议就公布了。类似情况，在毛泽东逝世后批判"四人帮"时，也曾再次出现过。当时后来到调整时期时，这种过份拔高分配制度的做法，被批判是一种掩饰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真实联系的"左"的偏差的表现,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被再次提了出来,并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106〕在伴随着大量宣传的政策指令的压力下，大跃进时的按需分配制度在整个调整时期内被逐步减少。到1961年至1962年期间，大跃进前广泛流行的一些分配做法，在添加一些新的内容之后，重新在农村得到了肯定和实行。〔107〕

"大跃进"初期，在工业战线上还曾推行过小时工资或月工资

的做法以取代计件制度。〔108〕然而，仍然还有人认为，仅仅从按劳分配的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并不能有助于加快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他们要求在城市迅速实行供给制的平均分配制度。当时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认为，实行平均分配计划时，一些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可能会减少收入，但绝大多数工人是乐于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因此绝不会仅仅因为收入减少而失去工作的热情。相反，他们一方面自愿减少不合理的报酬，另一方面还会努力工作。〔109〕

这种过于绝对地认为群众的"共产主义热情"能够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得到激发的设想，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事实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一直是一个不断引起争论的问题。因为是依靠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从而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呢？还是一旦这样人们就将会对革命事业离心离德？由于当时人们倾向于把共产主义信念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因此自然认为后一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110〕

这个时期在干部特别是党内干部收入问题上的一场讨论，起到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们曾在第三章中探讨过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这场讨论得以产生的政治原因。这问题首先是由张春桥1958年10月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引起的。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全面攻击了1949年以后取代解放前根据地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的工资制度。他认为所有不同名目的工资制度，都是资产阶级用以刺激劳动热情的一种手段，以为"钱能通神……，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与此相反，只有原先的分配制度，才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最好的结果。

张春桥在文章中写道："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

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111]

张春桥为供给制辩护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在向共产主义最终目标发展的时候，如果向工资制度让步，尤其在党内，就是一种类似修正主义的倒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并将会长期产生影响。[112]因此，对“共产主义幼苗”的积极扶持，与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观念以及在中国发展现阶段灵活采用供给制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当时张春桥的文章引起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对于他在社会主义分配问题上的观点，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113]但同时，许多不同意见的文章也出现在报纸上。例如，有一篇文章批评张春桥没有分清现阶段的要求和革命战争年代的不同之处。认为供给制的废除并不是“某些人对它实行攻击的结果”或“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而是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使适应战争时期的供给制的分配方法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需要了。”[114]如解放以后管理城乡经济的工作，以及所需要的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包括按需接受旧的国家政权中的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等等这种情况，都需要取消这种立足于物质条件严重不足以及具有高度自觉性的革命干部基础上的供给制。新政权需要依靠一种不那么激进的分配制度来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支持，任何以为在中国保留供给制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的想法，都会被看成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的标志。[115]

对张春桥所片面主张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产阶级法权”的本来作用的看法，也存在着强烈的不同意见。有一篇文章指出：“被利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才是无产阶级法权。”即认为这种残余的法权可以用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116]利用物质刺激促进劳动热情的做法导致的不平均现象，虽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表现，但在现阶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应该是由物质和思想意识发展到一定水平来决定的，而不是依赖于主

观愿望或政治命令。这篇文章还指出："……一个命令就宣布废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这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有碍于革命的……。而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是最革命的……，因为它切实符合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便于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巩固劳动纪律，鼓励人们的劳动情绪。"〔117〕

这场似乎是抽象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作用问题的论争，对大跃进时期的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分配制度的讨论上，因为按需分配制度的做法后来很快出了问题；而主要表现在随后影响农村的私人经济活动范围的计划发展上。同对与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的自由市场等有关的政策，以及我们在其他地方已涉及到的大跃进模式和随后的调整，也都有着直接的联系。〔118〕

北戴河决议在私人经济活动问题上的表述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从而再次导致地方干部把原先已分配给私人的自留地，又收缴回公社。并对农民用于消费或出售的猪或其它的家畜饲养，一律采取排斥的态度。干部们这样做有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防止在农村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二是为了加快步伐，迈进更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8月，由政府作出决定，强调要取消传统的市场，不再让农民相互买卖各自的劳动成果。因为这种形式的商品交换，被认为无论是对个人的思想意识、还是对依靠集体劳动为生来说，都是一种腐蚀剂，因为这和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

这些做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在经济上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不良后果。农民对这种做法进行抵抗(例如宁愿把猪杀掉，也不让公社抢走)。农村的主要经济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按照自留地的亩产量和整个平均亩产量的比例计算)。整个农村的日用必需品的流通渠道以及和城市的联系都已中断，并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虽然在整个1959年期间，这种情况一直被作为一种在大跃进"高潮"

中横扫整个农村的共产风而遭到抨击，同时，私人经济活动的积极作用也一直在得到肯定，但实际上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很好的扭转。[119]

对"大跃进"进行调整的意见后来占了上风，从而导致了1961年和1962年期间重新对公社进行了调整。这一时期明确规定了农民有权从事私人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利。[120]但在后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对于自留地、副业、农村自由市场以及相应的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内"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问题，又做出了极为严格的政策限制。而在"文革"之后，这些限制则又被作为极左思潮的一个主要问题，再一次遭到了批判。

结 论

1958年至1961年期间的经济和社会的问题暴露得十分明显。党内领导阶层普遍认为后来向"左"的方向发展是一个极大的失策。党内出现争执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在本章中提及的从思想上、领导上以及政策上对极左错误的具体批判和调整的本身，而是由于在造成"大跃进"失败的原因问题上存在着极端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一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大跃进"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个别领导人偶然的"左"倾错误造成的，还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全错误估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性质而造成的错误的政治路线的产物？

对于"大跃进"之后的种种调整措施，毛泽东本人是很不满意的。这从而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121]党内由于对大跃进的不同看法而造成的意见分歧，深深地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总的来说，这种分歧表明了党内在对中国革命的基本估价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不合，而由此引起的斗争将主宰中国政治长达二十年之久。

注释

〔1〕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论述，可参见戚新(译音)：《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左"倾》。

〔2〕自1949年到大跃进前，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团结一致，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因采用苏联模式也存在不少严重问题，从而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战略。例如，农业生产率下降，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待业问题日益严重等，都表明了中国正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因而迫切需要寻找某种新的经济方法。参见利普特：《重新思考大跃进》第93—104页；哈定：《组织起来的中国》第165—167页。

〔3〕有关中国领导人就发动大跃进问题的争论，可参见阿恩：同上，第2章；麦克法卡：《红色中国内部的争论》。

〔4〕～〔7〕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5.27)

〔8〕《人民日报》(1958.8.6)

〔9〕例如，武昌会议(1958.12)虽然意味着要对公社进行第一次调整，但同时，这一决议仍然预言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能够在15—20年内完成。1959年2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急燥情绪，但仍表示同样的信心，认为"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将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10〕《红旗》1958年第12期

〔11〕《理论战线》1959年第3期

〔12〕《新建设》1959年第2期

〔13〕《中国青年》1959年第1期

〔14〕〔15〕《新建设》1959年第8期、第2期

〔16〕莫里斯·梅斯纳，同上，第206—215页；派克：《革命、现代化、修正主义》第96—120页；斯达尔：同上，第301—308页；扬：《从人民内部矛盾到阶级斗争》；施拉姆：《毛泽东和继续革命的理论》。

〔17〕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1.28)

〔18〕《人民日报》(1959.1.22)

〔19〕《人民日报》(1959.1.31)

〔20〕《中国青年》1959年第1期

〔21〕有关马克思主义中这些概念的含义和运用的简单论述，可参见格利：同上，第8—16页。

〔22〕《大公报》(1958.10.25)

〔23〕莫里斯·梅斯纳：同上，第146—161页；麦克法卡：《起源》第15—19页。

〔24〕《理论战线》1958年第3期

〔25〕斯克拉：《生产关系，生产力，中国人民公社形成中的群众路线》。

〔26〕～〔29〕刘易斯：《红色中国的领导阶层》第70、72、83—86页。

〔30〕戴维：《调整的缘由》。

〔31〕《红旗》1959年第1期

〔32〕〔33〕《中国青年》1958年第11期

〔34〕有关反右运动，可参见戴维：《政治》第275—332页，336—366页，428—436页。

〔35〕《红色中国：政策文件分析》第456页

〔36〕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

〔37〕哈定：《组织起来的中国》第163—177页。

〔38〕沃格尔：同上，第224—225页；钱：《权力和政策》第2章；利普特：《中国公社的发展》，里斯金：《弱小工业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39〕刘易斯：同上，第220—232页；李：《"下放"制度》。

〔40〕沃格尔：同上，第227页。

〔41〕《美国科学评论》(1962.8.10)第198—200页；戴维：《政治》第450—457页；阿恩：同上，第44—45页。

〔42〕〔43〕《中国青年》1959年第11期

〔44〕《红旗》1958年第14期(英文原注为《红旗》1958年第3期，系误。——译者注)

〔45〕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

〔46〕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8)

〔47〕《理论战线》1959年第3期

〔48〕命令主义根据其内容，即可以是工作作风上"左"的错误，也可以是右的错误。

〔49〕《红旗》1959年第3期

〔50〕戴维：《领导》第78页。

〔5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12)

〔52〕《南方日报》(1960.11.3)

〔53〕〔54〕《红旗》1959年第11期

〔55〕戚新：同上，第33—34页；帕巴拉：同上，第275—282页。

〔56〕《群众》1959年第2期

〔57〕《中国青年》1961年第7期

〔58〕〔59〕《红旗》1959年第12期

〔60〕《中国青年》1959年第11期

〔61〕戴维：《政治》第122页；索林杰：《地方政府和政治决策》。

〔62〕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修改党章的报告》。

〔63〕哈定：《组织起来的中国》第185—186页。

〔64〕《红旗》1959年第4期。

〔65〕《人民日报》(1959.5.25)

〔66〕《中国青年》1959年第11期

〔67〕《红旗》1959年第6期。

〔68〕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8)

〔69〕《中国青年报》(1959.5.19)

〔70〕《人民日报》(1959.9.12)

〔71〕《彭德怀问题》，以及《认真思考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红旗》1978年第8期。

〔72〕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大陆农村公共食堂的发展》，《祖国》(香港)第300—303页。

〔73〕戴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则》；斯金纳：《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3部分。

〔74〕《红色中国：政策文件分析》第454—455页

〔75〕斯金纳：同上，第383—384页。

〔76〕戴维指出：公社化之所以引起许多问题，是由于违反了许多传统的做法和群众路线，权力不是来自于规章制度，而是来自于人和人的一种关系。斯金纳也持同样观点。

〔77〕按照斯金纳的观点(同上者，第396—397页)，对公社进行调整，是为了适应"自然的市场社会"。

〔78〕阿恩：同上，第273—274页。

〔79〕〔80〕斯金纳：同上，第392页，第384—386页。

〔81〕《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决议修正案》，1962年9月；《问题与研究》1979年第10期。

〔82〕哈夫曼：《红色中国的激励政策的基础》。

〔83〕《人民日报》(1958.10.1)

〔8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同上。

〔85〕《新建设》1959年第1期

〔86〕有关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所有制的详细论述，可参见《中国的集体所有制的含义》，《北京周报》1972年第51期第5—7页。

〔87〕《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红色中国：政策文件分析》第493页。

〔88〕《财经研究》1959年第1期

〔89〕《新建设》1959年第1期

〔90〕有关队为基础问题，可参见《南方日报》(1960.11.3)。

〔91〕平均主义问题被称为是"一平二调"，有时还有第三个问题，被称为是"三收款"。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

〔92〕《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3月，第5条，20条，31条，33条。

〔93〕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8)

〔94〕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5.5)

〔95〕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27)

〔96〕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5.5)

〔97〕〔98〕《红色中国：政策文件分析》，第27—29页，第456页。

〔99〕《政治学习》(1958.10.13)

〔100〕《大公报》(1958.10.25)

〔101〕《红旗》1958年第10期

〔102〕《红色中国，政策文件分析》第29页。

〔103〕〔104〕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

〔105〕《人民日报》(1959.1.20)

〔106〕《红旗》1959年第6期

〔107〕既使在六十年代初期对大跃进进行全面调整以后，中国农村的分配制度上仍然存在着极左思潮的影响，自那时起，农民只能保留一部分口粮，被称为是基本口粮，其余都得上缴给国家，这仍可看作是一种不太明显的"共产主义的幼苗"。参见阿恩：同上，第294—299页。

〔108〕《工人日报》(1958.10.18)

〔109〕《人民日报》(1959.10.16)

〔110〕《中国青年》1959年第10期

〔111〕《人民日报》(1958.10.13)

〔112〕有关张春桥后来在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北京周报》1975年第14期 第5—11页。这篇文章是"四人帮"反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一个主要证据。

〔113〕《人民日报》(1959.10.18)

〔114〕〔115〕《人民日报》(1958.10.17)

〔116〕〔117〕《人民日报》(1959.2.3，1959.1.3)

〔118〕沃克：同上，第71—87页；有关农村贸易调整情况，可参见斯金纳：同上，第366—382页。

〔119〕《政治学习》1959年第14期

〔120〕《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36、38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2部分；以及沃克：同上，第86—88页。

〔121〕阿恩：同上，第85—86页。

5

从极左到极右：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

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在上面搞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下面的无政府主义就会泛滥成灾，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

《人民日报》(1972)

"大跃进"在1961年至1962年间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而毛泽东一度选定的"接班人"又于1971年折戟沉沙，这十年可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里，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酝酿已久的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对抗，猛烈地爆发了，新的政治集团得以出现，并震撼了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对于这一多事之秋，我们只能着眼于与本文研究最为相关的一些特征，并提供有关事件的研究背景。

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集中于"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及"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从"大跃进"退下来同时发生)。与之相比较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温和主张，在1794年打倒了罗伯斯庇尔及"法国大革命"的其他激进分子。克兰

特·布林顿对这一时期进行了阶级分析。据此，莫里斯·梅斯纳认为中国的这一时期也是一种“热月政变”。[1] 在中国人的“热月”中，权力转移到党内那些“希望社会安定，政治有序，经济有效率的人的手中，他们对政治变革不抱多大兴趣”。[2]因此在这一时期，强调官僚政治和专家政治的权威，并实施了许多刺激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3]这些措施对重建秩序及重新强调生产，对使中国确定走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经济发展道路，都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可以发现，这些做法还导致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政治统治集团化逐渐发展的趋势。这些趋势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使他再次担心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毛泽东的这一担忧，促使他终于向党内的“走资派”发起了进攻，这种进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端。

从实质上看，“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对中国政治的猛烈冲击，不是被消除，而是被避开了。当“大跃进”的特定政策已丧失信誉并受到怀疑，当它的大部分激进的拥护者已在政治上失势时，导致这一运动的极“左”路线却从来没有受到过全面的批判。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虽然六十年代初期的批“左”维持了权力平衡，但当时批“左”的人不能也不愿利用他们的地位来仔细思考极左思潮这种不正常的意识形态，并进一步认识到正是这种思潮才有可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构成根本威胁。因此，若干年后当极左思潮以“文革”形式再次出现时，显然与上述的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只有把问题放在对“大跃进”的批判没有完成这一背景下(正如第三、第四章所论述的)，才能理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较顺利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文革”是令后人感到费解的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不过，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行为都是出于三个相关连的动机：(1) 通过对他所理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人物及整个社会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性批判，来纠正官僚政治及不平等的趋势；(2) 给中

国青年提供改革的经验。毛泽东感到他们真正成为优秀的"革命接班人"之前，需要教育这些在解放后成长顺利而自鸣得意的青年。(3)与一些党内同伴进行一场权力斗争，这些人把主席自愿退出积极的政策制定过程看成是一种权力的移交，而且还不加掩饰地轻视主席的意见。(4)毛泽东出于这些动机而作出了决定，准备与学生、士兵、较为现实的工人及党的理论家，组成一个大杂烩式的联盟，以联合起来反对"热月党人"的组织和政策。

在"文革"造成的许多后果中，最使我们关注并提供了理解本章关键问题的，是林彪作为一个权威人物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崛起。林彪是一位具有漫长而光荣革命生涯的老练的军事指挥员。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5)通过六十年代初期的活动，他加强了自己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并被确立为毛泽东主要的政治助手和理论门徒之一。当军队在"文革"中成了毛分子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时，其负责人林彪元帅御控制了运动的激进潮流而达到了权力顶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在1969年，党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逐渐在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与毛泽东进行争夺。最重要的是他继续指挥军队积极参与政治事务，而对重建党的组织置之不理，不把党看作是"文革"后社会的权力中心。(6)在1970年和1971年，这种争夺逐步升级，据称在林彪企图暗杀毛主席(作为夺取政权的序曲)时达到了顶点。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是，林彪及其同伙在其阴谋被揭露后，企图乘飞机逃离中国，在1971年9月13日因飞机起火摔死在外蒙古的平原旷野。(7)

林彪死后，官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他的命运保持沉默，但所有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了，因为林彪在各种公开场合消失了，新闻报道中也不再提及他的同伙。可是，已被废黜的"接班人"逐渐成了一场广泛的批判运动的间接靶子。这场运动给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文革"罪行提供了机会。这一批判及随之而来的政

治斗争正是本章的主题。

在这里，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批林运动的最初阶段。按时间顺序划分，这一阶段始于林彪在1971年9月的死亡，终于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不久以后“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始。在把批林运动的关键看成是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时，问题得到了暴露，但此后，在运动中，官方在对林彪的错误路线进行解释时，逐渐从谴责极左思潮向批判极右主义转化，这种转化的原因是，党内领导层围绕着“文革”应如何正确发展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从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成规下不点名地批判林彪到周恩来在十大政治报告中公开攻击“林彪（叛徒）集团”，这种变化部分地划定了从批判极左思潮到批判极右主义这种转化的界线。可是，应该注意到，这种界线并非是精确的：从批判林彪是本质上的极左错误，到把他描绘成一个极右分子，这种转化不过是正在进行的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运动的一个序曲。[8]

作为个人的林彪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焦点，虽然我们将引用关于他的政治路线性质的一些结论，但在这里，我们并不想证明他是不是极左分子（事实上他确实是极左分子，正如1971年至1972年批“骗子”运动最初阶段所指明的那样。毛泽东以后在对林彪和“四人帮”进行批判时也再次指出了这一点），也不想证明他的路线是不是极右性质的路线（而这一点正是1973年至1976年间的官方解释）。在这里，重要的是“文革”期间对中国政治生活中极左思潮的批判，是与对林彪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1971年林彪与毛泽东的政治摊牌中，毛泽东“战胜”了林彪。其后，这种批判就随之发生了。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后来党内最高领导层出现了派别斗争，批判极左思潮也就逐渐中止了。

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

批判林彪的第一个浪潮，是开展了一场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不指名的批判运动，从而打破了官方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倒台所抱的沉默态度，这一点形成了林彪消失后几个月中中国新闻媒介的特色。1971年2月，“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短评”，第一次使用了“刘少奇一类骗子”这一术语。这篇短评告诫人们要警惕“王明、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回想起来，这一术语很明显是指向陈伯达的。1970年8月至9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受到了批判。〔9〕

从进行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起，陈伯达一直是毛泽东的亲密的理论和政治助手。〔10〕陈伯达在解放后许多政策的最初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56年至1957年的集体化，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从而在混乱的六十年代中期，一下子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那时，他是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编辑(原文如此——译者)及权力相当大的“文化革命小组”两名组长之一(另一名是江青)，同时他还是5名政治局常委之一。1969年，当毛泽东力图放慢“文革”的发展速度并开始重新建党时，陈伯达的影响及政治地位开始下降了，这时他和林彪在推进“文革”的进展中逐渐纠集到一起。他们都竭力反对巩固和扩大周恩来总理的权力。以林彪和陈伯达为一方，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冲突开始于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到1970年年中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这种冲突就突然爆发出来了。〔11〕

在这次全会上，林彪、陈伯达以及他们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党羽，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发起了挑战。当这种挑战被挫败时，陈伯达成了受批判的主要目标，他在党内的宗派活动受到了批判，同时，他还为“文革”中的过火行为承担了主

要责任。陈伯达因多方面的错误受到批判，其中包括与“516兵团”的联系。“516兵团”对外交部长、周恩来以及军队老干部从极左的方面进行了攻击，因而在1967年至1968年遭到清洗。陈伯达还玩世不恭地策动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支持林彪提议在中国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自从刘少奇被废黜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着），以抗衡周恩来日益增长的权力，这些做法也受到了谴责。[12]陈伯达因此而被突然地逐出了政治舞台。1971年上半年，对他进行的党内批判扩展成一场公开的批判谴责运动；但他在这场运动中没有被点名，而只是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术语下受到了间接的批判。毛泽东在晚些时候指出，批判陈伯达的部分原因，是打算警告林彪，要他停止抵制党对“文革”路线的转变。[13]

批“骗子”运动反映了揭露陈伯达错误性质及其影响在分类上的矛盾。[14]根据逻辑推理，陈伯达被指责犯有极左错误，如鼓吹农村政策中的平均主义，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煽动工业企业中的无政府状态，否定工厂内合理的规章制度。[15]同时，“骗子们”还因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受到批判（很明显，这更多地应划入右倾修正主义的分类中），如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唯生产力论”等。据称这些谬论只是支持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变革。[16]这场批判运动转变成反对右倾主义的最明显的标志，是把“骗子们”的错误与刘少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刘少奇是“文革”的主要牺牲者，他被指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1971年2月至8月这段时间对陈伯达的批判，就显示了在其错误性质的界定上的含糊不清——甚至在林彪以后，仍继续把那些被攻击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人归入这一分类中。这种批判性质的含糊不清，表明围绕着批判极左思潮（在林彪死后，它成为党内领导层中的主要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早在1970年底和1971年初就已开始了。它还表明，党正面临着如何解决与修正主义密切有关的难题，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在“文

革"开始后即占据了整个宣传机器。

批判性质虽然存在着含糊不清的情况，但批陈运动确实存在一个反左的明确思路，这种思路反映了党内有的人企图努力批判和纠正"文革"中的过火行为。批陈运动点出了王明的名字，就使"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这一术语包含了上述意图，因为王明在党的早期历史上是以"'左'倾机会主义者"而出现的反面角色中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一些事件表明，批陈只是对已被人们察觉的部分极左思潮进行广泛的批判。例如，1971年3月，红卫兵中最好斗的头头之一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受到群众批斗，因为在"文革"的最初阶段，他在煽动校内武斗中起到了作用。这种武斗被认为是"骗子们"推行极左路线而造成的无政府主义的反映。〔17〕

在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并于1971年9月死去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引人注目地加强了对"骗子们"极左错误的批判。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虽然批判靶子还不是很明显地扩展到一度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头上，但回想起来很明显的是，在讨论最近进行的党内路线斗争中，林彪与陈伯达被归结为一类，其错误路线的主要特点被解释成极左。换言之，形成批"骗子"运动较早阶段的特点的摇摆不定，已在直接的集中批判及在指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左"倾倾向中被克服了。王明的幽灵被再次以魔法唤出，〔18〕报刊杂志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证明"'左'倾干扰"所造成的危害，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极左思潮在许多领域的表现，例如，在工业方面缺乏劳动纪律，顽固抵制"文革"中遭清洗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等。〔19〕

可是，如何确定"骗子们"的罪行这一问题，其波动的痕迹仍然存在，以致甚至在明确把极左思潮作为批判目标时，所有属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路线内的"左"倾和右倾倾向之间的联系，仍受到一定关注。将不同类型的政治错误概括成一条错误的

思想路线是采取了下面的讨论形式：即“骗子们”在顽固地竭力破坏社会主义和暗中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时，是怎样(以及为什么)改变他们的策略(即从“右倾干扰”变成“左”倾干扰)的。据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刘少奇一类骗子”把“没有改变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与“一直变化着的策略”(有时右倾，有时“左”倾)结合起来了。[20] 这种对“骗子们”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加以批判所暗含的意思就是：党内路线斗争最近的表现形式(至少是策略上的)是极左的倾向。因为，“文革”已将他们的右倾主义策略揭露无遗，并已使之失去信誉，“骗子们”被迫转向采用极左的办法，以掩饰他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例如，在对待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科学技术的作用问题上，因为据说刘少奇就曾兜售过“技术第一”“专家统治”之类的右倾主义思想。“文革”揭露并否定了那一错误路线后，“刘少奇一类骗子”(陈伯达和林彪)就在革命队伍中鼓吹了“技术无用论”的极左观点。据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他们)在科学技术中的地位”，以使资产阶级再次取得统治地位。[21]

阶级敌人在谋求实现其反革命目的时总是在不断改变其策略，《人民日报》曾报道的河北省乐亭县阶级斗争史的某些情况，就是一个例证。乐亭县自始至终反对“骗子们”在当地的追随者妄图使“大跃进”倒退的阴谋。[22]《人民日报》声称，“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在养猪(该县的主要产业)政策上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以前，该县在“大跃进”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后来“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将“原来由公社社员个人饲养的所有生猪，都交给集体饲养”，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管理错误，并使经济急速衰退。在六十年代初期，“骗子们”(再一次提及刘少奇)又利用“三年困难时期”的灾害，推行了关闭集体猪场，将所有生猪划给单个农户的右倾政策。其后果又是严重的倒退。在“文革”批判了这一政策后，集体经济又恢复了活力。可是，当人们为六十年代末的大好形势欢欣鼓

舞时，却又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的蔓延。于是，"骗子们"（这次是陈伯达和林彪）竭力鼓吹极左思潮，促使该县领导人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再次禁止私人养猪，从而使猪的存栏数又一次大幅度下降。这就表明，由于损害了农村社会主义的基础，损害了单个农民的家庭收入，养猪政策上的极左路线的错误，也就暴露无遗。1971年，当地的"骗子们"被赶下了台，因此实施了一项较为平衡的辩证的正确政策，既支持集体养猪也鼓励私人养猪。

在这一时期，除了对"骗子们"的"左"右倾干扰都进行批判外，批判和整顿的主要矛头很明显地是指向极"左"思潮。这也在宣传工具给予更多的版面并运用更多的细节来揭露和批判极"左"错误中得到了反映。显然，在"文革"第一阶段的后期，极左思潮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紧迫和最直接的问题。

1971年末，党内领导层中的激进分子对日益增长的批"左"气氛感到不安，从而在宣传媒介中作出了强烈的和不利的反应。例如，他们对"骗子们"在工业发展中的路线进行了批判，指责他们"以技术代替政治"，犯了右倾错误："这种将发展技术与实现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理论……是典型的帝、修、反的党派谬论……。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在于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23〕

激进派还指责"骗子们"鼓吹右倾思想，例如推行"唯生产力论"，宣传"学生比工人和农民更有知识、更聪明"等，认为其错误是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24〕

可是，在1972年初，围绕着批"骗子"运动方向问题的争论的重心已决定性地偏向领导层中那些力主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人。从1972年1月至这一年的年中，对极左思潮的猛烈抨击，仍是以开始进行意义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一形式进行的。这种调整意味着"文革"中的极左路线的危害正在被逐步消除。最初的政策调整主要集

中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尤其是工农业生产的管理和分配政策的方面。[25] 1971年底至1972年秋，中央召开了一系列的计划、公安和科学的全国性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倾向成为重要议题"。[26] 总之，在1972年上半年，批判极左路线确实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从而被看作是官方所进行的批判和具体的政策行动的主旋律；所以很明显，到1972年年中，针对"文革"中的过火行为所进行的一场相当全面的批判，似乎就将要展开了。

围绕着批判的斗争

到1972年夏天，对极左思潮所进行的公开批判——无论是在全国会议上，或者是在决策层中——在报纸上的报导都减少了。8月间，周恩来在讲话中责备《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央宣传机构的官员没能注意对近年来与极左倾向有关问题的揭露。根据推测，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曾指示《人民日报》官员"不要过多"批判极左思潮。[27] 很明显，周恩来在这次与激进分子的拔河比赛中赢得了最初的回合，因为在整个8月，全国的新闻报刊确实有一个批判极左思潮的短暂高潮——特别在农业政策上。[28] 但随后在8、9月间，就出现了一系列复杂难解的新情况，即党内领导层中一派力主更深刻地批判极左思潮，但另一派则企图缩小这种批判。

前者以周恩来为首——我们不妨称之为"老革命家派"，因为它包括了在较早年代就参加革命的大部分老资格的干部。这些人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极左路线是七十年代初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必须加以彻底的揭露、批判和纠正。他们中的许多人曾作为右倾分子成了"文革"的牺牲品；因此，批判极左思潮与在林彪死后重新恢复他们在领导阶层中的权力基础也是相一致的。

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文革派"，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迹起来的较年轻的干部。这些人有一切理由抵制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因为这种批判既威胁了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也威胁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权力)。这一派由稍后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领导——但在这时(1972—1973年)，其主要人物还只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而王洪文还只是一个配角人物，而且一直到1973年年中之前，他也确实没有在舞台中央取得位置。

1972年9月，大量的文章和新闻广播(大部分来自省级宣传工具)表明，批“骗子”运动正在重新被努力引向“批修整风”这一反右的主题上来，同时并明显降低了批“左”的腔调。林彪的政治野心以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罪行成为这次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路线”的重点。〔29〕而“骗子”的极左错误仅受到有限的关注，并且仅仅限于批判他们的策略，如“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指不诚实地用激进的口号和计划来暗中破坏社会主义。一些时事评论员强调指出，批判“骗子”的“主要方向”应针对他们的修正主义目的，这暗含了不应纠缠其策略上的极左形式的意义。〔30〕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强调“骗子”的路线代表了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主题。〔31〕在公众心目中，将“(刘少奇一类)骗子”与右倾立场决定性地联系起来的宣传努力，与早在1972年6月所发出的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是一致的。例如，中央1972年24号文件指出，林彪企图篡党夺权并阴谋杀害毛主席。该文件总结道：“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32〕虽然这一论断由于1972年下半年的强调批“左”而受到影响，但是1973年初批判风向的改变，表明了“文革派”终于成功地使批“左”脱离了它原定的性质。

遵照周恩来(周对转移批“左”重点不满)的严格指示所采取的明显行动是，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针对无政府状态和极左思潮发表了一组重要文章。〔33〕其中一篇的题目是“无政府状态是

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文章大量引证了恩格斯的《论权威》一书，攻击“骗子们”煽动了群众中的无政府思潮，从而危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34〕虽然这篇文章比几乎以前所有的批判“骗子”文章都更直率地论述了极左思潮，但它仍然把极左思潮看作是一种策略问题，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党内坚持了一条错误路线的证明——就如在批判修正主义时，它所做的那样：“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手法，揭穿了说，就是用‘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35〕

《人民日报》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这篇文章强调，列宁的教导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的纪律观念，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想，更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36〕

第三篇文章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一本论述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之父”——的小册子的概要。该文认为，研究巴枯宁著作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看法，对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这一组文章的发表，官方的宣传工具又引人注目地掀起了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的高潮，同时特别强调要纠正农村分配政策〔37〕和工业企业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使用政策上存在的错误，〔38〕以及教育知识分子政策〔39〕中的极左倾向。例如，在10月下旬，特地在湖南召开了教育座谈会，以批判将专业教育工作和政

治相互对立起来的极左倾向。关于这一座谈会活动内容的报道，除了强调实际工作经验和政治教育外，还强调了课堂教育的重要性，并要求在学校中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报道特别指出，建立师生间的革命关系并不是可以允许课堂中的无政府状态存在。座谈会告诫与会者，要警惕教育工作中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特别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想的干扰。”[40]

根据1978年的一篇报道，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对极左思潮再次发起的批判，打中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痛处。[41]他们曾策划在《文汇动态》(上海《文汇报》内刊的主要喉舌)的专栏上批判这些“毒草文章”。[42]后来该刊专门有两期(11月4日和24日)对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进行了反批判。同时据推测，在“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再次成为批判的禁区”后，“四人帮”主要是依靠在《人民日报》中占据高位的“亲密盟友”，在1972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在报纸上发起了对批“左”的“压制运动”。[43]《人民日报》中的激进分子不遗余力地“对那些要求批‘左’的人进行猛烈攻击”，他们通过禁止提及有关极左路线问题(如“唯意志论”及“政治能够冲击一切”)的办法，从而为“批判(林彪)定下了基调。”[44]

失败的批判

围绕着如何分析鉴定林彪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性质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的最后阶段，随着1973年的到来而开始了。1972年12月号的《红旗》杂志再一次为批判“骗子”定下调子，而这一点在新年到来的前几个月中已占了上风，这标志着批“左”的结束。《红旗》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需要支持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文章指出：“(刘少奇一类)骗子一向是极右的……，他们所宣扬的‘左’的词句仅仅是用来包藏他们右的实质。虽然他们并没有离开

他们的目的，这就是阴谋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45]文章继续强烈地为"文革"在教育领域中的改革辩解，为"工农兵学生"及"开门办学"[46]等新生事物欢呼——而在10月和11月批"左"期间，新生事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1973年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明确地指责"骗子"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47]这篇社论对极左思潮或无政府主义不置一词，而在前几个月，这些都是极为明显的批判目标。这一社论所暗含的意思非常清楚，即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可以贴上极左思潮标签的问题，都不过是贯彻执行正确政策过了头的标志(如不正确的工作作风)；主要批判目标应继续放在之所以要发动"文革"的首要原因上：右倾的修正主义。

1973年的最初几个月中，根据元旦社论的"指示"，全国性的特别是省一级的宣传工具，发起了一场逐步升级的批修整风运动。[48]这次宣传闪电战不仅把"骗子"的路线说成极右的，而且还竭尽全力对那些想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表示漠视。举例来说，有一家省级广播电台直率地质问："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它是极左这是错误的。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是极右的。"[49]其他文章和广播认为，继续批"左"将有助于掩盖"骗子"的反革命阴谋，并警告说党和人民必须"防止出现转移(批判修正主义)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50]例如，湖南橡胶厂党委为在这一时期曾误入歧途而作了自我批评："有一段时间，在批判修正主义和整顿工作作风运动中，有些同志忽视了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和目的进行深入的分析，孤立地批判了他们在经济领域所散布的谬论。这些同志没有将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经济建设的目的，与他

们所有的犯罪伎俩及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结果，这些同志片面地认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领域的反应是极'左'路线。这样，他们就不可能联系实际进行准确而深入的批判，不可能抓住实质，也就不可能击中要害。"〔51〕

这些论述使人们回想起以前突出"骗子"路线的极左内容，并与王明这个党内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头头联系起来的做法。而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没有任何涉及王明的内容，而且通过把"骗子"与那些臭名昭著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如陈独秀和彭德怀）进行比较的方法，明确认定他们的实质就是极右，这一转变得到进一步的论证。〔52〕有一篇文章更进一步把"骗子"与苏联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我们必须认识到，刘少奇一类骗子和叛徒考茨基，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无产阶级的叛徒。"〔53〕

由于在批判"骗子"运动的初期，极左思潮曾一度成为批判的主要目标，这一点难以否认，因此，这时就不得不作出种种努力，来解释为何现在把极左倾向降为第二位关心的问题。首先，是老话重谈：极左思潮纯粹是"骗子"的一种策略手法，以用来迷惑群众的警惕性，并掩盖他们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真正本质。报纸接着提醒人们，要划清主流和支流的界限，"骗子"的极左倾向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54〕

其次，是解释为与"（刘少奇一类）骗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目的相比较，较为次要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主义倾向对人民危害较小。例如，一家省级报纸承认"骗子"制造了篡党夺权所必要的混乱，煽动了群众中的极"左"倾向。但它认为："极'左'事物应予揭露，群众在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缺点与错误应予克服。但是，我们不应将人民的缺点、错误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相混淆，也不应以揭露极左思潮来取代揭露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55〕这种文章所内含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极左思潮应被看作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而"骗子"的修正主义路

线才是人民与不共戴天的敌人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把批判和整顿的矛头指向处于次要地位的极左思潮，只会分散揭露党内“骗子”的反革命目的注意力，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三个策略是文字游戏，即将以前的一些指责转嫁到“骗子”的头上。为了竭力揭露“骗子”的右倾实质，对从前归罪于“骗子”的一些关键性的极左错误，以强调右的方面的形式重新作了解释。例如，将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打倒一切！”（它在红卫兵运动中很流行）说成是意味着要推翻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完全不要一切权力。同样地，“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据说这是“骗子”坚持的观点）现在被认为隐含着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政治。最后，如同在批“左”时所指责的那样，“骗子”被认为违反了政治和生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以前是指责他们过分强调政治而损害了生产，现在则是指责他们拥护刘少奇之流的反动的旧观点——“唯生产力论”，这一异端观点强调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经济应优先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从而被批判是忽视了保证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一切政策问题的绝对必要性。[56]

在这一时期，“文革派”还曾有过一种打算，即想通过强有力地保卫“成果”的做法来转移批“左”的注意力。这种“成果”是“文革”的标志，但在当时，在批“骗子”运动中，它被当作“极左思潮”的表现形式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一家广播电台声称：“为了牢牢把握批修整风的斗争方向，还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57]这篇通讯不仅再次肯定了各种激进政策的正确性，而且，还通过把“骗子”和背叛“文革”的行为联系起来的做法，从而对“骗子”的性质是极右这一指责给予了更大的支持。[58]

在批“左”和维护“文革”成果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时，教育领域成了主要的竞争场所。这场斗争在1973年年中因张铁生事件而达到高潮。张铁生参加了当时新近恢复的大学入学考试，但几乎没

有时间复习迎考，因为他是“下放”知青，在农村种田。因此，他交了张几乎是空白的试卷。据报纸报导，他在试卷反面写了一番不满于考试制度的干瘪的意见，认为这种做法是对教育领域的文化革命的背叛。但张被宣传工具拔高成真正的革命学生的模范，而且在其后的几个月中，还成了保卫“文革成果”的象征和代言人。[59]

张铁生事件只是1973年一场规模更大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场斗争中，那些试图对教育政策中的极左错误加以纠正的人受到了批判。上海复旦大学——一所与激进分子有紧密联系的大学——“教育革命小组”写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了“有些同志”错误地将教育领域里的“(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极右路线看作是极左路线。文章指责这些“骗子”“企图为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指出他们特别想在大学入学问题上取消政治推荐(而不是考试)等新措施。[60]朱珀·多梅斯概括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在这里，真正争论的已不再是教育问题，而是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未来政策发展，所进行的一场新的和实质性争论的开始。”[61]也许应该把这一时期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论更精确地看作是“文革派”与“老革命家派”(他们在那几年中仍然在位)之间所进行的斗争的反应，而不是一场新的和实质性争论的开始。从严格意义上说，它还提供了比仅仅是“争论”更多的东西；事实上，它是党内最高领导集团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象征。

1973年上半年把“骗子们”的路线批判成极右路线，这种批判很明显是不正确的。它几乎只是孤立地描述了“骗子们”的修正主义的抽象特征。甚至当有的地方在报道他们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如何最终认识到“骗子们”的修正主义实质时，也只提供了受极右影响少得可怜的细节。而当这些报道提及被“骗子们”当作推行其反革命阴谋的极左策略时，通常只限于讨论“骗子们”在教育领域中鼓吹“读书无用”论等一般原则的问题。[62]换言之，把反对“骗子们”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变成继续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始于“文

革”），这种做法在实际中引起了一些虚假的和困难的问题，同时也使它与1971年至1972年期间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进行的更为详尽的批判形成鲜明的对比。

能否公开批“左”的问题，曾在老一辈革命家和文革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1973年8月党的十大的召开以及随之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使这一问题更加黯然失色了。十大以后最初的各种讲话和文件虽然对林彪和陈伯达进行了点名批判，但是对他们与极左错误的联系却不置一词。相反，周恩来的政治报告——被认为是对林彪、陈伯达罪行的总揭露——却重申了那时占主导地位的宣传口径，即“骗子们”的路线是极右路线，甚至连极左思潮作为策略的问题都没有提到。〔63〕例如，在报告的开头部分，周恩来指出林彪和陈伯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64〕读完这一部分的政治报告以后，人们不能不得出以下结论：即这个报告实际上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和文革派之间的某种妥协（无论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

周恩来对林彪的许多抨击，其矛头是揭露林彪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一集团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65〕对林彪的本质是极右这一点，周恩来在其报告中最率直的分析，就是指责苏联支持林彪的修正主义阴谋：“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66〕

周恩来直到最后才提到了一些也许可以含糊地称之为极左思潮的东西，他提到了林彪之流玩世不恭地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语

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67]政治报告中还有另外两段简短论述，或许可被解释为是对极左思潮的含糊批判。第一段是引用了1882年10月恩格斯的一封“致奥·倍倍尔的信。”其中写道：“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68]周恩来在批判林彪时，曾离开上下文关系，引用了上面的一些词句。这种引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林彪和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系以及他们共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利益的揭露。

另一段内容是周恩来论述了党内存在的一种情况，即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常常会掩盖了另一种潜在的错误倾向。周恩来叙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如何助长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以及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是如何为他后来倒向右倾机会主义铺平了道路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反对刘少奇修正主义的斗争包括了反对林彪修正主义的斗争。”[69]虽然周恩来很仔细，没有把刘少奇和林彪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但这样微妙地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配成一对，就暗含有这样的意思：就党内最近一次路线斗争来说，这种推论(右倾掩盖了“左”倾）也是真实的。

不管这种事后认识会允许我们怎样理解周恩来在十大的政治报告，有一点是清楚的：报告的要旨肯定了林彪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路线具有极右的性质。十大以后，事情迅速朝这个方向发展；“四人帮”的地位和影响得到巩固（特别是在宣传、教育及农业领域中），并为几年后文革派和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最后摊牌勾勒了雏形。

当时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几乎根本不再提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极左思潮问题。“极左思潮”，“平均主义”，“无政府主

义”以及其他一些在批“左”时使用过的法定术语，这时已几乎从宣传工具继续进行的批林运动中全部消失了。例如，1973年9月《红旗》杂志曾转载了几篇长文的摘要，标题是《把批林整风运动继续进行下去》，专门揭露所谓林彪集团的罪行。但其中却没有一处提到(那怕是最含糊地)极左思潮或者“左”倾机会主义。[70]因此，批林的矛头显然是指向了这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极右路线。

接着，在9月中旬开始了批孔运动。这场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批林运动联系在一起，虽然直到晚些时候它才演变成一场成熟的批林批孔运动。[71]将林、孔联系起来——虽然它逐渐被“四人帮”用来作为攻击周恩来的工具——有助于强调林彪的极右实质，因为还有什么比儒家这一中国封建制度的哲学基础更右倾的呢？[72]

最后，文革派发动了一场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攻势，并且阐述了“文革”对新生事物，特别是教育领域中的新生事物的政策。例如，十大的后果之一是，新闻界对张铁生这个辽宁的反潮流学生加以热烈宣传，把“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形式称颂为当代的革命潮流。[73]同时，对“文革”的改革措施也做了一些实质性的修改——例如，除张铁生的形式外，还采取了一些作为大学入学的标准的考试——但从广泛的范围上来说，这一时期宣传工具所描述的教育趋势确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重新肯定了文革的政策。[74]

批“左”在1973年9月即告夭折。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本质是作为揭露文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极左思潮而开始的，现在却被转变成另一种性质的批林运动，批判林彪这个极右分子不仅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还想将历史的车轮倒退到以儒家戒律作为指南的奴隶主统治时代。

对批判失败的解释

影响1971年至1973年间的中国政治的许多因素中，哪一种可以用来解释批“左”在林彪死后的演变呢？在197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批“左”曾是一场相当全面的运动。在此之后，为什么对“文革”中的过火行为所进行的批判和纠正，却在1973年失败了呢？在对我们刚刚叙述的事件的年表作出一些详细的概要性结论后，我们将会能够更好地理解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的发展过程。

在1971年9月林彪死后，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已发展成围绕极左思潮是否应予批判和纠正的问题所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党内领导层在围绕中国发展过程中有没有极左思潮这一问题而出现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这场斗争是在党内领导层内两大派(我们在前面称他们为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之间进行的。老一辈革命家试图将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作为他们的论坛，用来彻底纠正他们所忧愤的那种中国政治生活中严重的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已极大地危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文革派则企图维护并巩固“文革”“成果”，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有效地防止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倾向的唯一方法。换言之，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在中国未来发展的理论基础问题上存在着深刻分歧，前者所认为是极左思潮的东西，后者却将它看作是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实质所在。

基于这一理念的不同，关键性的权力问题也成了两派斗争的一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不顾一切地恢复他们从前作为党和国家机构中一支领导力量的地位。他们希望，揭露“文革”中的过火行为，将能改善他们的地位：即他们是被不公正地赶下台的，应该恢复他们的工作，以帮助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批“左”还可能使老一辈革命家获得对迫害人的人予以报仇

的某些机会。相反，文革派则急急忙忙地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及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做法辩护，因为他们分享权力的要求寄托在文革这两个关键问题的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

文革派有充分理由作出决定，必须要扭转在陈伯达倒台后发动的、林彪死亡后加快了的批“左”进程。“四人帮”知道，在1971年至1972年，当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发展到把主要矛头对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时，其逻辑结果将最终会把他们牵连进去，因为他们和正日益受到攻击的激进政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实质性的问题是，他们强制性地、果断地采取了行动，竭力阻止正在进行中的批“左”进程，因为这种批判不仅把他们的核心理论攻击到了难以接受的程度，而且还威胁了他们的政治生存。

文革派成功地削弱并慢慢停止了1971年至1972年对极左的全部批判。我们只能推测几种可能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看作是围绕1971年至1973年批“左”问题所进行的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曾干预过吗？在派别斗争的某些要害点上，毛泽东极可能非常妥善地插手，以强加某种结果（就象根据推测，当这两派在1976年1月围绕周恩来的接班人问题进行斗争时，他通过赞成“妥协候选人”华国锋从而解决了问题时所做的那样）。毛泽东之所以插手，有两种可能的理由，一是他可能被党内最高领导层内的斗争而引起的自相残杀激怒了，因此试图通过在各派之间寻求某种妥协的方法，来强加一项解决纠纷的办法；二是他可能感到1971年至1972年的批“左”走得太远了，要开始向他本人所赞赏的某种价值观和政策发出挑战了。[75] 后一种假设能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对彭德怀的处理中找到根据，当时虽然主席本人也批评了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出现的某些极左倾向，但他认为自已的批评与彭德怀在信中及对时局的评论中所呼吁的对极左思潮的分析批判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并没有证据认定毛泽东也参与甚至支持了在批判林彪及批判

"骗子"运动中的批"左"做法。事实上，从所知道的文件中能够推测出，毛泽东一开始就专注于他与林彪在后者野心勃勃的政治活动这一问题上的争执，而并不关注林彪的意识形态倾向是"左"的还是右的。例如，1971年8月和9月——毛泽东与林彪摊牌的前夕——毛泽东在一次视察中对当地干部发表讲话，论述了这样一些问题：林彪想恢复国家主席职位的企图，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的"突然袭击"和"地下活动"（例如，他的宗派主义花招），以及他所操纵的对毛泽东玩世不恭的崇拜等，这些讲话并没有明确指出林彪与前几年的极左思潮有什么联系。[76]

其他一些在内部传达的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也支持了这种说法。例如，中央文件所载据称是林彪政变计划的"'571工程'纪要"，就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林彪的实质性罪恶是他反对主席和党的野心，而不是极左思潮。[77]中央第61号(1971年)，第24号(1972年)以及第34号(1973年)等文件(这是整个围绕如何界定"骗子们"的性质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时期)表明了它们在解释林彪事件的一些最重要问题时的明显一致性。这些文件几乎是孤立地阐述了党内的阴谋和宗派问题，而没有涉及与政治路线有关的问题。[78]如果我们能够推测这些中央文件是毛主席自己理解林彪"问题"的公正反应的话，那么逻辑结论就是，毛从未将1971年至1972年的批"左"看作是对林彪的实质性揭露。相反，他也许很有理由地认为，批"左"对批林是多余的，因此在批"左"似乎威胁到他自身(更不用说他的亲密的政治助手了)的意识形态信仰和政策信仰时，他便要求停止批"左"。

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是否曾达成过妥协呢？也许这两派之间的冲突在1972年下半年已达到如此恶毒和僵持的程度，以致双方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或被毛泽东所迫？)感到需要接受某种形式的妥协。这种妥协有可能导致派别活动的结束，并给予领导人一个完整的机会，以便将注意力转到更为实际的政策考虑上来。暂时停止争

斗，还能使双方集中力量，以便进行他们所希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后最终的继承人问题的斗争。妥协也许采取了一种对政治进行简单权衡的形式，例如老一辈革命家同意停止批"左"，以换取文革派同意邓小平在1973年恢复工作。要不然，这种妥协也许更多地反映在两派之间对一定的政策领域所拥有的某种"影响范围"上，即老一辈革命家在经济问题及科技方面享有影响权，而文革派则控制了宣传、农业和教育领域。

总的来说，1974年至1975年是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的年代：对极"左"的明确批判停止了，但也在公开纠正某些可感觉到的"文革"中的过火行为。但后来这些纠正又逐渐被贴上企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标签，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的发生，一是展开了批邓运动，一是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在1976年最终发生了对抗。因此，1974年至1975年可被看作是一个静止时期，它反映了1971年至1973年与1975年至1976年这两个更为激烈的斗争时期之间各种各样的妥协和休战。

难道"四人帮"仅是因为控制了新闻和宣传工具，能够有效地消除批"左"带来的危害、进而智胜了他们的对手吗？官方事后在对1972年下半年的一系列事件的解释中，有些证据是支持了这种假设，据说在那段时间里，"四人帮"急忙操纵《文汇报》和《人民日报》的几个幕后起实质性作用的班子，扭转了宣传工具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越来越多的批判。(79)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最可能的解释是，所有上述因素对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最后结果的产生都起了部分作用。"文革"及林彪事件引起的所有政治不和，肯定使领导层及整个中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求有一段相对稳定和团结的时间。不断努力批判极左思潮的做法，很可能会重新引起各个层次上的派别活动。老一辈革命家要求在"文革"后的秩序中有发言权，一当他们确信这种要求已被注意，而激进分子同时在宣传和农业问题上也显

示了他们的力量时，双方也许都愿意在非常深刻的仍将他们分成两派的意识形态分歧上达到一种政治妥协。这种妥协在下列事实中得到反映：邓小平在1973年8月重新出来工作，而同时，王洪文也成了党的第一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很可能是这种妥协的煽动者及设计师，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党内新的一轮的激烈斗争（至少在当时是这样）。

当批“左”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保护下作为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的一部分于1971年至1972年发起时，其矛头首先是针对文革派的余毒的，其次才是针对林彪以前犯下的错误。有些学者认为，林彪是“文革”激进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和坚定的捍卫者，但是，他们将林彪本人与那些政策联系起来的证据是不足以说服人的。[80]相反，基于目前我们所知的林彪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政治活动情况，似乎可以认定，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支持所有可以扩大其权力的路线和政策。有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571’工程纪要”——不仅是林彪夺取权力的详细计划，而且还是林彪对1970年至1971年中国政治局势不满的概要——很难说是个反映了极左路线的文件。

死后的林彪成了特别便当和合适的批判靶子。他似乎被谴责为几乎在同时犯下了各种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错误和政治错误，例如，既鼓吹“政治统帅一切”，又鼓吹“唯生产力论”，或者既鼓吹“英雄史观”，也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81]这些大杂烩式的指控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中曾被激烈宣传过，它最重要地反映了1971年至1973年激烈的宗派斗争的性质。但是，如果林彪在本质上确实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与“左”或右的路线没有任何共通之处，那么他容易成为老一辈革命家和文革派双方共同批判的目标，这一点就更可信了。

当批“左”在1972年达到高潮时，林彪确实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推想，当老一辈革命家试图对“左”的

路线错误进行彻底的批判和调整时，他们有比对毛泽东一度选定的“接班人”在死后进行严厉指责更为直接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在我们所叙述的批“左”期间出现的大多数问题更相象于“四人帮”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林彪的混杂无章，缺乏说服力的政治路线。因此，1971年至1972年间的批判很可能是直接指向“四人帮”的；同时，批“左”很可能是老一辈革命家在预先准备他们和文革派的斗争，而不是仅仅指责林彪的罪行。〔82〕

这样就可以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直到1973年8月才公开点名批判林彪的问题——那时，在对林彪事件的官方解释中，激进分子早已成功地将林彪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其实，如果林彪基本上只是一个觊觎权力的野心家，那么这将有利于老一辈革命家把林彪看作是一个与众人注目的中心问题无关的一个个人，以便不干扰彻底批“左”这一更为迫切的任务。如果能将林彪这个有名人物和他的历史放在1971年至1972年批判和调整运动之外的话，那么，在“刘少奇一类骗子”这一含糊不清的术语下暗地里批判文革派将更为容易。

林彪和“四人帮”之间政治联系的真正性质也不很清楚。事实上，有迹象表明，除了“文革”初期(1966年至1969年)林彪和“四人帮”在一些问题上有过短暂的联盟外，就长远的政治利益而言，林彪和“四人帮”之间是分裂超过了联合。

在林彪死后(1971年至1973年)和“四人帮”倒后(1977年至1981年)，两次都分别进行了批“左”，但这两次批“左”所提出的问题之间，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方面，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中加以讨论。可是，这未必就意味着林彪和“四人帮”之间真正存在的一个政治联盟——主要是(如上所述)，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个体的林彪，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批“左”斗争中只是一个次要的（也许甚至是一个附带发生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能够从几个方面推定，在1968年或1969年，林彪和“四人帮”之间存在争执，并且在他们自

己的政治斗争中打得难分难解。毛泽东以后的一项分析刻画了林彪和“四人帮”之间关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立足未稳，正如菌子长在烂木上一样，要凭借林彪这棵‘大树’，林彪也要搜罗党羽，以壮阵容。那时他们的关系融洽得很。但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他们的地位和权力的相应变化，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83]在这些以前的“文革”同盟者之间，其冲突原因可能会是些什么问题呢？最主要的，是“四人帮”可能因1967年至1968年林彪控制军队压制红卫兵运动及在城市地区、工业组织中恢复秩序这一致命一招而感到沮丧。而且林彪还坚持应将权力交给新建立的省、市及各工作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这一定激怒了一部分人，这些人鼓吹群众组织是恢复“文革”后秩序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和激进分子很可能把这种武装介入看作是军事统帅政治的预兆。因此，“四人帮”很可能认为，这种行为等于破坏了他们在“文革”初期与林彪的联盟形式。[84]

其次，看来林彪还部分地支持了1967年至1968年“516兵团”保卫“文革”实现高度军事化的努力。[85]“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运动渐渐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因为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处于牢固地位的省级军区司令抵制运动的灾难性后果，将会给一个全国性权力的最后堡垒带来损害。当江青和姚文元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谴责“516兵团”时，他们很可能已发现与林彪在另一层目标上的冲突。

再次，“四人帮”在1970年至1971年间对林彪鼓吹的那种甚至连“四人帮”都认为过于激进了的农村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因此“四人帮”可能决定与周恩来等人结成“反林联盟”，以保住他们在中央的职位，并保护另一些他们在更坚定地摸索着的“文革”计划。[86]

第四，有一处资料认为，江青及其助手和陈伯达的关系远比陈与林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陈伯达在1970年被清洗实际上是林彪干的，是林彪与激进分子队伍内的对手进行斗争的一个部分。[87]另

一方面，一项分析表明，"四人帮"也愿意除去陈伯达，因为他被撵走能使他们更好地挤进毛泽东的最亲密的助手圈中。[88]因此，上述这种观点的逻辑推测大概是，"四人帮"也对公开指定林彪为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感到焦虑，因此，他们大概采取了要从林彪的下台中牟取好处的态度。

恰如林彪与"四人帮"实际上的联盟性质无法确定一样，林彪-陈伯达关系也是无法确定的。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没有提到（或者只是特别浮浅地描述了）据说存在的"林彪-陈伯达反党联盟"。实际上之所以要这样说，多半是因为双方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都失败了这一事实，因为"战胜者"发现，在努力将党内冲突的官方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时，要捏造那些被他们打败的人之间的同谋历史是很容易的。

第五，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并没有把"四人帮"看作是确定的联盟者；事实上，除了毛泽东以外，这项政变计划的真正目标所指看来是张春桥。这项政变计划首先要求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抓住上海的权力："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89]《纪要》列举了对中国政治局势的不满，以表明政变的合理性。《纪要》提到了"笔杆子托派集团"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指出要对他们的"继续革命论"以及"假革命的词藻"进行批判。显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能肯定这指的是"四人帮"。[90]

另外，李伟信（据称是主要的同谋者之一，林彪死后被捕）的交待（作为揭露《"571"工程纪要》的中央文件附件）证实，逮捕张春桥和姚文元（以及毛泽东的私人警卫汪东兴）是政变的关键部分。李伟信还声称，林彪及其同盟者曾考虑把暗杀毛泽东的罪行归咎于张春桥和汪东兴"与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合谋"（这几个人早就作为极"左"的"516兵团"的领导人受到谴责了）。[91]这样就可以激怒公众舆论，林彪以及军队就能够以极左阴谋正在危害国

家安全的名义接掌政权。

当然,《“571”工程纪要》——或其中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伪造的，以便证明将林彪清洗出领导层是合理的。在那种情况下，断言张春桥及其他一些激进分子处于政变的首要目标，就有可能是某些“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插入的，以便使文革派和林彪保持一定距离，避免有共同犯罪的嫌疑。但这种看法可能会贬低下列假设：即林彪与“四人帮”之间的冲突多于联合，但却有助于解释下列情况，即激进分子在把批林从批“左”分离出来中得到了好处。应该注意到，负责编制林彪事件的材料和报告的“特别审查委员会”正是由与文革派有这样那样联系的人控制的。这个委员会成员是：张春桥、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陈锡联、叶剑英。这里只有叶剑英可被看作是老一辈革命家阵营的，其他的人都是与极左思潮有联系的。〔92〕

事实上，“四人帮”继续花费大量精力，将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并将他们对林彪的抵制说成是他们的一贯立场。1978年一项分析认为，自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不抱幻想。“四人帮”的这种手法是对毛泽东这种态度的保护性反应，并且是“四人帮”精于“见风使舵”的例证。〔93〕激进分子在意识形态和安全机构中的战略地位大概也有利于他们“篡改《“571”工程纪要》，以适合他们自己的政治意图。

最后，江青在1972年年中与罗克珊·威特克的谈话中，简单地提到她与林彪的冲突。她证实林彪的亲信多次想用炸药和毒药谋杀毛泽东和她自己。这支持了下列假设：不管林彪与“四人帮”在一段时间内曾存在过什么样的联盟，在1969年至1971年激烈的政治冲突中，这种联盟已完全瓦解了。〔94〕

我们曾在前面对围绕1971年至1973年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而展开的政治斗争进行过分析，这种分析启发我们得出了一些主要假设。通过再次说明这些假设，我们可以得出某些结论。首先

林彪和"四人帮"——他们都被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谴责为推行极左路线——之间的关系是以不和为主，以致于每个人都可以公正地说，1969年后是以政治冲突而非意识形态的一致为特征的。此外，有迹象表明，林彪和党内领导层中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真正的斗争原因，是林彪为了巩固他个人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宗派活动，而不是他以保卫文革"成果"的形式一贯鼓吹的极左路线。

不过，在林彪以后和"四人帮"以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中，所提出问题的相象性是清清楚楚的。因此，看来很可能是，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的标题下进行的批"左"，其真正目标正是要指向仍在掌权的文革派。激进分子意识到老一辈革命家想利用这场运动来攻击他们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以及对意识形态的偏爱，因此，他们在1972年至1973年成功地作出了努力，控制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毁灭性危害的极左思潮的日益增强的批判。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使之保住了在中央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并足以允许他们在1975年至1976年发起另一场攻击，以求实现其目标。在老一辈革命家看来，批"左"的失败，意味着"文革"中的过火行为不会再受到彻底的批判和纠正。其结果是，开始怀疑"文革"是否合理，对前面的路怎么走又各有各的看法。因此，党的领导层在1973年仍然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中央的这些悬而未决的矛盾成了最高领导层之间另一轮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线。因此，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期间围绕着批"左"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在毛泽东死后和他们的激进派对手之间的最后摊牌的一场彩排。

注释

〔1〕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第4部分。

〔2〕同上，第267页。

〔3〕同上，第15—16章；惠尔顿特和麦克法兰，第3章。

〔4〕同上，第298—299页，第309--317页。

〔5〕关于林彪的经历以及他在权力中心升起及陨落情况，可参见：考：《林彪事件》；冯·欣内肯：《林彪的升落》；布里海姆：《林彪的陨落》。

〔6〕莫里斯·梅斯纳：同上，第364—370页；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宗派主义》。

〔7〕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57号)：《中共中央通知》。

〔8〕考：同上，第202—221页。

〔9〕《中国新闻分析》(1971年第851期第2页)

〔10〕对于陈伯达和林彪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参见：怀利：《毛主义的产生》。

〔11〕布里海姆：同上，第428—438页。

〔12〕：布顿：《文化革命中的极左阴谋》；冯·欣内肯：同上，第226—228页。

〔13〕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2)：《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声称对林彪采取了"甩石头"的做法。陈伯达在1980—1981年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作为一名被告而再次露面。陈伯达的基本罪行，是被指控在文化革命期间篡党夺权，迫害老干部，因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参见《北京周报》(1981年第5期第24—28页)。

〔14〕多梅斯：《文革后的中国》第77—91页。

〔15〕《人民日报》(1971.8.15，1971.8.19)

〔16〕《红旗》(1971年第4期第8页)

〔17〕哈定：《百日战争》第275—286页；冯·欣内肯：同上，第232—233页。蒯大富和他的亲密的红卫兵战友聂元梓，在批判"骗子"的反"左"运动开始后，就从政治中心舞台消失了，并于1978年被正式逮捕。参见《北京内参》(1978.12.28)。

〔18〕《光明日报》(1971.10.26)

〔19〕同上；以及《人民日报》(1971.10.21)

〔20〕〔21〕《光明日报》(1971.10.18，1971.10.6)

〔22〕《人民日报》(1971.10.30)

〔23〕《光明日报》(1971.12.13)

〔24〕《光明日报》(1971.10.4)；《北京内参》(1971.11.28)

〔25〕多梅斯：《文革后的中国》第153—166页。

〔26〕〔27〕《人民日报》(1678.5.23)

〔28〕《人民日报》1972年8月下旬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多梅斯：同上，第157—159页。

〔29〕《黑龙江日报》(1972.8.31)

〔30〕《青海日报》(1972.9.8)

〔31〕《桂林日报》(1972.9.9)

〔32〕引自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前言

〔33〕《人民日报》(1978.5.23)

〔34〕~〔36〕《人民日报》(1972.10.14)

〔37〕《人民日报》(1972.10.17, 1972.10.18, 1972.10.23)

〔38〕《人民日报》(1972.10.24, 1972.10.25)，《光明日报》(1972.11.14)

〔39〕《光明日报》(1972.10.20, 1972.11.5)，《人民日报》(1972.10.26, 1972.11.13)

〔40〕《光明日报》(1972.10.21)

〔41〕《人民日报》(1978.5.23)

〔42〕《文汇报》是一份当时置于“四人帮”强有力影响下的报纸。在1972年10月，当其他报纸都在猛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时，唯独它仍不断发表文章，强调继续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的重要性。

〔43〕《人民日报》(1978.5.23)

〔44〕《人民日报》(1978.5.18)

〔45〕〔46〕《红旗》(1972年第12期)

〔47〕《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1973.1.1)

〔48〕多梅斯：《文革以后的中国》第174—175页。

〔49〕《青海日报》(1973.1.30)

〔50〕《湖南日报》(1973.2.2)，《新疆日报》(1973.2.12)；《西藏日报》(1973.2.19)

〔51〕《湖南日报》(1973.5.8),《新疆日报》(1973.5.2)

〔52〕〔53〕《湖北日报》(1973.2.20)

〔54〕《西藏日报》(1973.2.13)

〔55〕《云南日报》(1973.2.16)

〔56〕《红旗》(1973第3期),《青海日报》(1973.1.30)

〔57〕《河南日报》(1973.3.21)以及多梅斯:同上,第175页。

〔58〕《辽宁日报》(1973.2.20)

〔59〕张铁生事件发生在毛远新控制下的辽宁省,毛远新不仅是毛泽东的侄子,也是"四人帮"的一个亲密同伙。"四人帮"垮台后,张铁生被指责为"四人帮"的反革命爪牙并被逮捕,参见《人民日报》(1973.8.10)。张铁生在文革后被捕的情况,可参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8期第14—16页。

〔60〕新华社内参(1973.7.22)

〔61〕多梅斯,同上,第178页。

〔62〕新华社内参(1973.3.16)

〔63〕~〔69〕《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8.24)

〔70〕《红旗》(1973年第9期第59—78页)

〔71〕《南方日报》(1973.9.16)以及戈德曼:《中国的批孔运动》。

〔72〕有关"四人帮"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来反对周恩来的情况,可参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16期第27—29页。

〔73〕《北京内参》(1973.9.19),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73.9.17),《新华月刊》(1973.9.19)

〔74〕佩珀:同上,第867—870页。

〔75〕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76〕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2号);《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77〕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4号);《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78〕上述这些文件可参见考：同上，第96—105页，第110—117页。

〔79〕《人民日报》(1978.3.23)

〔80〕多梅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第361—371页。

〔81〕《文汇报》(香港)在1973年11月期间的文章。

〔82〕戈德曼：《邓小平》第48页。

〔83〕《人民日报》(1978.5.18)

〔84〕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第324—328页；约瑟夫：《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军队》。

〔85〕布顿，同上，第1045—1046页。

〔86〕多梅斯，同上，第88—89页。

〔87〕《学习与研究》1972年第10期

〔88〕《中国新闻分析》1971年第851期

〔89〕〔90〕引自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4号)附件二

〔91〕同上，附件三

〔92〕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64号)中指出，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译者注)

〔93〕《人民日报》(1978.3.18)

〔94〕威特克：第366页。

6

从极右到极左：批判"四人帮"运动

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1959)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把"四人帮"的问题视之为中共党史上最重要和最复杂的一次政治斗争。在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把和"四人帮"的这次摊牌，说成是"一次激烈的重大的斗争"、"一场特别严酷的搏斗"。并且称之为"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建党以来很少见过的严重形势"。(1)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宣称与"四人帮"的这场斗争"一举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2)因而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一家省级电视台曾扼要评价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四人帮所犯罪行，比我党历史上任何一次错误路线都更为严重，更为危险，并且持续时间最长"。(3)

这番评价的隐含之意，就是指出如果"四人帮"

得逞的话，带来的将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崩溃。当时的形势是极为严重和复杂的，中国革命的两位最伟大的巨人——周恩来和毛泽东，已逐渐失去了工作能力，而且身体状况也正在迅速恶化，决定他们的继承人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紧迫，这场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触发起来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跨台之后，中国立即展开了一场批判运动，当时官方的公开广播暗示了这一问题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影响。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由于对"四人帮""反动路线"的分析，和对据称由这条路线所造成的具体危害的纠正，从而导致了对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拦路石的极左路线的全面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左"倾危害作了较为彻底的分析，而且还因此而对诸如"阶级斗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在中国政治中时兴了二十多年的一些重要思想概念作了基本修正。这些修正将引导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新认识。诸如对党的整个历史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的理解，以及对解放以来毛泽东在一些列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做法的评价等。简言之，随着"四人帮"的跨台而展开的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带来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意义深远的修正和调整；但这种调整反过来对毛泽东刚刚逝世之后的中国政治环境又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场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揭示了中国政治中批判极左的全部问题，而且还对中国在合理制定本世纪最后几十年内的发展计划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一节我们将详尽研究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但在此之前，我们先要对"文革"中反对他们的一些耐人寻味情况作一剖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们1976年10月垮台为止。因为通过对这段惊心动魄的斗争的历史过程的剖析，我们才能了解在毛泽东之后，全面批判中国政治中极左路线的流毒并不是偶然的。这种派系之间的斗争，不仅涉及到对"四人帮"批判的方向问题，而且还反

映了即使在激进路线最强有力的代表人物垮台之后，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仍然在很长时期内都一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第一阶段：作为极右分子的“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逝世约一个月以后，“四人帮”遭到了逮捕，当时正值批邓的高潮。[4]1975年，邓小平及其老干部派和“文革”派之间都因想方设法试图争取上风而再次发生冲突，这种对抗逐步升级，从而使邓小平在1976年初春再次被逐出了最高领导层。[5]“四人帮”出于其政治野心的需要，一再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反对邓小平建立一个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实力的全面现代化目标，认为这是正统的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的。这场批邓运动直至“四人帮”垮台之后仍然方兴未艾，特别是在正式文件中还强调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对“走资派”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6]官方有关逮捕“四人帮”的第一份正式公告，是新华社于10月21日才发表的，此时距“四人帮”被捕已是两个星期以后，而当时这一消息通过中国许多城市中的大字报和群众游行而早已为公众所知。[7]新华社的文章指出，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在几个月之后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该文还揭露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并着重强调了“四人帮”的政治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认为“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8]

在正式传达“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之前，广播中曾一再播送毛主席的“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就使人们知道了批判“四人帮”就在于他们“搞阴谋诡计。”这三项基本原则最初是在1971年作为对林彪的警告提出来的。而后，在1976年10月又直接成了批判“四人帮”的先声。[9]最初“四人帮”的极右实质的提

出，是被别有用心地和当时仍在进行的"继续批邓"明确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北京市长吴德(他本人后来由于在"四人帮"垮台前几个月内的一些事件中的错误而被撤职)在1976年10月24日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10〕次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中又重复了这一番话，同时又欢呼粉碎"四人帮"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这篇社论使用了这样重要的词句，即指出"四人帮""实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11〕

到10月下旬，把"四人帮"的政治路线说成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已成为给批判"四人帮"运动定调的关键。但是，同时又不得不说"四人帮"披着"革命"的伪装，以推行其反革命路线。甚至在10月25日的联合社论定调以前，上海一家报纸就已指出"四人帮"是一伙"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还是"阴险狡猾的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和"混入工人队伍中装扮成'左派'并爬上高位的假革命、投降派和蛀虫"。〔12〕

王明的例子又一次被引用了，但这里是注重说明他的第二次错误路线的右倾性质，并以此说明他的第一次错误路线以"左"的面目出现的虚假性。为了还"四人帮"极右实质的本来面目，剥去他们的假革命面具，是非常必要的。《人民日报》指出："红帽子并不能永久地掩盖其黑心肝……过去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他的黑心肝不是很快就暴露了吗？……王张江姚的帽上虽然也被染上了'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红颜色，但他们的黑心肝……还是被人民揭露出来了。"〔13〕

这个时期为否定"四人帮"是真左派做了大量工作，从而进一步强调了这样的观点，即批判"四人帮"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他们的极右实质，并应突出其宗派主义和阴谋活动，以此作为确切分析其政治

路线的关键所在。上述观点的理由在于：虽然“四人帮”制定过某些似乎很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策略，但他们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上所搞的阴谋活动，却使他们的嘴脸暴露无遗；这些阴谋活动的目标是在于篡夺权力，推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四人帮”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换言之，文革以来意识形态结构上流行的格式就是：所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必然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四人帮”的罪行如此之大——其罪恶矛头直指周恩来和毛主席——因此就必然成了极右分子。

在批判“四人帮”中，除了将这种反革命阴谋诡计与政治上的极右路线等同起来的逻辑推论之外，还有大量的具体论述被用以说明批右是正确的。《文汇报》在一篇题为《“四人帮”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文章中，列举了许多被称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东西：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干部，妄图把中国共产党蜕化变质为法西斯组织，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法西斯的专政，骨子里崇洋媚外（尽管表面上持排外的强硬路线），代表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并且时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14]

但到1976年11月上旬，对“四人帮”在各条战线上的余毒的批判，特别是在有关生产和经济发展方面，开始把那些明显的“左”的错误作为批判的重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批判。但是，当时却认为这些“左”的错误恰恰正好说明“四人帮”是一伙不折不扣的极右分子。例如，“四人帮”被指责用阶级斗争来冲击生产，是歪曲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之间有机的辩证关系的表现。“四人帮”还被指责为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来作为反对老干部、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的武器。[15]

然而，“四人帮”在革命和生产关系上这一极左做法的表现，并不是主要的，认清他们的“主观动机”和所希望达到的“最终目标”，才是理解他们政治路线的真正性质的关键所在。认清这样一点——“四人帮”长期处心积虑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其目的是为

了轻而易举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主观动机)，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最终目标)——是很重要的。当时据称正是由于这些“事实”才决定了“四人帮”的路线实质是极右，而极左的一套只是他们用以加速实现其极右目的的一种策略。

1976年出版的一期《红期》杂志上，有一篇关于批判“四人帮”破坏中国现代化的长文，反映了上述对“四人帮”路线的性质的看法。该文似乎一开头就论述了“四人帮”在处理生产问题上的“左”的一套，指出：“‘四人帮’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时，把破坏生产作为其反革命的主要手段……他们阴谋把社会主义的正常生产秩序搞乱，以便乘火打劫，乱中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罪魁祸首，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仍然正在走的走资派……我们必须彻底剥下他们的伪装，使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极右实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16)

该文分析“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的流毒时，也同样认为极左仅仅只是表面，而极右才是问题的本质。例如，张春桥曾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行全面专政”，(17)并指出要把教育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反动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教育制度的质量。这些做法看上去似乎陷入极左的圈子，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张春桥叫嚷‘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宣扬取消智育，鼓吹‘读书无用论’，实质是极右的……(因为)他不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学习到必需的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这怎么能够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势呢？由此可见，他大谈特谈的所谓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云云，除了说是别有用心之外，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18)这类论述都是企图说明极左就是真正的极右，这种情况的本身，就表明了批判“四人帮”的初期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样的文化大

革命框架内进行的。在这一框架内，存在的似乎只能是革命左派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而决不可能有任何来自极左路线方面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损害。

到1976年底，对“四人帮”的历史和生活的抨击，使“四人帮”是极右派的说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场抨击正是从这样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对他们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另一方面是对他们长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进行了详尽的披露。批判文章揭露了江青热衷进口货，王洪文坚持要从海南岛空运新鲜红虾以饱其口福，以及“四人帮”私自放映外国片和色情片并挥霍国家财产以供其享受作乐。〔19〕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证明其生活腐朽的事实。

对“四人帮”老底的揭露，则更加重要和具体，并进一步加强了“四人帮”的实质是真正的极右派的说法。对“四人帮”历史经历的揭发，是从1976年11月随着对张春桥的政治历史大量详尽的批判而开始的。对张春桥的主要指控，是他在三十年代曾经主张向日本人和国民党投降。不利于张春桥的当时的各种证据，现在都找出来了，其中有1936年鲁迅对他主张不要抵抗日本人的观点的批判（当时的张春桥只是党的一个年轻的宣传干部，化名狄克）。〔20〕1938年，张春桥还写了一篇文章，文中鼓吹抗日“统一指挥”，而当时蒋介石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根本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消灭共产党，从而使得该文被指责为主张向国民党投降。《人民日报》指出：“读一读这篇文章，很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眼界，进一步看清张春桥这个惯于伪装‘左派’，摇唇鼓舌，欺世盗名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说明他早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右派。”〔21〕

在此后几个月里，又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文章，详细揭露了江青和国民党的勾结情况，姚文元的地主阶级出身及其在五十年代和一小撮反党文人的联系，以及王洪文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堕落等，〔22〕这些指责为把“四人帮”的政治路线性质定为极右提供了基础，从

而表明了"四人帮"所以为极右，是与其为一伙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分不开的。

华国锋在1976年12月下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曾对"四人帮"的路线性质下过一个简单的结论。但1979年以后，他的这一整套观点都被批评为一开始就转移了对"四人帮"的批判方向，并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但是，现在回顾他的这一讲话是很有意思的，他当时用一种直率的语气谴责"四人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23〕

在指出"四人帮"伪装成左派和革命者以便欺骗人民和易于实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之后，华国锋列举了十二条理由，说明了为什么"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右派（后来广泛公布为"十二个为什么？"），然后再次有力指出："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24〕

"十二个为什么"和"他们右得不能再右了"的评语，很快就成为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指导原则，〔25〕两报一刊联合社论把华国锋的讲话全文称为是指导批判"四人帮"运动的纲领性文件。〔26〕

1977年2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假左派、真右派》的文章，该文着重指出，张春桥拉帮结派和搞阴谋活动，正是"四人帮"的政治路线一个最重要的特征。〔27〕该文在详细论证了华国锋所提出的"四人帮""右得不能再右了"的论点之后，还指出"这个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作出的科学结论揭示了'四人帮'的反动本质，剥掉了他们的伪装，还了这伙极右派以本来的面目"。〔28〕

此后，该文仿佛是针对"某些"仍然倾向于相信"四人帮"是左派或强调"四人帮"属于极左问题的"同志"，强调性地质问道："哪有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左'派，哪有这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派？！"〔29〕

通过对"四人帮"的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制止。"文革"期间，工人和学生的纪律涣散，被认为是"四人帮"政治路线的一个明显后果，甚至在"四人帮"下台后，这个路线仍在一段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据称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但是，"四人帮"却把它篡改为全面取消对工人和学生行为的一切限制，从而在工厂和学校里，在向"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造反的口号下，促进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其说是表现了一种极左的态度，毋宁说是广泛的夺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一位评论员指出："'四人帮'是不是真的要实现什么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呢？否！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要无产阶级的政府，只要资产阶级的政府。别看他们整天高喊反对'资产阶级的管、卡、压'，煽动无政府主义，一旦他们夺权到手，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那时他们就是有政府主义了……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为了乱中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这是他们的口号背后的极右实质。"〔30〕

为了说明"四人帮"的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极左的策略，这段时间的批判文章，甚至把马克思的老对手巴枯宁也拿出来作为例证，认为他正是一个非常类似"四人帮"的极右派。文章认为巴枯宁代表着一条有争议的路线，也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当他被沙皇政府逮捕后即背叛了革命。之后，又钻进了无产阶级队伍以推行他的反革命计划，并且组织了一个小集团，企图篡夺共产国际的权力，他也曾采取煽动无政府主义以标榜自己非常革命的手法，来掩盖其极右性质。〔31〕巴枯宁的这些情况，都同样适合对"四人帮"的评价："通过把第一国际的阴谋家巴枯宁所纠合的反革命阴谋小

集团的行为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相比较，人们可以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有了一个更为清楚的理解。”〔32〕但换句话说，巴枯宁和“四人帮”以及其他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似乎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领袖们，就其只是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和极端革命的手法，以便制造一种有可能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夺取权力的条件这点而论，确实也可以说是一伙极右分子。

在粉碎“四人帮”的初期，报纸要求人们对他们的反动行为的批判，都必须集中在对其极右实质的揭露上面，而不能因其次要的极左手法而转移，这样的情况不禁令人追溯起1957—1958年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六十年代中期开展的对党内“走资派”的长期政治迫害，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运动，以及对邓小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决定”的批判情况等等，而这些情况带来的后果，就正是由于严格划定了人们的思维“禁区”，从而才导致了对领导层内“左”的偏差造成的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作出什么严肃的思考。

在1975年到1976年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作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和建议，为此，邓受到了“四人帮”的攻击。〔33〕“四人帮”把这些文件污蔑为“三大毒草”，并以此作为证据，攻击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34〕1977年7月，为替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报刊开始登载有关对“四人帮”的上述污蔑进行驳斥的文章。文章认为邓小平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是修正主义，并且还指出，真正使“四人帮”对此感到紧张的，并非仅仅是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本身，而是这些建议还包含了一种对激进政策的尖锐批评。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1973年8月党的十大以来的这种激进政策，已极大妨碍了中国向现代化发展所做的努力。这种批评“在他们这些‘太岁’头上动了土，揭了他们的疮疤，戳了他们的痛处。”〔35〕

在“四人帮”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极左一词尚未成为一个

普遍使用的政治术语。只是到“四人帮”垮台后，通过对其错误路线与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的攻击进行批判时，极左这一提法才开始流行开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仍然很明显地指那些与邓小平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具体的错误。例如，对无政府主义的否定，是和赞成规章制度与有效的企业管理，以保证劳动纪律和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反对在国家的发展中过份夸大自力更生原则，是和重新肯定必要的外国技术的引进联系在一起的；对分配和工资政策中的平均主义的否定，是和要求增加物质刺激，更严格地遵守按劳分配原则联系在一起的。〔36〕

然而，在揭露“四人帮”攻击邓小平的现代化建设时，若仍然毫无疑义地将“四人帮”视作极右分子，则就将出现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因为从推理看，“四人帮”认为邓小平的计划是一个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蓝图。但如果“四人帮”自己正是打算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分子的话，他们所指责的这一计划，不正和他们的目标不谋而合吗？这种为什么的情况并未得到解释。

在1977年8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就“四人帮”的情况作了一次详尽的报告。〔37〕在这个报告中，他正式给这场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冠以“党内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名称，并且把粉碎“四人帮”欢呼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38〕华国锋一再指出“四人帮”奉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并强调认为他们可疑的经历，是分析其路线的基本实质的关键所在，“‘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39〕

华国锋还曾发出过号召，要求“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

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40〕不到两个月，在庆祝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一家大报在其社论中要求正式发起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第一战役是集中批判“四人帮”阴谋夺权，第二战役是〔41〕集中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的罪恶历史”，〔42〕第三战役明确要求揭露“四人帮”的极右实质。然而，随着批判的逐步深入，到1977年10月中旬，对“四人帮”的批判已开始更直接地面临与极左思潮有关的问题了。事实上，这时的重点已开始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第二阶段：剥去“左”的伪装

需要清除“四人帮”在“政治、经济、思想意识、文化、军事以及党务上的流毒和影响”，是华国锋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随后两报一刊联合社论中强调的一个主要观点，〔43〕并认为这种“流毒和影响”正是“四人帮”极右路线在各个领域中的一种表现。由于后来认为这种表现是以极左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实际上很清楚，这种“流毒和影响”就是指“极左的影响”。“流毒和影响”的提法并非第一次，早在一开始批判“四人帮”时就已出现了。这一事实本身，也可以表明极左思潮至少作为一个次要问题从一开始就已存在了。〔44〕然而，到1977年最后三个月内，注意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斗争已日益加强，到1978年初期已成为批判“四人帮”的主要目标了。与此同时，揭露他们的极右路线，都逐渐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

《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4日有一篇文章，明确表明了这一重要的转变。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彻底剥掉“四人帮”的假左派的伪装》，认为“四人帮”虽然是“反动的、腐朽的极右分子”，但也迫切“需要注意他们假左派的伪装的一面”。〔45〕该文提起毛泽

东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一贯警告：“毛主席多次谈到了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和正确路线，我们必须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右也反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过程中，毛主席也多次反对‘左’倾的错误，并批评了‘左’比右好的观点”。〔46〕

文章认为“四人帮”的阶级根源和主观动机以及他们的政治路线所导致的结果，决定了右的实质比其“假左派”的表现更为重要。但是该文指出：“四人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们能够利用党内和社会上由于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存在的‘左’的情绪。因此，“孤立和揭露一小撮妄图利用部分群众中“左”的情绪，以左右群众的极右分子，并且认清左的情绪(整个社会上的)和‘四人帮’假左派之间的某种联系，是非常必要的。”〔47〕该文还继续指出：假左派力图使群众相信他们对各种革命口号的夸大和对文化大革命政策的激进的解释，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体现，并且由于群众和干部逐步相信了“诸如‘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之类的思想”，从而使这种极端主义反过来又在群众中滋生了一种普遍的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并无情地将他们政治上思想上的对立派攻击为社会主义的敌人。〔48〕

该文提出的另一有意思的观点，是要求必须弄清为什么“四人帮”在1971年到1973年期间阻挠对林彪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问题。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为了保护自己而“禁止反左”的阴谋计划：“‘四人帮’袭用林彪假左派的老谱，却比林彪伪装得更为巧妙……在制造反革命的奇谈怪论上面，确实超过了林彪，因此他们的假左派的伪装，更带有‘理论’色彩，他们不去揭露和批判林彪，用假左手法来推行极右路线，谁要批判林彪的假左，他们就诬蔑别人是否定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49〕

官方对“四人帮”的评论一开始是针对其极右阴谋的，但此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注意到“左”的偏差。这一变化刚出现

后不久，《人民日报》12月12日又刊登了一篇有关“四人帮”的文章。该文给“四人帮”的路线冠以“假左真右”的权威说法。[50]认为“四人帮”虽然就最终政治目的和阶级根源来说仍是极右分子，但通过分析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不难看出，对他们的“‘左派’的伪装”应予以集中揭露。第一阶段的批判虽也曾提到过“四人帮”施放“左”的烟幕以掩盖其反革命活动，但却多少忽略了“四人帮”的“左”的策略，而这对弄清他们的错误路线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关键问题。这样，到1977年底，批判的重点就开始有所改变了，揭露“四人帮”“假左派”的一面得到了允许。从他们垮台之后，这时才开始对他们的极左思潮进行了一些直接批判。

上述文章指出，“四人帮”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左’的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修正主义的实质正是要修正这一观点。象刘少奇一类的右的修正主义分子，是通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来调和马克思主义的，而象“四人帮”一类的“‘左’的修正主义分子”使用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手法。“这类修正主义更狡猾，更有欺骗性，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表现为否定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孤立地抽出阶级斗争这个口号，从‘左’的方面加以夸大，歪曲和篡改。”[51]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来说，这种来自“左”的方面的进攻，具有和右的方面同样的影响，“四人帮”利用夸大阶级斗争来破坏生产和瓦解政治联盟，其后果是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削弱了无产阶级。

到1977年12月之后，在分析“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时，重新规定了极左和极右一样，都应是批判的主要问题。虽然这一规定在逻辑上显得不合情理，但却在“四人帮”垮台后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用以解释“四人帮”极右的阶级根源和阴谋活动，以及复

辟目标的理论框架。而正是在这一框架内，这些情况从未成为批判的重要问题。因此，这就表明，对“四人帮”右的实质的批判，如果不和它的“左”的现实活动联系，则只是一种“抽象的和务虚的”批判。因此，对“四人帮”的性质必须重新作出分析：“假象也是本质的反映，尽管是颠倒的反映。抛弃了假象，也就等于抛弃了认识本质的向导。真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一定要把批假左表现和批极右实质联系起来，通过揭破伪装，达到认清实质；假左画皮剥得越彻底，极右实质就暴露的越充分。”(52)

虽然这时批判的大方向仍然把“四人帮”的政治路线规定为一种极右实质，但却已预示了在向合理地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现象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从此，对“四人帮”的批判，逐渐更多地集中在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上面。这种说法现在已很明显，就是指“四人帮”的路线具有一种“假左”的特点：“对于他们在这些‘革命’词句、‘左派’伪装后面干的那些反革命阴谋活动，当然要揭深批透；而对于这些词句和伪装本身，也决不能轻易放过，同样要揭深批透，因为这是‘四人帮’长期以来当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的，是我们许多同志曾经当作正确路线而受到迷惑的，在人民群众中流毒最深、影响最广、破坏最大、束缚最紧的大半是这些东西。”(53)

最初在批判“四人帮”这一转变时期的批判内容中，常常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例如，对“四人帮”在农村政策上的流毒，象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副业生产上的严格限制等情况的批判，(54)是伴随着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55)进行“一批二打”而进行的。在整个这段发生转变的时期，在给“四人帮”的政治路线定性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虽然1978年春天时最普遍的是定为“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56)但在许多报告中，仍然提为“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57)还有的则不提“左”或“右”，一概简单批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58)在

这场语义相当含糊的批判中，即使批判的主要靶子是“四人帮”的极左“流毒”，但其错误路线的基本实质显然是仍被当作极右来分析的。

总而言之，极左思潮这时已看成是“四人帮”的一个策略问题。例如，华国锋在1977年8月的讲话中，尽管指出了“四人帮”“实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路线”，但是有一篇文章还是断言“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四人帮’的阴谋手段更‘左’的了”。(59)另一片文章则宣称“‘四人帮’的‘左’倾非同一般，他们的‘左’，‘左’得出奇，‘左’得可怕，‘左’得可恶，‘左’得可恨，故非加一个‘极’字不能符其实”。(60) 但是该文在相当详尽地论述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潮的具体内容以后，仍得出给论，认为这些都确实只是为达到其极右目的而实施的一种策略：“其险恶用心，是要搞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老干部，搞垮我们的党，搞垮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搞垮我们的军队，搞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搞乱我们的思想、政策和队伍，搞光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其最终目的，是篡党夺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61)

一篇有关“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的“流毒”的文章指出，“四人帮”妄图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永远处于愚昧状态，以便让他们肆无忌惮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62) 由于“四人帮”的“左派路线”被认为是一种“伪装的”或“假左派路线”，因此，对他们在具体政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路线性质的各种分析，都只能归为这样的说法，即他们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决定了他们的本质只能是极右。

1977年底到1978年中这段时间里的大量分析，已相当详尽地表明，极左思潮有三种存在形式，而“四人帮”是其中最坏的一种，即“假左路线”，而另外两种在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渴望迅速取得革命成功的急性病的反映。这种急性病类型的极左思

潮，导致了“思想超过革命的发展阶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问题上过火”。〔63〕这种类型的极左分子“尽管也危害了革命，但他主观上还是要革命的”。〔64〕这种较为普遍的极左思潮，还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左的倾向”，通常仅仅涉及“工作作风上的一些错误”；〔65〕另一种则是“‘左’倾机会主义”，通常是指比“左的倾向”要严重的一种不切实际的错误，它常常是在“左”的倾向自由泛滥时产生，并将之形成一条包括“制度、政策以及纲领”的完整的政治路线。〔66〕虽然犯“左的倾向”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在“主观上都仍然是要革命的”，〔67〕但前者通常可以作为“革命队伍内部的一种错误倾向”的反映，而后者往往会身不由己地陷入路线斗争中去。〔68〕

“假左”虽然也涉及到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但与“左倾机会主义”不同，“假左派”甚至在主观上也是反革命的，他们——四人帮——的动机就是要搞阴谋诡计，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是一伙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妄图开历史倒车，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现实倒退到资本主义黑暗深渊的反动派。他们的‘左’，决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也不是什么左倾机会主义，而是一种反革命的‘左派’伪装和阴险毒辣的阴谋手段”。〔69〕

“四人帮”政治路线的目的就在于要消耗社会主义的财富，……使整个民族陷于愚昧。〔70〕他们的极左思潮仅仅是“他们极右路线的一种现象和达到其极右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71〕因此，他们的这种“假左路线”同上述两种受到较为宽容对待的极左思潮类型相比，必然是不能划同一等号的：“他们不是冒进的问题，而是要在中国扭转历史的车轮，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中去。”〔72〕

尽管“假左”的整个提法，后来在彻底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时被当成一种障碍受到了批判，但在1977年到1978年间，党内对

几种不同类型的极左思潮的提法上的区别，反映了领导层在分析"四人帮"错误路线时存在着深刻的分岐。

这几种不同的提法反映了不同的认识，其中包括了一种可以称为"蜕变论"的观点，此观点认为，较为温和的形式的极左思潮可能更为危险，因为微小的"左"的倾向，可能不易为人们所警觉，如果在早期不予以纠正，则将"蜕变"为"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路线；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政治野心一旦膨胀起来，超过其革命的主观愿望时，其"左倾机会主义"就可能成为一种"假左路线"。《解放日报》对这种蜕变过程作了如下描述："……绝大多数犯了'左'倾错误的人，通过教育以后，能够彻底认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条件，能够改正错误。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有些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开始犯了这种错误，此后，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毒害下，继续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73)

区分几种不同类型的极左思潮的结果和上述蜕变论观点的产生，为在1979年更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问题打下了基础。然而，重要的是必须是注意到，这种区分的一个根本意图，是想把"假左真右"(或"假左")合法地作为对"四人帮"政治路线的批判的一个基本概念。

第三阶段：对极左思潮的正面进攻

随着反对"四人帮"运动的日益深入，以"假左"作为对"四人帮"政治路线基本性质的分析定论逐渐遭到了否定。官方开始主张把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同对他们个人历史、阴谋活动及政治野心的揭露区别开来，这一重要区别是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74)尽管全会公报没有给作为林彪、"四人帮"阴谋活动的基础的政治路线性质定调(林彪和"四人帮"从

1978年初即已作为批判目标被联系在一起)，但公报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认为这应是新时期基本政治方针的标志。[75]这些口号成为对毛泽东的遗产和毛泽东之后领导阶层日益强化的集权的经济政策进行重新评价的标准，并由此激发了从理论上再次重新评论有关林彪和“四人帮”的政治路线实质的全部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批判极左思潮的新时期，竟是以(在三中全会上发出的号召)立即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一口号为前导的。[76]在号召停止对林彪、‘四人帮”进行群众性批判和随后而来的深入批判其极左路线这两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着几种显而易见的矛盾的解释。

一方面问题很明朗，对建国以来的极左倾向是否要进行更彻底的分析和纠正的问题，党内存在着某些意见分歧。“凡是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和“实践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间斗争的有关迹象表明，批判极左思潮必定会成为全会争论的焦点。双方都意识到，这一批判将不可避免地对他们各自的政治地位产生重要的影响，三中全会正是这两派之间进行斗争的紧要关头。从三中全会宣布结束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性批判运动，到1979年初对极左思潮再次开展强有力的批判，这段间隔，恰恰反映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党内“实践派”的优势正在不断扩展，在宣传机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77]

而另一方面，宣布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性批判阶段的结束，也可能是有意识地为下一步直接对极左思潮发起进攻做好准备。批判“四人帮”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把重点主要放在调查和深挖同谋者、追随者以及各个阶层的帮派分子上面，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殊情况，是和“四人帮”倒台后第一年里全国范围的群众性揭批运动相

一致的。通过宣布这场斗争的群众性揭批运动阶段的结束，领导阶层将可能试图使带有个人色彩的复仇和攻击合法化，并用更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的批判取而代之。于是，1978年底到1979年初，在宣布批判“四人帮”群众运动胜利结束的同时，各种宣传工具还声称“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的清查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78]有的文章在欢呼群众性揭批运动胜利结束的同时，还指出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砸碎他们造成的精神枷锁，仍是一个长期的必要的斗争过程。该文还认为“今后的揭批运动，应同党在新长征中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现实思想紧密联系起来”。[79]从这点来看，对批判“四人帮”的方向问题所作的调整，以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应当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提法是一致的。[80]

1979年7月底，《光明日报》指出，假左并不是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科学概括。[81]这样，有关“假左路线”的提法能否作为对这种错误政治倾向的实质的一种确定分析，就成了疑问。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内，通过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极左思潮最全面、最彻底的分析过程，使林彪、“四人帮”政治路线的实质得到了重新确认。

1979年7月底以后，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这时对林彪、“四人帮”路线的特定提法有了改变，但在批判极左思潮中，一些最重要的提法却几乎没有多大变动。这个时期的批判还认为，从1977年12月持续到1978年12月的有关“假左”的讨论，是批判林彪和“四人帮”的一个突破口，因为这场讨论确实具有新意，并有助于打破以往只许批右不许批左的清规戒律。[82]与此同时，这场讨论对“假左真右”的提法也有分歧意见，认为这种提法混淆了林彪、“四人帮”的具体政治纲领中的最主要内容，因而将有碍于全面地科学地批判“左”倾机会主义。同时，

还认为这种提法很不恰当地暗示了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造成的社会大破坏，主要是由于这条路线的“真右”性质而不是其“假左”的表现：“在给林彪‘四人帮’路线的定性上，使用‘假左’容易使人觉得：一、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没有‘左’倾机会主义的东西；二、还存在着一个很革命很正确的‘真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三、林彪、‘四人帮’的路线，不是因为‘左’不好，而是因为‘假’不好；四、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没有‘左’倾，只有右倾。”〔83〕假左派提法的另一种弊病，在于它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即“左”的错误并没有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为犯这些错误的人，在主观上都是想“真心实意”干革命的。但对极左思潮展开的新的批判，是以这样一种论点为基础的，即个人的主观愿望并不能作为对政治路线进行分类和定性的可靠标准。

原先制定的区分“‘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假左派”的一条界线，是指前者仍有“干革命的愿望”，后者则尽管披着极左的外衣，但实际上却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批评和纠正个人错误时看其主观动机如何是很重要的，但现在也有人指出，持有截然不同的动机的人不仅有可能，而且也确实能推行同样的政治路线，这是一个不容遮掩的事实。无论个人的动机如何，他所推行的路线的实质及其影响并不能因此而受到改变，正如一篇文章所评论的那样：“当仓库起火时，不管是坏人纵火还是自己同志失火，这漫天大火就是火。”〔84〕

然而，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分析：用“假左真右”来描述林彪、“四人帮”的路线，主要根据以下推断，即极右分子的复辟目的和政治阴谋活动是在“左”的外衣下进行的，因此可以推论，即使他们可能具有右派的动机并进行右派活动，但他们的政治路线并不一定必然就是极右的：“路线的对错‘左’右，和路线的提出者与执行者的主观动机并无必然的联系，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固然要推行错误路线，而真诚的

革命者何尝不会推行错误路线？……真诚的革命者的动机并不能保证路线正确，恶意的反革命者的动机也不一定只搞右倾机会主义，而不搞‘左’倾机会主义。因此，决不应该从动机上判断路线的对错‘左’右。”[35]同不能用主观愿望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来作为判断“‘左’倾机会主义”和“假左”的依据一样，也不能因为极右目的或“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客观存在，就把其“左”倾错误的实质也定成极右。有一篇文章精辟地概括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路线是‘左’的，就是‘左’，如果路线是右的，就是右。”[86]

早期在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实质看成是极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他们的这种“假左派”的政策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为资产阶级东山再起和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思潮所导致的后果，就使得他们这条路线实质上相当于极右路线。[87]但这种推论在1979年早期就被明确否定了。“既然把‘左’的机会主义者的路线同样推断为旨在阻扰革命，那为什么就不能把这种‘左’视为本质上的‘左’呢？否则就将路线本身和路线造成的相反结果相混淆了。事实上，同不管是大火或是山洪都能把村庄毁灭的道理一样，无论从‘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都有可能将革命摧毁”。[88]如果继续沿着上述这种荒谬的推断冥思苦想，并设法为此寻找理由的话，就会促使人们相信“左”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比右的错误要好的谬论，从而有碍于近几年来对极左倾向的纠正。“毁坏革命，可以用右的方式，也可以用‘左’的方式，如同毁掉一个村庄，可以用大火烧、也可以用洪水冲一样，人们决不能把大火烧毁村庄的罪过，推到洪水的头上，因此也决不应该把‘左’的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恶果记到右的路线的帐上。如果坚持‘左’的即便毁了革命也还要归罪于右的说法，不但在道理上说不通，而且不能证明‘左’比右好，只能助长人们宁‘左’勿右。这无异于人们保护村庄，只需防洪、不用防火，在路线斗争中只需防右反右，

不需防‘左’反‘左’。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必然会给‘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可乘之机。”[89]

总而言之，“假左真右”和“假左”的提法作为思想意识上的批判模式，已经遭到了否定，同时，把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作为区分“左”倾或右倾的正确标准的做法，也遭到了否定。更确切地说，对任何一条路线进行分析的唯一标准，只能是“这条路线用以指导人们行动的口号、原则、体系”中表现出来的客观内容。[90]对“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绝不应该加以折衷揉合，因为他们的“政治纲领、要求、方法、策略”都是截然相反的。[91]这种客观内容上的不同，应作为对路线进行分析的决定因素，并要和着重强调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政策结合起来：“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来判别林彪、‘四人帮’路线的归属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根据林彪、‘四人帮’已经实施，即对革命事业已经发生恶劣影响的那些东西，看看他们实际推行的那一条路线是‘超过客观实际’（左的错误）还是‘落后’（右的错误）于客观实际。”[92]

有篇文章在反对把林彪、“四人帮”路线性质归于极右的时候，还深有感触地指出了十年浩劫的危害之大，以至于一开始竟不能对极左思潮进行直接的批判。这种说法实际已含蓄地批评了华国锋，尽管该文没有点名，但却点到了华国锋早先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关“四人帮”路线性质的那些众所周知的提法，该文写道：“由于我们的思想受了长期的禁锢，不能很快解放，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时候，仍然沿用了‘极右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等等提法。[93]

根据批判的客观内容的标准来看，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路线在1979年1月时即被称为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94]但时隔不久，这一提法很快就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左路线”这一看来似乎更大的罪名所代替。[95]此后，这一新的提

法，在二月份又被简称为“极左的政治路线”。与此同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一措词不再用来描述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了。[96] 这些专用名词的变化看来似乎是微小的，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些名称上的变化，为进一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1979年到1980年间涉及到批判极左思潮时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1979年2月初，《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评论了在早期批判“四人帮”时的一些提法问题，认为当时把“四人帮”的路线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提法把路线上的正确与错误同政治上的革命或反革命混为一谈了，从而会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97] 这种区分很快就被正式提出了。人们认为，反革命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敌人和人民)之间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手段来解决。而党内的路线斗争是一个区分“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这应当通过党内斗争来解决，即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是用对付敌人和反革命的方法来解决。[98] 主要因为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从文化革命延续迄今，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仍被混为一谈，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和混乱”。[99]

就林彪和“四人帮”而言，他们的路线问题及其反革命活动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00]他们确实是推行极左路线的反革命。然而，如不能对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问题作出足够的区分，就有可能给我们造成进一步的混乱：“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林彪、‘四人帮’在党内公开地全面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然而，我们和他们的斗争并不仅仅限于政治路线的问题，而且还具有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性质，这种双重性质使得斗争十分复杂尖锐。尽管如此，这两种斗争还是能够而且应当加以区别。”[101]

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林彪、“四人帮”是假左派，真右派，当然

完全正确；如果说他们的路线是“假左真右”，就不那么准确、妥当了。在列出一种政治派别时，应该适当考虑派别成员的主观愿望和牵涉到个人阴谋活动的情况。因此，在确定“假左真右”的合理运用范围时，《人民日报》写道：“只有在一种意义上，即只有在政治派别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只有用它来概括林彪、‘四人帮’这个反动的政治派别的性质才是合理的，科学的。因为，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反革命派，右派。为了掩盖自己欺骗别人，他们往往以‘最革命’、‘最最最革命’的面目出现，因此看上去象‘左’派但实际上是右派，即假左派，真右派。这就是说，用‘假左真右’来概括他们的政治面目，是恰当的……，超出这个范围，用于任何别的方面，特别是用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完全不合理的。”〔102〕

路线和派别之间的这种交叉关系，意味着党内的路线斗争还包括非对抗性矛盾的一面。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是通过从整顿、团结目的出发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程来解决的。另一方面，政治派别的斗争反映了“人民和敌人”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因此，对错误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应当和仅仅在政治上利用这种路线的反革命集团成员区别对待。《人民日报》在提出对这些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的同志要相对宽大处理时，还指出，“迷惑于这条路线的，执行这条路线的，除‘四人帮’以外，还大有人在”。评论进一步指出“他们并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他们是一些犯路线错误的人……，我们如果说，他们推行的路线容易为反革命利用是恰当的，如果说他们推行这条路线的活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则未免过分”。〔103〕

尽管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被认为是二十多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危害的根源，但是种种迹象有力地表明，真正导致1976年10月最后摊牌的原因，是他们围绕毛泽东、周恩来续承人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派别活动，而不是他们的极左路线本身。在路线和派别之间问题上的划分不同，是“蜕变论”延伸的一种表

现，而蜕变论正是把林彪、"四人帮"定性为"假左真右"的一个主要推论方法。根据这种说法，一旦极左路线的成员的政治野心超过其革命热情时，蜕变就开始了。1979年至1980年间对林彪、"四人帮"问题的评论，表明在这一动乱时期，路线斗争和派别斗争相互纠缠，使得有关各种矛盾不断升级。这种混乱局面可能是由来自两方面的蜕变所引起的，例如，和林彪的斗争就经历了一个"整个说来，属于党内路线问题"的发展过程。虽然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是从他们的政治军事生涯的早期观点中发展而来的，但他"利用那条貌似革命的路线来为他的反党野心服务，后来发展成赤裸裸的反革命"。〔104〕在他成为反革命以后，其极左路线方面的问题，仅仅是他与党和人民的矛盾的次要方面，《人民日报》曾指出："……当林彪已暴露其反革命面目，成为赤裸裸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之后，如果还把这些当作路线问题，还来讨论他的《571工程纪要》和妄图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是属于'左'的路线还是属于右的路线，那不是有意把水搅浑，就是十足的糊涂虫。"〔105〕

"四人帮"推行了一条与林彪一样的极左路线，"但情况有所不同"。"四人帮"是一伙叛徒、内奸和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从一开始推行的极左路线，他们就在按照自己危害党、篡夺党的领导权的反革命愿望行事。〔106〕因为他们的极左路线更为极端，更为系统，因此，反革命本性就比林彪掩盖得更深，隐蔽得更巧妙。然而，在分析"四人帮"的问题并肃清其流毒时，我们仍然决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本性问题同极左的政治路线等同看待。"如果把他们这条在党内横行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并迷惑了许多人的路线看轻了，或者看简单了（例如，认为他们没有'理论'，只简单地骂它一句'反革命'了事等），那将等于保护这路线，使它将来还有可能复活起来危害人民"。〔107〕

在林彪问题上，路线和派别活动联系起来的过程，是一个从极左逐步发展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的过程。而在"四人帮"问题

上，这种过程正好颠倒过来。这种截然不同的区别意味着，在同样都涉及极左政治路线和反革命活动的这两个问题中，就其结果而言，没有客观上的区别，但就发展的早期阶段导致这两起事件发生矛盾的内在因素而言，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林彪事件中，矛盾的根源主要在于党的路线的原则的不同。而在"四人帮"事件中，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激烈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性质。换句话说，根据这种观点，林彪开始时确实是一个"真诚的"极左分子，仅是在后来被权欲冲昏了头脑。而"四人帮"从一开始就是阶级背景不清，政治历史不纯的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们阴险地利用政治生活中的极左思潮，来为其最终政治目的服务。

1979年到1980年期间，在对极左路线展开的更猛热批判的同时，并未否定对表现为宗派主义和阴谋活动的极右路线的批判，后者当时仍被认为是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号召"揭批'四人帮'利用极左路线实现其阴谋活动"的做法，[108]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和早先的公式化提法，诸如"我们越彻底撕下……（林彪、"四人帮"政治路线）'左'的伪装，我们就越能充分认识其极右实质"[109]或"撕下……他们假革命的面具，彻底认清他们的反动实质"[110]等等，没有什么不同。但是，1979年之后在评价林彪、"四人帮"事件孰"左"孰右问题上的争论，已经从问题的现象，非常明确地深入到了和政治思想观念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上去了。

林彪和"四人帮"都被认为是推行"假左真右"路线的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主张被认为是要使中国重新倒退到"封建法西斯专政的道路上去"。[111]他们企图通过推行建立在"冒牌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基础上的路线来达到这一个目的。[112]"这种冒牌社会主义"的实质之所以是极左的，其原因在于它不重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因素，而过份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作用，人们认为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最大的危害，就是有许多人"将假社会主义当成真社

会主义”。从而使得这些人在分析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不是抱着极左观点不放，就是把社会主义同物质匮乏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一种“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好”的情况[113]。

表一

“四人帮”：极左的政治路线　　极右的政治派别

分　类	“四人帮”的政治路线	作为政治派别的“四人帮”
本　质	极左（“左”倾机会主义）	极右（假左真右）
反映本质特征的因素	客观内容（口号、原则、政策、体制）	1.主观愿望（复辟资本主义） 2.政治行为（阴谋活动） 3.阶级出身和政治历史（地主、国民党等）
所涉及的关键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上的正确与否	革命与反革命
矛盾的类别	党内/非对抗性	敌我/对抗性
解决方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后　果	假社会主义	封建法西斯

把“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反革命政治派别加以分析的方法（见表一），对毛泽东以后的政策所造成的实际影响，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进行更详尽的讨论。这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一区别的做法本身不要引起误解，即以为在理论和批判的范围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含义，从而造成如果偏重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就会忽略对极左路线的彻底批判，纠正以往极左思潮的新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就将受到严重干扰。此外，搞不清路线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区

别，还必将傅大的揭袭"四人帮"的做法，将非对抗性的政治错误作为阶级斗争来对待。〔114〕在批判"四人帮"时，这种失误将是一种"对实际工作造成损害的理论上的错误"，并会给将来留下极左思潮复萌的可能性。〔115〕

怎样理解批判"四人帮"矛头的先后转变

为什么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极左路线的批判要涉及其所采取的方法问题？为什么一开始批判"四人帮"要竭力标明其路线为极右路线，继而又攻击其为"假左真右"，直至1979年7月——这时距"四人帮"倒台已有两年多以后，才开始直接批判"四人帮"为极左路线呢？

以下一个事实可以有助于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如同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运动中的情况一样，成为引起领导集团内部之间政治上争论的原因——虽然这种争论远未达到1971年到1973年间老一辈革命家和文革派之间的那种对抗性的、激热的甚至是无情的程度。但是，这场围绕批判极左路线的争论表现得更加隐讳的特点，使人联想到党的领导层内，可能对所批判的目标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的认识。而且，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领导层内靠抵制批判极左路线起家的势力，在"四人帮"垮台后，政治上的分裂和思想上的僵化都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因而难以再顽固地长期抵制彻底的反"左"运动了。

然而，反对"四人帮"运动的这种螺旋形发展的情况的形成，至少应部分归因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出现的派系斗争。〔116〕一方面，"实践派"一方通过对极左路线的全面进攻，已取得了全面优势，这一派以邓小平和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为首，因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而被人们称为"实践派"。但

这个口号是以一种并非真诚的态度从毛泽东语录中截取下来的，以这一口号作为醒目的大红标题，借以摒弃过去十年里的激进政策，并揭示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毛主义箴言的错误性。“实践派”由于宣称老干部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不公正牺牲品，并强调极左路线已使中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他们就能够利用对极左路线的批判，来作为使其政治权利和实用的现代化计划合法化的有力工具。

另一方面，另一个领导集团有充分理由来抵制对极左思潮的全面清算和全盘否定，特别是当这种做法涉及到对毛泽东的遗产进行重新评价的时候。这派因宣称要坚持在1977年2月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17〕的誓言，因而被其对手轻蔑地称为“凡是派”。毛主席长期以来的贴身警卫汪东兴，毛泽东死后在党内得到了很快的提升，而华国锋经过毛泽东的个人认可，身兼总理和党的主席二职，成为“凡是派”的关键人物。〔118〕正如派伊所指出的，“这派成员在逮捕‘四人帮’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决不会放弃四个现代化和重新恢复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的做法。”〔119〕尽管在“实践派”和“凡是派”之间存在着某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但全面批判极左路线，仍不能不对后者在文化革命后期和1976年危机四起的状态中权力上升的合法性构成威胁。而且这种批判对“凡是派”来说，因涉及到他们在1975年到1976年期间，批判邓小平和镇压天安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也和“凡是派”所坚持的毛泽东主义的方针政策产生了冲突。

1976年10月到1979年初，“凡是派”之所以处心积虑地要把“四人帮”的路线定为“极右路线”，其原因也可以通过他们企图避免把反“四人帮”的运动，转变为对极左路线的大规模批判而得到部分解释。“凡是派”对宣传工具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其处于

有利的地位，并由此来决定对“四人帮”的批判的范围与界线。然而，随着邓小平在1977年8月的正式复出，“实践派”逐渐迫使“凡是派”退居守势，并使他们对批判极左路线所持的反对意见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按照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提出的说法，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批判“四人帮”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全会“结束了1976年以来的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120]到了1979年，“凡是派”在领导层中遭到了进一步的孤立。1980年2月，“凡是派”的几个关键人物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成为伴随深入批判极左路线而来的整顿的牺牲品，被从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上撤了下来。[121]华国锋在政治上的失宠，也是始于这一时期。1980年9月，他被撤掉了总理一职，1981年6月，又被撤掉了党的主席一职，这两个职务分别被邓小平的人接任过去。在调整华国锋的职务时对他的一个主要指责，是认为他推行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需要较长时间来纠正错误。[122]

对“凡是派”和华国锋是否能够得上极左分子这一问题，还是有不同意见的。[123]然而，1979年到1980年间“凡是派”的下台和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在时间上的紧紧相联，使这二者之间看上去似乎更具有某种联系。况且，在反“四人帮”运动中，导致这种令人费解的情况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党内领导层的宗派主义所能解释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国，自1949年以来极左思潮一直影响着政局的发展。任何领导人无论他的立场或所属政治派别情况如何，面对着发动一场可能会启开装满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从而会威胁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潘朵拉魔盒的批“左”运动，都会踌躇再三的。因为这场批判将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甚至还有毛泽东的领导和意识形态等等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的一系列问题中去；同时，还必定会使毛泽东的权威受到挑战，并使党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受到影响。而且，在当时发动一场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乎都还显得准备不足。而与之相比的是，由于毛泽东近二十年来一直偏重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此批右则显得更加轻车熟路。因此，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对待批"左"问题一直是小心翼翼，因为这个问题具有难以捉摸的危险性。

最初之所以要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活动，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即一方面几乎要全面否定文化革命的具体纲领，另一方面又要显得并未急转直下地否定"革命传统"。[124]因为在"四人帮"刚垮台时，人们首先要求的是抛弃他们的路线以及文化革命的发展模式，不论其性质是极右，"假左真右"，还是极左，因此，新的领导人应该把对"四人帮"的分阶段的批判，作为逐渐展开对以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自居的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一种缓冲步骤，以免显得转弯过急。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对"四人帮"的批判，首先是揭露他们的极右实质和个人丑恶的历史，以便从政治上搞臭他们。然后，再深入地批判有关他们的极左路线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总之，在"四人帮"垮台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过程，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1976年底到1980年的这段时间里，对中国以往的正统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已逐渐触发了一场派别斗争。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正是这样一种挑战，从而对今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潜在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场批判也就必须谨慎地处理好一切有关的问题。

注 释

〔1〕《北京周报》1977第1期第33—34页。

〔2〕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1977.8.12)。

〔3〕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1977.11.5)

〔4〕奥尼亚特：《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被捕》。

〔5〕赖斯：《邓小平的第二次升降》；冯韦克：《中国的外贸政策和批邓运动》。

〔6〕《人民日报》(1976.10.13)

〔7〕〔8〕转引自新华社电讯稿(1976.10.21)

〔9〕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76.10.16)

〔10〕新华社电讯稿(1976.10.24)

〔11〕《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社论(1976.10.26)

〔12〕《文汇报》(1976.10.22)

〔13〕《人民日报》(1976.10.24)

〔14〕《文汇报》(1976.11.1)

〔15〕《人民日报》(1976.11.16)

〔16〕《红旗》1976年第12期；《人民日报》(1976.11.28)。

〔17〕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北京周报》1975年第14期。

〔18〕《光明日报》(1976.11.23)

〔19〕这一类消息通常都是从非正式的，但都很有效的大字报这类传播渠道捅出来的，法新社就曾根据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报道过江青如何侈奢地“试穿好衣服”。

〔20〕《人民日报》(1976.10.21)

〔21〕《人民日报》(1976.11.13)。张春桥在这里是被谴责为跟随王明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不是其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当“四人帮”被批判为极左性质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得到了强调。

〔22〕新华社电讯稿(1976.11.21)

〔23〕〔24〕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北京周报》1977年第1期。

〔25〕《北京周报》(1977年2月14日)

〔26〕《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社论　(1977.2.7)

〔27〕～〔29〕　《人民日报》(1977.2.6)

〔30〕《人民日报》(1977.2.17)

〔31〕〔32〕《新华日报》(1977.4.18)

〔33〕《新华日报》(1977.7.22)

〔34〕威新(译音)：《"四人帮"问题》(香港)第201—295页；戈德曼：《邓小平》第46—69页。

〔35〕〔36〕《人民日报》(1977.7.16)

〔37〕华国锋：《政治报告》，《北京周报》1977年第35期。

〔38〕同上，华国锋在这次报告中，宣称和"四人帮"的斗争是"党内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39〕同上，有关对华国锋的错误的评论，可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0〕同上。

〔41〕〔42〕《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社论(1977.10.6)

〔43〕华国锋：《政治报告》，同上。

〔44〕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指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各条战线上的流毒和影响。"《北京周报》1977年第一期。

〔45〕～〔49〕《人民日报》(1977.10.17)

〔50〕〔51〕《人民日报》(1977.12.15)

〔52〕《解放日报》(1978.1.20)

〔53〕同上，还可参见《解放日报》(1978.6.9)

〔54〕广西人民广播电台(1978.3.12)，《人民日报》(1978.4.20)

〔55〕《人民日报》(1978.1.12)，安徽人民广播电台(1978.6.9)

〔56〕《人民日报》(1978.3.24)

〔57〕《人民日报》(1978.3.18)

〔58〕华国锋：《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5.29)

〔59〕《人民日报》(1978.1.26)

〔60〕〔61〕《人民日报》(1978.6.28)

〔62〕新华社电讯稿(1978.3.16)

〔63〕〔64〕《人民日报》(1978.6.28)

〔65〕《人民日报》(1977.12.12)

〔66〕〔67〕《解放日报》(1978.2.23)

〔68〕〔69〕《人民日报》(1978.1.26)

〔70〕～〔72〕《人民日报》(1978.6.28)

〔73〕《解放日报》(1978.2.23)

〔74〕有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一些具体情况，可参见章新利(译音)：《批判极左思潮和毛以后的运动》。

〔75〕《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北京周报》1978年第52期第6～16页。

〔76〕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解放日报》(1978.12.12，1979.1.5)

〔77〕有关"凡是派"和"实践派"在三中全会上的斗争情况，可参见香港部分刊物上的一些资料，如《镜报》1979年第18期；《导向》1976第4期；《争鸣》1979年第16期。

〔78〕新华社电讯稿(1979.1.3)

〔79〕《人民日报》(1979.1.5)

〔80〕《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同上。

〔81〕～〔84〕《光明日报》(1979.1.23)

〔85〕〔86〕《人民日报》(1979.2.28)

〔87〕邹谠：《毛泽东思想》第525～526页。

〔88〕〔89〕《人民日报》(1979.1.23)

〔90〕《人民日报》(1979.2.28)

〔91〕《人民日报》(1979.2.16)

〔92〕《光明日报》(1979.1.23)。这里有关对"左"右倾错误的区别标准，系引自于毛泽东著作《实践论》。

〔93〕《人民日报》(1979.2.28)

〔94〕《光明日报》(1979.1.23)。这里在涉及到"左"倾倾向，"左"倾机会主义等词时，都在左的上面打上了"" 引号，以和真正的、革命的左，以及极左相区分。《光明日报》在197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对正确路线的一种歪曲，因而都是错误的，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

〔95〕《人民日报》(1979.1.26)

〔96〕《人民日报》(1979.2.16)

〔97〕《光明日报》(1979.2.16)

〔98〕～〔100〕《人民日报》(1979.2.16)。也可参见《红旗》1979年第3期该期一篇很长的文章指出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区别。

〔101〕《人民日报》(1979.2.28)

〔102〕同上，还可参见《光明日报》(1979.1.23)

〔103〕〔104〕《人民日报》(1979.2.16)

〔105〕同上，还可参见《人民日报》(1979.2.28)

〔106〕～〔108〕《人民日报》(1979.2.16)

〔109〕《解放日报》(1979.1.19)

〔110〕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1976.11.18)

〔111〕山东人民广播电台(1979.4.28)

〔112〕《人民日报》(1979.5.9)

〔113〕《解放日报》(1979.5.7)

〔114〕《人民日报》(1979.2.28)

〔115〕同上，还可参见《光明日报》(1979.1.23)

〔116〕同〔77〕

〔117〕《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社论(1977.2.7)

〔118〕张：《汪东兴的崛起》

〔119〕派伊：同上，第164页。

〔120〕《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北京周报》1980年第10期。

〔12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23〕同上，第23页。

〔124〕作为一种选择性的解释，可参见邹谠：同上，第526页。

7

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

> 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
> 恩格斯(1875)

在1971年至1973年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期间，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虽然中途夭折，但它也确实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就如第五章所论述的，党内领导层中的激进分子能在林彪死后防止对“文革”的恣意攻击；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林彪之死以及批“骗子”运动，确也提供了批判极左、向中国政治的时髦观念进行挑战的机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看，老一辈革命家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并希望调整主要政策，使注意力从激烈的阶级斗争转到现代化这一他们认为的紧要任务上来。七十年代初期，确也发生了一些具体变化，[1] 但调整政策的主要努力，却因1973至1975年间激进分子的政治指责而被葬送，这种情况

预示着文化大革命产生的许多政策正在东山再起。〔2〕

我曾描述了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在1971年至1973年间围绕着批判极左思潮所进行的斗争，这一斗争是1976年围绕周恩来与毛泽东继承人问题而发生的政治摊牌的一次"彩排"。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时期之间联系的是，在批"骗子"运动的批"左"阶段期间和在批判"四人帮"时所论及的问题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3〕这两个时期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不仅内容相似，而且在批判形形色色"左"倾倾向时的言词表达上，也常常具有相同之处。这些比较表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存在着意识形态冲突。同时，这些比较也证实了我们早先的观点：批"骗子"运动第一阶段的真正目标，是打击领导层中留下来的文革派，而不是对林彪的一种事后谴责。

回想起来，虽然批林运动和批判"四人帮"运动之间看起来有着很明显的联系，但直到1978年上半年，官方才把批判"四人帮"与批判林彪挂起钩来。而在那一时期之前，除了把他们看作是严重的路线斗争(在党的历史上分别为第十次和第十一次)的例子外，这两起事件是被分开来看待的，并都被喋喋不休地指责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4〕稍后一些时候，当批判"四人帮"运动的焦点从批判其极右性质转到批判其"形左实右"的政治路线时，才开始用"一丘之貉"、"臭味相投"、"在路线、思想及理论上都难以区分的集团"之类的词语，来描述林彪和"四人帮"。〔5〕把他们归并在一起，是邓小平及其"实践派"的追随者们努力扩大批判文革，巩固四个现代化理论基础的一部分，但却明显地受到了领导层中一些人("凡是派")的抵制，这些人愿意看到批判"四人帮"运动的焦点仅仅是对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而不是扩大成全面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6〕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凡是派"从政治上失势了。自此之后，宣传工具一致将批判林彪和批判"四人帮"联系了起来，并因此把他们看成是极

左路线的推行者。[7]

本章第一部分将着重讨论林彪死后以及"四人帮"垮台后的两次批"左"之间的主要联系。然后，将对林彪及"四人帮"极左路线在1976年后的发展，进行更多的实质性分析。

两次批判之间的主要联系

1971年至1973年批判极左时所提出的问题，从来没有从历史渊源或从对社会主义极左倾向的影响方面进行过系统分析。而且，那一时期的批判，只是偶尔对特定政策领域中及一些被指控的零星的理论错误中的"左"倾倾向进行了谴责。这种不连贯的特征，部分归因于批判中引起的全部问题在党内所产生的斗争，同时还反映了党无法对极左思潮进行有准备的细致的分析，因为当时党仍处于文革的反右理论这一关键的政治气氛影响下。虽然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在1976年的被清除以及"凡是派"在1978年至1980年的失势，使对极左思潮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成为可能，但这种深化的批判却显得色彩斑驳，其原因乃是前些时候肤浅的批判所致。而在农村发展、工业政策、科技、老干部及知识分子政策、革命和生产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在激荡的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正常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这种批左的浮浅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农村发展

中国在1970年至1971年间开展了一场强有力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约根·多梅斯认为，林彪力图在这面旗帜下复活许多大跃进的激进政策，他在这方面是个急先锋。大寨，这个位于山西省的模范大队，是文革号召在农村发展中要"政治挂帅"的缩影。[8] 林彪被指责积极推行了招致平均主义复活的农村政策，以及其他一些早在大跃进时期就受到了批判的"左"的东西。可是，在林彪死后，对农村

发展中"左"倾错误的批判同对"四人帮"关于农业发展的有关论调的批判之间，也存在一种同样明显的相似性。"刘少奇一类骗子"企图缩小生产队的权力，扩大生产大队和公社职权的政策，在后来受到批判，其理由是，虽然这种做法是想提高农村的社会化水平，但事实上，它们都导致了管理混乱、官僚主义及命令主义，其后果是忽视了生产效益，这就违反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从'左'的方面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9]

企图缩小生产队权力的这种做法，从四个方面对农村政策造成了影响。

1.计划　上级在农业生产计划中，不是鼓励把更多的资金投入最能影响实际生产的单位——生产队，而是集权过多。有个公社指出了这一问题："有的公社和大队干部遇事不注意和生产队干部及群众商量，布置生产活动往往要求行动一致，安排作物种植面积和推广外地良种，也不顾实际情况，强调整齐划一。"[10] 生产中的这种"方向盲目"的做法，被看作是大队和公社干部的"命令主义"的结果。这些干部认为生产队具有潜在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一种衰退的所有制形式，同时，他们还认为，只有敢于限制生产队的经济管理职权范围，才能防止这种资本主义倾向。但由于生产队了解当地情况，因此，打倒"四人帮"后，生产队安排其自身生产计划的权力再一次得到强有力的肯定，同时，极左谬论仍继续受到批判，这种谬论认为应在地方农业中实行更集中化的计划，中国农村应为这种计划提供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1]

2.分配　1971年1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与在调整大跃进过程中所发布的一部分决议在语气和内容上都非常相似。其主要原因是，由于1970年至1971年之间的"学大寨"运动，农村的分配出现了一些问题。[12]《指示》指出了这些问题，"有的公社是'分掉一切，吃掉一切'；有的公社生产虽然上升了，但社员的收入却没有增加；有的地方大

量透支，使正常的分配难以进行下去；有的地方借批'工分挂帅'为名，在按劳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所有这些做法，都损害了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3]《指示》再次强调了按劳分配的政策，并揭露了分配领域中的“左”倾倾向，指出：“在现阶段，必须注意克服平均主义。”[14]

一场宣传运动严厉谴责了平均主义对农业发展的有害影响，并颂扬了通过艰苦劳动“致富”的美德。这就提出了对“四人帮”在农村分配中的影响同样要进行了批判的问题。[15]同时，1979年重新颁布了1962年的公社《条例》（它是1971年关于分配问题的《指示》的基础），并把它看作是人民公社所有制管理方面问题的基本指导方针。[16]

3、核算　在对农村中的极左思潮进行批判时，哪家单位应负责财产核算的问题，是与分配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寨作为一个典型，是把大队作为核算和分配的单位；其他地方也在1970年至1971间仿效了大寨的这种做法。但由于对各自具体情况或群众的愿望没有予以一定的考虑，因此这种核算形式被指责为“过早地在今天实施了为未来所设计的政策”，并被指责为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因为它消弱了个人的劳动与报酬之间的联系。[17]在大队一级的核算体制下，指定作为个人分配收入的集体产品分成了其基础乃是比生产队核算体制下具有更大规模的农户劳动，而在一起参加分配过程的农民中，很少存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农民开始感到他们只是在为“其他人”而不是为他们自己及其家庭与近邻的利益劳动。因此虽然给以大队为基础的集体劳动（包括劳动力、劳动方法及物质资料）投入了大量资金，并有可能提高生产队的平均产量，但较富的生产队仍然对这种“拉平”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他们的贡献多而收入却太少了。农村核算中的这种极左倾向，被看作是导致农业生产严重衰退的原因，因为它被认为压抑了许多个体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四人帮”垮台后，不适应地扩大大队一级核算形式的做

法，已被指责为大寨这一典型(当时已受到批判)所引起的主要的农业错误之一。[18]

4.无偿调拨劳动力和物资　1971年《指示》还告诫上级部门(县，公社，大队)不要在没有征求意见或进行适当补偿时，就调拨生产队的资金或使用生产队的劳动力。[19] 1972年颁布的几个文件，批评了干部在征用生产队劳力参加大队或县的计划建设(如修筑道路、修筑水利)时违反了"等价交换"政策。这几个文件指出，无偿调拨劳力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促进集体经济，但它减少了生产队(并因此减少了农民个人)的收入，并将导致劳动热情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20] 1977年至1978年的"减轻生产队负担"运动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上级"任意调拨生产队的人力、物资和财政收入"，以保护生产队的利益。[21]

"骗子们"被指责在他们竭力"割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尾巴"过程中，全面压制了农民进行合法的副业生产的权力，并被指责限制农民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投入农村商品市场进行买卖。对许多农民来说，这种做法削弱了一条贴补收入的重要来源，并导致许多日常用品(从猪肉到竹制品)的严重不足，而集体经济不可能充分供应这些日常用品。批判这一极左思潮的观点认为，"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开展副业，而在于副业生产遵循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执行了一种什么样的政策"。[22] 毛以后农业政策的主题之一，即是恢复农村经济中私人成份的生机。在这点上，不仅"四人帮"路线被斥之为极左，而且家庭自留地，副业活动及农村市场都被称颂为有助于"逐渐"提高总产量，增加家庭收入，并因此而能为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作出贡献。[23]

"骗子们"还因在执行"以粮为纲"这一政策时的极端做法而受到批判。这一政策的意图本来是尽可能地提高粮食产量，以求实现地方和国家的自给自足，并为国家税收及余粮收购提供坚实的基础。执行这一政策的"左"倾倾向是"仅仅只看到粮食产量，而不从

事多种经营”，而右倾分子的错误则在于“从事多种经营以获取金钱，片面寻求现金收入及提高工分的价值。”[24] 右倾方法是通过鼓励资本主义倾向而削弱农村的集体经济，极左倾向却是通过严格限制农村经济的多样性（即执行削减如茶叶、烟草、花生及生姜这类能够获得较多收益“经济作物”的政策），来损害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任意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还导致人们把精力集中在对其他作物具有更大作用但不适宜栽种粮食的土地上。[25] 农业政策中与此相类似的其他一些错误也被归咎于“四人帮”。从1979年开始，逐渐扩大了一些土地来生产“经济作物”，以挖掘农村生产部门的收入潜力；同时，明确强调在一些可行的地方，要将“畜牧业放在第一位”，以改变中国整个以粮食为基本食物的局势。[26]

如上所述，农村工作中作为极左思潮表现形式而在1971年至1973年受到批判的许多政策，是在振奋人心的“学大寨”这面旗帜下进行的。在“骗子们”的农业路线被揭露后，推广大寨经验所采用的方法受到一种温和的责难。例如，1971年关于分配问题的指示对过分热情地接受大寨经验提出了警告：“（为了）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方法，（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事与群众商量，而不应不加考虑地全盘接受这一方法。”[27] 1971年至1972年对大寨经验的批评，确实没有条件达到1979年至1980年展开一场批评大寨的运动所达到的水平，它也没有直接揭露大寨这一典型本身的实质（与此相对照的是对这一典型的滥用）。大寨经验的每一个方面现在几乎都被判断为不适用于农业现代化计划，大寨和昔阳县（大寨是它的一部分）都被指责为在其发展中窜改了产量记录，歪曲了自力更生的位置。[28] 虽然有人认为，大寨在文革期间被拔高为一个最完美的典型，是因为它的许多做法符合林彪和“四人帮”推行的极左的路线，[29] 但是，在批判“四人帮”的最初阶段，曾有一种强有力的说法，认为江青强烈地憎恨大寨，因为大寨的经济是成功的，而在

她看来，这表明大寨忽视了政治。[30]

工业、科学和技术

“文革”期间，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工业生产纪律遭到破坏，这一点最先成为对“骗子们”进行连续指责的一部分。《人民日报》在总结了一家工厂与极左倾向斗争的经过后写道：“为了进一步清除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少数工人中的影响，……帮助大家进一步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什么是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修正主义黑货，什么是保证生产所必需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什么是束缚工人手脚的条条框框。”[31]同样，“四人帮”也因把所有能有效地予以执行的劳动纪律，看作是“对工人的管、卡、压”而受到批判。这样，“四人帮”就被指责为“肆意反对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鼓吹无政府主义。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32]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中国工业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其原因，一是文革强调“反对专家治厂”，二是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介入其中，技术革新小组为工人提供了参与原本属于专家职权范围的企业事务管理的机会。[33]1971年至1973年对极左路线的批评表明，党的某些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倾向走得实在太远了，而且这种倾向还使关键性的经济部门得不到它们所极为需要的专门知识和领导人员，从而危及中国推行现代化的能力。例如，这些批评者认为，专家们虽然确实应经常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以便与普通劳动者打成一片，并在生产中了解“基本形势”，但也应赋予他们以工厂技术工作的主要职责。不应该因为他们的专业技术，就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应鼓励他们“为革命学习技术”。[34]同样，工厂还进行了艰难的尝试，以发挥企业管理人员的作用，“防止忽视专门管理，只注意群众管理的倾向”。[35]这些批评者对工人参与技术革新、生产方向以及劳动管理作了限制。

与“骗子们”一样，“四人帮”也被指责为破坏了工业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把加强生产的领导体制说成是‘架空党’，把努力进行技术革新污蔑为‘技术挂帅’，诽谤那些献身于技术研究的人，把他们说成是‘走白专道路’，把加强无产阶级纪律污蔑为服从‘驯服工具论’。”[36] 在毛泽东以后，恢复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的作用也成为工业组织变化的重要问题，其特征是在1978年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并代之以直接的管理结构。[37]

“骗子们”的极左路线被说成是干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一家报纸指出，“左”倾分子在科学技术政策上的错误，在那时比右倾分子的错误更为严重，它认为：“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技术第一’的谬论及‘技术无用论’——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技术第一’谬论的翻版——其反革命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38] 这篇文章阐明了“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这一目标——它与“四人帮”倒台后正在重整旗鼓的现代化计划的要求极为相象。接着，这篇文章批判了极左路线对党和技术之间关系的歪曲：“技术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但当它为不同的阶级所掌握和运用时，它就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特性。……将政治居于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只抓政治而不抓技术。”[39] 邓小平在1978年的一篇讲话中，肯定了“科学是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反映了阶级关系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是为使科学技术非政治化而作出重要努力的一个象征。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力图消除极左观念所引起的“混乱”。这种观念认为，科学工作的衡量标准应该是意识形态，而不是它对社会主义物质发展所作的贡献。[40]

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待遇

对“骗子们”关于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政策上的有关批判，逐

渐扩展成对所有领域中有关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极左思潮的总批判。极左分子“只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而没有注意利用他们“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1〕“骗子们”认为，由于所有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因此脑袋里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为了批驳这种推论，1972年展开了一场辩论，认为判断知识分子政治方向的标准只能是他们是否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发挥他们的才干。〔42〕这场辩论是为了批驳据称为“四人帮”所作出的一种“估计”：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因此应将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而不应将他们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同盟军。〔43〕持反对意见人在这场辩论中阐明了后来为邓小平在1978年科学大会上所强调的观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即资产级级——作者注），而应该说成红了。”〔44〕这场辩论发展成为一种要求：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远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应被看作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他们与那些体力劳动者一样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45〕

一些老干部在1972年受到了大规模批判，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遭到了清洗，又不准重新出来工作。这里的问题是，对这些早就受到批判的老干部是予以彻底平反，并再次赋予他们具有职责和权力的地位，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是老干部而简单地不信任他们。例如，沈阳第三机床厂汇报了“一些同志”对恢复许多老干部工作的决定加以抵制的情况：“党委和革委会……准备逐步使一些老干部，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以进一步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但是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散布的极左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对重新让老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不信任，他们担心老干部会走上老

路。”[46]这种形式的批判仍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老干部确实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使他们在文革中垮了台。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批判极左思潮而提出同样问题时，文革前有关这些老干部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所有渎职罪名，都被强有力地否定了；其后，在批判“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极左路线时，重要的问题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这是“四人帮”全面迫害老干部的一部分罪行，他们认为这些老干部没有达到文革中所确立的“红”的标准，妨碍了中央的文革派及其追随着们实现其政治野心的企图。[47]

革命和生产

林彪和“四人帮”以一系列形而上学的观点代替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问题进行正确的辩证分析，这种做法也受到了指责。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导致从极左分子教条倾向出发，来处理社会主义发展中重要的斗争问题，并使这种处理充满了高度的不可调和性，同时还造成这样一种特征：占优势的积极的价值观附属于一个斗争重点，而几乎所有的消极的价值观都被归结于它的对立面，或被仅仅归结为辩证法的补充。批判者们认为，正确的方法是根据一个矛盾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去理解和行动，而不是根据在一种对抗的气氛中所强使它们形成的相互对立去理解和行动。据说“骗子们”和“四人帮”在判断干部和知识分子个人的长处时，只重视“红”（高度的意识形态忠诚）而不重视“专”，这便是这种形而上学观的表现。[48]

极左分子鼓吹，在工厂和公社这类经济单位中，革命和生产目的之间存在的就是这种关系，这一提法后来也受到了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错误是批判极左思潮的本质所在，即林彪和“四人帮”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持有一种片面的看法。根据这一说法，林彪和“四人帮”被说成是破坏了经济，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使中国人民陷入了贫困之中的罪魁祸首。

1971年至1973年，“骗子们”因“企图”“将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割裂开来”而受到严厉批判。他们推崇唯意志论的“精神万能论”，导致了太多的“空谈”和许多政治会议，这些会议转移了生产的注意力；他们严厉打击敢于“为革命而抓生产”的干部和工人；“所有把他们的空谈当成耳旁风的人都会被看作‘把生产置于一切事情之上’，‘业务挂帅’（并非政治）而受到污辱。”最后，极左分子也因为相信政治“能”促进生产而受到批判。[49]

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发动了一场几乎完全相同的大规模的批判。他们因用“三支毒箭”来破坏经济而受到谴责。这“三支毒箭”的目的在于将革命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为一种对抗性矛盾。他们认为：和政治相比，“生产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生产得以增长决定于是否狠抓革命”，“那些抓生产的人必定是修正主义者”。[50] 在“四人帮”以后占据统治地位的路线驳斥了极左分子关于革命政治将自动促进生产增长的观点，并且宣布政治和经济之间是一体的而非对抗的；同时还指出“在那些生产一团糟的地方，革命也肯定存在问题。”[51] 同样地，中国的新领导还修正和发展了在批“骗子”运动期间首次提出讨论的一个问题，即谴责极左分子贬低工业企业中健全的财政管理重要性的做法。新的路线断定，利润和政治并非是不相容的，对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来说，资本积累是一项崇高的革命任务。[52]

评价毛泽东思想

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林彪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场目的（至少部分的目的）在于揭露林彪的批判运动，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这种揭露主要采取了谴责“天才

论”和“英雄史观”的形式，而按照推测，林彪总是利用这些观点来为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服务的。[53] 这些“理论”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左”的内容。事实上，一个左倾分子可以把杰出人物吹捧为“天才”、“英雄”，而同时又可以颂扬群众的作用。“骗子们”也确实因鼓吹“早就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过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而受到批判。[54]

那些宣传极左路线的人因与毛泽东的紧密联系而取得了政治与权力上的实质性合法地位。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他们之所以支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与其可以理解的政治动机分不开的。《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也持这种观点。它指责“刘少奇一类骗子表面上抬高毛泽东思想，实际是贬低和污蔑了毛泽东思想，表面上是树立了毛主席的绝对的权威，实际上却是树立他们自己的绝对权威。”[55]

林彪把宣传“天才论”作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这一点受到了谴责(甚至在林彪以后这也是进行批判的重要主题)。然而这种谴责在1973年被明显地贴上了极右主义的标签。但批“骗子”运动的批“左”阶段也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希望以一种较温和的形式来更深刻地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等。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一点得到了实现。熟悉“四人帮”以后时代修辞语言的人们，这时将听到一种重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清晰回声——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为七十年代末进行的这种重新评价树立了榜样。

“骗子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和运用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一点也受到了批判。他们被说成僵硬地运用毛主席的特殊“教导”，而不考虑具体情况或历史内容。正如《人民日报》所评论的：“刘少奇一类骗子是不断变换手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初他们是把马列主义绝对化，否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在这一方法失败以后，他们又转过来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否认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把毛泽东思想

绝对化和凝固化，这本身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56〕换言之，不应该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僵硬的教条，而应根据变化着的具体情况加以发展或修正。

与此相关联的一种批判观点认为，“骗子们”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骗子们”对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采取这种态度恐怕是基于下列推断：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是一贯正确的，那么他的革命教导也必然是一贯正确的，有的宣传报道揭穿了这种推断。例如其中一篇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是绝对真理？毛主席有一个简明的定义：绝对真理就是‘无数相对真理之和’。既然‘无数’，当然是数不完的，也就是认识不完的，因此任何单独个人都不可能穷尽绝对真理，不可能享有科学上的绝对权威。……任何个人的认识，都是受主观和客观各种条件限制的，因此都不能具有无条件的、至高无上的意义。所谓‘没有谬误’的天才，穷尽了绝对真理的超人，是根本不存在的。”〔57〕意思非常明确：毛主席也是人，也会犯凡夫俗子所犯的错误，也会有凡夫俗子所有的疏忽。因此，他的思想也难免有错误，这才是自然合理的。

另一篇文章批判了“骗子们”将几种观点引向极端的做法（“四人帮”把这些观点说成是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引伸出来的）。接着它严肃地提醒它的读者：“毛主席教导我们：‘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路线还是错误路线，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58〕

这里还有一些共同点：即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来不断地理解并不断地发展所有的理论——即使是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如果发现某种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规律相脱节，那么就应修正或放弃这种理论。“先验论”（也就是将理论置于社会实践之上的理论）是极左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谬误之一。1971年至1973年批“骗子”运动也曾批判过这

种错误理论。

“骗子们”还被说成“抄袭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以篡改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59]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被说成是要另立思想体系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同时蒙蔽群众，造成他们的政治路线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和精神互相一致的假象。这就是说，他们用革命的外表掩盖了他们的路线，同时却将他们的对手说成是反革命分子，似乎是后者的目的和政策在危害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利益。

虽然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运动期间，并没有就涉及毛泽东思想性质的任何内容展开充分的讨论，但上述这些正在流行的思想意识问题似乎是批判极左思潮的一部分。当这种情况在林彪死后出现时，这一批判的大部分内容提醒了“文革派”——无论如何，都足以提醒他们——促使他们采取步骤停止了这种批判。非常明显，任何对毛泽东思想带有批判性的深刻评价，同时也将对“文革派”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正确性提出挑战，这样做势必要损害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抬轿人的“文革派”要求承继统治的合理性。在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遭到了清除，中央“文革派”逐渐失势，毛泽东思想中的错误方面及其相对性内容，也受到了修正，并被重新加以了详尽的阐述。同时，运用革命的意识形态来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具体问题的教条主义方法也得到纠正。在1978年至1979年期间，这些内容也成了批判极左思潮的主要组成部分。[60]

极左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批判“四人帮”以及在批判一般意义上的极左思潮时，一个主要的突破表现在1979年期间，把重点转向以客观内容作为分析政治路线方向的关键性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在此之前，批判“四人

帮”运动集中于批判其右倾本质，即揭露他们篡夺政权的反革命目的，以表明他们是如何以复辟资本主义作为真正目的的。根据这样的分析，“四人帮”的“左”倾错误只是些政策性的花招，与其卑劣的主要目的相比，这只是一些小玩意。在党内领导层中，有一部分人更正视极左思潮这种独特而邪恶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危害性，并愿意对此进行彻底的批判。但只有在他们巩固其权力以后，才可能进行这种批判。从政治路线方面来分析，这种极左思潮与右倾主义明显不同。

我们现在转而讨论林彪和“四人帮”路线的主要特色。林彪和“四人帮”的路线被说成是极左思潮的顶峰，它在“一整个历史时期”〔61〕（有二十多年）中统治了党，危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讨论的方法不同于上一节，上一节只概括了1971年至1973年期间那场失败的批“左”运动与1976年后批判“四人帮”运动这两者之间所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相似之处。现在，讨论的焦点将集中在极左政策的表现上，这种表现曾吸引了批判文章的注意力。我们将讨论林彪和“四人帮”的基本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构成了被称之为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完整体系”。〔62〕整个这种系统化的理论被看作是1966年和1976年之间极左路线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虽然所论及的极左倾向都归因于林彪和“四人帮”，但只有后者，才被认为执行了最具有系统表现形式的极左路线。〔63〕我们的分析还将考虑林彪和“四人帮”极左路线在经济、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表现，其方法是强调上述每个方面一到两个主要的内容，而这种内容已被认为是那一错误的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

经济内容

在批判“四人帮”鼓吹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理论时，就已包含了对“四人帮”的经济方面的极左路线的总的评价。〔64〕这就是说，“四人帮”的经济政策前提是，虽然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

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虽然中国的物质基础还相当落后，但社会主义仍可以飞速发展。本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能进行持续的变革，但激进分子为了把上述前提置于更绝对的气氛中，无视这种现实，相反却认为这种变革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他们的理论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忠诚所激发的政治性变革，将能补充在建设一个更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时的经济发展之不足。他们过多地把重点放在人的主观意志（"唯意志论"）上，把这种主观意志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而忽视了客观上的经济因素。这种做法受到了批判。[65]

虽然并没有指明林彪和"四人帮"完全忽视了经济问题，但他们仍被说成是遵循了如下逻辑：即发展生产最好是"抓革命"，[66]"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67]根据对这一路线的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把穷过渡视为左的和非常革命的事情。在编造'上层建筑决定论'的时候，又大肆鼓吹'生产关系决定论'。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他们似乎认为生产关系越先进，生产力就会发展得越快。"[68]这种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其对立面就是"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一个垃圾桶式的标签，激进分子曾经用它来描写某些人的社会主义发展方法，他们认为这些人过多地强调了经济问题，忽视了政治和意识形态。[69]

在批判"四人帮"的最初阶段（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对夸大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作用、相对轻视生产力作用的现象，是这样进行批判的：这是用来支持当时的流行观点，而鼓吹这种观点的人的路线应被分析为极右，或"形'左'实右"。这里的论据是，"四人帮"企图通过在上层建筑（例如教育、政治、文化）和生产关系（例如工厂管理、公社管理和组织）中制造混乱来削弱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从而破坏生产，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和复辟资本主义。[70]把革命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变成偏重于政治

方面这样一种绝对化的做法，是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从来没有被否认过。可是，在认为对"四人帮"的批判主要应对准他们的极右实质，而不是他们的"左"倾伪装后，"四人帮"路线的这种表现就成了不过是其主观的目的(篡权)和所企求的结果(复辟资本主义)的附属内容。当1979年初期对这一路线分析的实质性的批判尺度被人们接受时，"四人帮"关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也就被选了出来，当成了"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这种"假社会主义"本身被看作是"欺骗人民，鼓吹普遍贫穷的极左理论。"〔71〕

"穷过渡"是"四人帮"路线的一个方面，它的性质被界定为极左，因为它断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平均主义的教育政策，工人最大程度地参加企业管理，农村在所有制和核算方面从生产队提高到生产大队——能够独自提高和发展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它把这类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原理等同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本质。而"四人帮"倒台后对这一问题的结论是："它无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荒谬追求'先进的'生产关系。"〔72〕在外界条件不利于"四人帮"的论点时，他们仍顽固地鼓吹革命思想及革命政治，这是一种极左错误，这种极左错误把主观因素凌驾于客观条件之上，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历史阶段——这种错误也是在"大跃进"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期间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时的一个主要内容。〔73〕

在指责"四人帮"的路线为极右时，部分文章的论据含蓄地归之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条重要原则的特殊解释。〔74〕马克思指出，社会革命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内，当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落后于社会物质基础的变革时，阶级斗争就发生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

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75〕这是马克思对从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思考的基本观点。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革命的爆发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生了矛盾，而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代表了能向旧秩序挑战并最终推翻了这种旧秩序的一个新崛起的“进步”阶级。例如，在封建社会，以庄园经济组织为特征的生产关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革命，打碎封建阶级的“桎梏”，这种革命就为以重商主义和工业化为特征的新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随后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时，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发生。这时，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困不堪的无产阶级，将从工厂底层崛起，用暴力推翻垂死的资产阶级，以迎接一个最终达到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的崭新时代。

由于人们相信“四人帮”路线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中所造成的变化形式，已成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桎梏”(这是事实)，所以才认定“四人帮”路线的实质就是反革命，这并没有太多地扩展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三家主要的宣传工具所发表的联合社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论述“四人帮”的路线应被断定为本质上的右倾的：“为什么我们说‘四人帮’的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在他们控制下的宣传工具及资产阶级宗派体系构成了极端反革命的、腐朽不堪的上层建筑呢？根本的原因是，这一上层建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阻碍生产力的发展。”〔76〕

稍后，在论证对这一路线的批判时，所关注的并不是“四人帮”路线在经济领域里的影响，而是这篇社论所暗示的结论，即任何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倾向在本质上都一定是右倾——“四人帮”倒台后二年中对“四人帮”的整个批判运动其结论就是如此。直到1979年初对极左思潮展开更直接批判时，才认为一条不正常的路线干扰了决定其性质的经济基础的发展，这并不是合理的事实。

更确切地说，应分析这一路线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以确定这一路线是一种右倾错误(即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还是一种极左错误（即生产关系超越了物质发展水平)。根据这种区分，“‘左’倾倾向是林彪和‘四人帮’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内容和特点”，〔77〕因为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政策“超越了现阶段的可能性，超越了现实的限制。”〔78〕

在一开始，党也许只是勉强地认为“四人帮”路线的经济内容是极左思潮的体现，因为它的封闭的意识形态体系接近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毛主席在《矛盾论》(1937)中写道：“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79〕坦格·楚认为这一观点是毛泽东为使马克思主义适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重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节点。〔80〕“四人帮”认为，在阶级结构、社会组织、分配方式、权力及统治集团形式中继续进行革命变革乃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夸大点说，这一思想的逻辑基础就是毛泽东这一“重新阐述”的衍生。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对所谓“穷过渡”的意识形态含义所产生的全部明显的问题，当然愿意持谨慎态度。“四人帮”的错误与党内从反革命到右倾的所有问题具有联系，在这种已经确定的与过去的路线斗争的前后关联中来论述“四人帮”的错误，要比直接批判极左思潮以及——不可避免地——毛主义本身的问题这一更为艰难的任务显然要容易些。

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个有特色的贡献，就是洞察到社会主义能变质成为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还能逐渐促使资本主义复辟。〔81〕允许这种变质类型的发展，就是对或多或少历史必然向前发展这一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严重修正。但是，连毛主义这一革新本身，也成了一种僵硬的正统，因为它成了文革教条理论的一部

分。这一新教条告诉人们，修正主义只会来自右的方面（“资本主义道路”），而拒绝承认“左”倾倾向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威胁。这种对党内路线斗争的僵化观念以及僵化反应，部分解释了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批判“四人帮”的过程被曲解的缘由。直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已倒台两年多后，才突破了批“左”的“禁区”。这样，在对所有事情进行精确分析时，也分析了极左是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矛盾的根源这一可能性。这种分析预示着要详尽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而这种理论是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

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正统和变质类型的启发式概括见表二。这里所提供的是构成对极左路线的经济内容进行批判的逻辑基础的外延。这种详尽阐述被公认为进行得很好，超出了批判林彪和

表二

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正统类型和变质类型

	历史年代①	（一）生产关系	（二）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平衡②	生产方式
正统类型	1.封建主义后期	封建制度	先进	正　确	资本主义
	2.资本主义后期	资产阶级制度	先进	正　确	社会主义
	3.社会主义后期	社会主义制度	先进	正　确	共产主义
变质类型	4.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制度	先进	“右”	修正主义/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早期	共产主义制度	落后	“左”	“假社会主义”
	6.社会主义	封建主义制度	落后	“右”	“封建法西斯主义”
	7.资本主义早期	社会主义制度	落后	“左”	“原始共产主义”

注① “历史年代”是特定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不是指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年代。

注② “正确”是指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当“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成熟到足以引起革命变革时的那种形势。当这一本质上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处于“平衡”中），即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产生变质类型，其结果是右倾倾向；当生产力并没有发展到适宜于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维持和支持“革命”变革时，其结果是“左”倾倾向。

"四人帮"的明定范围，它的目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前后关联中来探究批判极左思潮的完整含义。不过它表明，批判极左思潮的基础乃是对社会主义定义的一贯老练的解释，而不是权力斗争中的牺牲者们在事后所作的十分合理的思索——毛泽东以后时代批判极左思潮的演进就是如此。

列于表二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正统类型几乎不需要加以说明。它们起源于马克思对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生产力的增长预示着现存生产关系的变革，并将导致这种变革；依次进行的这些变革预示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而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见表二之3）在性质上是渐进的，因为预示着历史变革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那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不会阻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进步变革，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则为物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相反，很明显的是，较早阶段（见表二之1和2）的过渡是革命性的，因为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竭力镇压对他们政权和特权的任何挑战。

可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变质类型需要一些详尽的解释。这些类型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可能离开正路的典型。这种离经叛道发生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或"平衡"）还不适宜于进行所希望的变革形式时。要么是在支持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时没有充分变革生产关系（表二之4和6）；要么是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这一被希望的程度（表二之5和7）。

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修正主义的更大危险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从而阐述了第一种变质类型（表二之4）。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下列推断为基础的：中国在六十年代初期确实面临着这样一种变质的发展情形；毛泽东的分析是（部分地根据他对苏联

社会中的矛盾估价)[82]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还没有完成，这就让那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了相当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纠正这种演变，使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希望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倒这些篡权者，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创造一种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驳斥这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是毛泽东以后批判极左思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变质类型5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形：社会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性超过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变质成了批判那些旧日的革命家的典型，这些革命家忽视了物质现实对社会变革的制约，过高地估计了社会对急剧变革的承受能力。这种类型是批判本书所描述的极左思潮的实质所在。如果允许这种类型约束住党内的摇摆，使之对人民产生影响，那么，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变质类型将引起一种高度不稳定的情形，这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被强加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情形——在批判“四人帮”运动中，这种情形被称作“假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通过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式，来阻碍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四人帮”顽固地坚持要严格限制中国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所有残余，顽固地鼓吹超越于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毛泽东以后，这些都受到了批判。这一点反映了对这种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变质类型的两个方面的批判，与大跃进“退下来”时对“共产风”和“共产主义萌芽”所进行的批判是一样的。

接下来的一种变质类型(表二之6)与前一类型具有紧密联系。“四人帮”被指控企图用“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以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他们通过削弱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基础的办法，为其篡党夺权打下了基础。因此，这种类型体现在对“四人帮”进行批判的一个方面：即继续集中于他们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而进行的极右活动，而这一点与他们的极左政治路线明显不同。这种变质类型仅有可能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中，即除了接受某

些社会主义的外表外，它仍然忍受着封建主义强大影响的痛苦。在一个封建和半封建的社会中，当落后的、小规模的生产力的变革不彻底，因而不能支持彻底根除传统的生产关系时，历史发展阶段中这样一种明显矛盾的说法才是可能的。

在中国的情形下，这一类型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下列现象，即国家官僚主义和专制统治的遗产，对权力的顽固和封建态度；缺少超前的资产阶级民主经验以及整个复杂的其他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都打上了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的烙印，打上了几乎还是空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烙印。事实上，批判林彪和"四人帮"，已发展成为对封建思想仍广泛影响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等问题的持久而严密的批判。〔83〕进行这种批判的推断就是，正是这些顽固的封建思想，为1957年至1976年间两个十年中的许多纷扰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一分析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应指向已深深扎根的封建残余，而不是指向表面上的"资本主义尾巴"。

最后一种类型（表二之7）所持的观点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治充分发展的社会中，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只有采取一种离经叛道的形式，否则就不应为承受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完全的过渡。这种观点声称，在一个（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假社会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某种结合。根据这一观点，整个中国革命都具有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科学"类型向极左类型演化的倾向，因为中国过去和现在在物质上都没有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事实上，所有自我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原始社会主义"。其特点则是官僚主义的严重统治，较低水平的生产力，极不平等的社会劳动分工。〔84〕

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三种类型评述了对"四人帮"极左思潮的

重要批判，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对极左思潮的一般批判。这些批判都涉及到当急躁革命家试图通过缩短历史发展的各个独立阶段来加速变革进程时所产生的许多老问题。

"四人帮"倒台后，官方的路线强调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整个历史发展中通常所起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85] "四个现代化"的趋势因声称"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86]而得到公认。1979年《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重新援引了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强调了现在将重点放在发展社会生产这一任务上的重要性。1956年的《决议》，是在五十年代早期的巩固阶段和过渡阶段后作出的。根据这个《决议》，党正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87] 在评述这一《决议》与1979年形势的关系时，该文写道："这一决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决议》明确告诉我们，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从那以后应当放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88]

《八大决议》据说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引导中国滑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集大成者。因此，在文革期间，它经常受到批判。在毛泽东以后的时代，这一决议才重新得到承认。这种情况象征着对过去所论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批判，因为这种论述体现了极左分子的"穷过渡"理论。

政治内容

"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颠倒敌我关系"被看作是极左路线政治内容的实质。[89]象提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

"理论"一样，极左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作用的观点，是从被夸大但又符合逻辑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另一突出贡献的外延演绎而来的。毛泽东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后，仍应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开展反对阶级关系中内在不平等的斗争对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来说具有注定性的意义。林彪和"四人帮"把毛泽东的教导"阶级斗争为纲"曲解成"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并歪曲说阶级斗争与同样是"纲"的科学实验、生产斗争是互相冲突的、而不是互相依存的关系，结果这种歪曲受到了批判。[90] 极左分子还把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无处不有，草木皆兵。党外有，党内也有，社会上有，家庭里也有。他们鼓吹'没有真空地带'，'处处摆开阶级斗争的战场'，直至造成'全面内战'的横祸"。[91]

极左路线还有这样一种逻辑：社会主义社会中某种持久的政治、社会、经济不平等形式反映了敌对的阶级关系；如果不解决这种阶级关系，那将导致资产阶级复活，资本主义复辟。[92] 要求以个人物质利益来刺激生产的实践和政策，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应大胆而积极地限制(甚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农民自留地、农村商品市场、工业中的各种工资等级(物质)政策、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时所引起的所有问题，都成了残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93]

而且，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那些因负有职责或占有职位而取得了权力、威名和特权的团体，被认为最有可能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94] 官僚主义和学究式的研究被认为是"新生资产阶级"最肥沃的温床；同时工厂和公社也能孕育阶级敌人，一些干部、农民和工人因技术、经验或自身经济利益都有可能玷污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象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一样，必须开展无休止的斗争来反对这一"新生资产阶级"和正在蔓延着的修正主义。极左分子被说成在进行这一斗争中，把那些完全应该属于"人民"行列中

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贴上了阶级敌人的标签："'四人帮'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老干部看作是'走资派'和'批判对象'；把老工人看作是'特权阶级'和'革命对象'；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臭老九'和'专政对象'；把农民看作是'小生产者'和'斗争对象'。"〔95〕

这种逐步升级的阶级斗争引起了混乱的后果。1966年至1976年间的经济，据说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工人被怂恿不去做工而去参加政治运动；由于过分限制增加个人收入的许多渠道，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受损害；以工厂民主化，把企业管理人员与反对生产实验挂起钩来，进行冷酷无情的批判，使企业管理混乱不堪；任意取消管理工厂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懒散状态，严重损害了劳动纪律。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破坏了社会民主生活和党内民主生活，这种民主生活被某种政治"错误"的高昂代价所约束，而且争论也被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所代替。同样地，法制也受到了破坏，因为司法的客观标准和程序已让位于一种非正式的和主观的（因此也常常是专断的）等级司法制。〔96〕阶级斗争在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无处不在的影响，破坏了各级行政组织的功能。老干部因其历史值得"怀疑"与"缺乏革命热情"而受到迫害、降级、撤职，被那些毫无经验但政治上忠诚的干部取而代之（在批"左"中，这些干部被贬为"乘直升飞机上来的人"，因为他们在"文革"中飞速升到了有权有势的地位）。结果，各级组织都出现了瘫痪和无能的情况，这就影响了整个政治和经济形势。

"四人帮"鼓吹在社会主义中社会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阶级斗争的做法，最初被解释为"四人帮"极右阴谋的一部分，认为他们动摇和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但当揭示出这条不正常的政治路线与搞宗派、搞阴谋的政治问题有区别时，才逐渐认识到应把"四人帮"的阶级斗争方法当作极左思潮的主要表现来进行批判。分析"四人帮"的阶级斗争路线的几个具体特

征，能使我们了解极左的性质。

1．“四人帮”“把‘阶级斗争’一词与马克思主义整个内容割裂开来……并过分强调了它的作用。”而右的路线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刘少奇一类“走资派”在文革期间最大的意识形态罪状之一。〔97〕

2．极左路线通过任意扩展“敌人”的范畴和缩小人民的范畴而不正当地扩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其结果是滥用高压手段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非对抗性矛盾，不合理地压制民主生活与不同意见。右倾的方法则是通过缩小“敌人”的范围，扩大“人民”（包括那些理应被镇压的组织和个人）的范围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功能。〔98〕

3．在对职业团体、文化工作、学术争鸣及个人的思想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时，“四人帮”强加了一些不现实的过高的标准，从而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形成了一种高度的政治对抗的效果。另一方面，右倾倾向却抛弃了所有的阶级分析，在评价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时，接受了一种“超阶级”的观点。〔99〕

4．“四人帮”强调要通过阶级斗争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其目的是要在中国经济中“堵住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被说成在实现这一目的过程中犯了极左错误，即过高地估计了在过渡时期初期中国接受更纯洁的社会主义组织形式和分配形式的物质和思想基础；过低地估计了在过渡阶段保留某种准资本主义实践的必要性。而极右路线则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这样做的方法是，允许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的因素，并且要使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发展成为不平等（起源于剥削）的牢固形式。〔100〕

5．无政府状态常常是受“四人帮”阶级斗争观点影响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他们鼓动工人去推翻用来“镇压”他们的规章制度；支持学生造“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提倡居民去检举揭发形形色

色的"走资派"，动员农民在农村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后果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纪律常常遭到破坏。这种无政府状态表现为罢工、长期的斗争运动、对任何权威不服从等等自发性的破坏，也表现为对参与政治的价值或者对参加劳动的价值的冷漠及玩世不恭。在马列主义体系中，普遍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极左思潮的一种表现，即反抗一切权威，最大程度的自由，不考虑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的群众参与。[101]而在权威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则是强调严格的经济和政治服从，漠视有能力的公民参与政府管理和从政的机会。[102]

总之，"四人帮"被说成是把阶级斗争看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唯一动力"。[103]因此，根据"四人帮"的这一极左路线制订的许多政策和计划，都突出地将阶级斗争作为出发点和评价的标准。这一方法与他们强调在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领域继续革命这一历史发展理论是一致的。换言之，在"左"倾分子看来，因为阶级斗争是生产关系的实质所在，而生产关系又是历史变革的实质所在，随之而来的逻辑是，在保证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应将阶级斗争看作是最重要的因素。而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声称，正是这种内在的一致性，使得极左路线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从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极左路线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虽然这一点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批判"四人帮"的明确而坚定的主题，[104]但是随着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重新强调生产和现代化，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新观点就显得相当不明确。这也许表明，要确定什么是中国后十年中的发展"动力"这一问题的影响和意义，相对来说，困难要更大一些。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同样是最初批判"四人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5]但是，这一点仅仅体现在通过一系列谨慎的步骤而选择的路线上，这条路线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作用。

"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的批判随着揭露其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并忽视经济问题而立即开始了。可是，批判的要旨相当混杂，迅速实现现代化这一新方向的思想特征因号召"通过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106]而显得有些模糊。大约在一年后，开始用这些观点来一致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解放生产力"，而不是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107]

在重新阐释阶级斗争时，还采用了第三个观点；即坚持"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必须服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08]这个观点因下列意见而更加精确了：应将经济现代化本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那些献身于现代化任务的人事实上正在实践毛泽东的格言("政治挂帅"及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的真谛。[109]1979年全国人大作出了总结性结论，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10]这无疑成了政治上极左路线的墓志铭。换言之，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一概念，已被团结和安定这一相反的价值观所代替，后者作为毛泽东以后政治中的有效原则而得到了强调。这种新的正统做法体现在"革命的统一战线"这一概念的修改上，现在它被称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11]

哲学内容

这一部分所要讨论的是中国称之为"思想"范畴的问题。[112]虽然这一短语的最精确的翻译应是"意识形态"，但我在这里将使用"哲学"这一词语，以避免与"意识形态"相混淆。"意识形态"一般是用来表示林彪和"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整个体系的有关内容，不仅包括上述的政治和经济的内容，也包括一些更理论化的内容。

把极左路线的哲学内容与这一路线的一些更具体的特性区分开来，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批判林彪和“四人帮”就要涉及到与他们有关的一些所谓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在极左路线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几乎每一个具体错误，都是与一个或几个邪恶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生产关系决定论”，“阶级斗争就是一切论”，“穷过渡论”，“读书无用论”，“政治决定一切论”，等等。毫无疑问，正确认识这些理论只是一种事后批判的结果，并没有准确地代表林彪和“四人帮”用来表达其政治纲领的明确方案。不过，这些“理论”确实使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察觉到极左路线所产生的影响。而“理论”一词（不管它是如何变成贬义词的）的使用，也确切地揭示了那条路线之所以具有系统性的原因。

这一部分的注意力将放在两个抽象的问题上（虽然也伴有一些具体的实际细节），这两个问题能被看作是极左路线的哲学框架。第一个是认识论问题，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人类知识的形成、积累以及政策制订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矛盾的性质问题，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原则和社会变革的动力。

人类的认识是通过一个辩证的过程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不停地相互转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根重要支柱。〔113〕虽然毛泽东在正确分析人类问题时，强调了实践的根本重要性——有人说这是实践“第一”，〔114〕但他的认识论的实质在于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极左路线被认为是在两个方面把这种辩证的关系搞得“绝对化”了，也就是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首先，林彪和“四人帮”通过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特殊解释和运用，而“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大搞教条主义”，这一做法在后来受到了谴责。〔115〕林彪和“四人帮”为了论证他们的政治路线在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从而不惜对“革命导师”的教导断章取义，把这些理论

上升为“超时空、超历史的绝对真理”，从而破坏了思想体系的系统性。这一做法也受到了谴责。[116]他们对待理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违背了下列原则：即所有的理论——即使是“革命导师”所赞成的理论——也应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受时间限制的。[117]

教条主义既能反映一种右倾错误，也能反映一种“左”倾错误。林彪和“四人帮”的教条主义就是一种“左”倾教条主义，因为他们割裂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统一，有目的地夸大它们的作用。他们散布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谬论，扩大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这些都被认为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其次，据称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肢解还包括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并通过一些更加模棱两可的片言只语的教条主义解释，来为他们那条极左路线的重要内容寻找理论依据。正如《红旗》杂志所指出的：“林彪和‘四人帮’的教条主义从‘左’的方面歪曲了革命导师的词句和理论，将它们推向极端，使真理变成了谬误。”[118]“四人帮”通过这种手法，割裂了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因此，从探讨极左路线的哲学内容这一出发点来看，这种过分强调理论而忽视实践的做法，是应该加以注意的最重要的一点。“四人帮”除了利用“绝对化”的手法赋于极左路线以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外，还使其成为一种具体的政治手段，一方面用来贬低老干部的能力和经验（这种技巧和经验是取得政治权威的一个根源），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们是如何坚持忠于他们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的。[119]

可是，与其为寻找合法性的依据而推崇理论的同时，极左路线在另外一些方面又过分强调实践而忽视理论的作用，从而又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表现出另一种“绝对化”的现象。林彪和“四人帮”被认为在其激进政策的内容中贬低理论的作用，而将全部重心放在实践经验上，这最明显地反映在“文革”的教育体制中。这种

体制把很大的重心放在“开门办学”之类的政策上，让教师和学生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和他们的学习无关的体力劳动上，课堂讲授和理论知识学习，在革命化学校的全部课程安排中只是次要的东西。[120]极左分子的科技政策也同样反映了对理论的不信任态度，只强调实践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基础理论的研究。[121]经济管理方面的政策也同样如此。在那里，“科学管理”被斥责为天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线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由普通工人所代替。[122]“四人帮”只强调实际、贬低理论的做法，被认为是一种极左的推理所致。因为如上所述，他们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阶级分析时，错误地认为理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他们正是凭藉这种“资本”才成功地攫取了权力和利益。所以，如果再进行这种理论研究，就只会腐蚀真正的革命价值观。

因此，看来在思想体系范围内，极左分子因过于强调理论而受到批判；但在更具体的政策问题上，他们又因把实践抬高到一个绝对的高度而受到谴责。这两方面的“绝对化”都被判断为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使理论和实践互相对立起来，破坏了它们之间固有的辩证统一。

至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和运用，现在正统的说法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革命导师”的理论，应在历史联系中加以评价，并且根据日益积累的经验和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发展和运用这些理论。[123]这些提法看来是意味着要对遵循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中的具体内容进行逐步的反省，并且更多地强调批判和分析的方法是衡量坚持还是反对这种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标准。在涉及教育、科技、经济管理等问题上，毛泽东以后的正统观点，是主张理论知识在促进社会主义发展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只要是努力为四化建设服务，课堂讲课、基础理论研究和“科学管理”就都是革命的。[124]

极左路线哲学内容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涉及到作为普遍存在和

社会发展这两个因素的矛盾的性质。矛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它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125]总的说来，这一理论认为，变革(自然和社会)是所有事物和生命中固有的内因和外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矛盾有统一性和斗争性这两个方面，统一性给予事物和生命具有为同一和存在所必须的稳定性，而斗争性则赋于所有事物以不停地运动和变化的特性，从而提供了发展的动力。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这些社会矛盾，并使之为政治目的服务。为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内达到这一目的，革命者必须认识到物质条件对人们的行为所具有的限制，并要在社会中为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这两个方面留有余地，以避免犯下和阶级敌人"无原则调和"的右倾错误，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犯下对无辜目标"进行残酷打击"的"左"倾错误。

林彪和"四人帮"在理论上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作用，不承认统一的重要性，从极左的方面贬低矛盾，从而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但就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更带哲学味的论述内容来说，极左分子解决现存的社会矛盾的方法，被说成是以滥用"一分为二"口号为特征。这一口号曾是1964年一场激烈的哲学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现在被看作是在"文革"风暴中很快爆发的意识形态冲突的预兆。[126]在那时，负责从意识形态上培养高级干部的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成了一场宣传中的攻击目标，因为他认为"合二为一"(而不是"一分为二")是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的主要方法。杨献珍的观点被批判，因为它反映了与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妥协的要求，并向毛主席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出了挑战。

这场哲学争论要解决社会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争论的方法变成了一场严厉的政治冲突——这要归咎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因为林彪和"四人帮""混淆了学术讨论和敌我斗争之间的界线"。[127]他们用毫无根据的阶级分析对待一个学术问题，用教

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标准来决定本应“通过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和讨论才能解决”的问题。林彪和“四人帮”的这种做法后来受到了谴责；人们争论说，处理这类问题的正确方法，应是鼓励“观点交流”和“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发表错误的意见”。[128]

更重要的是，片面强调“一分为二”被看作是极左路线在哲学上的重要表现之一。林彪和“四人帮”被指控“成功地使矛盾的统一和斗争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把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变成了‘对立斗争’法，把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歪曲为仅仅只有‘斗争’和‘分裂’的一个方面”。[129]把“一分为二”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地步有助于使阶级斗争取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这一合法地位，同时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国现代化服务这一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这一点后来也受到了指责。后来提出的问题是：“‘斗争’哲学与‘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难道不是和在批判‘合二为一’时所造成的理论混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吗？这种形而上学……严重束缚了思想，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不敢提及‘统一’、‘达到统一’及‘联合’等词句。”[130]

在“四人帮”以后，对社会矛盾性质的解释是，忽视斗争和忽视统一(特别是后者)都是错误的。“合二为一”和“两个对立方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现在被说成是反映了“革命导师曾大量加以阐述的观点”。[131]这种哲学观点与毛泽东以后强调“革命统一战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红与专的统一”等这类思想是相一致的，这和极左路线形而上学地只专注斗争和对抗的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 论

“文革”时期出现的极左路线之所以能有巨大感染力和广泛影

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部分解释(这一点是本章进行分析的明确主题)。首先，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在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世界观使得他们的路线具有了体系完整的特点。[132]就象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的领导人在把这种体系贴上极左标签时所主张的那样；这种体系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象这条路线的辩护士可能以为的那样，是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的正确运用。[133]但是，如果撇开其性质和影响的总的评价不论，仅就其发展模式的完整性来说，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确实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合理性和强有力的说服性。[134]

另一个原因是，这条路线的核心组成部分及其混杂的世界观，直接起源于毛泽东思想。极左路线所有经济的、政治的和哲学的奠基石——社会主义发展中生产关系决定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政治中的"纲"，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把"一分为二"强调为社会主义认识论和哲学的主要原则——都与普遍看作是毛泽东主义著名特征的那些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管这种关系是"夸大"还是"正确运用"，它们本身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如果看不到正是毛泽东思想的逻辑派生物才使极左路线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那就不可能全面地分析极左路线的产生和发展。[135]

注释

〔1〕多梅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进程》。

〔2〕哈定：《组织起来的中国》第309—317页。

〔3〕多梅斯：《文革以后的中国》第126—129页。

〔4〕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

〔5〕《人民日报》(1978.5.18)

〔6〕沃马克：同上，第775—776页。

〔7〕《人民日报》(1979.2.15)

〔8〕多梅斯，《文革以后的中国》；麦克斯韦尔，《学大寨》；米奇·梅斯纳尔，《农业学大寨》。

〔9〕〔10〕《人民日报》(1972.8.24)

〔11〕《人民日报》(1978.2.16)

〔12〕～〔1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年第82号)

〔15〕贵州人民广播电台(1978.5.11)

〔16〕《北京周报》1979年第16期

〔17〕《人民日报》(1972.8.7)

〔18〕有关重新肯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可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决定》，新华社电讯稿，1979年10月5日。

〔19〕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年第82号)

〔20〕《人民日报》(1972.3.18)

〔21〕《广东日报》(1978.3.17)

〔22〕《人民日报》(1972.10.18)

〔23〕《人民日报》(1978.1.31)

〔24〕福建人民广播电台(1972.6.5)

〔25〕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年第82号)

〔26〕《北京周报》1980年第4期第23—24页

〔27〕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年第82号)

〔28〕《人民日报》(1979.10.3)

〔29〕《北京周报》1980年第32期第5页

〔30〕《北京周报》1976年第46期第6—9页

〔31〕《人民日报》(1971.10.29，1972.1.24)

〔32〕《人民日报》(1977.2.1)

〔33〕翁多尔：同上，第7—8章。

〔34〕《光明日报》(1972.10.15)

〔35〕《人民日报》(1972.10.24)

〔36〕《人民日报》(1977.2.12)

〔37〕《北京周报》1978年第42期第12—15页。

〔38〕〔39〕《光明日报》(1971.10.6)

〔40〕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3.18)

〔41〕《光明日报》(1972.1.21)

〔42〕《光明日报》(1972.10.28)

〔43〕《光明日报》(1977.3.18)

〔44〕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3.18)

〔45〕同上，在七十年代初的《光明日报》(1972.11.25)、《人民日报》(1972.10.15，1972.10.29)上，曾登过一系列批判林彪在教育领域的极左路线的文章。与粉碎“四人帮”之后有关这方面的批判文章相比，可以发现这两个时期对教育领域的极左路线的批判，都是集中在过于重视意识形态、政治和阶级斗争上面，而否定正规的学校教育，否定课堂纪律和教师的权威。

〔46〕《光明日报》(1972.1.24，1971.10.26)

〔47〕《北京周报》1977年第14期第6—12页

〔48〕《光明日报》(1972.10.24)以及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3.18)

〔49〕《浙江日报》(1972.12.4)

〔50〕《光明日报》(1976.12.6)

〔51〕《红旗》1976年第12期

〔52〕《人民日报》(1972.11.6)

〔53〕考尔：同上，第160—174页。

〔54〕《北京周报》1972年第29期

〔55〕～〔57〕《人民日报》(1972.1.28)

〔58〕〔59〕《光明日报》(1972.1.25)

〔60〕《北京周报》1979年第47期第9—14页，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61〕《人民日报》(1979.2.16)

〔62〕《红旗》1979第4期第26页

〔63〕《人民日报》(1979.5.8)

〔64〕《解放日报》(1978.12.5)

〔65〕关于“四人帮”是怎样夸大“革命精神”作用的情况，可以参见《人民日报》(1979.2.16)以及路易斯：《政治变化诱因的社会限制》。

〔66〕《人民日报》(1979.3.9)，这里涉及到对“文革”的一句重要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的批判。

〔67〕有关“四人帮”相互勾结的情况，可参见《光明日报》(1976.11.30，1976.12.6)

〔68〕《解放日报》(1978.12.5)

〔69〕邹谠：《毛泽东思想》第510—512页。

〔70〕《光明日报》(1978.1.17)

〔71〕《人民日报》(1979.5.9)

〔72〕《解放日报》(1978.12.5)

〔73〕有关批判“四人帮”的唯意志论方面的文章，可参见《人民日报》(1978.1.26，1979.1.22)。

〔74〕康福思：《历史唯物主义》。

〔75〕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上，第2卷第82—83页。

〔76〕《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社论(1979.1.1)

〔77〕《光明日报》(1978.1.23)

〔78〕《人民日报》(1979.2.16)

〔79〕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同上。

〔80〕邹谠：《毛泽东思想》第498—501页。

〔81〕伊舍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

〔8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卫西(译音)：《红星照耀下的苏联》。

〔83〕《北京日报》(1980.8.15)

〔84〕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

〔85〕《北京内参》(1976.11.4)

〔86〕《红旗》1976年第12期

〔87〕〔88〕《光明日报》(1979.2.17)

〔89〕《红旗》1979年第4期第21页。邹谠在其《毛泽东思想》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是“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试图加以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

〔90〕《人民日报》(1977.12.12)

〔91〕《红旗》1979年第4期第21页

〔92〕邹谠：同上，第506—509页。

〔93〕《北京周报》1978年第6期第11—14页

〔94〕舒尔曼：《关于革命斗争》第49页。

〔95〕《红旗》1979年第4期第21页

〔96〕有关“四人帮”的路线对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影响问题，可参见《北京周报》1979第2期第25—30页，1978年第4期第21—22页。

〔97〕《人民日报》(1977.12.12)

〔98〕有关“四人帮”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的情况，可参见《北京周报》1978年第3期，第10—13页。

〔99〕莉茜：《中国的阴影》；怀特：《有关阶级和阶级出身的政治》。

〔100〕“四人帮”认为，任何形式的不平等，都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因此，在社会主义初期的过渡条件下，即使一些有益的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东西，也都应该一律取消。但事实上，保留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的状况，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

〔101〕按照中国人的分析，无政府主义有时也可以来自右倾的错误。例如在1956年至1957年间，百花齐放运动之后的反右运动，就是证明。

〔102〕“四人帮”被认为是利用无政府主义的极左观念来破坏革命纪律，以便乘乱夺权。参见《人民日报》(1978.5.9)。

〔103〕《红旗》1979年第4期第22页

〔104〕《人民日报》(1976.11.14)

〔105〕《解放日报》(1976.11.15)

〔106〕《文汇报》(1976.11.4)

〔107〕《人民日报》(1977.12.12)

〔108〕《光明日报》(1979.2.17)

〔109〕《人民日报》(1979.4.11)以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

报》。

〔110〕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1979.6.18)。

〔111〕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1978.2.26)。

〔112〕下一段话可以集中表达这一节的含义："……林彪和'四人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在政治上谈到敌我关系时，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二是在思想上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大搞教条主义。"——引自《红旗》1979年第4期第21页。

〔113〕〔114〕邹谠：同上，第501—503页。

〔115〕〔116〕《红期》1979年第4期第21页

〔117〕《人民日报》(1978.5.8)

〔118〕《红旗》1979年第4期第22页

〔119〕《解放日报》(1976.11.15)

〔120〕《光明日报》、《人民日报》(1978.9.24)

〔121〕戈德曼：《邓小平与科技问题的辩论》。

〔122〕《人民日报》(1977.2.12)

〔123〕《光明日报》(1979.2.24，1979.3.11)

〔124〕有关中国近年来教育方面变化的情况，可参见舍克：《教育改革和政治督促》；有关科技方面的内容，可参见雷顿-爱德逊：《毛泽东以后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内容，可参见费莱彻：《中国工业：新的路线》。

〔125〕康福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路易斯：《红色中国的领导阶层》；斯达尔：《继续革命》；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126〕所罗门，同上，第454—463页；斯达尔：同上，第24—27页；莫里斯·梅斯纳：同上，第301—303页。

〔127〕～〔131〕《光明日报》(1979.5.31)

〔132〕邹谠：《毛泽东思想》，第521—523页。

〔133〕贝特海姆：《大跃进》。

〔134〕艾尔·爱姆费德：《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中国》。

〔135〕有人认为，“四人帮”的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之间有着天然的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并认为有客观根据可以证明“四人帮”代表的是一条真正革命的路线，而中国现领导走的则是一条修正主义道路）。参见鲁塔：《加上毛泽东就构成“五人帮”》。

8

批判极左思潮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
> 列宁(1920)

本书所提及的各起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和互不相关的，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揭示了在中国政治中历次对极左思潮所作的批判的演变过程和作用。这样，就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把这些事情看成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总过程中的几个不同阶段，并且这些不同阶段又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将一方面通过对1958年以来展开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方式的回顾，另一方面通过在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最近一次批判极左思潮情况作出的对今后发展的预测，来进一步弄清这一发展过程的某些含义。

对批判的回顾

政治斗争和不彻底的批判

解放以来，对极左思潮共进行了三次主要的批判，我们已经在一些细节上对这三次批判中所蕴含的政治冲突方式进行了考察。这里我们将考虑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以求进一步弄清整个批判过程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每一个时期对极左思潮的批判，都成为中共党内相互对立的领导集团之间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各个集团都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支持或反对既定的批判和纠正"左"倾错误的运动。在上述的历次斗争中，有三组明显对立的对手，即在"大跃进"高潮时期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对立；林彪死后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的对立；"四人帮"垮台后"实践派"与"凡是派"的对立。这些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极大地影响了每个时期内批判极左思潮的发展方向。

1959年夏秋之季，由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而引起的一场批判运动，成为上述这类政治斗争的第一起事件，它为处理党内政策争论开创了一个后果严重的先例，对后来20多年里批"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毛泽东成功地操纵了庐山会议，使领导集团内冲突的情况及其后果都大大升级。[1] 这种情况就诱导人们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危害不在于"左"倾(例如那些被广泛认为要对"大跃进"战略所造成的明显失误负责的倾向)，而是在于右倾(例如归结为彭德怀和其他人对"大跃进"的批判)。这种"左"比右好的观点，为在六十年代初从"大跃进"全面后退时对极左未置一词的做法，提供了思想上的正当理由。这种观点还进一步削弱了党对反"左"的认识，也削弱了公众对"左"倾的反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经过长期酝酿考虑的关于修正主义

危险的主观论断，正逐步形成为一种广泛的政治偏执，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成为可能。因此，正是从庐山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和思想生活中对极左思潮的关注和批判，都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虽然毛泽东也曾经承认，对“大跃进”中的一些过火的冒进行为（如根据一些空想而采取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有必要进行调整。但在取得庐山上的胜利以后，他又重新努力加速经济的发展，推广某些“共产主义幼苗”的经验（如农村食堂和城市公社等）。1960年中，由于自然灾害和农民的抵制，“第二次大跃进”陷入了困境。这时为了拯救经济，在更实际的战略基础上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党开始执行各种新的政策。但是，由于庐山的全面摊牌而造成的“反右”的政治环境，要想对产生“大跃进”的那条路线进行彻底批判，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这时所能进行的，只能是一场不彻底的批判。在这期间，许多原先错误的政策都迅速得到纠正，但从总体上讲，极左思潮却并未得到相应的批评和分析。所以，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庐山会议后能在政治上全面批判极左思潮，而且在思想上还认为“没有必要”，因此，“大跃进”中出现的最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情况深刻地影响了本书所论及的此后的批判进程。

领导层内部的政治争论，最终导致批“左”的中途夭折（纠正了“大跃进”的某些错误，但没有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而且在林彪垮台后和“四人帮”垮台后，也都曾再次展开过批“左”运动，然而，也都同样出现了批判“不彻底”的情况。

在林彪垮台后所展开的批判，是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为名而揭开对极左路线的全面批判的。但在1973年中，批“左”由于老革命家——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团与文革派——以现在称之为“四人帮”为首的党内激进人物之间斗争的压力而流产。文革派为了防止批林批到自己头上，成功地把批判矛头由林彪的极

左错误改变为极右实质。然而，老革命家们仍有能力采取一些措施，纠正了一些他们所感到不安的“文革”中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因此，这一次批“左”运动也象“大跃进”时期一样，是以一场全面的批判开始，以一场不彻底的批判告终。在运动中，尽管极左思潮没有受到深刻的批判，但一些“左”的政策也继续得到了纠正。

“四人帮”垮台后，在一段时间里，批判和批判的结果呈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1976年后达两年之久，批判集中在“四人帮”的极右实质上面，即所谓“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决定了他们的路线是极右的。然而，即使在严厉谴责“四人帮”的极右实质时，也仍然对他们路线中显然是“左”的错误的东西，在政策上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因此，在批判“四人帮”的第一阶段，我们再次看到了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希冀在政策上纠正极左倾向，另一方面，却没有能相应地批判和分析极左路线的更为深刻的根源和内容。因此，在“四人帮”垮台后所开展的批“左”，仍然是一种不彻底的批判。只是其后到1978年底和1979年初之交，才开始出现了对极左思潮的全面批判。显然，从批判“大跃进”到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发展过程来看，不彻底的批判必然导致任何力图进行全面批判的做法中途夭折。

对批判“四人帮”过程中所出现的几种不同情况，人们可以提出几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批判“四人帮”的最初阶段，是和批邓、以及激进派力图控制毛泽东与其亡后的继承地位等情况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才能把从批判“四人帮”从前几个月中的反右倾火力中区分出来。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领导集团(凡是派)拖延的影响，也妨碍了转而对极左思潮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凡是派”出于政治利益需要而反对对“文革”本身进行全面的批判。第三种观点更引人注意，它认为对“四人帮”路线的批判过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复杂多变的情况，是在于这

一过程本身特性的极端复杂和敏感，它必然地要涉及到当代中国20多年历史的痛苦反思，涉及到对毛泽东的难以说清的作用进行痛苦的再评价。这种情况还反映了由于1958—1960年间和1971—1973年间所进行的不彻底的批判，已使得党难以从政治上有分析地解决这一解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极左思潮问题。

毛泽东和批判极左思潮

毛泽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都对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产生了种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长期以来，有关构成极左路线核心观点的种种思想，一直被认为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极左思潮所造成的广泛影响，是和对毛泽东主义某些基本信条表面上的崇拜分不开的。的确，由这种崇拜所派生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对极左思潮的批判难以进行下去。因为在什么是“极左”，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主义”之间，其差别并不总是很清楚的。更何况毛主席的思想中经常有表达含糊不清、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地方，因此极易为怀着不同目的的人所利用。(2)

在毛泽东一生的最后20年里，他对修正主义危险的主观臆断，也极大影响了批“左”的发展。毛泽东从1956年以来，主要关注着右倾机会主义问题。这种思维方式有力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观念，也极有力地影响到中国政治文化中流行的价值准则，因而使党在需要对政治路线的错误作出批判性判断时，经常缺乏应有的远见。这样说并不是不公正，充其量，党只是从思想上对极左思潮给予表面上的关注。更有甚之，对中国政治家来说，批判极左思潮绝对是一种冒险的事情，即使是稍稍涉及一下这个主题，都有可能使毛主席勃然大怒，从而有被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危险。尽管毛泽东曾经指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要敢于反潮流，但在中国现行制度的各个层次上，很难有既掌握权力、又有足够勇气的人，能对

毛泽东及其密友的那一套极左做法提出异议。极左思潮被认为是偶然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即往往是具有良好的愿望，但只是在具体做法上超越了现实。极左思潮的各种表现，诸如“大跃进”中的“五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等，都被看作是一些严重的偏差，但这些偏差又被认为是出于正确而又忠诚的政治路线，同由右倾路线派生的修正主义不一样，因此是不能用批判的方法来对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极左思潮缺乏远见，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能从解放后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所抱有的偏见这一事实得到解释。

毛泽东和批“左”之间的政治联系，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考察。首先最明显的，是主席和“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的主要拥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江青不仅是毛泽东的妻子，而且和林彪、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一样，其政治上的发迹有赖于毛泽东的扶助。这些人后来被指控犯下的极左错误，到底是在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下去做的，还是采取了欺骗毛泽东的做法，这还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些极左派都普遍被看成是毛泽东最忠实的助手、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的忠实推行者，正是由于这种声誉，因而使得他们多少在政治上是无懈可击的，除非是毛泽东本人亲手将其打倒(例如林彪)，或者是毛泽东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逮捕“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否则他们是安然无事的——因为他们的对手都必须要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

其次，毛泽东对两次主要运动(即极左路线得到全面展现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负有责任。因此，要想批判或抑制从激进动机中产生的过火政策，也就是象要批判极左路线的意识形态核心一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政策和观念都是经过毛泽东的首肯的。

第三，毛泽东必须对党内斗争方式的变化负责。这一变化是不断发展的，它使政策歧见的失败者受到了沉重的惩罚。弗里德里克

·戴维斯曾把这一变化描述为一种党内领导层的整风方式从说服倒退到压服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庐山会议，在“文革”达到了顶峰。〔3〕对党内出现的日益加剧的意见冲突，毛泽东认为这是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生死斗争的反映。在毛泽东以后，中国的分析家们认为，党内领导层在处理政策意见分歧上本来有一套长期形成的规章准则，后来之所以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作扩大化理解的“左”倾思想在作祟。然而，就我们的研究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中国体制的各个层次的领导人，都接受了对错误路线的强制性的认可，否则，他们也许会意识到对极左倾向需要进行批判。在研究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批“左”内容时，我们不能不追溯历史，探讨一下批“左”和党的生活准则的变化这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需要指出的是，党的生活准则的削弱，改变了原先的政治环境，使得对极左思潮进行全面批判的任何想法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又正是毛泽东个人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党内生活的各项准则。

最后一点是，在我们所讨论过的各个时期，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同意过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他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评价（包括他本人的自我批评），都只是对现实的很勉强的让步。他从未认为极左思潮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应加以批判。因此，当彭德怀敢于发表一些不同意见时，毛泽东极其强硬地斥责他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样，他不仅窒息了对“大跃进”的批判，而且还使人们失去了勇气，表明了任何对“左”的错误的进一步批判，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林彪死后，中国曾掀起一次批“左”运动。毛泽东在这期间起了什么作用，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在第五章中曾作了推测，认为老革命家派和文革派之间，可能会就林彪死后是否要开展一场批“左”运动而进行了争吵，毛泽东当时也许进行了干预，以迫使他

们达成妥协。如果这样做了，那末，他就要对那个时期的不彻底的批判负有责任，并造成了一个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已接近沸点的局面，从而使1976年10月的全面摊牌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然而，从有关文件看，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也就是说，在这期间，毛泽东对林彪的主要批评多数都是对林彪的阴谋和个人野心而作的，缺乏任何实质性的、与"左"倾相联系的思想和政策问题的批评。人们可以从这一点推测出，毛泽东当时几乎并不倾向支持老一辈革命家在1971年至1973年发起一场对极左思潮的全面批判。也许他认为，这样一种性质的批判，与解决由林彪事件所造成的主要矛盾是不相干的。

同样，毛泽东在去世前几年曾多次警告过"四人帮"，但其主要内容几乎只限于宗派主义问题。[4] 虽然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宗派主义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左"倾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的同志在政治上的一些特征，但这种特征至多不过是一种次要的现象，而谈不上是什么错误路线等等，这样就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发动起一场批判和纠正极左路线的运动的问题。

在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展开的批"左"运动的最初阶段里，毛泽东的影响仍具有极大的权威。批判"四人帮"运动的发展过程之所以如此曲折复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认识到，要真正全面分析极左路线的起源和影响，不可能不涉及到毛主席在晚年投下的沉重的阴影。一段时间内，新领导人力图避免把毛泽东和极左路线的灾难联系起来。例如，在1979年，《人民日报》曾宣称："现在已很清楚，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5] 1980年的中央全会宣布对刘少奇的批判"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最大冤案"。[6] 但在当时，有关毛泽东在这两起现被认为是由极左路线造成的最大的冤案中可能起到的作用，都只字不提。

在1979年至1980年间，批判极左思潮已更为直接地涉及到了毛泽东本人。〔7〕虽然当时有人仍然力图把毛主席同林彪和“四人帮”的那些最受人谴责的政治阴谋区分开来，但人们已普遍认为毛主席已犯了严重的思想错误，从而为极左路线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尽管毛泽东犯下了这些错误，但中央全会仍然对他的政治遗产给予了全面的评价，认为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缺点错误。正如当时《决议》指出的那样：“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8〕

总的来说，解放以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发展过程有着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却以一种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他的政治行为及其思想，逐步解除人们对与中国政治文化有关的“左”倾错误的警惕性，抹掉了那些力图阻止“左”倾浪潮的领导人各种努力。

在批判极左思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对“大跃进”的批判和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在许多方面都出现了何曾相似乃尔的情况。在语言上，它们都具有互换性，虽然每一起事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批判的目标几乎都是相似的具体政策问题。例如，三次批判都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的性质问题，尤其是与此相联系的物质刺激问题；社会主义发展中如何对待、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老干部(红与专对立)的问题；农村中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作用问题等。

上述问题中所发生的所有倾向性错误，关键都是在于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过渡性质的误解，其根源都集中在思想意识错误上面。极左分子由于其主观的世界观，及其对革命过程中许多具体问题采

取一种教条主义方法，从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政治方向和政策重点做出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判断。可以说他们的错误，在思想认识上表现了双重的谬误，即一方面反映了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错误，另一方面反映了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错误。而在唯物主义发展观看来，上述几个方面都是既有联系、又相分离的几个不同阶段。

第一个认识错误在于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向其转变的有内在联系的历史阶段之间的差异。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乃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极左思潮则错误地把某些资本主义的残余（资产阶级法权）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兆，认识不到这不过是较长时期内过渡进程中自然而必然的现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这种错误认识称作为"消极的极左思潮"的原因，这种错误认识强调不断斗争，以反对资本主义行为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

第二个认识错误是在于撇开了实行革命变革的唯物主义方法，忽略了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之间的差异。这种错误是以"超越"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水平的思想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它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高度自觉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来决定那些先决条件适合于过渡时期的社会。而实际上，这些条件是很不完备的。这种错误是一种"积极的极左思潮"，它竭力倡导和建立更高级的社会化和平均化的制度，在决策上要更多地体现平等，在价值观上要更多地向人民灌输公有观念，以加快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分析家们认为，极左思潮的这两种认识方式，实际上若不是低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过程中所受过的破坏性限制，就是对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了过高的估计。[9] 在上述我们已讨论过的三起批判事件中，极左的这两种表现形式，显然都是批判的目标。例如对"大跃进"的批判，主要是揭露了那些

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关的口号，抨击了那些对"共产主义幼苗"采取拔苗助长的做法。但从"大跃进"退下来，也包含了纠"左"的重要内容。例如重新肯定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等，这种情况后来在批林和批判"四人帮"时还曾再次出现过。又如对"文革"的批判，一方面涉及到对极左分子鼓吹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极左分子为消除文艺的"腐败影响"而采取的镇压措施；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迫害行为；对"走资派"的政治虐待的做法等，另一方面这种批判还涉及到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更带平均色彩的工农兵上大学）等，在当时这些"新生事物"被极左路线歌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关键所在。

虽然从"大跃进"到批林和批判"四人帮"的这三个时期里，都包含有对极左思潮的上述两种形式的批判，但是其中又各具特点。对"大跃进"的批判，是把矛头对准其积极的方面，而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批判，则是对准其消极的方面。二者相比，后者尤甚，因而赋予了后两次事件以特别复杂与恶毒的性质，从路线错误滑向了反革命。〔10〕

概括地说，就"大跃进"和毛泽东逝世后这之间对中国政治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功能与影响问题进行评价时，下列各点似乎是最突出的。第一，极左思潮显然并非仅仅是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出于自己狭隘的政治目的而强加给对手的一个多余的标签。当然，在操纵各次运动发展时，各派的斗争策略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应更确切地把它理解为：中国领导人2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上所进行的意义深远的争论。这种批判包括着某些主要领导人的一贯看法，即认为他们的一些同志所提出的观点和政策，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但事实上，极左思潮作为一种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反对的标签，一直有着严格的含义，而不象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那样，在意识形态上和政

治上到处被滥加使用。[11]

第二，现在被谴责为"极左"的这条路线，并不是一些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异想天开的产物。虽然会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用激进思想作为表达个人野心的工具，但是因其更纯粹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更坚决的对革命敌人进行不断斗争的态度，会使它的观点和纲领一时吸引很多忠实的信徒。

第三，由于和毛泽东本人及其哲学观连在一起，因此极左路线的威力和号召力就得到了无法估量的强化。极左路线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原则，都是源于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概念，而它所倡导的事物，则显然是以主席令人生畏的权威为其后盾的。极左路线从伟大舵手的庇荫下获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合法性，因此，任何向它挑战的企图都受到了严厉惩罚。

最后一点，中国政治文化的标准从1957年开始，就日益强烈地向"左"倾斜。反右运动、"大跃进"、庐山会议、林彪和"四人帮"的飞黄腾达等等，以及先后这20多年里新穿插的毛泽东进行的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斗争。这个逐渐得到强化的后果，是导致了中国政治制度中的思想瘫痪，即有效地扼制了那些反对极左思潮蔓延的人讲出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不仅困难而且还是前途难测的冒险，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同样，只有在毛泽东离开了历史舞台，才能对极左思潮展开更全面的批判，也就同样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了。

批判极左思潮和毛泽东以后的政治环境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一章里所加以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去世前的岁月里，因领导人的冲突和在思想上没有合法的地位，因而对极左思潮不彻底、不深刻的批判受到了阻碍；早先这种不彻底的批判所产生的使人麻木的后果，影响到后来进行更系统的批判。

现在，我们把焦点从对不彻底批判的回溯性分析，转到近年来对极左思潮进行的更全面的批判上来（在“四人帮”垮台后），看看这一批判对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政治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党内斗争、路线错误和反革命

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主要含义，似乎是为了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而要对路线错误和反革命活动之间的重要差别作出区分。在批判“四人帮”和处理与极左思潮有关的其他一般问题时，作出这种区分是关键性的一步。党内路线错误引起的非对抗性矛盾，不同于反革命与革命的对抗性矛盾，对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的认识，使得批判“四人帮”运动能够分成两条渠道进行：一方面，对他们极左的政治路线进行批判的分析；另一方面，揭露他们的宗派阴谋，由此而仍被定性为“在本质上是右的”。这场运动还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斗争形式进行了分析，并在党内斗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三者之间明确了差别。从而对于重新解释党的历史、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内斗争已被定义为：反映了党内“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12〕的矛盾。路线斗争则有更严重的定性，被认为是“党中央在一定时期内为达到革命或建设某一目标，在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如关于基本形势的估量，关于战略策略的采取，关于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所产生的形态比较完备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的原则分歧”。〔13〕导致党内斗争的种种矛盾，“在当前是普遍存在的”，这些矛盾的解决是“党的正常的民主生活”的一部分。而路线斗争“往往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产生的，而不是经常发生的”。〔14〕但是，这两种类型的斗争，只是党内斗争的不同方面，这些斗争反映了同志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非对抗性的方法来解决。

与党内斗争相并列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或者是人民与敌

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采取的是"对立阶级之间根本利害的冲突"[15]的形式。党解决这类阶级斗争的方法，就是强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现行的观点强调，必须把不常发生的主要的路线斗争，同更为频繁的党内斗争区分开来。路线斗争同样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是"同志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和不同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区分开来。[16]这样，客观上就一方面存在着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差异，另一方面存在着这两种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差异，关键在于前者之间是"原则性的分歧"，而后者之间则是"根本性的分歧"。

三种形式的斗争被认为是相互联系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都反映了过渡社会中矛盾的持久性；另一方面还因为某种斗争形式允许其不受限制地发展，则可能升级为更严重的斗争。毛泽东以后的官方观点坚持认为，在分析中或在政治上一定不能混淆不同形式的斗争，如象"四人帮"所干的那样，他们被谴责为在党内和社会上冷酷无情地寻找"走资派"。《红旗》杂志相对温和地指出，由于"四人帮"夸大了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阶级斗争，从而导致了"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内斗争出现了某些不正常的现象"。[17]

在毛泽东以后的时代，不同形式的思想斗争之间的差别，被清楚地区分开来，以便澄清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从而对解释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庐山会议以后，党的历史主要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之间一系列重大的斗争来写的。[18]即使和"四人帮"的斗争，也是按这种框架来描述的，并被称之为"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两条路线之间的重大斗争"。现在，有的两条路线斗争已被明确指出是不存在的，与此有牵连的一些主要的"坏人"，已在死后得到平反昭雪，如彭德怀和刘少奇，他们曾被认为是第八次和第九次路线斗争的敌人，但已分

别于1978年12月和1980年2月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19]

而且，就是对某些更早时期发生的，仍被称为路线斗争的那些对抗，也已经有了新的解释。《红旗》杂志指出："路线斗争虽事关重大，正确路线非胜不可，但从来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我们党内谁制定和推行了错误路线并导致了革命事业于失败，全党有理由结束他们的错误领导，对于他们的路线错误一定要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但这种严肃的斗争，不是意味着把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20] 对路线斗争的这种新的认识，进一步得出了如下结论：在解放前，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从未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也从未当作阶级斗争来对待。当时认为这些斗争仅仅反映了党内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问题。解放后，这些斗争都未被解释为根本的阶级斗争。直到极左派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重新描述党的历史时，陈、王、张的错误才被说成是敌我矛盾(即阶级斗争)，但这和他们的路线的"原则分歧"毫无关系，虽然他们后来由此而堕落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21]

人们对李立三也作了类似的重新评价，但是明显区别的是，指控他干过反革命活动的种种罪名得到完全的洗刷。虽然人们认为，李立三在1930年提出了以城市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他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党的批评，因而受到了信任。而后来在'文革'中把这种非对抗性的路线斗争上升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并对李立三进行"残酷迫害"，则是林彪和"四人帮"一手造成的。[22]

正如本书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当"四人帮"和林彪事件的余党在1980年被带上法庭时，对他们的指控只限于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是指控他们犯了如下罪行："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原文如此——译者)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

警惕修正主义的危险，批判过程中强调的是动员群众起来造反，而不是强调纠正错误。以前做法，是通过纠正错误达到"改正政治错误并实现新的团结"，现在则是强调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毫不留情地扫除猖狂的宗派主义"。〔28〕换言之，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四人帮"垮台时，三种斗争方式（党内斗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区别原则被破坏了，这种逐渐产生的、把思想冲突的不同形式不加区别地混淆起来的做法，给中国的政治制度带来极大的苦难和动荡。

1979年以后，对极左思潮全面批判的发展，也许预示了那些已是名存实亡的领导人冲突原则的恢复。这种批判不仅全面谴责了把阶级斗争引入党的政治生活，而且还直接把重新区分三种斗争形式作为深刻分析林彪和"四人帮"罪行的关键内容。这意味着要重新恢复党内斗争的指导路线，这一路线在庐山会议和"文革"前一直是有效的。我们可以预计今后在政策争论中失败的领导人所需付出的代价也会明显地减少。

这方面可作佐证的一个例子，就是"凡是派"成员在其经受了一系列的政治挫折后所受到的处置问题。"凡是派"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遭受到了一连串的失败，并在1980年1月党的五中全会达到顶点。当时，他们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些特殊政策表示反对，对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批判极左思潮反应冷淡。为此，他们受到了邓小平和"实践派"的谴责。对他们的处理，首先是降低了在中央的地位；其后，是被很有"礼貌"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撤换下来，并采用一种中央委员会关于"同意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同志辞职要求"的形式公布于众。〔29〕更为重要的是，解除他们的职务，并未同时展开一场批判他们的政治思想的运动。1980年至1982年间，对华国锋职务的解除方式，也是减少党内斗争代价的另一个例子。当时华国锋失去了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政治局委员等领导职务，并因压制"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等各种“左”的错误，而受到公开批评。然而与此同时，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席位，仍然得到了保留，并对他在粉粹“四人帮”时的作用予以了肯定，同时还承认他“在以后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30]

将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区分开来，除了要使党内生活逐步正常化以外，还可能预示要更多地向公众暴露一些领导层内部的政治分歧，以便在一党制条件下将来形成一种“忠实的反对派”情况。[31]这种得到制度保护的反对派——可以说在庐山会议前，这是党内统治集团“力量均衡”的一个特点——的存在，主要将取决于党内领导层的思想分歧的尖锐程度(在粉粹“四人帮”和放逐“凡是派”以后，新的矛盾又渐渐开始出现)，以及解决政策争论的程度上的合理化程度。

党内领导人在政治冲突上的相对缓和，其动机可能是什么？很明显，这一步骤与重新强调安定团结是一致的，而安定团结被认为是动员群众支持和参加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人们认为过去那种对抗性的群众运动和大规模的清洗，今后不应再出现了，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有热情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将全部才干用于新的秩序。此外，新的领导人急需恢复党的威信。但是，从庐山会议到“文革”结束，这期间尖锐的路线斗争，不仅使有的人从革命者变为阶下囚，而且还在中国领导层内造成了分裂。这种一直持续不断的政治自杀，使党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要想在公众中重新恢复这种威信，就必须要在党内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状态。否则，只会加剧原已为连年的斗争和动乱所造成的信任危机。[32]

“评价二十年”

批判极左思潮还为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带来了另一令人感兴趣的影响，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左”倾问题开始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从表面上看，这一提法似乎有些同义反复，但从上述

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念和政治文化中的极左思潮的批判来看，人们对极左路线的错误所带来的危险开始有着高度的敏感，态度已发生重大的变化。对极左路线的这种新的认识，和重新区分三种斗争形式的问题一样，将不仅对重新解释过去，而且也会对当前的政治行为，都产生出重要影响。

首先，从1978年到1980年，人们开始逐步地但却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自解放以来的30多年里并不是来自右的方面的修正主义，而正是来自极左方面的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造成了全面的巨大危害。1979年2月，《光明日报》发表了一封来信（很明显是选出来代表官方观点的），指出："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表明了我们实际上更多地是受到'左'的破坏，而不是右的破坏。"〔33〕另一封信以夸张的语言提到："为什么我们国家，一个实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八亿高度自觉性的人民的大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将近30年后，仍然贫穷落后？……根源就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34〕

这些年来，极左路线之所以有着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它对许多人仍具有吸引力，这些人一般说来是属于革命队伍中的人，批判"左"的错误犹豫不决；另一方面，由于以前的历次运动总是说左倾"危害较小"，批判火力大都猛烈地对准右倾，并将右倾说成是"危险的倾向"，这样就给另一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之现在对批"左"犹豫不决。〔35〕低估"左"的威胁，高估右的危险，这两种倾向结合的结果，就为极左路线横行霸道开了绿灯，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正如一篇文章指出的："对中国人民来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只面目凶恶的狼，'左'倾机会主义是一只笑面虎。我们深受这只笑面虎之害，全身是伤，差点丧命。"〔36〕

有一种提法，主张要"评价二十年"。就是要求对自解放以来"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进行全面的评价，这种提法认为，从1957年到1976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困难，其主要根源

就在于极左思潮。这种提法是与“四人帮”多次讲过的“评价十七年”相对立的。“四人帮”在他们的“评价”中认为，1949年至1966年间，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有支配地位。[37]现在的提法则认为，“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极左路线”。[38]这个“历史时期”的跨度问题，是一篇报告在研究安徽省1949年以来农村发展的方式时以含蓄的口吻提出来的。这篇报告先赞美了“从1954年到1957年我国农村稳定兴旺的形势”，然后指出：“然而，在过去二十年，一直存在着一个接一个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斗争。结果，人民失去了热情，领导部门瘫痪了，我们的队伍一片混乱……就拿安徽来说，这是从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1955年)的反右倾思想开始的。自那时以来，大多数农村政策是极左的。”[39]

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总体上讲，其目的是要击退“右派”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因而被认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斗争被扩大化了”，出现了严重的“不幸后果”。[40]因此，这一运动已被明确认为是导致极左思潮抬头的开始。不仅如此，而且现在通过推翻当时的各种错误决定，甚至摘去当时被认为处理正确的右派人物的帽子的做法，[41]表明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即反右运动通过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革命的最大威胁乃是来自右倾这一思想的广泛渲染，从而为极左路线的蔓延发展创造了一种有利的条件。

这个“评价二十年”，对“大跃进”和“文革”也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价，认为这两场运动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但“评价二十年”的提法并未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全盘否定，为了赞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53年至1957年和1962年至1966年这两个时期被单独作为“显示了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时期。[42]言外之意，没有提到的时期——即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和1966年至1976年(“文革”)——是极左路线盛行、社会主义没有发挥作用的时

期。而且，赋于1962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以“社会主义”性质，就在本质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存在理由。因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六十年代初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和“走资派”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巩固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曾有人力图——至少是官方——为“文革”的意识形态观念加以辩护，认为“文革”中出现的灾难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把“四人帮”批判为假“左”真右阶段时(1977年12月—1978年12月)，就有人认为批判“四人帮”不等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相反，还把这一阶段批判“四人帮”路线说成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部分。[43] 而当对“四人帮”路线的批判转向直接否定极左思潮时，就出现了对1966年至1976年时期的大胆评价。《光明日报》曾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其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是一场灾难？原因就在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左’倾路线。”[44] 但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问题只归结为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这种论述所暗含的意思，就是认为这场运动的本意(或路线)仍然是正确的。

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是“评价二十年”的一个重要内容。1979年10月，叶剑英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在这方面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叶剑英以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45]

叶剑英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只肯定发动了这场运动的动机，否定了从开始到结束时的全部行为。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

已去世的刘少奇平反，是走向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另一步骤。1981年，《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作的权威性的评价标志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决议》宣布：“‘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46)

批判极左思潮就是要否定它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的正统地位。同时还为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树立权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领导层的权力而言，对“左”的错误的极端反感和“评价二十年”，已经一方面理所当然地恢复了“文革”期间被清洗、被批判并靠边站的那些干部的权力；另一方面也理所当然地对那些在极左路线时期飞黄腾达的官员实行降级或清除。因此，批判极左思潮，不仅否定了强加予“文革”受害者的“站错队”或反革命的罪责，而且，还对他们遭受的政治迫害和人身迫害，给予了一种充分的安慰和殊荣。

更为重要的是，批判极左思潮，为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时期主要任务的观点从意识形态上论证了其合理性。“评价二十年”导致了用这样一种方式来重新评价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方面，它否定了极左路线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它又重新肯定那些一度被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的方针和具体政策，以用于为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服务。

对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教育形势的评价，是由批判极左思潮带来重大变化的又一个明显的例子。一方面，“文革”中的教育改革遭到谴责，其原因是，首先它过分强调实践，忽略理论学习；其次，在招生中实行平均主义政策，使大学内尽是一些低水平的学生；再次，这种“改革”在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借口下，鼓励学生不守纪律，不严肃认真地学习；最后，它以“政治是统帅”的名义破坏了学校教学和管理。另一方面，自“四人帮”倒台以来，由于

强调招生和升级的质量标准，学校重新肯定了专业管理和教师的权威，特别是强调必须掌握为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科学技术。新的教育措施带来一种考试编班制，这些措施不仅完全否定了“文革”模式，而且的的确确是六十年代初（和五十年代“大跃进”之前）教育制度的翻版而这些曾遭到极左路线的恶毒诅咒。[47]“评价二十年”的实质正是为这类政策的变化创造了转变思想的环境。

新的领导人为了清除林彪和“四人帮”路线的“余毒”，认为必须通过批判极左思潮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各项具体政策。在部分干部当中，“左”的思想的残余常使他们对现行路线的内容和方向态度暧昧。《人民日报》在一篇长文中批评了这些干部，“例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学习条件，有人认为这是对他们过于迁就；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某些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否定过去；为错划右派改正和为确实改造好的地、富分子摘帽，有人怀疑这是阶级路线有问题；发扬民主，有人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人则认为这是对革命导师不恭；……。还有的人甚至否定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这些都是用极左眼光看问题得出的结论。”[48]提出“评价二十年”的问题，一个主要原因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排除这类怀疑的态度，而这些怀疑态度被认为是中国实行现代化政策的严重障碍。

连续不断地进行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可能会使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念出现新的偏差。这种偏差的表现形式可能使人们对被称为“极左”的东西讳莫如深，以至于避免对现行政策中他们认为是右的倾向提出批评。或者，为了证明们们已经肃清了极左路线的“余毒”，而宁愿在政治倾向上违背本意，向右看齐。

但是如果重新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向右倾斜的意识形态体系，则是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本意相违背的。批判极左思潮，摒弃以往一旦

出现不同意见就大加讨伐的做法，主要是为了从总体上在党内和社会上建立一种更为开放的政治生活。但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以后的新领导人为了保持权力，为了复仇和实现现代化，对来自于"左"的方面的任何挑战采取严厉压制的做法，对国内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发展采取严格控制的态度，都是能够理解的。然而随着政治上的开放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党的地位的提高，这二者之间似乎有一种难以说清的联系，这种情况有利于创造出一个更为稳定的政治秩序，但是对于清除由"文革"带来的对政治参与的失望感，却见效甚微。

但是，意识形态向右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其原因之一，是在于现在的宣传部门都认为，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来看，过去被谴责为右倾的许多政策实际上是正确的。为了纠正极左路线的过火行为，党要求人民"克服对被称为右的东西的恐惧感"。[49] 更重要的是，极左思潮已被作为处理中国解放以来过去和现在一切问题的替罪羊。[50] 而这一切也许会导致出现一种新的教条。也就是说，人们将会对任何带有丝毫"左"倾色彩的观点看法，都持以一种坚决反对的态度。在这种气氛中，无论是野心勃勃的干部，还是谨小甚微的公民，可能都会认为"右比左好"——一个"左比右好"的对立物，"左比右好"的说法最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出现，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点。[51]

如果这种缺乏远见的新的思想批判形式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它将的确会对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对政策争论有着明显作用以外，还表现为可能掩盖了许多问题得以产生的真正原因。因为有的问题不仅仅只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原因，而且还是由于滥用政治权力，从而有助于推行这条路线的人得以上台的原因。当然，批判极左分子践踏民主与法制是一回事，而要真正认识到林彪、"四人帮"（以及毛泽东）只是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薄弱才能够为所欲为，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正如有一篇文章

指出的那样："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学到了以前不懂的东西。我们已经认识到'四人帮'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它完全是历史的产物。我们的法律不完备，法制不健全，缺乏保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可靠制度，从而给了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机……。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极端深刻、痛苦的教训。革命人民必须牢记这个教训，掌握民主与法制的武器。"〔52〕

在毛泽东以后，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新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同时，为了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扩大政治参与，做到司法程序制度化。〔53〕但是在1980年，他们借口于"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极左路线所利用，并从未对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起到过积极作用为理由，〔54〕把"四大"从国家的宪法中予以取消。这一情况表明，上述改革措施的范围和意义，迫切地有待于加以解释和确定。并且还表明了党总是倾向于把极左思潮一些主要方面的内容，看成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不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原因，而不是看成是这些矛盾的表现症状。

"四人帮"垮台以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已在许多方面发展成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加以净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大革命"转向四个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深远的方向性变化。〔55〕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以批判极左思潮为工具，建立起了人民群众对新秩序的信任，使指导中国达20多年之久的那套"左"的价值准则遭到了摒弃。但是，持久的安定不可能建立在只对过去作否定性评价上面，中国的未来更多地是取决于它的领导人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怎样成功地进行健康的改革。如果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除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应有的斗争和痛苦外，还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它将会引起另一轮以"左"反右的是非颠倒的斗争，将会使中国政治长久卷入有关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不同观点之间更加激烈的斗争之中。

注释

〔1〕迪特迈：《刘少奇》第344页；戴维斯：《政治》第613—615页。

〔2〕米尔顿：《风不止》。

〔3〕戴维斯：《政治》第612—614页。

〔4〕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8.12)

〔5〕《人民日报》(1979.3.8)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1980.2.29)

〔7〕最初对毛泽东提出批评的，是由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于1979年2月13日在中央理论工作会议上的一次长篇讲话，标题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见《明报月刊》(香港)1980年第170期第2—15页。

〔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1页。《决议》还明确了庐山发生的事情的责任，指出，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9〕"四人帮"怎样在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初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里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见克莱格，第2页。人们可以推测，在社会主义初期物质发展水平越低（就象被革命政权所确定的），过渡时期就将延续得越长，而"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就越为突出。

〔10〕系统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的特殊词汇，将揭示出这些暴烈和对抗性的词汇和口语的明显的偏见。迪特迈的文章《思想改造与文化革命》，虽然没有直接谈论上述问题，但却包含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论战特征怎样影响了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中国政治的令人感兴趣的讨论。

〔11〕1980年初为刘少奇恢复名誉的同时，有大量文章谈到历史上对"修正主义"一词的滥用，并试图对其作一个更清楚的定义。见《人民日报》(1980.4.3)；《北京周报》1980年第16期第19—23页。另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4页。

〔12〕～〔17〕《红旗》1979年第3期

〔18〕迪特迈：《理论与实践中的"路线斗争"》。

〔19〕邓小平在彭德怀、刘少奇平反大会上的讲话；另见迪特迈《死亡与美化》。

〔20〕《红旗》1979年第3期

〔21〕《人民日报》(1979.2.16)

〔22〕《北京周报》1980年第15期第3页。关于为李立三平反的更详细的报告见新华社电讯稿1980年3月20日。

〔23〕《北京周报》1980年第48期第3—4页

〔24〕《北京周报》1981年第1期第4页

〔25〕〔26〕戴维斯：《政治》。

〔27〕〔28〕迪特迈：《刘少奇》。

〔29〕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据说，汪东兴起初虽然被撤销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负责警卫党的高级干部的8341部队司令员的职务，但他仍保住了在政治局的位子和党的副主席的职务。吴德和陈锡联分别被撤销了北京市市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在中央的一般职务。见两篇来自香港的报道：《明报》(1979.1.7)；《争鸣》1979年第16期。

〔30〕《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1〕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于观点上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当然总是有分歧和对抗。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冲突似乎不太可能导致政治平衡，而这在过去是经常发生的。关于在一个一党制的体制中出现分歧的问题见亨廷顿的《一党制的社会与体制的不安定》。

〔32〕1980年初开始赞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克服所谓信仰危机的运动，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很好地注意到了他们的权威赖以立足的意识形态的脆弱的合法性。见《解放军报》(1980.1.12)，《文汇报》(1980.1.13)。

〔33〕《光明日报》(1979.2.17)

〔34〕同上，另见《光明日报》关于同一问题的另一篇文章。

〔35〕《人民日报》(1978.12.28)

〔36〕《光明日报》(1979.1.23)。还有一篇文章把"'左'的修正主

义”称为“化作美女的恶魔”，见《人民日报》(1979.1.26)。

〔37〕“评价十七年”，主要是针对文化、艺术和教育等领域的；但也可以说它曾被“四人帮”利用来污蔑1966年前的时期，是“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掌了权”。《北京周报》1979年第51期第4页。

〔38〕《人民日报》(1979.2.16)

〔39〕新华社电讯稿，(1979.1.15)

〔40〕《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9年第40期第15页；《人民日报》(1979.1.2)。还有一家香港杂志在1979年3月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基本上错了”，它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反映。见《争鸣》1979年第17期。

〔41〕《北京周报》1978年第47期第3页

〔42〕《光明日报》(1979.4.19)。1949—1953年被认为是巩固政权、恢复遭到世界大战和内战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时期，一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人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的。陆定一在一篇文章中对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间跨度提出了稍稍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后来发展成一条路线的左倾错误，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到纠正。它从1958年到1976年持续了18年。”《人民日报》(1979.3.8)。

《争鸣》(香港)1979第17期除了列举反右运动，还列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作为由极左路线引起的三次大灾难。另一篇关于同一问题的文章认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全部思想都是极左思潮的反映，因为它不符合1958年—1959年中国物质和思想发展的水平。关于反右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类似估价见纪新的《中共“左”倾思潮探索》，《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9月第94—100页。

〔43〕《人民日报》(1978.9.7)

〔44〕《光明日报》(1979.2.17)

〔45〕《北京周报》1979年第40期第15页

〔4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7〕塞克、派伊、格拉斯曼的文章

〔48〕《人民日报》(1979.6.22)

〔49〕《云南日报》(1979.3.2)

〔50〕《人民日报》(1979.6.8)

〔51〕关于"左比右好"的看法的起源和影响，见《人民日报》(1978.12.12)。

〔52〕《中国青年》1978年第3期

〔53〕纪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

〔54〕《北京周报》1980年第16期第3—4页

〔55〕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之间的重大差异的绝妙的分析，见迪尔莱克：《没有革命的社会主义》。

主要参考书目

〔1〕比扬·乔恩·阿恩，《中国政治和文化革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2〕波特·阿曼，《革命：重新解释》，载克利夫德·派恩顿与罗伯特·布拉克编：《为什么革命：理论与分析》，马萨诸塞，坎布里奇，森克曼出版社，1977年版。

〔3〕《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选》，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74年版。

〔4〕斯蒂芬·阿多斯：《中国工业革命(1949—1977)：政策、计划、管理》，纽约，潘神出版社，1977年版。

〔5〕汉纳·阿伦特，《论革命》，纽约，威金出版社，1965年版。

〔6〕所罗门·阿维尼：《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

〔7〕理查德·鲍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西方瞭望出版社，1980年版。

〔8〕BBC国际广播电台：《远东》，伦敦。

〔9〕戈登·贝内特：《华东：中国人民公社的故事》，西方瞭望出版社，1978年版。

〔10〕《政治标签与人口压力》，《时代景观》1969年第4期；《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1976年。

〔11〕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1917—1923》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6年版。《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组

织》，同上，1974年版。《经济核算与财产形式：一篇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文》，同上，1978年版。
〔12〕《大跃退》，载夏尔·贝特兰与莱尔·布尔登：《毛以后的中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版。
〔13〕弗兰兹·博克瑙：《世界共产主义》，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14〕康拉德·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15〕克兰·布里顿：《发动革命》，纽约，1952年版。
〔16〕爱玛·布恩斯：《马克思手册》，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35年版。
〔17〕巴里·伯顿：《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阴谋："5·16"集团》，《彭德怀问题》，香港，1968年版。
〔18〕戴维·考特：《1798年以来欧洲的左派运动》，纽约，1966年版。
〔19〕查尔斯·塞尔：《工作中的革命：中国的动员运动》，纽约，1977年版。
〔20〕戴维·A·查尔斯：《毛泽东文选提要》，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21〕菲力普·布里奇坎：《林彪的垮台》，《中国季刊》1973年第55期第427—449页。
〔22〕克里恩·布林顿：《革命解析》，纽约，葡萄丛书，1952年版。
〔23〕爱米尔·本斯：《马克思主义手册》，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35年版。
〔24〕巴里·伯顿：《文化大革命的阴谋集团："5·16"集团》，《亚洲综览》，1971年第11期第1029—1053页。
〔25〕《彭德怀事件》，香港，联合研究院，1968年。
〔26〕戴维·考特：《1798年以来欧洲的左派运动》，纽约，麦克格瑙书店，1966年版。
〔27〕查尔斯·谢尔：《工作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纽约，学术出版社，1977年版。
〔28〕帕里斯·H·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8年版。
〔29〕帕里斯·H·张：《中国秘密机关的首脑：汪东兴的崛起》，《中国季刊》1978年第73期第122—136页。
〔30〕戴维·查尔斯：《彭德怀元帅的解职》，载罗德里克·麦克法卡编《毛统治下的中国：命令政治》。
〔31〕杰罗姆·陈编《毛的著述：文选与书目》，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2〕钱兴礼(译音)：《反极“左”斗争与非毛化运动》，《问题与研究》，1979年第12期第32—51页。
〔33〕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2卷，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5年版。
〔34〕珍妮·克莱格：《文化大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中国政策研究组公报》，1969年第16—17期第1—4页。
〔35〕《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对政策文件的分析》，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36〕波依德·康普登编：《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件，1942—194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37〕莫里斯·康福思：《历史唯物主义》，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71年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同上。
〔38〕弗兰德里克·科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社制度：1963—1974》，载《对中国经济的再评价》，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华盛顿，美国新闻出版署，1975年版。
〔39〕琼·多比尔：《中国文革史》，纽约，葡萄丛书，1974年版。
〔40〕阿里夫·德里克：《没有革命的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例证》，《太平洋事务》1982年第4期第632—661页。
〔41〕洛厄尔·迪特迈：《死亡与美化：刘少奇的平反和当代中国政治》，《亚洲研究》，1981年第3期第455—480页。《理论与实践中的路线斗争：文化革命起源的再思考》，《中国季刊》，1977年第72期第675—712页。《刘少奇和中国的文化革命：群众批判的政治》，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思想改造和文化革命：中国政治象征主义

的分析》，《美国政治学评论》，1977年第1期第67—85页。
〔42〕约根·多梅斯：《文革以后的中国：两次大会之间的政治》，伦敦，1977年版。《中国国内政治的新进程：对再次调整的分析》，《亚洲综览》1973年第7期第633—647页。《公社的新改革：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述评》，《亚洲研究》1982年第2期第253—268页。
〔43〕唐苏平（译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失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12—20页。
〔44〕米诺拉德·M·德拉希科维奇：《革命的国际：1864—194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45〕加希·杜特《中国的农村公社：组织的难题》，伦敦，1967年版。
〔4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68年版。
〔47〕约瑟夫·伊金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近代中国》1977年第5期第41—78页。
〔48〕莱斯利·艾文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纽约，蒙纳特出版社，1978年版。
〔49〕《中国大陆期刊摘录》，香港，美国领事馆。
〔50〕安·芬维克：《中国的外贸政策与批邓运动》，载托马斯·芬加编《中国寻求独立：七十年代的政策演变》，西方瞭望出版社，1979年版。
〔51〕罗伯特·米歇尔·费尔德，卡茨林·麦克格林，威廉·阿伯莱特：《中国的政治冲突和工业增长：1965—1977》，载《毛以后的中国经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78年版。
〔52〕马丁·弗莱彻：《中国的工业关系：新方针》，《太平洋事务》，1979年第1期第78—94页。
〔53〕《对外广播情报署每月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54〕约翰·加德勒，瓦尔特·艾德马：《中国的教育革命》，载斯图尔特·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与文化变革》。
〔55〕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角色》，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56〕乔尔·格拉斯曼：《中国共产党领导政策的变化与连续性：两条路线斗争与增额变化》；《当代中国》1978年第2期第51—70页。
〔57〕默尔·戈德曼：《中国的批孔运动：1973—1974》，《中国季刊》1975年第63期第435—462页。《邓小平与关于科学技术的论争》，《当代中国》1978年第4期第46—49页。
〔58〕托马斯·戈特立著：《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派主义与战略三角的起源》，兰德公司报告，1977年。杰克·格雷：《两条道路：中国社会变革与经济成长的战略抉择》，载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与文化变革》。
〔59〕雅克·杰利马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21—1949》，纽约，雷顿出版公司，1972年版。
〔60〕约翰·贡纳尔曼：《革命的道德含义》，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61〕约翰·G·吉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挑战》，纽约，1980年版。
〔62〕梅尔文·格托夫：《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与外交事务》，载托马斯·罗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63〕马克·A·哈格平：《革命的现象》，纽约，1974年版。
〔64〕哈里·哈定：《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共产主义问题》1977年第2期第1—18页，1977年版。《中国政治中的组织问题：1949—1975》《第五次中美关于大陆中国的会议录》，台北，1976年。《组织起来的中国：官僚化问题：1949—1976》，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65〕奈杰尔·哈里斯：《神灵训示：马克思和毛泽东在当代中国》，伦敦，1978年版。
〔66〕詹姆斯·P·哈里逊：《通往政权的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21—1971年》，纽约，1972年版。
〔67〕威廉·欣顿：《中国农村革命资料集》，纽约，葡萄丛书，1966年版。《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纽约，1973年版。

《中国的转折点》，纽约，1972年版。
〔68〕查尔斯·哈夫曼：《红色中国激进政策的基础》，《亚洲瞭望》1963年第5期第245—257页。
〔69〕罗克斯·D·霍帕：《革命的历程》，引自《如何革命？理论和分析》，马萨诸塞，坎布里奇，杰克曼出版社，1971年版。
〔70〕克里斯托夫·豪：《文化革命前后的劳动组织与工业刺激政策》，载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与文化变革》，1971年版。
〔7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中社会的政治秩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一党制的社会与制度动力》，载塞缪尔·亨廷顿、克莱门·莫莱：《现代社会的权威政治》，1970年版。
〔72〕爱里斯·约瑟夫：《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国领导层内的冲突(1959—1962)》，1975年版。《文革以后中国军队介入的效果》，1973年版。
〔73〕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波士顿，1966年版。
〔74〕特茨亚·科塔卡：《大跃进的政治理论》，引自《社会研究》1969年第1期第36卷第93—122页。
〔75〕马歇尔·Y·M·高：《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集团》，1975年版。
〔76〕艾沙克·克拉姆尼克：《革命观，近代学者的定义和解释》，引自《历史和理论》1972年第1期第11卷第26—63页。
〔77〕V·I·克里斯托弗：《毛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歪曲》，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0年版。
〔78〕戴维·M·利普顿：《卫生，斗争与中国政治体制》，1974年版。
〔79〕梅尔文·J·拉斯克：《乌托邦和革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80〕伦萨利·W·李：《下放制度，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引自《中国季刊》1966年第28期第40—62页。
〔81〕约翰·威尔逊·路易斯：《导论：中国的领导和权力》，见《中国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权》，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领袖、政委和官僚：革命后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见贺平第与邹谠编《危机中的

中国》第1卷第2部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则，人民公社的教训》，《亚洲评论》1963年第3卷第10期第457—464页。《红色中国的领导层》、《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的政治缩影》，《美国政治学评论》1966年第4卷第60页，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红色中国的主要资料》，纽约，1964年版。

〔82〕赛蒙·利斯，《中国的阴影》，纽约，1977年版。

〔83〕凯林斯·利伯塞尔，《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治继承》，引自《国际事务评论》1978年第32卷第2期第7—1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政治》，见《共产主义问题》1978年第3期第1—17页。《1975—1976年间中国的政治冲突》，见《当代中国》1976年第2期第7—14页。

〔84〕维克多·D·李普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公社》，见《近代中国》1977年第3卷第2期第237—254页。《大跃进的再思考》，《近代中国》1975年第1期第92—115页。

〔85〕雷蒙德·鲁塔：《加上毛泽东就构成"五人帮"：毛泽东最后的大战》，芝加哥，1978年版。

〔86〕理查德·罗温索尔：《共产党的政策：发展还是乌托邦？》，见查默斯·约翰逊：《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变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版。

〔87〕罗德里克·麦克法卡，《红色中国的党内分歧》，见《太平洋评论》1958年第31卷第4期第323—335页。《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的矛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毛泽东的中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版。

〔88〕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批判》，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7年版。《毛泽东思想综录》，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局，阿林顿1974年，编号61269—1、61269—2。《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外文出版社，1971年版。《毛泽东选集》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1977年版。

〔89〕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纽约国际出版社，1968年版。

〔90〕安东尼·马斯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之父》，伦敦，1974年版。
〔91〕奈弗尔·麦克斯韦：《学大寨》，引自《世界发展》1975年第3卷第7—8期第477—481页。
〔92〕克劳斯·梅纳特：《北京和新右派》，伯克利，中国问题研究中心，1969年版。
〔93〕莫里斯·梅斯纳：《列宁主义和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民粹派观点》，引自《中国季刊》1971年第45期第2—36页。《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纽约，自由出版社，1977年版。《毛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课题》，引自J·W·路易斯：《亚洲的农民起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94〕米歇尔·梅斯纳：《农业学大寨》，引自《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大寨：实践中的群众路线》，引自《近代中国》1978年第4卷第1期第27—62页。
〔95〕戴维·米尔顿、兰希·达尔·米尔顿：《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革命中国的岁月：1964—1969》，纽约，潘神图书社，1976年版。
〔96〕彼特·R·穆迪：《政治斗争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1973年版。
〔97〕安德雷·拉登：《中国共产党政治的宗派主义样板》，《中国季刊》1973年第53期第34—6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摇摆：一个批判》，《中国季刊》1976年第68期第720—750页。
〔98〕维克多·李：《革命与官僚：文革中的上海》，载维克多·李与詹姆斯合编：《中国未间断的革命：从1840年到现在》，纽约，潘神图书社，1975年版。
〔99〕彼得·罗兰、戈登·怀特：《社会主义发展和乡村不平等：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农民研究杂志》1979年第1期第3—48页。
〔100〕马科斯·罗纳德：《无政府主义传统》，引自德拉希科维奇·米诺拉德：《革命国际1864—1943》。
〔101〕米歇尔·奥森贝格与斯蒂芬·戈尔斯坦：《中国政治分列》，载《共产主义问题》1974年第2期第1—13页。
〔102〕派特尔·沃尔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载《批判》1977年第8期第4—41页。

〔103〕安德列斯·奥尼亚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芝加哥，1979年版。《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被捕》，引自《中国季刊》1978年第75期第540—565页。
〔104〕威廉姆·L·帕里什和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105〕詹姆斯·派克：《革命，还是现代化与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见上述《中国未间断的革命》。
〔106〕苏珊娜·派帕：《教育和革命：中国模式之修正》，《亚洲观察》1978年第9期第847—890页。
〔107〕琼·S·帕已拉：《红色中国的政治经济》，1970年版。
〔108〕卢西恩·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剑桥，1981年版。
〔109〕纪新(译音)：《四人帮事件》，香港，宇宙丛书，1977年版。《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左倾》，载香港《七十年代》1978年10月第30—37页。《文革“左”倾的极度发展》，载香港《七十年代》1978年12月第70—78页。《中共左倾思潮探索》，载香港《七十年代》1978年9月第94—100页。
〔110〕纪新(译音)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香港，宇宙丛书，1979年版。
〔111〕詹姆斯·雷顿-安德逊：《毛泽东以后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引自《近代中国》1979年第4卷第2期第37—45页。
〔112〕戴维·雷斯尼克：《粗暴的共产主义和革命》引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76年第70卷第4期第1136—1145页。
〔11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年版。
〔114〕埃德温·赖斯：《邓小平的第二次沉浮》，引自《中国周刊》1976年第67期第494—500页。
〔115〕卡尔·雷斯金：《毛主义和激励机制：中国的劳动刺激》，引自维克多·李和詹姆斯·派克所著《中国不间断的革命》，同上。《小工业和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季刊》1971年第46期第258—246页。
〔116〕约翰·E·鲁：《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1927—193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117〕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1970年版。《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毛主席和人民的谈话：讲话与书信，1956—1971》，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毛泽东和不断革命理论》，《中国季刊》1971年第46期第221—244页。
〔118〕弗兰兹·舒尔曼：《红色中国的思想和组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70年版。《论革命家的冲突》，《国际研究杂志》1969年第1期第36—53页。
〔119〕本杰明·施瓦茨：《现代化与毛派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目标的评论》，同上列《毛的中国》。
〔120〕苏珊·舍克，《教育改革和政策退步：中国教育政策的最近变化》，载《当代教育评论》1979年6月第183—213页。
〔121〕威廉·G·斯金纳，《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引自《亚洲研究评论》1965年第24卷第3期第363—399页。
〔122〕莱斯利·斯克拉，《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结构中的生产、生产力和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引自《农民问题研究》1979年第6卷第3期第311—341页。
〔123〕阿尔伯特·索博尔，《法兰西革命简史，1789—1799》，贝克利分校出版社，1977年版。
〔124〕多罗舍·J·索林格，《中国西南的地方政府和利益组合（1949—195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77年版。
〔125〕理查德·H·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71年版。
〔126〕《斯大林全集》1—13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3—1954年版。
〔127〕约翰·布赖恩·斯达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意识形态和文化：当代中国政治辩证法导论》，纽约，1973年版。
〔128〕约翰·布赖恩·斯达尔与兰希·安妮·戴尔，《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书目提要和索引》，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1976年。
〔129〕《中国大陆期刊综览》，香港，美国领事馆。《中国大陆出版社综

究》，香港，美国领事馆。
〔130〕保罗·斯威齐：《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危机》，《每月评论》1979年第2期第20—24页。
〔131〕保罗·斯威齐，夏尔·贝特兰：《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增订第2版。
〔132〕弗雷德里克·戴维斯：《整风的起源：解放前党内的情况与教育》，《中国季刊》1976年第65期第15—53页。
〔133〕保罗·托马斯：《卡尔·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伦敦，1980年版。
〔134〕希勒尔·迪克丁：《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73年第20—41页。
〔135〕查尔斯·悌利：《从动员到革命》，宾夕法尼亚，爱迪森-威斯利，1978年。《革命和集体的暴力》，引自弗莱德·格林斯坦，莱尔逊·波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第3卷，宾夕法尼亚，爱迪森-威斯利，1975年。
〔136〕莱昂·托洛茨基：《论俄国革命》，杜比选编，纽约双日出版社，1959年版。
〔137〕邹谠：《毛泽东思想，为了成功而进行的最后斗争，毛泽东以后的时代》，引自《中国季刊》1977年第71期第498—527页。
〔138〕邹谠、马克·布莱彻、米歇尔·梅斯纳：《农村责任制在大寨与昔阳的贯彻》，《近代中国》1982年第1期第41—104页。
〔139〕罗伯特·C·塔克：《马克思的革命理想》，纽约，1969年版。《一种新型政党：反对极左路线》，纽约，1977年版。
〔140〕亚当·乌拉姆：《以人民的名义：革命俄国的预言家和共谋者》，纽约，1977年版。《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今世界》，纽约，1977年版。
〔141〕杰布·冯·欣内肯：《林彪的崛起与陨落》，纽约，1977年版。
〔142〕弗里德里克·齐·威克曼.《历史和意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73年版。
〔143〕伊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纲领和政

治，1949—1968》，纽约，1969年版。
〔144〕安德鲁·瓦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革命》，引自《中国问题研究》1977年第32期。
〔145〕肯尼思·R·沃克：《中国农村的计划：社会化和私人角色(1956—1962)》，芝加哥，1965年版。
〔146〕迈克尔斯·沃勒：《共产主义的语言》，伦敦，1972年版。
〔147〕王若水：《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香港，《明报月刊》1980年第170期第2—15页。
〔148〕卫西(译音)《新沙皇统治下的苏联》，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年版。
〔149〕E·F·惠尔普特和麦克法兰·布鲁斯：《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文化革命的经济》，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
〔150〕戈登·怀特：《阶级的政治和阶级的起源：文化革命的产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波士顿，1977年版。
〔151〕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即《红都女皇》——译注)，波士顿，1977年版。
〔152〕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以来中国的政治和认识论》，引自《中国周刊》1977年第80期第768—792页。
〔153〕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产生：毛泽东、陈伯达对中国理论的探寻193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4〕格雷厄姆·杨：《从人民内部矛盾到阶级斗争》，《亚洲评论》1978年第18卷第9期第913—933页。《关于群众路线》，引自《近代中国》1980年第6卷第2期第225—240页。
〔155〕戴维·S·茨威格：《第二次文化革命：为什么能和为什么不能》，引自《近代中国》1978年第2卷第2期第81—91页。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